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成果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南近代文化论稿/刘圣宜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 10  
(岭南学丛书/左鹏军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2950 - 8

I. 岭... II. 刘... III. 文化史—研究—广东省—近代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177 号

---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嵇春霞

封面设计: 罗春兰

责任校对: 张 辉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mailto: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规 格: 787mm×960mm 1/16 16.5 印张 314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500 册 定 价: 38.00 元

---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岭南学丛书”缘起 .....	左鹏军 (1)
前言 .....	(1)

## 第一章 共性·个性

岭南文化论析 .....	(3)
岭南近代商品文化的发育 .....	(11)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	(19)
近代风云变幻与广州文化的发展 .....	(25)
近代广州风习民情演变的若干态势 .....	(33)

## 第二章 冲突·交流

澳门多元文化的历史形态 .....	(47)
华夷观念与律劳卑事件 .....	(53)
19世纪中叶中英冲突的由来及结果 .....	(61)
《循环日报》的创办与西学在岭南的传播 .....	(70)

## 第三章 地域·思潮

香港与中国近代改革思潮 .....	(83)
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官僚制度的批判 .....	(90)

岭南革命派对确立三民主义的贡献 .....	(95)
清末实业救国思潮兴起之原因 .....	(103)
辛亥革命与实业救国思潮的高涨 .....	(111)
理财救亡论：孙中山、梁启超、梁士诒之主张 .....	(119)
20 世纪思想界之开篇：民族主义 .....	(128)
孙中山梁启超社会主义观之比较 .....	(135)

## 第四章 时代·人物

洪仁玕与基督教 .....	(153)
王韬与早期中西交流	
——以《循环日报》为中心 .....	(159)
容闳：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	(167)
郑观应研究 .....	(174)
梁庆桂与晚清广东维新运动 .....	(213)
丘逢甲：与时俱进的爱国思想 .....	(222)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	(228)
师复主义及其评价 .....	(236)
林森任治河督办时期的广东水利建设 .....	(246)
后记 .....	(252)

## “岭南学丛书”缘起

吾国土地广袤，生民众多，历史悠远，传统丰硕。桑田沧海，文化绵延相续，发扬光大；高谷深陵，学术薪火相传，代新不已。是端赖吾土之凝聚力量者存，吾民之精神价值者在。斯乃中华文化之壮举，亦人类文明之奇观。抑另观之，则风有四方之别，俗有南北之异；学有时代之变，术有流别之异。时空奥义，百转无穷；古今存续，通变有方，颇有不期而然者。

盖自近代以降，学术繁兴，其变运之迹，厥有两端，一为分门精细，一为学科综合。合久当分，分久宜合；四部之学而为七科之学，分门之学复呈融通之相，亦其一例也。就吾国人文学术言之，旧学新学，与时俱兴，新体旧体，代不乏人。学问之夥，盖亦久矣。是以有专家之学，许学邴学是也；有专书之学，选学红学是也。有以时为名之学，汉学宋学是也；有以地为名之学，徽学蜀学是也。有以范围命名之学，甲骨学敦煌学是也；有以方法命名之学，考据学辨伪学是也。外人或有将研究中国之学问盖称中国学者，甚且有径将研究亚洲之学问统名东方学者。是以诸学之广博繁盛，几至靡所不包矣。

五岭以南，南海之北，或曰岭表岭外，或称岭海岭峤；以与中原相较，物令节候殊异，言语习俗难同，盖自有其奇胥者在。岭南文化，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已有古人类活动于斯；汉南越国之肇建，自成其岭外气象。唐张曲江开古岭梅关，畅交通中原之孔道；韩昌黎贬阳山潮州，携中原文明于岭表。宋寇准苏东坡诸人被谪之困厄，洵为岭隅文明开化之福音；余靖崔与之等辈之异军突起，堪当岭外文化兴盛之先导。明清之岭南，地灵人杰，学术渐盛。哲学有陈白沙谿甘泉，理学有黄佐陈建，经史有孙贲屈大均，政事有丘濬海瑞。至若文学，则盛况空前，传扬广远，中土嘉许，四方瞩目，已非仅岭南一隅而已。明遗民诗家，自成面目；南园前后五子，各领风骚。韶州廖燕，顺德黎简，彰雄直狷介之气；钦州冯敏昌，嘉应宋芷湾，显本色自然之风。斯乃承前启后之关键，亦为导夫先路之前驱。晚清以还，诸学大兴，盛况空前。其颖异者，多能以先知先觉之智，兼济天下之怀，沐欧美之新风，栉西学之化雨，领时代之风骚，导历史之新潮，影响远播海外，功业沾溉后世。至若澳门香港之兴，则岭海之珠玉，亦华夏之奇葩；瞭望异邦，吾人由斯企

足；走向中国，世界至此泊舟。故曰，此诚岭南之黄金时代也。然则岭南一名之成立，则初由我无以名我，必待他者有以名我而起，其后即渐泯自我他者之辨，而遂共名之矣。

晚近学者之瞩目岭南，盖亦颇久矣。刘师培论南北学派之不同，尝标举岭南学派，并考其消长代变；汪辟疆论近代诗派与地域，亦专论岭南诗派，且察其时地因缘。梁任公论吾国政治地理，言粤地背岭面海，界于中原，交通海外；粤人最富特性，言语习尚，异于中土；盖其所指，乃岭南与中原之迥异与夫其时地之特别也。梁氏粤人，夫子自道，得其精义，良有以也。斯就吾粤论之，其学亦自不鲜矣。有以族群名之者，若潮学客家学；有以宗派名之者，若罗浮道学慧能禅学；有以人物名之者，若黄学白沙学。晚近复有以各地文化名之者，若广府、潮汕、客家、港澳，以至雷州、粤西、海南之类，不一而足；且有愈趋于繁、愈趋于夥之势。

今吾侪以岭南学为倡，意在秉学术之要义，继先贤之志业，建岭南之专学，昌吾土之文明。其范围，自当以岭南为核心，然亦必宽广辽远，可关涉岭南以外乃至吾国以外之异邦，以岭南并非孤立之存在，必与他者生种种之关联是也。其方法，自当以实学为要务，可兼得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之长，亦可取古今融通、中西合璧之法，冀合传统与现代之双美而一之。其目标，自当以斯学之成立为职志，然其间之思想足迹、认识变迁、求索历程均极堪珍视，以其开放兼容之性质，流动变易之情状，乃学术之源头活水是也。倘如是，则或可期探岭外之堂奥，究岭表之三灵，彰岭峤之风神，显岭海之雅韵也。

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为学当奉圭臬；学而有法，法无定法，性灵原自心生。然何由之从而达于此旨，臻致此境，则时有别解，地有歧途；物有其灵，人有其感；惟所追慕向往者，则殊途同归、心悟妙谛之境界也。吾辈于学，常法朴质之风；吾等之怀，恒以清正为要。今此一名之立，已费踌躇；方知一学之成，须假时日。岭南学之倡导伊始，其源远绍先哲；岭南学之成立尚远，其始乃在足下。依逶迤之五岭，眺汪洋之南海；怀吾国之传统，鉴他邦之良方；愿吾侪之所期，庶能有所成就也。于时海晏河清，学术昌明有日；国泰民安，中华复兴未远。时势如斯，他年当存信史；学术公器，吾辈与有责任。

以是之故，吾等同仁之撰著，冠以岭南学丛书之名目，爰为此地域专学之足音；其后续有所作，凡与此相关相类者，亦当以此名之。盖引玉抛砖，求友嚶鸣，切磋琢磨，共襄学术之意云耳。三数书稿既成，书数语于简端，略述其缘起如是。大雅君子，有以教之；匡其未逮，正其疏失，是吾侪所慕望且感戴焉。

左鹏军

丁亥三秋于五羊城

# 前 言

中国近代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时期，又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对这一时期文化史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视。然而，这一研究目前还是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导致我们对这一段文化史的发展过程还不能全面认识和详细评价，对历史的经验教训也缺乏有力度的揭示。由于中国近代文化史是一个庞大的题目，而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笔者依自身的学术积累和兴趣，把研究目光锁定在近代岭南地区。这个地区是西学东渐的前沿，得风气之先，不但吸收西方文化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岭南人对如何融会贯通中西文化也做出了最早的探索和独特的贡献。近代岭南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从岭南文化本身的发展过程来看，近代是它获得快速发展和质的提升的阶段，是它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外部力量的侵入、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风云成为文化变革的催化剂。艰难的转型中，岭南文化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经世致用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之长处，逐步实现文化的改造、更新和提高。近代，是岭南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豁口。岭南人在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时刻，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和敢于创新的努力。思想观念的转化是整体转化的前提，具有破冰的意义，近代岭南文化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启蒙资料，也产生了近代最为杰出的思想领袖。可以说，近代是岭南文化形成和发展中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岭南人在文化上对中国社会发展贡献最大的时期，值得大书特书。

在广东地区，岭南文化研究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而至今不衰的热点问题，笔者有幸躬逢其盛，参与其中，不想辜负大好时代给予的机会，故有此书之写作。本书收入笔者从 1985 ~ 2007 年历年研究岭南近代文化和人物的心得与收获，其中部分章节曾以论文的方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现把它们归类排列，分为四章：第一

章宏观综论岭南文化的属性、内容、特点、发展变化等问题；第二章专题研讨岭南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关系；第三章分析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改革思潮的影响与作用；第四章对发生了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影响的岭南近代人物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孙中山等进行个案考察。在此基础上，本书从多方面分析了岭南成为近代维新、革命思想发源地的时代与地域渊源，展示了岭南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所论仅是初步的、很不成熟的意见，所述亦仅为岭南近代文化中很小的几点。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岭南文化的研究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刘圣宜

2007年9月26日

# 岭南文化论析

## 一、什么是文化

“文化”一词的初见，在中国文献中可追溯到西汉，原本是指古代《诗》、《书》、《礼》等典籍以及文物典章制度和礼仪风俗，还有就是指与武力相对应的教化。可以说，文化就是文治教化，即以中国固有的礼乐典章制度、伦理道德对人进行制约和感化。这种理解在中国一直保持到近代。

“文化”一词在近代有所变化，原因是 19 世纪中叶以来，西学东渐，英语 culture 一词被作为“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西方学科的一个专有名词引进中国，翻译为中文，这个词就是“文化”。既然“文化”是一个西方的术语，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英国的人类学之父泰勒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不过，麻烦的是，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术语，1920 年以前有 6 个不同的定义，到 1952 年竟然增加到 160 多个。究竟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人们大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使用文化一词。

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有关文化的概念传入中国后，近代中国学人在文化的释义方面已经接近西方。他们把西方传入的“文化”称为大文化、广义的文化。它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是人类在物质和精神生产中创造性活动的总和，是这种活动的结果。而中国原有的“文化”可称为小文化或狭义的文化。1979 年版《辞海》“文化”条目对其含义作了这样的界定：“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这个界定，应该成为我们对文化的一个共识，成为我们进行文化研究的前提。

## 二、岭南文化性格

文化是多种多样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区域性是文化存在的三个基本样式。以

民族性来说，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分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在岭南的延伸；以时代性来说，岭南文化可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等时段，而以近代的岭南文化最具瞩目的个性和时代精神；以区域性来说，岭南文化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南方山河海文化。对于岭南文化，近人有以珠江文化和海洋文化概括之，虽然颇能显示岭南文化的特色和价值，但我以为不够全面。岭南地形复杂多变，山地和丘陵所占地表在 50% 以上，山丘文化是不能忽视的，只是开发较晚，还未引起注意而已。

作为一个区域，岭南地区位于中国最南方，一般是指南岭山脉以南，包括广东省、海南省、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还有香港和澳门。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岭南置桂林、象、南海三郡。粤西属桂林郡，海南及南路一带属象郡，广东省大部属南海郡。南海郡治在番禺（今广州）。

南岭（又名五岭）横亘在粤北和湖南、江西两省之间，最高峰海拔为 1 902 米。它把岭南与中原分隔开来，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两广又称为岭表和岭外。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崇山峻岭像一道天然屏障，影响了广东经济文化与中原的交流发展，直到唐代，岭南还被看做化外之区、瘴疠之乡，是被朝廷贬逐的官员流放之地。唐代开元年间一个广东籍的宰相张九龄，主持开凿了南岭山脉的大庾岭山道，才使岭南和中原的交流逐渐频繁起来。古代岭南开发较中原为晚，农耕文化自然比较落伍；但它又因为边沿化而得以较为自主和自由地生长，因而形成了十分独特的、与岭北差别较大的区域文化。

我们在研究岭南文化的时候，总是首先要界定它的区域特征，把它和其他区域文化的差异显示出来。岭南文化的特征，不同时代自有不同的表现，而不同人群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路和表达方式分别进行了多样性的归纳和说明。笔者对古代岭南文化研究不多，现只就近代岭南文化的特征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岭南文化的成分比较复杂多样，是一种多元杂交和共生的文化。从源流方面来说，主要的成分有来自中国北方中原地区和荆楚地区的中华传统文化、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南洋文化、来自西方欧美国家的西洋文化和岭南原本固有的土著文化。如果以岭南人的民系进行分类，也可以把岭南文化的成分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以生产方式分类，又可以分为农耕文化、工业文化和商业文化。最具岭南文化特点的文化成分是商业文化，还有其他区域没有或少有的华侨文化与港澳文化。

商业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分，值得特别注意。它对岭南文化的个性起着主要作用，是形成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岭南向来重商，早在汉代，广东的徐闻和广西的合浦这两个最靠海的市镇是中国南方重要的港口。

唐代，广州崛起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宋代，广州更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更不用说，按梁启超的说法，在世界地图上看广东，广东是“世界交通之第一等孔道”。由于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通商的特殊原因，广州外贸发达，是当时中国和东亚地区的一个最大的商埠，所谓“商贾辐辏，海船云集”，以致中国南方各省有上百万居民依靠广州这个市场为生。到辛亥革命时期，广州商业已形成100多个行业，当时广州大多数报纸的背景是“商办”，反映商人的利益、要求和心态，商业文化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对社会的影响很深广。

华侨文化在岭南近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文化与东南亚、欧美国家的交流融合从来都是一种双向交流运动，而作为民间交流载体的就是华侨，华侨对祖国的贡献是巨大的，华侨文化是流动的、活泼的文化。

港澳文化是岭南近代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港澳两地，中西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和结果是很特殊的、很有创意的，对岭南腹地的辐射和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有了商业文化、华侨文化和港澳文化三种特色成分的近代岭南文化，其个性风格自然倾向于趋新、求实和灵敏多变。笔者在1991年广东学术界举行的“岭南近代文化特点研讨会”上提出，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新”、“实”“活”、“变”<sup>①</sup>。

“新”就是趋新和创新，乐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创造新文化，表现出一种先驱文化的特质。岭南人得风气之先也开风气之先，成为先驱者和开拓者，创造了很多全国第一，由于求新而领先于人。

“实”就是注重实效与实利，不尚空谈。有益的东西积极吸取，为己所用；有害的坚决抵制，毫不含糊。对外来人口和事物采取开放兼容的态度，也是务实的表现。封闭与开放、排斥与兼容，在岭南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但岭南人最终明白了封闭是不智的，该开放时要开放，该兼容时就兼容，也就是实事求是，不为条条框框所囿，以最大价值为依归。

“活”就是生动活泼，反映迅速与灵敏，富有活力。所谓“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岭南文派、诗派、画派，广东戏剧、音乐、建筑、货品和食品等都散发出一种生猛鲜活的灵气。

“变”就是不停滞、不固守，应变能力强，变化发展，与时俱进。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汇和融合中，岭南人不断扬弃、变革与重构，显示出一种进取的态势，从而使岭南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

岭南文化是个性鲜明的区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它的个性显然是相对

<sup>①</sup> 华茗：《岭南近代文化特点研讨会综述》，载《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突出的。原因之一是它的本土文化非常独特，方言、婚姻、丧葬、节令、饮食、居住等习俗因其怪异而被中原人视为蛮风夷俗，但换一个角度，又可把其视为合理和高明的生活方式；原因之二是它大量吸收、融合了异域文化，特别是南洋和西洋的文化；原因之三是作为华夏正宗的中原文化，在岭南传播时也发生了不同时代的流变，在表现方式上更有自己的面目。

### 三、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

岭南文化既然是属于大中华文化系统的一种区域文化，那么它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便是十分密切的，可以说是母体与子体的关系。当我留意别人如何总结岭南文化的个性特点时，往往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所总结出来的特点并不是岭南所特有，而是整个中华文化所共有的，比如，家族本位性、经验直观性、动态发展性，还有传承性、包容性、创新性，等等。这说明，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在基本内涵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岭南承传了中原文化，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原文化对岭南的影响是长久而深入的。秦统一中国，在岭南推行中原行政建制；汉初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也与汉朝建制相同，中原的王朝政治及其文化的触角伸入岭南。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两汉时期南下苍梧聚集西江流域的学者不遗余力地宣教中原文化，而岭南人则热心学习中原文化。广信人陈钦、陈元父子治左氏春秋之学，成为岭南经学的开山。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改造了岭南土著越族的刀耕火种和水耕火耨。唐代大诗人韩愈被流放到岭南，先贬为阳山县令，再贬为潮州刺史，所到之地受到人们长久的崇拜。文天祥、包拯等中华精神道德的楷模也在岭南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南宋和南明的流亡政权来到岭南，带来了成熟的典章制度和礼仪文化，以及大量文化素质很高的移民。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今粤人大抵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就是说岭南受到来自中原移民的“流风遗韵”、“衣冠习气”之熏陶沾染，民风“庶几中州”矣。可以这么说，从历史的承传来看，岭南文化属于大中华系统，它与中原文化的共性有时甚至比它们之间的差异还大。虽然岭南偏于中国南方一隅，但历代都有中原文化的精英进入岭南地区传播中原文化，为岭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养料，提升了岭南文化的品位。宋明两代更是中原文化大举南下并成为岭南文化的主宰时代。

岭南上层文化人宗经入仕，也引领着岭南的学术、教育和文学向中原地区靠拢。近代岭南的学术文化在两广总督阮元创办广东最高学府——学海堂的主导下，从空疏转向切实，出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学者，他们在经学、教育以及大型丛书的出版等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使得岭南人士以秉承中华学术正统而深感自豪。张之洞在1884~1889年间出任两广总督时，创办广雅书院，以读经史、习修辞为主

要学习内容，造就经世致用之才；又创办广雅书局，大量刻印经史类古籍，使中华文化典籍在岭南学界广为流布。张之洞高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旗，以示中华学术的正宗地位不可动摇，岭南学术的代表人物如张九龄、陈白沙、湛若水、梁廷枏、张维屏、陈澧、朱次琦、康有为等，无不以他们在经学中的地位自重。参与科举考试，进身仕途，进入中原文化圈，成为读书人追求的目标。在他们那里，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是分不开的，所谓“岭学”，不过是岭南人研究经学的历史和成就。

岭南的俗文化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岭南的三大民系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原汉人的血统。自从陈澧作“广州音说”，力证粤方言最接近隋唐古音后，客家人也不甘落后，纷纷撰文证明客家话根源自中原古音，潮州人则奉韩愈为文化之祖。这些都表明，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同源、同根、同类，是大中华系统的文化。

近代新型知识分子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主文化自由主义，但出于民族统一的历史责任，他们希望建立起一种超地域、超阶层的中国文化，以共同的文化背景、文化取向和文化内涵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岭南人更加视中原文化为自己的文化主体，岭南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向化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积极意义已经超乎文化之上。

## 四、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

岭南自古便与海外进行文化交流，但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岭南并与岭南文化进行初步融合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认识世界成为岭南人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课题。他们在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斗争中，逐渐发现了西方文化的长处之处，提出“师夷长技”，提出引进西学，使岭南文化得到新的营养而推陈出新、转型和发展。香港、澳门的割让和租借，也使它们成了西方文化进入岭南的基地。西方的经济思想、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等，已经通过港澳展示在岭南人的面前。岭南学子也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更多、更早地迈出国门，走向世界。西方先进文化对岭南文化走向近代化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与西方文化接触最早、最多的岭南人，进行了西方文化的介绍引进和中西文化结合最初步的、持续的实践。

鸦片战争时期，岭南学者梁廷枏于 1846 年写成了堪称当时国内质量最好的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四说》，包括了美国史、英国史、与清朝有朝贡关系的从海道入贡的国家关系史和耶稣教传道史，开创了中国人编写外国史的先例。他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准确地解释了美国的联邦制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中

国开眼看世界的先驱。

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根据他在香港居住所获得的西学知识，著成主张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一方面在思想上宣告了历代农民革命指导思想——传统平均主义的没落；一方面成为中国即将兴起的近代化思潮的先声。

洋务运动时期，王韬、郑观应、何启等突破洋务派师夷之末的局限，深入探究西人立国之本，大力鼓吹议院制，并融合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宣扬“君民共主”的新观点，使之成为此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改革主张的生长点。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从中西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世界观，并进而用西学革新孔子学说，形成一整套变法的理论和主张，对中国出现第一次近代思想解放潮流起了重大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融合中西文化，从宏观的视野对世界潮流予以深刻的理解和阐述，又从中国的视角对如何走自己的路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创立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和理论体系的三民主义，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五四运动时期，留日归国青年杨匏安 1919 年在《广东中华新报》上连续多天发表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文章，最早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高度评介马克思主义是西欧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最科学、最光辉的学说。他与李大钊并称为中国南北两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镇，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进步潮流中的主导地位行将被更先进的思潮所取代。

先驱者们艰辛而卓越的努力，终于打破了中华古代文化停滞落后的僵局，使新的思想文化源源不断地涌现成为不可改易的现实。综观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在几个最重要时期新思想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出在岭南，这与岭南人善于吸收融合西方先进文化是分不开的，这是岭南文化在近代能有超越于内陆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岭南文化更新进步的重要因素。

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也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岭南人主动地走向世界，吸取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加快了自己前进的步伐，有利于岭南文化的更新和进步。

## 五、岭南文化的精神和价值

区域文化是生长于斯地的人类为适应其生存的环境和条件而创造的生活方式之总和，对于本区域的人来说，文化也是他们从祖祖辈辈的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相应的行为方式。文化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倾向和时尚，思想观念和行事习惯亦可能大不相同，甚至相反。任何一种

成熟的文化都不是单纯的，在它内部包含着矛盾与差异、理性与非理性、封闭与开放、排拒与吸收、保守与激进、尚武与崇文等，这些观念和行为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渗透的，共存于一张大网之中。在岭南文化这个大网里，找寻对我们今天还具有重要价值的优秀因子，可能就是研究岭南文化的目的和意义吧。那么，岭南文化的价值和优长表现在哪里呢？

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即竞争精神、包容胸怀、创造能力和务实品格。

### （一）竞争精神

梁启超在 20 世纪开端的时候说：“竞争为进化之母，此义殆既成铁案矣。”当时，封建专制统治在各个领域内造成缺乏竞争以及竞争形式不发达的状况阻碍着中国的发展，梁启超从西方理论和经验中吸取“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的思想，代表了岭南知识界打破传统的勇气。其实，在生存竞争激烈的时代里，特别是受到外部力量的压迫，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之秋，十分需要竞争精神。郑观应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第一个发出了“商战救国”的口号，不畏强梁，“与外人商战”，是又一个例子。从古到今，在每个时期进入岭南的移民们，当他们来到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从零开始，为了寻找新的活路，为了开创美好的未来，就必须抛弃依赖思想，自立自强，敢于拼搏，因此竞争意识空前强烈。有竞争，社会能快速进步，岭南人也就活得更精彩。

### （二）包容胸怀

岭南自古是商业发达之区，与海外的交流两千年来基本不绝，对外来文化自然包容了很多。佛教、伊斯兰教在东吴时期传入，天主教和新教在明清时期传入，鸦片战争前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在澳门地区共生共存 300 多年，交织着多姿多彩的欧洲和亚洲的风土人情。近代岭南人在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同时，理智地向对手学习先进科技和政治制度，对有益的东西不拘一格地兼收并蓄，是包容心理的典型体现。

岭南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两晋时期、两宋时期、明末清初，都有大批岭北人民南迁避乱。他们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观念和习俗，如果互相之间没有包容的雅量和胸襟，如何能和平地共存于同一个地方？所以，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就在不断地接纳移民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出来。直到今天，从全国各地来到岭南参与建设的外来人员，谈到他们对广东这个地方的感受，最强烈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包容性比其他地方更强。不论什么人，只要有真本事，就不难在岭南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空间，也容易有出头之日。对外来者一视同仁，提供的发展机会较多，有这

样一种宽松的环境，能够吸引众多人才前来施展身手。

有容乃大。有了包容的胸怀，才有文化的丰富、多元、博大与和谐。

### （三）创造能力

人的创造能力如何才能发挥出来？首先要思想解放；其次是尊重个性、发展个性。岭南处于中国南部边沿地区，远离皇权中心，受到的思想束缚相对较少，行动自由度较大，岭南人富于冒险精神和自主意识，喜欢自行其是。从北方迁徙到岭南的移民，在性格上必然具有冒险因子和开创的勇气。特别在19~20世纪间，中国正处于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岭南人的创造能力得到适时的发挥。

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结合中国儒家伦理，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拜上帝教，发动了一场以创建人间天国为理想、席卷中国的农民起义。康有为把西方进化论与儒家公羊三世说融合，构建自己的历史进化论，倡导变法维新。他撰写的《大同书》，对一切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进行无情的批判，将大同之世设计为人人平等、自由、独立的新型社会，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孙中山的开拓和创新精神更强，他说：“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虽然反清革命有很多“不知”的前途，但他并不因为“不知”便不去奋斗。他倡导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岭南人在很多方面都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兹不一一列举。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里，岭南人又以争当排头兵为荣，乐于喝“头啖汤”。

创造能力是各种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创造力对振兴中华具有决定性意义，最需要继承和发扬。

### （四）务实品格

岭南人是特别务实的，脚踏实地、注重实干，讲求实效是他们做人做事的原则。举凡创业有成之人，莫不如此。近代著名实业家出在岭南的不少，如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和莫仕扬等便是实干典型。他们均出身平民，从低级职务做起，勤奋务实，一步一步地成就了大事业。郑观应所著的改革名作《盛世危言》出版后，以其所展示的广博的西方知识、深刻而敏锐的见解、全面而系统的改革主张、实事求是的精神、直言无隐的勇气，在中国朝野引起了强烈反响，张之洞誉之为“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也”，对中国富强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作用。

岭南民风讲求实际，不尚空谈，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认为以事实说话最有力，务实品格的确非同一般，甚至被今天的人讥为“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这个比喻相当生动贴切，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岭南文化的弱点，即不善于总结经验，

把它提升为理论。什么时候岭南人克服了这个缺点，岭南文化的品位肯定还将会提高一大步。

## 岭南近代商品文化的发育

商品文化，是岭南近代文化中的一个勃兴和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的开端，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商人阶层及其文化的发育。由于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通商的特殊原因，广州外贸发达，是当时中国和东亚的一个最大的商埠，中国南方各省有几百万居民依靠广州这个市场为生。到辛亥革命前，广州商业已经形成 100 多个行业，1904 年成立广东总商会，当时广州大多数报纸的背景是“商办”，反映商人的利益与心态，对社会的影响很广很深。因此，研究岭南近代文化不能忽视商品文化，而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很薄弱的，下面拟作一初步探讨。

### 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商品意识的发展

岭南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 16 世纪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的开辟有直接关系。岭南自古是个商业重镇，但在 16 世纪前，其海外交通局限于南洋和印度洋，最远达非洲东岸。新航路开辟以后，岭南与欧洲、美洲开始了往来。这样，不但贸易范围扩大了，而且进入了与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相联系的新阶段。

17 世纪时，新形式的工业开始在中国、印度及欧洲出现，与旧式手工业并肩发展。中国景德镇及广东窑厂、印度的阿麦达巴德的纺织工场和法国哥白林的挂毯及家具工场，都逐渐改为以分工式生产，采用了工厂的集体生产技术来取代传统的乡村作坊形式。同时，更厘定及划一了部分产品的质素及款式，以便大规模地成批生产。新产品亦接连涌现，它们的设计不再被传统款式所规限，受外界市场需求所左右。这些商品的设计及改良，标志着近代商品意识和商品文化开始产生了。这种商品意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

鸦片战争后，广州的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次鸦片战争的条约开放了中国沿海关闭着的闸门，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市场，在无情的优胜劣汰的经济规律支配之下，洋货逐渐占领了广州的部分市场。岭南人的商品意识和商品文化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 世纪 60~90 年代，除了洋布、呢绒、煤油的大量进口外，在广州的大街

上，还可以看到许多商店摆满了各种各样日常用的外国商品：洋烟、洋糖、牛肉干、洋钉、洋火、洋伞、洋袜、番枳，还有沙发，等等。这些过去十三行里洋人的玩意，现在全是为供给中国人消费的。当时英国的商业报告说：

“葡萄干，中国人用来当糖果吃，销路颇广。外国药品，包括5万多瓶杀虫药片，继续受到欢迎。炼乳的输入也有显著增加，当地人觉得它对小孩子有用，并且有时还把它当做果酱来吃。橡皮鞋的输入受到普遍的欢迎，因为它们是按照中国式样和中国人的身材制造的。

“外国酒也开始流行了，特别是香槟，同糖果、饼干、沙拉油和罐头牛乳一起陈列在货架上。好的葡萄酒和蜜酒可以半价出售，如果这样办，并努力推销，这些商品不久就会有销路的。

“牛肉精和其他肉汁受到欢迎，中国人好设想自己已经衰老，因而喜欢保养自己。他们拥有许多健身的秘药，借以恢复耗竭了的体力。看来，由于肉汁价格不高而使他们大为满意。

“现在，在中国的每家商店里可以看到的另一种商品，就是肥皂，甚至在街头的小摊子上，你都可以看到价钱较低的肥皂条。在这里肥皂应该有广大市场，因为土货品质很坏。外国玩具，特别是机械的，似乎也受到欢迎。玻璃、刀、图画、装饰品、文具、表、珠宝、锡器、缝纫机以及无数其他货物，都有买主。但是，本地商店陈列的样品，大部分是劣等的货色，我敢说，如果输入上等货，是会受到欢迎的。

“中国人认为外国棉纱最适合于织布，煤油与火柴适于照明与取火，金属与颜料适于作坊的需要。

“在中国官吏和富人中，似乎有一种欣赏外国奢侈品的倾向，如扶手椅、沙发、弹簧床……”<sup>①</sup>

这些由外国人发回本国的商品流通信息，召唤着更多外国商品的到来。

洋货的泛滥，冲击着广东市场，也冲击着岭南人的生计、习惯和观念。

旧有的手工业作坊纷纷衰落和倒闭，失业工人在街头彷徨，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当的破坏。但是，广州本来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市民的应变能力也比较强，外国的东西好，他们便先拿来，再学习，研究、仿制、创新，摸索着寻找新的出路。所以，一方面大片作坊在倒闭；另一方面新的工厂、新的产品也在不断地冒出来。

比如，从前中国人取火用的是火石和铁片，自从火柴进口以后，它就完全取代

<sup>①</sup>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95页。



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特别是瑞典的无磷安全火柴，价格低廉，每箩售价仅5钱银子，每包（10盒）才10文钱。这样的价格是所有阶层的人都买得起的。火柴进口激增，以致英国人感叹，在所有进口商品中，任何东西都比不上火柴这样受欢迎。广东开采火石的矿坑完全停闭了，打火石、火镰等手工制造业归于消灭。在这种情况下，转轨生产火柴是惟一的出路。1879年，从日本归国的广东华侨卫省轩在佛山文昌沙开设了广东第一间火柴厂——巧明火柴厂。以后，火柴厂越办越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火柴进口大大减少，国产火柴有了发展的机会。1920年，广州的火柴厂增至21家，并积极引进当时比较先进的日本机械、技术和原料，使质量大为提高，很快开辟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贵州、福建、云南等中国南部各省的市场，还开始打入国际市场，并出口到南洋群岛、越南、檀香山、菲律宾、泰国等地。

仿制洋货是岭南人对外来冲击做出的迅速反应，也是他们吸收外来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除火柴外，新兴的仿制造业还有很多，比如，欧洲的洋伞，由于其轻便耐用，几乎完全代替了中国纸伞。广东在19世纪70年代就大量地仿制欧洲洋伞并运往其他口岸和内地出售。其仿制之精，连外国人也感叹说，除了丝伞伞面比较厚重外，与洋伞几无区别，至于布伞，伞面已经做到与洋伞毫无区别。广东仿制的煤油灯、镜子和自鸣钟等也很出色。可以认为，19世纪80年代煤油进口的增加，应部分归功于广东制造的煤油灯价格的低廉，而外国进口的镜子，也不能与广东制造的“带画的镜子”竞争，后者在沿海市场上的销量已压倒洋镜。外国人还惊叹：中国匠人制造着大量的木钟和铜钟，以致把钟的进口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由于广东出现了许多模仿各种最复杂的洋货的行业，所以内地人往往看到任何一件外国制造品时，立刻就会说：“那是广货！”

广东的制造业，除仿制洋货外，还有加工洋货的，如用洋纱织布、洋布加染等等。

从广东制造业的发展，可以看出岭南人注重实际、善于学习和心灵手巧的特点，对外来冲击的反应采取了积极、灵敏、宽容以及富于进取的态度，这是岭南文化健康发展的原因。

广东的商业，随着外贸的开放，也逐渐走向世界。据统计，鸦片战争刚结束时，广州的外国商行才20来家，到70年代，已超过200家。但仅仅通过外商并不能完成商品流通的全过程，洋行必须与中国商人和中国商业机构打交道，于是不少华商也卷入了这种外贸活动，有的人甚至跳过洋行这个环节，直接向外国厂商订货或直接向外国市场推销中国土特产。于是，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近代新式商业便诞生了。时间在19世纪50~60年代以及80~90年代得

到了初步的发展，到了 20 世纪 10 ~ 20 年代更进一步发展并渐趋繁荣。据统计，1909 年，广州城区已有店铺 27 524 家，广州商业内部的行业已有 100 余行，广州附近的一些城镇商业也日益繁荣，如佛山的商业已有七十二行之称。广州和佛山还发展成为岭南地区外向型手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

一些过去没有的行业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陆续诞生了。如当时广州已有洋庄丝行（经营机制丝出口）、燕梳行（保险业）、轮渡行（蒸汽船内河航运）、矿商公会、金山庄（经营美洲进出口）等行业。南海、佛山、江门、顺德等地也出现中国人经营的新式银行、百货公司、房地产公司、西式酒楼、新式药店等。一些商人采用了从外国学来的方法经营自己的商业，不少商号还能较熟练地运用商业广告的手段进行宣传，从而扩大了营业额。

面向世界的商业，要求知识素质较高的商人。据一外国人评论：“（广州）商人性质之活泼、知识之灵敏、营业心之坚忍、商工业之熟练，实于支那人别开生面者。”<sup>①</sup>可见，岭南人商品意识的发展，已居于全中国的前列，令外国人刮目相看。

## 二、岭南近代商品文化的特点

### （一）带有浓烈商战色彩的多变性

中国既参与了国际市场，就要学会在其中游泳的本领。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制造业，为了求得产品在市面上的销路，常常在产品设计方面采取多变性的策略，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这种商战策略，使得岭南商业文化表现出多变性的特点。

18 世纪，欧洲工业化步伐加速，欧洲价廉物美的产品大量涌进世界市场，使亚洲变成了欧洲工业品的倾销地。岭南工商业为了在困境中找寻一条出路，在自身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采取了适应性的产品设计、“劳工密集”型的生产形式以及产品以外销为主这三条策略作为应变措施。这三大经济策略的实施，终于使珠江三角洲一带刚刚崛起的微薄工业得以生存下去。

三大策略中的“适应性的产品设计”属于商品文化的范畴，从中可以看出岭南商品文化的多变性。

中国的瓷器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商品，宋朝以来中国窑场已大量生产款式划一的瓷器，外销东南亚各国。为了迎合日新月异的世界市场，18 世纪从广州出口的中

<sup>①</sup> 刘圣宜、王燕军：《抵抗与吸收》，广州文化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3 页。

国瓷器，在装饰图案中渗入了阿拉伯以至拉丁或英国的色彩，但仍保留中国的风味及特征。有的外销瓷器，采取了非中国式的形制及装饰，在设计上摹仿东南亚的“军持”、日本的“伊万里瓷”和荷兰的咖啡壶等，还不惜完全抛开了传统的风格，但这仍然是很不够的。

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世界艺术权威作家如弗格森、欧文·琼斯等认为，中国的商品完全没有装饰设计，这当然是从西方的概念来谈的，他们批评说，透过各式各样的入口英国的工业商品，中国的装饰风格已为世界所熟悉……中国人在这方面可以说完全缺乏想象力，而他们的工艺成品，亦因而难以达至艺术的最高境界。

为了追赶世界潮流，也为了改变外销品的包装设计，20世纪初，岭南一些公司设立了设计室或广告制作部。当时“设计”这一外来名词，已被广泛运用在广告、市场推广、产品款式、时装、家私和室内装饰及展览制作等方面。例如，香港的永安公司，它的设计部对商品陈列、广告和文具等设计便有专人负责。1905年成立的化妆品公司广生行亦有独立部门负责设计及生产该公司特有的各种化妆品玻璃瓶。该公司还有石印部，负责印制各类小册子、标签及广告海报。康元制罐厂原设于上海，1934年迁至香港，它的设计部门聘用了5位曾在上海受训的设计师。

中国美术家加盟商业界的新鲜事也出现了。

如画家关作霖，1845年在香港创立了一间专营外销画的画室——“喇叭画室”，请了一批画匠在室内分工绘制油画出口，在外国人中名声甚噪。后来，关氏家族一直承袭和发展了商业创作的形式，并分别向摄影、石版印刷、海报设计及广告设计等各方面发展，把绘画艺术与商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其后人关蕙农在1920年因制作宣传商品的月份牌而著名，被时人称为“月份牌王”。其后，又涌现出一批在商界甚为活跃的美术家，如海报画家麦少石、专长于广告设计的黄风洲、擅于药物包装设计的尹笛云、以壁画见称的潘峭风及商标设计专家欧少杰等。在这些文化人的推动下，岭南商品文化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岭南的工业不断扩展，商品亦趋向多元化，新的工厂有羽毛饰物厂、火柴厂、肥皂厂、煤球厂、藤器制造厂、榨糖厂和水泥厂及纺纱厂等，而商品的设计更趋于多样化。1906年，香港举行了第一届工业艺术展览会，为产品作宣传，这个向外界展示香港制造业实力的展览使外国人赞叹不已，认为它“表现了居港的中国手工艺者的艺术气质”。

20世纪初，以法国市场为主的茶叶，其商标纸的设计充满了“新艺术”风格。其他产品的设计，也大量借用外国意象。这一类的宣传画和包装盒封面比比皆是。

抗战期间，不少上海公司在香港开设分厂，又由上海传入了现代的设计风格，而产品的设计也有所改变，因为需要迎合东南亚、中东及非洲新客户的口味。

由于岭南的商品设计日新月异，所以其商品的竞争力也一直不减，当西方国家的工业品大量输入的时候，珠江三角洲的贸易与制造业仍能维持和发展。灵活多变的商品文化便是这样在商战中形成的。

### （二）面向世界的适应性

近代岭南对外贸易比较发达，工业品又以外销为主，商品文化便表现出对世界文化的认同和适应。

首先，外商不断地输入外国的新产品，在广东的市场上出售，使得岭南人比内地的人更有机会及时地学习到外国的新东西，对世界商品设计潮流的信息了解较快。另外，有的外国商人订购中国货物时，指定货物的品质、款式及价格，要求按样定制。这样，岭南人在生产和设计外销产品时，常常要适应外国商人的要求。岭南商品文化的适应性便产生了。

1763年，荷兰人把他们设计的唾壶的图样带到广州，要求厂家按图样进行大量生产，然后返运欧洲出售。荷兰唾壶肚子又大又圆，颈部收得很细，顶部像花朵一样翻开，造型美观，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仿制以后销路不错，所以200多年来，唾壶的造型一直沿用下来。

20世纪初，岭南在海外的市场不断扩大，也得力于设计师们的设计迎合了各种地区的人不同的口味。据历史悠久的香港星光实业公司的营业经验，他们塑料制品的颜色偏于鲜红、蓝及黄，非常鲜艳，原因是为了迎合亚洲、中东及非洲客户的需要，这些地区的消费者不接受当时欧洲的所谓品味较高的棕色和奶白色。该公司虽曾试图改变他们的口味，但结果并不成功。

另外一个叫日升制造厂的有限公司，自1930年便开始生产各类手电筒，并创立了设计部，他们改良产品的款式，但其非洲及亚洲的客户，对任何款式的轻微改变都不接受，结果该公司最早期的产品被视为杰作，备受推崇，从来不需要任何的改良。相反，该公司销往欧洲的产品，款式却需要经常改变，才能刺激销路。

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香港商品的主要市场，而商品的设计大部分都由客户提供，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部分设计师放弃了自己的个人风格和创意，改循西方风格，而成为成功人士。但香港早期的现代设计风格便逐渐淹没，而老一辈的设计师也因无用武之地而销声匿迹。同时，过于依赖外国客户提供的设计，而被动地迎合消费者的口味，令很多年轻的设计师惯于依样画葫芦式地抄袭，很难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才华。而香港的设计水准，亦因而日益下降。

可见，商品文化的这种适应性，一方面，使得岭南文化有不断引进吸收、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优点；但另一方面，模仿与抄袭毕竟是低层次的文化，而且为适

应别人，常常会失去自我。商品文化的缺点，在这里表现得至为明显。

### （三）融汇中外的创新性

岭南商品文化在珠江三角洲经历了几百年的孕育和变化，风格独特的制造品和极具个性的商品设计也不时出现，而且表现出一种善于融汇中外优秀文化的创新性。

引进外来文化是创新的第一步，岭南人在引进的同时便开始了中外结合的尝试。近代中国外销画名家关作霖，曾拜英国名画家钱纳利为师，学习西洋画技，作品在英国展出，颇为英人所重。19世纪中叶，他在广州开设了一间外销画制作室——“啱呱画室”，高三层，并雇了一些画师，分工绘制油画，临摹照片，专门制作销往外国的中国风景、人物画。这种外销画用西画的写实手法描绘中国的山水风景人物，使中外艺术融为一体，深受中外人士的欢迎，开创了把中国画从抽象写意技法推向写实的第一步，啱呱画室的画被外国人购去了不少。

19世纪后期，岭南的商业设计，特别是平面设计更出现了将中国多种多样的传统风格与西方的现代意象相融合的作品。设计师的创作灵感一部分来源于中国的经典教材《芥子园画谱》，色彩鲜艳的广东年画，笔触细腻的岭南派花鸟画；另一部分则来源于西洋的装饰图案，现代“新艺术”以及东洋日本的海报、月份牌等。

19世纪，欧洲维多利亚时代的广告画颇有特色，喜欢以美女和玫瑰花为主题，而这种意境很快被岭南画师所采用。他们也把沉思中的少女和花卉用于自己的作品中，又加进了若干中国味，创造出一种新的设计来。我们可以看到一帧典型的西方推销药物的广告，以忧伤的调子出现，构图由鲜花和美女组成，给人一种温馨感。这种生活化的设计很快被岭南商界所引用：一家岭南饼店的年历海报画了一个中国时装美女倚柱而立，手里拿着一枝玫瑰花，神情闲适；一家绸缎庄印制的服装盒，封面也用了同样的设计。著名的化妆品公司广生行的“双妹嚶”牌商标，画的是两个身穿旗袍、长裤的中国女子，撑着洋伞，在铺满鲜花的园中散步。据说广生行的创始人冯福田因在中区看到两个天使显灵，便制造了这个商标。这种把中国人的面孔服装与西方人的情调相结合的创意，在当时成了一股潮流。

在商品的造型和用途方面，岭南人也时有创新。20世纪岭南制造的铝质水煲，配有胶木把手，是一种用现代原料制作的新型日用品，其造型设计，部分取材于中国传统的陶瓷茶壶形状，部分则取材于日本式的铁水煲，可说是一种中日合璧、各取所长的工艺品。

一些西方的新产品，不太符合亚洲人的需要，也被岭南的设计师们加以改装，成为西方技术与中式设计相结合的新产品。如美国的“波士”牌火油煮食炉，由

香港合众五金厂设计部重新设计，把原本放在煮食炉旁的火油容器改装于两个炉头之间，使两个炉头间的距离增大，可以安放较为阔大的中式铁锅。由于适应了亚洲人的生活习惯，产品改装后非常畅销。

又如塑料制品，是引进西方技术进行生产的，但其产品却常常借用东方产品的造型，以使洋货为我所用。

中国传统手工艺品销往国外，也同样需要改造和创新，迎合外国人的欣赏习惯。比如，中国的象牙雕刻，传统的图案是龙、凤、船等，而岭南的牙雕销往国外的，往往刻进了西洋的楼房、树木和花卉。

岭南人在商品上的创作才能，使一些西方的制造商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文化传统对近代设计贡献重大。

### 三、商品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商品文化是岭南文化大系统中一个突出和重要的成分，特别在近代，其存在和发展，对于整个岭南文化特征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

如上所述，岭南近代商品文化具有多变性、适应性和融汇中外的创新性。这些性质，是使岭南近代文化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显著标志。

多变性是由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所派生的，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所衍生的保守、稳定和停滞不前适成对比。多变性使岭南文化有一种不断学习、进取的精神和更新、发展的活力，使岭南文化有一种动态的美。

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不被别人消灭或淘汰，岭南人在商场中注重实效与实力，不尚空谈，养成了“惟实”之风；同时，又勇于接受新事物，打破传统束缚，追赶新潮流，形成了“求新”、“求活”和“求变”的心态。这些商品意识直接作用于岭南人的文化氛围，于是以“新”、“实”、“活”、“变”为四大特征的近代岭南文化便逐渐诞生了。岭南文化的这些特点，使它在中国从古代社会过渡到近代社会的转折中，表现出一种先驱文化的属性。

适应性是从商业竞争社会里适者生存的规律所派生的，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派生的独立自主却又骄傲自大适成对比。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客观现实环境下产生的对西方文化的适应，使岭南文化具有了竞争之世的时代特点。由于关注世界，大量地学习与引进外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交流，形成了岭南文化对外界反映敏捷、吸纳快速的优点；又由于追求利润，不分良莠地兼收并蓄，忽视选择与消化，产生了岭南文化急功近利、模仿抄袭和浅薄粗俗的缺点。

融汇中外的创新性是在商品交换的过程里派生的，是中外文化交流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与中国古代社会末期的禁锢、排外和仇外心理适成对比。创新性是岭

南文化走向世界、也是世界文化走向岭南的结果，是岭南文化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原因。中西学的交融，是岭南近代文化的显著特点。它对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及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所以有人说，岭南是中国近代新文化的生长点。

岭南近代商品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总的来说是处于商品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其特点也是正在形成之中，但它对于岭南近代文化风格的形成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它的萌芽便可推知它的将来，现在岭南商品文化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岭南商品文化发展的轨迹，这对于我们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创造一个新时代高度发达的商品文化无疑是有意义的，对岭南文化的变革、重构与进步也将提供有益的启示。

##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岭南，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最早的交汇区之一。

历代相沿的与外商做生意的传统习惯，使岭南成为华夷杂处，声气相通之地。

岭南与海外的交通，以15世纪欧洲至印度的新航路的发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岭南与海外交往和范围，主要在东亚、南亚、西亚，最远也不过到达非洲东岸；而后一阶段，交往范围扩展到欧洲、美洲，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关系。以下主要谈谈岭南在后一阶段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 一、优越的条件和领先的地位

1487年葡萄牙人第亚士发现好望角，1498年葡萄牙人伽玛开辟一条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sup>①</sup>，葡人便于1514年首次来到广东屯门。从此，西方与中国的交通便以陆路为主（穿过中亚细亚高原地带）发展为以海路为主。

海路的沟通，使得欧洲与东方的通商比以前便利，比以前安稳，并且比以前的赢利更大，因此两方面的商业关系一天天地增进，两方面的文化交流也随之增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高峰。而岭南，适逢其会，成为中西交通的要冲。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岭南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处于前

<sup>①</sup> 参见齐思和等编著《中外历史年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97页。

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明清政府对岭南的特殊政策，也促使岭南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处于一种比内地有利的位置。

澳门是岭南的前沿，明清时期隶属广东香山县。自从它在 1553 ~ 1557 年间租给了葡萄牙商人居住后，一直没有对外封闭过。明末发生过驱逐天主教士的事件，但只是把他们逐到澳门了事。清朝继续了明朝的做法，保留了澳门作为外国商人的居留地。澳门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展览地，外国人在澳门办报纸杂志，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报传到西方，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如涓涓细流进入岭南，中西文化在澳门共生共存。

清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广州对外封闭的时期，是最为短暂的。

1757 ~ 1842 年，是全国仅广州一口对海外通商时期，清政府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封闭了广州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这种做法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基本断绝，但广州处于独口通商的地位，不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没有中断，而且由于所有中外贸易均集中在广州，反而使得广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有所扩大和发展，广州成了当时中国的一块特殊的土地。以广州为中心，岭南地区的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对外文化的交流亦不可遏止。

地域和政策上的优势，使岭南在中国近代对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先锋的作用。

从 16 世纪开始，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前沿的岭南，其对于西方文化吸收的先行性与开放性等特点已经显露出来。

它是第一个来中国的西洋教士首先进入之地，圣方济·沙勿略于 1552 年到达广东上川岛。它是第一本中文天主教义的出版之地，1584 年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在肇庆印出。第一个中国信徒是 1583 年利玛窦在肇庆招收的。它是第一批西洋先进器物在中国的陈列之地，1582 年罗明坚、利玛窦两人在肇庆陈列了西方的自鸣钟、地图、天象仪器和三棱镜等。它也是西方的军事、医学、建筑、乐器和绘画及制品最早出现之地。1521 年广东官员就仿制了西方武器新式火铳，3 年后南京正式铸造西洋兵器时，工匠和铳法都从广东借去。西医医院最早在澳门建立，1569 年澳门主教加纳罗设立圣加札医院，1569 年又成立辣匠禄麻疯院和圣拉费尔医院。中国最早的西式建筑是 1558 ~ 1569 年间在澳门建筑的教堂，西式民居最早也在澳门出现。西洋乐器随西方传教士最早带入澳门，澳门教堂最早有风乐，风琴。钟表是西洋自动机械中的奇器，在中国当时，的上层人士中流行，而广东自从 1582 年传教士罗明坚送给广东制台陈文峰一台有车轮的大自鸣钟后，广东人便首先仿制。当时，修钟和造钟都以广东最早，“广钟”在全国的知名度很高。中国文化的西传，也多由在广东寓居多年的西洋教士介绍出去，传教士马若瑟于 1728 年在广州写成《中文札记》，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字学的著作，对中国语文的优美

领悟极深。欧洲第一部中医著作是由广州一个不知名的法国人寄出，并于1671年在格莱诺布尔出版。第一部被译为西方文字的中国小说《好逑传》的最早译本，是1719年由一个在广东居住过多年的英国商人魏金森译出的。<sup>①</sup>这是1840年以前的事情。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侵略者强行打开，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并放松了对外国人活动的限制。从此，西方文化大规模地输入岭南，并与岭南文化进行初步融合。岭南不仅在各种文化领域（如历史地理、军事技术、宗教语言、文化设施、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继续率先与外国进行了交流，而且涌现出一批新的文化人。他们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最早的比较、对照、吸收和融合的尝试，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岭南在1840年以后，其对外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不仅是地域交流上达到一个新阶段，而且在交流程度上也达到一个新阶段。古代与近代的文化交流，其不同点首先是交流的范围从东南亚、非洲东岸扩大到了欧洲、美洲；其次是交流的内容从封建时代文化转入资本主义时代文化；再次是交流的结果从同化别人到被人局部同化。近代中国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从敌视、抗拒、被动吸收到关注、欢迎、主动学习，以外来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在这个新阶段，岭南无疑是最先进和最有代表性的地区之一，它是近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下面试对1840年后岭南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作一概括。

## 二、文化交流的内容和特点

岭南近代对文化交流与内地相比、与岭南古代相比，都有不同的地方。

（一）近代中外（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与文化东传同时进行，且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岭南由于处在对外战争的前沿，文化交流和冲突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对矛盾给近代岭南对外文化交流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向海外扩张，西方文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闯入中国，而中国自然经济的特点和执政者的国防观念却在拒绝西方文化的输入。西方

<sup>①</sup> 参见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9~453页。

国家发动了侵华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封闭着的大门，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开出了一条通道。但是，西方文化伴随着大炮、鸦片和不平等条约而来，违反了中国人的意愿，亦给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造成困难。非和平、非平等的交往，使早期岭南的中西文化交流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广州，是中国近代开放最早的城市，对外文化交流既有传统也有基础，广州人民一向对远道而来贸易的外国商人，甚至传教士都怀有友好的感情。但英国的鸦片和大炮把这一切都改变了，鸦片烟的流毒和战争的灾难最先落到了广州民众的头上，他们比广大内地人民更早地感觉到古老中国遇到了极大的危机，鸦片战争后10多年中，由广东士绅发起和领导了反对外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以及反对外国人进入潮州城的风潮。这些斗争具有保卫家园的意义，但也因此产生了副作用，这便是岭南社会领导文化潮流的士绅们普遍拒绝接受西方文化的心理以及西方人士撤离城市后形成的空白，直接造成广东对外贸易的低落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迟滞。鸦片战争后二三十年间，岭南除了在林则徐督粤时期有过比内地领先的“开眼看世界”热潮和香港在割让给英国后成了西方文化东渐的根据地之外，其他地区随后则进入了相对缓慢发展时期。19世纪60年代开始，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大办洋务，引进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与科学文化，使中国中部的京师、天津和东部的上海、南京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大量的西方书籍被翻译过来，新式学校也在不断地创办。1862年在北京设同文馆，1866年在同文馆中添设“算学馆”，讲授自然科学，成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开端。1867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设馆译书，到1880年止，出版了外国图书98种，销售了3万多部，还有已译成而未出版的书籍45种，这在当时来说数量是不少的。继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之后的译书机构，有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分会。而岭南在这方面就显得落后了，以致追求西学的康有为要到上海买书，并用几个大箱子把它们装运回广东。

如何看待侵略者与其文化的关系，是近代岭南人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 （二）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在中外学者合作之下得以迅速推进的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外国文化人谋求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成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这一做法以岭南人首开其端。

广东高明人梁发之所以著名，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最早的基督新教教徒，更因为他的传教经历和效果。梁发协助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翻译和印刷圣经，从而皈依了基督教，他以匿名方式写了大量的传教书文，成为马礼逊翻译《圣经》的普及本，而他写的《劝世良言》成了洪秀全的启蒙读物，直接引发了拜上帝教的产生。

广东候补道潘仕成在鸦片战争中深感英国轮船的先进，决心学习制造，他对英军的军舰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后，设计、制造了一艘西式战舰，这是我国最早建造的能够安装舷侧炮的新式战舰。潘仕成还与美国军官壬雷斯合作，研制水雷。他们吸收了欧美的新技术，利用中国的原材料，研制成功一种新式的水雷。这种新式水雷在当时是一种颇具杀伤力的武器。

1851年，英国医生合信在广州撰写西医专著《全体新论》，就请了中国医生、南海人陈修堂相助。1863年，香港英华书院院长、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深感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根底浅薄，便邀请了到香港避祸的王韬襄助他完成《中国经典》这一宏大的翻译工程，并终于在1885年成功地译出了《十三经》，对中国文化的西传贡献甚大。

岭南学者的这种国际性文化合作，对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后来，这种合作为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所发扬。1867年，该馆附设译书馆，由英国人傅兰雅和中国科学家徐寿、华衡芳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技著作，甚至后来居上，走在岭南的前头。

### （三）“文化共存”思想是岭南对外文化交流顺利开展的心理因素

“文化共存”的思想，是岭南文化包容性的表现。

在香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存共生，有目共睹。罗香林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一书中，对香港华人善于保存国粹的“自我存在”与善于学习别人的“共同存在”的双重性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岭南人的独立性与包容性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一种良好的心态。

岭南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最早打破“体用观”和“器道观”，主张中西文化全面交流和融合。早在冯桂芬提出“中体西用”之前，洪仁玕已经提出不分体用地全面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宗教思想、民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等。郑观应最早认清了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王韬认为，中西之道只有差异，没有优劣之分，“器”是沟通中西之“道”的契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比前人更为客观、公正，心态也更为健康、积极，他们是善于融合中西文化的能手。他们经过不断地探索、反思和争论，摆脱了非此即彼的绝对化、片面化的思想方法，最早提出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的见解并做出了尝试。

当然，作为一个对外文化交流前沿的区域来说，其内部也是存在差别的。广东省内和香港、澳门的文化氛围便有较大的差距，这可能是因为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而港澳却在外国人统治之下的缘故吧，清政府对于中国周边地区的离心倾

向是特别敏感的，控制也特别的严厉，历届粤督都比较保守，除张之洞和岑春煊稍有建树外，洋务运动在他们手中开展得很慢。广东大儒们的中华文化优越感和排外心态也不见得比北方士夫们轻，某些文化精英如陈澧、朱次琦等局限于儒家文化的道统之中，没能开创中外文化交流融合新局面和写出领导潮流的震聋发聩之作。而积极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人物，囿于这种文化控制和封闭的气氛，不能在广东省内有所作为。他们的事业发端于岭南，却往往结果于外地。例如，洪秀全要到广西传教，康有为要到上海买书，孙中山要到檀香山和香港求学，这与广东省内较为封闭的文化氛围都有直接的关系。总的来说，岭南人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外来文化持颇为宽容的态度，对西方文化较早地在岭南地区被吸纳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

#### （四）“西学东渐”在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中占很大的比重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重心是中西文化交流，其中又以西学东渐为主，这是时代的特点。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国际战争中屡战屡败，不但使西方人轻视中国，甚至使得中国人也对自己的文化产生怀疑，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念头。这种思想越来越强烈，到后来从被动、抗拒西方文化到主动、积极学习吸收，寻求救国良方，这样“西学东渐”便自然发生，并成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流。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岭南地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集团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对西方文化采取了深浅不同和取向不同的吸纳。

士大夫和官员当中有一些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明白人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介绍，而且目的相当明确，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以，此时期岭南人以主动姿态吸取的西方文化，主要是世界历史地理学和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知识。对西方政教稍有涉及，但很肤浅。对于西方的基督教精神文明，则认为“鄙屑不足道”。其中的林则徐、梁廷枏和潘仕成等代表人物，成了“西学东渐”的先驱者。

中下层人民中除了一部分附从于官僚士大夫外，另一部分则从自身需要出发，对西方文化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他们传统文化的负荷轻，接受外来文化时，容易跨越心理障碍，特别是对清朝统治怀有不满的下层群众，反叛传统和接受异端的思想使他们对西方文化开始了主动积极的吸取，洪秀全和洪仁玕就是典型的代表。洪秀全对基督教平等观和天国观的关注，创立中西合璧的“拜上帝教”，开始了融合中西文化的大胆尝试；洪仁玕对西方文化的全面肯定和吸收，也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香港、澳门两地，因为处于西方殖民政府的统治之下，西方文化可以毫无顾忌地输入，而中国人也可以自由地加以吸取，对西学的吸纳比内地更多，也走得更快、更远，特别是西方教育、医学、法律制度、经济思想的介绍和引进令人注目。

值得一提的是，何启、胡礼垣致力于西方法律、医学的介绍和推广；王韬在《循环日报》发表一系列改革言论；郑观应写出了以西方为楷模的改革巨著《盛世危言》；理雅各和王韬合作翻译了《中国经典》；容闳带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美，其中三分之二是在香港、澳门受过初步英语教育的岭南人；孙中山立下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香港、澳门虽然不属于中国政府管辖，但人民却可以在这两地与内地自由来往，由两地培养出来的具有西方新知的中国青年，对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岭南之所以成为维新和革命领袖辈出之地，与境外先进文化的直接熏陶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岭南学子也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更多、更早地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可以说整个过程是起伏曲折的，交流是逐步深入的。西方文化的输入和中国文化从岭南的输出是同时进行的，是一个双向的流动。但由于时代的原因，中国落后于西方，以及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这个双向的运动又不是对等的，即西方文化输入中国较多，而中国文化输出外国相对较少。西方文化的输入，经历了一个西方强迫输入、中国被迫接受和不时抗拒到中国主动学习引进的过程；西方文化的输入者也经历了以传教士为主体到以中国具有先进思想、代表先进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过程，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中国没有受到西方完全的同化，但也不能排斥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于是，便产生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它是中国近代文化的新生形态，尽管这个新生形态是不成熟、不系统和不定型的一种过渡形态，但它为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 近代风云变幻与广州文化的发展

广州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具有鲜明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化。“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一道，属于岭南文化的主脉。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时代的嬗变，古老的广州文化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广州文化在近代的转变，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西方文化之长处，实现自身的更新和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时代的风云息息相关。深刻而激烈的社会变迁使广州文化实现了一次飞跃。

## 一、承上启下，发扬实学经世传统

广州文化在近代发生变化的首要原因，是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内忧外患的危机面前，知识界经世致用的学风重新抬头，一扫空疏之颓气。

鸦片战争后，面对来自西方的威胁，广州知识界以学术经世的态度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林则徐在广州时，出于对外防御的需要，开始注意收集西方国家的情报，翻译西方的书刊，打破对西方世界隔绝和无知状态。他“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他将译出的资料，亲自审阅修订，于1840年前后编译出版了《四洲志》、《华事夷言》、《达滑尔各国律例》等书。《四洲志》概述了世界五大洲30余国的地理、历史，重点为英、美、法、俄诸国情形，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史地的译作，吹开了中国人研究西洋地理历史的风气。《华事夷言》则是鸦片战争前夕西洋人对中国的时事评论的编译，大抵摘西人杂志、报纸中有关中国的议论而成，此书在当时颇为流传，成为中国人了解外国人思想观念的第一本参考书。《达滑尔各国律例》是对瑞士人达滑尔所著《各国律例》(Law of Nations)的选译。《澳门新闻纸》是对英国人办的《广州周报》和《广州纪事报》的选译。林则徐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打破禁区，带头留心夷事，关注夷情，甚至还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在继承传统经世思想的同时，把经世之学的内容加以扩充，使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添了时代感和开创性。自此之后，过去被士大夫鄙视的“夷务”开始作为一门新的学问，列在经世之学的名下。

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它把学术研究和社会需要紧密结合，治学目的十分明确，研究内容求实求真，研究成果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经世致用的学风在盛世时隐藏不露，衰世时风起云涌，虽断断续续却历久不衰，并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积极的、入世的取向。

梁廷枏是广东顺德人，曾任广州越华书院监院、粤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学长、广东澄海县训导等职，一向留心实学。1835年，两广总督邓廷桢聘请他任广东海防书局总纂，主编《广东海防汇览》。次年，又聘为《粤海关志》总纂。在编书中，他不但收集了大量鸦片战争以前中外贸易的资料，而且还“采集海外旧闻”及各种报章、西人著述，逐渐积累了不少有关海外的知识，成为当时广州有名的“外国通”。鸦片战争后，在林则徐等人的鼓励带动下，梁廷枏开始了史学经世的学术创新，他于1844年撰写的《合省国说》，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美国史。它充分利用了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材料真实可信，知识全面系统，非旅途见闻，更非天方夜谭，当时在国内是质量最好的世界史地专著。他认为，当时中国人称美国为米利坚，只是洲名的音译，而不是国家的名称，米利坚合

省国才是这个国家的正式名称，因为“曰合省国者（亦称合众，或称兼摄邦国、联邦国、西语为‘育奈士迭’），称其国内所分之地为省，前分后合，从质即以合省名”<sup>①</sup>。第一次向国人解释清楚了美国联邦制的性质。他最早向国人介绍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把水如何受热成汽，推动活塞工作，如何发动并牵引车、船行走，均作了详细说明。梁廷枏研究成果的领先性到今天历史学者们都是承认的，他们把这种情况形容为“春江水暖鸭先知”。广东是对世界文化关注最早的地方。

当时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还大多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主要在船舰、火器方面，“师夷长技”，一般就是指军事技术。梁廷枏在《海国四说》中指出，英、美等国强盛的重要原因，“实以贸易为本务，所入视农工远甚，统领之所劝奖者固在此。盖税之所出，国用攸资也”<sup>②</sup>。他认为美国的开矿无禁政策、英国的免税进口农器政策、奖励发明创造的法令等对促进和发展生产有积极作用。他称赞美国的民主制度，认为“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统领限年而易”等民主选举和法制使得美国统领在任期内能够“力守其法”、“殚精竭神”，而美国的政治也少有“贪侈凶暴”的现象。不过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度“是必米利坚之地之时而后可”，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仿效。这些文字表明了他对西方世界认识在深度上已经走在时代的前列，而且对哪些做法好、哪些做法可为中国仿效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意见。

在广州，探索世界知识的活动当然不止林、梁两人，一些比较开明的中小官吏、学者、通事、买办、教会学生、归国华侨等也都兴趣甚浓。官吏如邓廷桢、怡良、关天培等，士绅如张维屏、俞正燮、丁拱辰、邹伯奇等，有的认真收集、翻译外国书报、地图、奇器，有的自己著书立说，有的再版有关海外情况的旧籍，以探索、了解、介绍世界知识。这些文化活动继承了历史上的经世精神，又发展了传统学问、更新了知识，承上启下，为广州文化变迁开了一个好头。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认识世界成为广州人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课题。由此，学术成果也以研究西方军事技术、世界史地和对外关系等最为突出。

鸦片战争后，学者们不断在传统学术研究实践中贯彻强烈的经世意识，使学术走出象牙之塔，成为解决重大时务的有利武器。在鸦片战争前后再度兴起的今文经学，不株守古代典籍的章句文字，而侧重探索其微言大义，有其独特的治学门径。随着中国社会危机加重，研究今文经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今文经学家攻击古文经学之风，也日益流行。康有为治今文学，便有学术经世的意图。他的著述较多，重要

① 梁廷枏：《合省国说》卷一，1844年刻本，第12~13页。

② 梁廷枏：《合省国说》卷三，1844年刻本，第15页。

的有《王制义证》、《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新学伪经考》、《孟子为公羊学考》、《论语为公羊学考》、《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这一系列著述的中心思想是“发古文经之伪，明今文学之正”。康有为把古文经斥为伪经，认为今文经才是孔子真传。又说孔子是受命于天、有德无位的素王，孔子创作“六经”，是为了托古改制。他推崇《春秋公羊传》，把其中所讲的三世之别与《礼运篇》所讲的“大同”、“小康”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这都是康有为想利用今文经的微言大义进行议政的经世思想使然。虽然，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这些论断不免有牵强武断之处，但在当时却大大冲击了“无一人敢违，无一人敢疑”的古文经典的正统地位，在思想界掀起一阵飓风。保守的学人惊呼：《新学伪经考》使“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sup>①</sup>他们纷纷要求朝廷将此书焚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的经学研究为其“托古改制”、“君权变法”的政治理想服务，推动了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有为可说是把学术经世发挥到了极致。

经世致用之学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实”字。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各种与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实务，标示着近代广州文化适应着时代的要求，由空疏向切实转变的趋向。

## 二、兼收并蓄，学习西方先进文化

广州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城，自然不乏文化开放和兼容的风度，虽然有清一代全国大部分地区、相当长的时间是闭关锁国，但广州由于一口通商，与外国的交流一直不断。不过，近代以来的文化交流却是过去无法比拟的，这也和时势的变化有关。首先，和平时期的文化交流和战争时期非常不同，这不是风度问题，而是生死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既是侵略的文化，又是先进的文化，中国人既要抵抗侵略，又要向侵略者学习，这不是一个容易协调的矛盾，期间的敌视、冲突、排拒和斗争异常激烈。广州人经历了痛苦之后，开始冷静地思考、理智地选择和艰难地摸索中国前进的道路，迈开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步伐。其次，在学习西方的内容上，关注的不再是奇珍异宝等消费性奢侈品，而是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民主思想。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融合中西文化的新问题上，广州人探索的步伐和取得的成就不可小视。

<sup>①</sup> 《朱蓉生答康有为第四书》，苏舆：《翼教丛编》卷一，1899年线装本，第12页。

咸同年间，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广州最早出现了异军突起的一支文化流派，这便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思想理论。在大多数人还视西方宗教为异端邪说的时候，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结合中国儒家经典义理，创造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文化。其代表作是《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天朝田亩制度》等。洪秀全把中国经典里“公羊三世说”中的“太平世”和基督教《新约·马太福音书》里的“天国”合起来，创造出“太平天国”的新概念和新理想。又用“拜上帝教”教义作为中国农民起义军的思想信仰、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体系。虽然洪秀全的“中西合璧”、“耶儒合璧”的创造在文化融合上并不成熟，在学术上价值也不高，说不上是成功的例子，但对于引进西方思想观念，冲击中国保守、陈旧、封闭和自大的文化风气有着积极的意义，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大胆尝试。

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大都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康有为在戊戌年间倡言变法，他试图会通中西，融贯新旧，把中国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同西方的进化论糅合起来，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但限于历史条件，只能让孔子穿上进化论和民权论的外衣，用今文经的微言大义去附会天赋人权之说，把伸民权和尊君权的旗帜同时高举。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的康梁对西方的认识迅速提高，君主立宪思想和“新民”学说的产生便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新成果，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果说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属于从旧式士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变的类型，那么自从留学欧美、日本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出现后，广州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便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折。近代中国学生赴欧美留学的风气自广东始，广东香山人容闳、黄宽和黄胜于1847年到美国留学（黄宽后来又转赴英国）；1872~1875年由容闳带领的4批120个公费留美幼童中，有84名是广东人；广东南海人何启于1872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广东新会入伍廷芳于1874年自费赴英国留学；1879年孙中山赴檀香山求学。他们均是中国留学生之先驱。他们在西方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接受西式教育，逐渐成为知识结构和思想素质与中国传统士子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把西方的先进文化、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带回中国，与中国文化中的优良成分加以融合，因而有了新的发明创造。其中最为杰出的文化成果便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时，已提出“驱除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革命纲领。在1896~1897年间于伦敦暂居时又利用英国博物院图书馆极为优越的读书条件，广泛阅读西方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军事等方面的书籍，美国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和德国杰出学者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引起了他的注意和兴趣，对他的民生主义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加上在国外实地考察世界

大势，和中外志士们反复探讨中国的前途，孙中山终于形成了中国文明须“取法于人”，而且要“取法乎上”的观点，从而在1905年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三民主义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在鼓舞和指导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人民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是中国学术进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飞跃，也是广州近代学术的一个开创性成果，昭示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合是中国学术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广州的学术思想在近代之所以能有超越于内地的发展，实源于此。

### 三、倡言改革，推动文化领域各门类的创新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救国的行列中来，动员人民的任务催促着文化的大众化和政治化，文化领域各门类都要适应新的形势。甲午中日战争后，维新变法思潮和运动勃然兴起，维新派在鼓吹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倡导文学革命，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主张。黄遵宪、梁启超、丘逢甲等广东籍维新派成为这场文学革命的首脑。

文化的更新，是从文学理念的变革开始的。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高呼“诗界革命”的口号，在其后的《饮冰室诗话》中再把“诗界革命”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饮冰室诗话》近10万字，是梁启超在诗歌创作理论方面的一部重要专著，它回顾了戊戌以前维新派提倡诗歌革命的情况，对走过的道路进行了反思，得出了“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结论，反对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做法，认为“以旧风格含新境界”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才是正道。他突出强调了新名词与新意境的结合。他对当时的三位诗坛健将——谭嗣同、黄遵宪、丘逢甲的诗歌创作进行了热情的介绍和大力颂扬。

梁启超也是近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1897年，严复和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1898年，梁启超在日本办《清议报》，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进一步对小说界革命加以鼓吹，提倡以政治小说转变国人言论，推进政治变革。他说：“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澳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sup>①</sup> 1902年，他又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

<sup>①</sup>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35页。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对小说的社会作用作了完整的论述。他认为，一般中国人的“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大都从旧小说得来，所以小说要进行革命，要弃旧图新。新小说应给人以理想，给人以知识，从而振刷国民精神，提升国民道德。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sup>①</sup> 提出以小说来开通民智，改造社会。

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还正式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所谓“文界革命”，其实就是要把散文从桐城派古文的禁锢下解放出来，自由地写作。改革的内容，一是提倡语文合一，二是革新内容，反对空洞无物。这个革命成为“五·四”后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近代的散文，以陈述时务、议论政事为主题的时务文和政论文取得了最大的成就。为适应社会政治剧变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它打破了古文艰深的文体风格，以一种自由奔放、通俗易懂的姿态登上了文学的殿堂。

在文学革命理念的指导下，文学改革实践无论是诗文还是小说的创作都出现了新气象。这一时期广州的诗文创作，以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和丘逢甲为代表，小说创作以吴趼人、黄世仲和苏曼殊为代表。他们的作品打破了传统的格局，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收获。

梁启超在倡导文学革命的同时，又举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帜。他从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挽救中国危亡的需要出发倡导革新史学，他撰写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文章，引进西方进步史学观点，与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相结合，构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他批判中国旧史学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为帝王服务而不是为国民服务，提出变写“君史”为写“民史”、“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从而促进人民的国家意识，振兴民族主义。梁启超在1920年退出政坛后，全力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撰写了一系列的经史研究论著，在社会史、学术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的成就尤为可观，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是一位努力实现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拓荒者。

在20世纪初，绘画的革命也出现在广州地区。画家们吸收西洋画法，对国画进行大胆改革，被后人称为“岭南画派”。其创始人为广东番禺的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他们主张吸取古今中外尤其是西方绘画艺术之长以改造传统国画，使之

<sup>①</sup>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0页。

朝着现代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折衷中外、融合古今”是其改革的方向，艺术革命是其灵魂，通过艺术美的陶冶以改造国魂是其目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它代表了前进的艺术思潮，以旺盛的创造力和艺术实践在中国近代画坛上独树一帜。

文艺的革命，使文艺的社会功用由教化和消闲扩大到担负起救国的责任。

### 四、跨越时空，追赶世界潮流

广州文化除了求实的一面外，也有富于想象力的一面，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是近代广州文化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与艰苦的斗争需要理想的支撑有关。近代中国是苦难的深渊，广州进步的思想家们在生存极度艰难的时候，怀抱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和追求，这使文化充满了鼓舞人向上的力量。这种追求不是向后看和向内看的，而是向前看和向外看的，甚至是超越了时代和地域限制，追随着世界前进的潮流的。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刘思复（又名“师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这三种思想都和当时世界上的新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有直接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的大同理想融入了世界人类的共同语言之中。

康有为的《大同书》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性，真诚地希望人类社会能够消灭国家、阶级和私有制，达到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境界。他主张在大同社会里，一切财产公有，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而且公有制是建立在大机器生产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对于这个人类最完美的社会的原则，康有为并不打算马上拿来实行，他知道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同书》虽然是一个幻想，但对美好社会的设计和向往，却是人类进步的不懈动力，所以有着积极的意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直接来源于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经常用“集产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来表达控制私人资本过度膨胀的意向，并多次把民生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虽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但也是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批判，是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度。孙中山和康有为不同，他的民生主义是可以实行的，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着手解决“土地”和“资本”的问题，他希望建设一个良好政府，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这个理想。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失败了，他的理想也落了空，但他关于用社会主义原则和方法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主张，对指导中国向更高阶段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初年，广州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学说——“师复主义”，这是以中国国内无政府主义派别的领导人师复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学说。1912年5月，师复在广

州西关创立“晦鸣学舍”，出版《晦鸣录》周刊，提倡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他又在广州首创工会组织，从事工人运动。“师复主义”是克鲁泡特金学说在中国的翻版，以个人的绝对自由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以建设一个无政府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主张立即消灭强权，消灭资本制度，实行世界大革命。师复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各人完全自由，无复一切治人之强权……”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人们可以自由组织“公会”，“亦无章程规则以限制个人自由”，“无所谓义务与制裁”。<sup>①</sup>这种学说在理论上是空想，在现实中也是行不通的，但它较早在中国传播了欧美兴起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让中国人大体上知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一种西方学说，对国人了解世界潮流有促进作用，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桥梁，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师复主义”的出现，说明民国后广州在引进西方最新思想学说方面，仍走在全国前列。

综上所述，近代的广州文化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刺激下，在时代风云激荡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学风，吸收了外来先进文化，开始了文化革新和进步的过程。开创性、新颖性、革命性、过渡性和理想主义是广州近代文化的特点。广州的文化依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更新，并以新面貌不断给予时代以新的作用。

## 近代广州风习民情演变的若干态势

风俗习惯的变迁是社会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密切相关，也和它们一样，是构成社会整体变革的重要表征。风俗习惯的变化可以反映出社会变动的深浅、利弊及民众对改革的接受程度，因而是值得考察和研究的课题。

近代中国的变化之大，人所共见。而城市的变化又比农村来得更快更烈。笔者试以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为视点，说明广东风俗习惯的变化以及民众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近代广州社会风习民情的演变，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西风东渐对民众

<sup>①</sup> 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载《民声》19号。

生活的影响；二是政治变革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三是商业发展和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习俗的冲击。风习民情的变化有趋于善和恶两个方面，有文明进步和野蛮落后两个方向，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复杂多样的发展态势；而挣脱封建思想意识的枷锁，释放人性欲望，追求平等自由，是一条鲜明的主线。

## 一、西风东渐对民众生活与观念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西方商品（包含科技）和宗教（包含教育、医术、慈善事业）最先对民众生活和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各种西方商品输入广东，并以其物美价廉赢得了人们的喜爱。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货逐渐充斥了广州的市场。据粤海关10年报告称：“在广州贸易区最受欢迎的布料依次是白色洋布、本色洋布、洋标布和擦光印花布。在当地的消费品中，毛巾开始普遍使用。据说大宗布料被广泛用来做内衣。擦光印花布现在大量从日本进口到广州，似乎已完全取代了德国的产品，越来越多的广州人穿起了棉汗衫和洋式短袜，特别是那些手艺人。毛织品在亚热带地区并不受欢迎，但有趣的是，毛线现在被本地人大量用来扎辫子，使这种商品的进口稳步增长。”<sup>①</sup>除洋布、呢绒这些穿的东西外，吃的有洋酒、洋糖、牛肉干、牛奶、面粉等，用的有煤油、肥皂、火柴、洋钉、洋伞、钟表，甚至还有沙发、扶手椅、弹簧床……20世纪初，西方传来的电影在都市中已经普及，成为市民娱乐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新品种。西式照相术也大受欢迎，照相留影成为广州人一项时髦的消遣，西方舶来品改变了广州人的生活习俗，使用洋货成为时尚的潮流。在广州这个通商口岸，买办较多，他们是最早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一批人，说洋话、用洋货、住洋房、信洋教，取一个洋名字，送孩子上洋学堂。由于他们比较富有，对社会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影响力，西方的生活方式渐成人们羡慕的对象，人们在互赠礼品时也把洋货作为希罕的赠品。习俗的改变对观念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人们在接触西洋器物时改变了对西方蛮夷的看法，从惊奇、赞赏到羡慕、模仿与学习，社会心态从仇洋转向崇洋。

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在广东的传播并不顺利。《中法条约》规定归还天主教教产和容许传教士任意租地，致使法国天主教横行霸道，激起广东人民的反教斗争。反教运动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义和团运动后，一方面中国仇教势力受到压抑；另一方面教会也因义和团事件而进行了反省，教会本色化呼声日益强烈，与

<sup>①</sup> 张富强、乐正等译编：《广州现代化历程——粤海关十年报告（1982~1941年）》，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民众矛盾较为缓和。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表示对各宗教一视同仁，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基督教获得快速发展。广东省在1903~1919年中大约有43个差会在传教，广州有20多个差会。全省差会总堂数目有127处，居全国各省首位。传教事业最兴旺的地区是珠江三角洲地带及人口众多村落稠密的地区，几乎每个镇都有教堂，以教堂为中心向附近乡村派遣中国布道员，积极传道。不少地区中基督教的势力及思想影响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全省有外国传教士730人，仅次于江苏省，其10%从事医务工作，男女医生人数多于其他各省，竟等于皖、浙、豫、湘、鄂、甘、赣、黔、晋、陕、滇诸省之和。这730个外国传教士分驻于72城，驻在广州、香港、汕头者占44%。全省受餐信徒1919年总数已达6万多人。基督教在广东的受餐信徒比皖、甘、赣、桂、黔、晋、陕、川、滇诸省信徒之总和还多。约有一半居住在广州及其四周并南部三角洲之近100英里地区内。<sup>①</sup>

信仰基督教的广东人，除了一部分是吃教者外，不少是由于对西方文明的羡慕、向往而入教的。比如，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仁玕认为，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基督教新教是西方强国的意识形态，凡是信仰新教的国家，其国力必强。洪仁玕并没有对基督教与西方国家富强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只是从归纳法上直觉地感知基督教与西方文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把基督教列为西方文明之“上宝”，并企图吸收利用它来改造和提高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面貌，移风易俗。又比如，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由于从小接受西方文化教育，也把基督教看做西方文明进步的基础而加以推崇。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经常研究耶稣精神与革命的关系，孙中山认为耶稣之理想为舍己救人，革命之理想为舍己救国，其牺牲小我，力谋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1924年孙中山在《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一文中说，基督教传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感觉，使吾人卒能脱异族专制之羁厄”，希望基督教青年会“担负约西亚之责任，以救此四万万人民出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sup>②</sup>孙中山从基督教中吸取了革命精神和献身精神。由于基督教包容有朴素的人道主义因素和拯世救民实现天下大同的思想，对于生活在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下的人民，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容易接受基督教的影响。据冯自由统计，兴中会成立前，直接参与孙中山密谋反清者有15个，其中半数以上是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而早期兴中会会员和1895年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多为基

<sup>①</sup> 以上统计均见《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

<sup>②</sup> 孙中山：《勉中国基督教青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7页。

督教徒。<sup>①</sup>除此之外，一些有功名的儒生也加入教会。如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钟荣光，中过举人，参加过戊戌维新运动，1898年，他因吸食鸦片成瘾，求助于教会医院想改掉这一习惯，从此他皈依了基督教，后来成为广东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

上教堂做礼拜成了广东一道新景观，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泉涌而进。传教士积极发展教育和慈善事业，吸收女子进入中小学堂读书，鼓励禁烟和组织天足会反对女子缠足。基督教青年会的年轻人感兴趣地进行着文娱体育、社交聚会和讨论发言等活动，教会学校的学生日益滋长着关注社会、服务社会的热情。基督教的救世精神对青年的影响不可忽视。香港西医书院教师康德黎在1912年撰著《孙逸仙与新中国》一书，其中提到就读该院的中国学生在1894年香港大瘟疫中的勇敢表现：“学生们无不自告奋勇地轮值效劳……瘟疫的恐怖横于前，许多亲友染疫而死或奄奄一息，居民逃出疫市，这些学生们竟然轮值履行书记、换衣、看护诸职务……轮值者一经病者接触，九死一生……这些学生们的工作，表明中国境内有人具有负责任的高尚的勇气与热忱。”<sup>②</sup>

但是，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侵略与被侵略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制约着基督教在广东的发展，并使一些曾信仰基督教的人开始与其疏离。广东人对西方科技、医术和教育兴趣远大于宗教，“中华归主”只是传教士的一个梦想而已。

近代城市的人们还忙碌于谋生与享乐，对宗教的兴趣日渐淡薄，也是基督教未能征服中国的一个原因。

## 二、政治变革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具有民族平等和民主自由思想的政治变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清末维新运动影响下，男子发式、女子缠足、跪拜礼节和尊卑称谓等习俗已经开始动摇，辛亥革命后，改正朔，易服制，废除跪拜，剪辫放脚，是由政府命令推行的，对移风易俗起到了加速作用。等级伦理关系受到民主平等思想的冲击，在人际关系上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男子剃发蓄辫，是清初统治者强迫推行的发式，是民族征服的象征。反清人士一直不予奉行。随着西风东渐，蓄辫发式又为西人耻笑。1898年，康有为以旧习俗不适应新时代为由，上书光绪帝，提出效法西方国家，断发易服：“今物质修

<sup>①</sup>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sup>②</sup> 康德黎：《孙逸仙与新中国》，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中国学社1962年版，第162页。

明，尤重机器，辫发长垂，行动摆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sup>①</sup> 他的这个主张成为国内力主剪辫的先声。不久，留日学生将剪辫的风气带回国内，广东也出现了仿效者。清末的军制改革也是促成剪辫成为风气的一个因素。因练兵处要仿照外国军制改造军队服装，而官兵蓄发则无法着装，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练兵处对业已流行到军队的剪辫风气听之任之。1910年10月，在北京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获得通过，消息传出，各地剪辫者不少。广州也成立了推行剪辫的组织。“粤商何乐琴发起华服剪发会，伍于簪、谭教五、苏尧臣等应之，赞成者已有多人，订会章20条”。该会决定于1910年12月31日为全体会员剪辫日。<sup>②</sup> 武昌起义后，人们对于蓄辫这个民族耻辱的标记，更为唾弃。广州光复当天，“无论老弱少壮之男子以及士农工商兵，罔不争先恐后，纷纷将天然锁链剪去，是日岸堤一带之剪辫店，自朝到暮，拥挤非常。操此业者。几至食亦无暇……统计是日剪辫者，尽有20余万人”。<sup>③</sup> 剪辫风气很快波及城镇和乡村。

清朝的社交礼节也体现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清末，在维新思潮推动下，一些开明的官员在自己的辖地内主动改革官场礼节，主要内容为废除跪拜和禁用“卑职”等称呼。这个改革的最先发起者是两广总督岑春煊。1906年1月24日，是旧历除夕，他对下属宣布从次年正月一起，广东、广西两省官员在下级进见上级时不再跪拜，一律改用“长揖”。辛亥革命后，广州军政要人在社交中已普遍采用了握手、举手、鞠躬、鼓掌等现代礼仪。1911年年底，广州新军收复香山后移驻广州西关，在谘议局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胡（汉民）都督亲出欢迎，与各军官握手为礼，当众演说，掌声如雷。次由香军代表谭民三庚续发言，众复鼓掌……胡都督偕秘书局多人出至队前环行一周，举手为礼”<sup>④</sup>。民国成立后，政府规定用鞠躬代替以往的旧礼仪。1917年，在广州东园举行的各界庆祝元旦大会上，全部都使用了鞠躬礼：“是日所行礼节如下：（甲）新年团拜之秩序：一、先向国旗行礼三鞠躬；二、各界向督军省长行礼一鞠躬；三、督军省长向各界答礼一鞠躬；四、各界相互行礼一鞠躬；五、礼毕照相……”<sup>⑤</sup> 社交礼节的改变，显示了从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到平等

<sup>①</sup> 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63~264页。

<sup>②</sup> 《粤省提倡华服剪发会》，载《大公报》1910年11月12日。

<sup>③</sup> 《广东独立记》，载《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456页。

<sup>④</sup> 《欢迎香军纪盛》，载《申报》1911年11月22日。

<sup>⑤</sup> 《广东阳历新年之团拜》，载《申报》1917年1月9日。

自由观念的转变。

中国妇女的地位，在近代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从男尊女卑向男女平等的方向转变。这个转变是以清末的反对缠足、兴办女学和妇女参政等女权运动开始的。

1882年，康有为路经上海时大购西书，并阅《万国公报》，深受启发。1883年回乡后，极思成立不缠足会。但在他的家乡南海县，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以一人之力实难抵挡，所以他与邻乡友人、一个曾经游历美洲的士绅区谔良，商议共创“不裹足会”。然而，由于当时风气闭塞，此会议而未成。1896年，广东顺德县出现了最早的不缠足会——龙山戒缠足会。此会由赖弼彤和陈默庵发起，一呼百应，入会者达数百人。<sup>①</sup> 风气由是顿开，多有以女子大足为合宜者。1897年，在广州附近一下子出现了9个不缠足会，它们是：香山不缠足会、陈村戒缠足会、赤花戒缠足会、顺德戒缠足会、佻城不缠足会、佛山不缠足会、大良不缠足会、南海不缠足会和澳门不缠足会。<sup>②</sup> 它们在报刊上登启示和文章，指出缠足陋习违情背理以及天足对于强国保种的特殊意义，动员人们入会，又编印不缠足歌谣，向下层群众进行宣传。为解决放足女子的婚姻问题，提倡在会员内部实行子女通婚，向会员散发“草籍”，以利入会者互相婚配。广州成为不缠足运动最活跃的地区。

与不缠足运动同时兴起的，是兴办女学。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想高涨，兴女学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内容。清末兴女学的理由，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1）广开民智，强国强种。梁启超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德法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sup>③</sup> 认为女子居国民之半，若不受教育，则国民智力，必为未受教育者牵制。（2）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女子解放的前提。郑观应批评中国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是不人道的：“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sup>④</sup> 报纸舆论也鼓吹“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3）开发生产力，发展经济。女子占人口一半，如能开发妇女的才智，使女子发挥与男子一样的社会作用，定会对经济有促进作用。这些理由使不少家长转变观念，愿意送自己的女儿上学堂。

据史料记载，广州人开办的最早的女子学校是1901年由张竹君创办的育贤女学；其次为1903年由刘佩箴、杜清持创办的广东女学堂，此校后改名为私立坤维

① 梁启超：《戒缠足会叙》，载《时务报》第16册。

② 参见《知新报》，第19、20、22、27、29、30、36、102册。

③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页。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女教》，《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女学堂。1907年，清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章程》，把女子教育正式列入了学制。明确了女子教育的法律地位，开始有了官办女子学校。民国初年，女学发展很快，在推广男女同校、开办女子高等小学、女子师范学校、女子半夜学校等方面，广州都走在全国前列。岭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1918年，岭南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到1920年女生计有中学三年级11人，大学预科12人，大学一年级2人，大学二年级3人。<sup>①</sup>女子教育的兴起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教育史上的重大变化。同时，它也是妇女地位重大变化前奏，打下了妇女解放的基础。

20世纪初，婚姻自由观念开始抬头。在新思想影响下，广东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学生冲破旧风俗和社会压力，自由择偶，并在城市中举行文明婚礼者，大有其人。自由风气也渗入乡间，1904年9月7日，报纸刊登一则新闻《婚姻奇案》，报道顺德县霞石乡一女子梁保屏，从14岁起为其未婚亡夫守节8年，成年后觉醒到这种做法不人道，自己选择了一位男子，要与之结婚。因双方父母不允婚事，便一道出奔到香港，循英国法律登记结婚，获准注册。<sup>②</sup>

辛亥革命期间，有一些妇女参加革命立了功，民国建立后，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参政方面发展。1911年12月，广东临时省议会在制定选举法时，规定了议会中有妇女代表10名。经过几轮选举，张沅、李佩兰等10名女代议士产生。广东在省议会中设女议员，在全国开妇女参政之先河，当即为舆论所称颂，妇女参政取得进步政治家的支持，但随着临时政府的北迁，很快变成泡沫。1912年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正式公布，妇女均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东女代议士们奋力抗争，李佩兰发表女界要求参政的意见书，广东籍留日女学生寄来了请愿书，女代议士们甚至联合各省女界共同上书北京政府。她们疾呼：“20世纪之时代，国家社会主义之时代也。20世纪之人民，平等自由磅礴之人民也。我女界对于社会固为一分子，即对平等国民亦为一分子，而国家对于我女界人格比较对于男界之人格则扞格殊甚，国家社会主义何在？自由平等这磅礴又何在？”<sup>③</sup>但由于妇女参政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1912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失败。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广东妇女参政运动率先复起。1919年秋，广州护法国会准备制定宪法，女界70多人发出通告，提出解放教育、解放职

① 甘乃光：《岭南大学男女同学之历程》，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40页。

② 《婚姻奇案》，载《大公报》1904年9月7日。

③ 《广州女界邓博倩等要求参政权上省议会书》，载《亚东丛报》1912年第2期。

业、解放政权三项主张。12月23日，广州女界1000多人在体育学校开会，决定组织女界联合会，选举委员11人，李莲、苏开瑞等当选为筹办联合会的委员。<sup>①</sup>后来，广州军政府的外交部任命曾参加辛亥革命的郑毓秀女士为外交调查会的名誉会员，此事被称为“中国女子参政运动的先例”<sup>②</sup>。1921年3月28日，广东省议会开会，女代表旁听，提出女子的参政问题，省议会发生激烈争执。女代表还与一些议员冲突起来。4月13日，广州城5000多妇女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妇女参政权，但是，广东省议会讨论时反对票占了多数。然而，女界的斗争没有停止，请愿在继续，最后，广东省长发布命令，承认女子在县议会选举中可得为选民，广东女子参政名义上取得了有限的成果。<sup>③</sup>应该说，广州女子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精神越来越强了。

### 三、商业发展和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习俗的冲击

广州是商业兴盛的城市，经商容易致富。由于农村人口激增和天灾人祸，生活水平下降，弃农经商者增多；仕途拥挤，士人生活相对贫困，又使更多的人弃学经商。在广州，商人在市民中所占比例相当高。据1909年统计，广州城住户为96614户，店铺多达27524户，几为住户的1/3。<sup>④</sup>清末，“商人渐有势力，而绅士渐退。商与官近，致以官商并称。通常言保护商民，殆渐打破从来之习惯，而以商居四民之首”<sup>⑤</sup>。商人地位的提升，使人们的贱商观念日益向重商、慕商方向转变。世人重商，商人的思想观念和习惯也就成为领导潮流的时尚。这对于习俗的影响，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趋利和逐利的意识使广州人勇于进取，注重实效，不尚空谈，养成了“惟实”之风。市场经济和意识浓厚，勇于接受新事物，打破传统束缚，追赶新潮流，形成了求新、求变、求活的心态。但逐利的意识也容易使人抛弃道德和廉耻，走向惟利是图的邪路。“重义轻利”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诚实守信的经商之道也逐渐褪色。商人的讲排场、尚奢华和及时行乐成了一时的风气。清末，豪商巨贾为显示自己的富有往往挥金如土，极尽奢侈之能事。而其他阶层的人民因羡慕而纷纷仿效，使奢侈消费成为风尚。这种风气在婚嫁上最为明显，形成

① 《广州特约通讯》，载北京《晨报》1920年1月6日。

② 《中国女子要求参政的先声》，载《解放画报》1920年5月第1期。

③ 刘志琴主编，罗检秋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

④ 《广东省垣人户最近之调查》，《广东省咨议局编查录》下，政治丛述（六）部，宣统二年（1910年）版，第103~104页。

⑤ 同上。

了对传统“节俭”美德的冲击。有记载称：“粤中婚事所用之迎新彩舆，有金翠辉煌者，有红缎平金者，有金亭翠亭陈设礼物，至其仪仗之鲜明，灯彩之富丽，诚各省所不及也。”<sup>①</sup> 这是清代的一般情况，到清末，则变本加厉。1897年，广州城内白姓、周姓、邓姓三富豪娶亲时，“迎娶仪仗之盛，固不待言。所奇者，前导有美女10余人，戎装执刀，花团锦簇。中队更有女顶马，明装艳服，高跨连钱桥，旁复用艳婢10余人，扮作旗装，手持玉唾壶、五彩花瓶、白玉如意、宣德铜炉之类；后则女郎40余辈，均芳龄三五，姿首绝伦……”<sup>②</sup> 其糜费之状，实令人慨叹。

清朝后期，社会的精神状态、风俗习惯和道德水准都呈现出末世的衰颓。晚清颓风在习俗上的表现主要是吸食鸦片的普遍化、赌博的泛滥和娼妓的盛行。政府也做过一些努力进行禁止，但动荡的政治军事局面往往使这些努力收效不大，恶风陋俗难以消除。

### （一）吸食鸦片的普遍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正式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易于得到，民间吸食鸦片渐成风气。19世纪60年代，广州每月进口的鸦片达到700多担，吸食的方式也愈来愈讲究。烟土有不同的等级和口味，烟具精雕细琢，烟馆豪华，布置雅洁，气氛宁静，烟民采半坐半卧的姿势，懒散而迷醉。中国人吸烟完全不同于西方人饮服鸦片酊和吞服鸦片药丸的情调，成为一种中国化的享受。清末民初，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烟馆还与茶楼妓院一样，成为社交场所，谈生意、拉关系、消遣、娱乐……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对这一恶习也日见宽容。不但在广州城中烟馆林立，附近乡镇，也是不分男女老少，无论贵贱贫富，广为吸食。下层人民吸食鸦片多与生活艰难和精神苦闷有关。另外，近代中国经济落后，医学也不发达，国人健康状况普遍不良，鸦片成为“万用医药”，也是鸦片广泛流行的一个原因。

1906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的诏令，为了振刷官员和全体人民的精神，决心痛除几十年来危害国家的烟毒。政府从禁种、禁吸、禁售各个环节入手，规定10年内禁绝鸦片。20世纪初，土烟已经取代洋烟占领中国市场，只要政府狠抓禁种这一环节，收效必大。而且，过去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的英国，在1906年因为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下议院通过议案，不再支持中印鸦片贸易，答允逐年削减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中国禁烟运动有了比较好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掀起了一次认真的大规模的禁止吸食鸦片的社会运动。广州也于1907年开始采取

<sup>①</sup> 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01页。

<sup>②</sup> 见《申报》1898年1月1日。

行动，首先是查禁烟馆，所有烟馆一律停闭。其次是严定期限，令烟民们断绝烟瘾。另外，在官方的鼓励下，民间纷纷成立戒毒团体，宣传发动群众参加禁烟行动。自然，这些措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比如一些烟馆转入地下经营，一些烟民大量购买鸦片以做储备，等等。但总的来讲，禁烟运动还是很有声势。与此同时，禁种鸦片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广东在1910年秋季，大部分地区都已经禁种鸦片。至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广州吸食鸦片的人已经大为减少。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针对革命期间社会失控、烟毒有复炽之势的情况，于1912年3月2日重申禁烟令，后来北洋政府也多次发布禁令，使民国初年再度掀起禁烟热潮。1912年年底，广东都督府颁布了《禁烟章程》，章程规定：自1913年1月1日起，在全省禁绝吸食鸦片，违者重罚。警察厅负责执行，广州居民吸鸦片烟被抓者每日不下十数人，有的被罚款多达1000元。如此严厉的措施使一些烟瘾重的人纷纷逃到香港、澳门以躲避搜捕。<sup>①</sup> 各界群众也积极参与，有人提出成立“强迫戒烟所”，有人提出马上废除为期10年的《中英禁烟条约》，在1913年一律禁止印度烟入口。劝导人民禁烟的舆论盛极一时，各种报刊大量登载宣传戒烟的文章。民国初年禁烟取得的成效比清末又进了一步。

但民初政局不稳，政权更迭频繁，各种政权对禁烟态度不一，阻碍了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在龙济光踞粤时期，官府竟公开包庇售卖烟土，后来还实行烟膏专卖，使“私土运入颇多”。<sup>②</sup> 桂系踞粤后，鸦片更加泛滥，政府对鸦片种植、运输和吸食征收各种税费，以搜刮民财。军队甚至强迫老百姓种烟，以收取亩捐。这一时期，云、贵、川等省所产鸦片也经广西运销广东，广州的烟祸又卷土重来。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使禁烟运动走向流产，因为鸦片已成为军阀割据的重要经济支柱。

## （二）赌博的泛滥

赌博兼有游戏娱乐和投机生财的双重功能，在广州这个商贾流民聚集之地一向较为流行。但因赌博引发不少社会治安问题，如斗殴、偷窃、凶杀、迷信等，为清律例所禁止。然而，赌博在晚清和民国初年屡禁不止，甚至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聚赌风，与赌业获利丰厚、政府暗中保护、民众趋之若鹜等因素有关。

赌博活动形式多样，花样翻新，有番摊、牌九、扑克、花会、麻雀、闹姓、升官图、抛骰子、斗鸡、斗狗、斗蟋蟀、白鸽票等等。1861年，广州贡院毁于战火，粤绅请官厅准予开办闹姓，得到允准，赌博活动开始取得合法地位，由秘密转为公

<sup>①</sup> 《粤警厅禁烟之严厉》，载《申报》1913年1月28日。

<sup>②</sup> 见《政府公报》1915年4月30日。

开。在好逸恶劳和投机心理的驱使下，农工商学各界之人无不被裹挟其中，牵涉面之广，连妇女、老少者亦未能幸免。“通省赌具，除闹姓外有铺票、番摊、小闹姓等名目，妇女则有花会、女摊，童稚幼孩更有骨牌会、牛牌各名色，无论老少，人人有赌，父不能戒其子，夫不能责其妻，甚至有仕宦眷属因赌卖身，流落为娼者。至仆妇女更无论矣。”<sup>①</sup>“凡有花会赌厂设立的地方，其周围数十里的人家，不论贫富男女老少，几乎十之八九，无不参加，一家之内，父子婆媳亦共同会商下注。”<sup>②</sup>

历届两广总督，对于禁赌，都不用力，以致赌害愈演愈烈。直到1911年，张鸣岐任粤督，才下令自农历三月一日起在全省禁绝赌博，并公布了严厉的惩治条例，广州的赌风稍有收敛。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成立，在胡汉民、陈炯明督粤期间，采取了各种措施禁赌。但1913年龙济光接任广东都督后，广东赌风又起，且有人联名上书省行政公署，要求弛禁。从1913年年底到1914年3月，弛禁与严禁两种意见争论不已，官厅不敢做主。要求弛禁者便携款到京运动解禁：“粤人以赌为生活者不计其数，现有奸商某等为前清道员，携巨款来京运动解弛禁赌，并带有工文墨者数人司文牒之事。”<sup>③</sup>但此事遭到旅京粤人之反对，梁士诒、梁启超等领衔复电广州商务总会并电致龙都督与民政长，请严申赌禁，惩办博徒。广东弛禁暂没有成为事实，但禁赌也没有明显成效，各地官署包庇赌徒，从中获利，广州周围的许多地方赌博遍地，而绝无军警过问。到1914年10月，龙济光借口救济水灾，招商承饷开办了山票、铺票，美其名曰“水灾有奖义会”，年饷80万。随后又开办牌捐。此例一开，山票、铺票、牌捐、字花、牌九、骰子挡等各种名目的赌博活动又死灰复燃。当时，广州的西关参与赌博的人十分踊跃：“男男女女，如蚁附膻，一时有小澳门之称。”<sup>④</sup>1916年后，广东进入桂系执政时期。为应付驻粤军队的欠饷和民军编遣费用，当局用36万元的“运动费”贿赂省议会议员，使“开赌案”得以通过。于是，自1917年下半年起，广东省内赌风日甚一日，历来种种之赌祸，无不毕备。

### （三）娼妓的盛行

广州商业发达，旅馆、食店林立，到城市谋生的男性增多，为娼妓的盛行提供了基础，加以战乱、灾荒和贫穷，大批妇女失去生活保障而流入城市，在无以为生

① 《奏停赌饷》，载《申报》1903年7月14日。

② 李汉冲：《花会赌博种种》，《广东风情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③ 卫恭：《八十年来广东的禁赌和开赌》，《广东文史资料》第十六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6页。

④ 《粤官商争持中之禁赌问题》，载《申报》1914年3月18日。

的情况下，妓业成了她们的谋生手段。年轻的充当妓女，中年和少年的组成妓业的龟鸨、女佣、女仆群体，妓业成为城市中一个女子集中的大行业，不仅屡禁不止，久盛不衰，而且随着商业的发展而日见兴旺，向着职业化发展。民国以前，广州的娼妓多集中在陈塘、东堤两地，青楼妓院、花筵酒家遍地皆是。

1912年，广东军政府为正风俗，饬令绥靖处查禁娼业，但未取得明显成效，公娼暂时消失，私娼却随处可见。1914年，广州当局为解决军队的饷源，对挂牌纳捐的公娼以恢复商业经营的名义同意在固定地点复业，并制定了一些管理规则。广东都督、省长发布告示，“宣布所有东堤及西关之娼寮、陈塘南新填地塘鱼栏一带，并花地之金针帮及水上之士敏土厂前、二沙之西、大坦尾之北，前经指定湾泊妓艇地点，均许其先行复业，惟不得在城内开设。”警厅制定的14条管理规则的主要内容是，营娼业者必须注册，营业地点受到限制，妓女不准吸食鸦片和聚众赌博，不得接待军警学界有服装标志者，不得凌虐妓女，按时按量交纳花捐等。对私娼虽然仍禁止，但并不严格，不少妇女仍在酒楼和旅馆陪饮陪宿，酒楼旅馆伙记专为私娼媒介，以图分利。官府对于私娼往往以罚款了事。民国官场的腐败和对花捐的垂涎，是娼业盛行的重要原因。1921年4月1日，广州各界民众有组织地举办了一次“废娼大游行”，但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并没有被当局答允。原因是政府在花筵捐上税收每年达60多万元，占市府总收入的1/4。废娼后不仅失去了巨大的税源，而且为安置妓女还须再拿出50多万元来。政府无力负担此项开支。

民国成立后，由于军阀割据和更迭的局面出现，使清末遗留下来的社会陋习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 澳门多元文化的历史形态

鸦片战争前 300 年间，澳门是中国领土上惟一没有对外关闭且特许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它不但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最初入口，而且是中西文化共生共存的奇异之区。下面试从宗教、风俗习惯、建筑音乐绘画、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方面描述澳门多元文化的历史形态。

## 一、宗 教

葡萄牙人在澳门输入的西方文化，较早的是宗教。葡萄牙是个信奉耶稣天主教的 国家，澳门是在华天主教的策源地，也是天主教在远东的跳板。自 1552 年耶稣会士圣方济·沙勿略首先到达广东省上川岛后，1556 年，耶稣会传教士公泽勒又被派到澳门，开始建立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个立足点。1575 年，澳门教区作为东亚第一个主教区正式成立，管辖中国、日本、朝鲜及中南半岛各分区的传教事务，因此澳门便成了整个远东天主教的中心、教士的集散地，甚至被人称为“东方的罗马”。1807 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澳门，开始了基督教来华的历史，但是由于新旧教派的互相排斥，新教在澳门的影响不大。

清雍正元年禁教前，在澳门，大小教堂林立，且有不少中国人信教。

耶稣会士在澳门建立的第一座教堂是“圣母小堂”。据说，它建于 1565 年。“1565 年 11 月 21 日，培莱思神父赴广州，申请入中国未果。返回澳门之后……获中国官员准许，得建一座小屋，作为临时会所，并附设一座小堂，名叫‘圣母小堂’。”<sup>①</sup>不久，澳门又成为发展远东教务的中心，建立了吸收东方人进教和培养传教士的“玛尔定堂”。方豪教授在他的《方豪六十自定稿》里说：“1580 年，澳门山上又建立一玛尔定小教堂，专收有志入教之人。阅二年，玛尔定教堂遂为中国及日本教中心……此堂且为最初赴罗马之日本使节学习拉丁文及其他欧洲文字之所。”文德泉神父在他的《三巴牌坊》一文里也说：“1579 年 6 月，罗明坚神父到

<sup>①</sup>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前卫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 页。

达澳门，于次年，即 1580 年，建一小屋在山丘上，作为中国人学习教理之所。罗氏又在此屋侧，附设一所教堂，定名‘玛尔定’小堂。从此之后，著名的‘天主之母堂’（按：即三巴寺）也开始兴建了。”<sup>①</sup> 据成书于 1751 年、由两位曾任澳门同知的清朝官员印光任、张汝霖合著的《澳门纪略》所载，当时较大的教堂便有“大庙”（澳门最早的主教座堂）、“风信庙”（蕃舶既出，室人日望其归，祈风信于此）、“葛斯兰庙”、“龙松庙”、“发疯寺”（内居疯蕃，外卫以兵，月有廩）、“板樟庙”、“唐人庙”（专为华人进教之所）、“三巴寺”、“小三巴寺”、“花王庙”（蕃人男女相悦，诣神盟誓毕，僧为卜吉完聚）、“医人庙”（凡夷人鰥寡孤独，有疾不能自疗者，许就庙医）等等。西方传教士起劲地向当地的中国人传教。16 世纪晚期，澳门华人加入天主教的数以千计。明崇祯七年，即 1634 年，澳门建立了华人教堂——“唐人庙”（此为葡史所记，《澳门纪略》记为清康熙十八年），用华语传教。入教的中国人有两种：一种是与外国人关系密切的人；一种是从广东各县到澳门进教的人。其中有经商来往的商贩，也有通事、仆役和雇工等。澳门人入教，有的取了葡萄牙姓名，改穿西式服装，娶葡萄牙女子为妻，按照葡萄牙的风俗习惯生活。

乾隆年间广东官方报告，澳门著名的华人教徒和教士有林先生和周世廉等 19 人。其他信徒无法统计。<sup>②</sup>

清明节前后的复活节和冬至前后的圣诞节，大批中国信徒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香山等县到澳门“唐人庙”持斋礼拜，成为一时盛典。<sup>③</sup>

入教的澳门人，因与西方人接触较多，习染很深。语言习惯渐化为夷，引起清政府的惊恐，于 1746 年查封“唐人庙”，禁止中国人信天主教。不久，“望德堂”又成为华人进教之所，此后，附近信教的人大增。虽然清政府的禁令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时期，但禁令时松时紧，到了 1818 年，仍有华人信徒 98 户。据《中国丛报》1834 年 11 月的统计数字，1830 年澳门有中国教徒 6 000 多人，其中有 7 名中国神父。

在澳门的大部分中国居民，仍信奉佛教和道教。澳门的中国寺庙有著名的“妈阁庙”、“莲峰庙”、“普济禅院”、望厦村的“观音堂”等。另外，乡村中还有不少中国宗祠、文庙观音阁等。一年四季，各种宗教节日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每逢礼拜日，教堂内便传出管风琴的鸣奏、唱诗班的歌声、教徒的祈祷声。每逢“复活节”，又会有供奉着“圣体”的盛大游行出现在街道上，吸引了无数的游人。

①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前卫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 页。

②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 页。

③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前卫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6 页。

而中国寺庙也是香火鼎盛，举行着各种佛教和道教的盛典。

## 二、风俗习惯

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葡萄牙人，还有一些西班牙人、英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瑞士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等等，他们按照各自的风俗习惯生活，明清政府基本上不加干涉。所以，澳门交织着多姿多彩的欧洲和亚洲的风土人情。

到澳门来的葡萄牙人大多是经营商业的，他们有“祈风”之俗。每年商船出海，家家的生命财产系于此。出洋的时候是冬天，多北风，回来已是四五月，四五月多南风，所以一到商船将返，妇女儿童便“绕舍呼号以祈南风”，如果出洋的人不回，则“相率行乞于市”，乞者常千人。

葡萄牙人行西历，无中国的所谓“节令”。春天和秋天也没有祭祀祖先的习惯。婚丧大事也无“宾饷币帛之仪”。“燕饮不修宾主揖让之礼，饮酣则掷玻璃盏以为乐”。每天下午起床，晚上活动，上午睡觉。崇尚奢侈，稍有钱财便花在居室的装饰和服装的华靡上面。出门“张盖乘舆”，相见以脱帽为礼。

葡萄牙人重女轻男，“家政皆女子操之，及死，女承其业。男子则出嫁女家，不得有二色，犯者女诉之法王，立诛死，或许悔过，则以铁钩钩其手足，血流被体而后免。女则不禁。得一唐人为婿，皆相贺。婚姻不由媒妁，男妇相悦则相耦”。婚礼在教堂举行。

丧礼也与中国不同，“尤薄于送死，家有丧，号哭不过七日，不炊。亲友馈之食”。

这些在中国人眼中都是些不可思议的奇风异俗。

1839年，林则徐巡阅澳门时，在他的日记中亦描写了澳门的西洋风俗：“甫出关闸，则有夷目领夷兵百名迎接，皆夷装戎服，列队披执于舆前，奏夷乐，导引入澳……入三巴门，自北向南，至娘妈阁天后前行香，小坐。复历南环街，由南而北，凡澳内夷楼大都在目矣。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屋，多至三层，绣门绿窗，望如金碧。是日无论男女，皆倚窗望街而观，昔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混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成狐、兔等兽之形。……须本多髯，乃或剃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么子，良非丑诋。更有一种鬼奴……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髻。衣服

上而露胸，下而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sup>①</sup>

而澳门的中国人，依然保持着中国的生活习惯，他们过春节，祭祖先，赛龙舟，行中国农历的节令。男子读中国经书，参加科举考试。女子年轻守寡的，不肯改嫁，被褒扬为节妇。两种反差很大的生活和观念，和平共处，两不相扰。

### 三、建筑、音乐、绘画

近代西洋建筑传入中国，是从澳门开始的。澳门西洋建筑甚多，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教堂具有当时罗马盛行的“巴洛克”风格外，民居也别有情趣。民房一般都是三层的楼建在山坡和山顶上，形状有方、圆、三角和六角及八角等，还有的造成像花、果等形状，屋顶俱为螺旋形，争奇斗丽。房子四面窗户很多很大，窗饰讲究，楼门都设在两旁，门前有数十级楼梯，主人居楼上，黑奴居楼下。

澳门的中国式建筑，有中国官署议事亭，在平地上建起的中国平房民居，还有就是雕梁飞檐、富有民族特色的妈祖庙、关帝庙等。

西洋音乐和绘画是通过宗教仪式而传入中国。澳门的三巴寺有风琴。除风琴外，还有铜弦琴、西洋军乐等传入澳门。

教堂里有不少西洋画，《澳门纪略》载：“三巴寺有《海洋全图》。有纸画、皮画、皮扇面画、玻璃诸器画。其楼台、宫室、人物，从十步外视之，重门洞开，层级可数，潭潭如第宅，人更眉目宛然。又有珐琅人物山水画、织成各种故事画、绣花画。”<sup>②</sup>

18世纪末19世纪初，有几个著名的西方画家曾在澳门从事绘画创作，出现了用西洋技法描绘澳门风物的杰出作品。

英国画家威廉·亚力山大和马生随英使马戛尔尼到澳门，在居留期间，把中国景物用写生画法描绘后带回英国，英国人描画中国事物，是以澳门的历史名胜为开端。继之，则有约翰·韦伯及柏黎二人，后又有孔夫顿（他的作品年代在1815~1819年间）、罗拔·义律（作品年代在1824年）、比成（作品年代在1826年）。最有成就的是长期旅居澳门的英国著名画家钱纳利，他于1825年来到澳门并成为一个人普遍受到人们欢迎的人，1852年在澳门去世。他在澳门侨居26年，用炭笔、水彩等创作了大批描绘澳门风土人情的作品，他的写实画《濠江渔娘》在英国展出后，大获好评。他还在澳门广交画友，传授画艺，培养中外画家，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流派。

<sup>①</sup> 转引自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sup>②</sup>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另一个热心描绘岭南风物的画家是法国波塞尔，他在1838年8月~1839年6月在澳门、香港和广州作画。回国以后出版了名为《中国与中国人素描集》，他的画风以客观、真实和细致著称，展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岭南风貌。

### 四、科学技术

葡萄牙的枪炮，当时的中国人称之为“佛郎机统”。1517年葡萄牙人来到广州时，佛郎机统随即传入中国。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在澳门建筑了炮台，带进了洋枪洋炮，更加加快了西洋枪炮在中国的推广使用。葡萄牙人早期在澳门修筑的炮台，自半岛的东南至西北沿岸的各山头都布满了。较大的有“三巴炮台”，位于半岛的中央山顶上，建于1619年，成于1626年。炮台成多边形，“列炮廿八，上宿蕃兵”。另外，还有“东望洋炮台”、“西望洋炮台”、“加斯兰炮台”、“南湾炮台”、“娘妈阁炮台”、“沙梨头炮台”、“烧灰炉炮台”、“仁伯爵炮台”和“圣约翰城堡”等。各个炮台上安置的炮位，有200余个。最大的炮，重3000斤，长2丈，炮口能容3人蛇行而入。烧灰炉炮台所在地，是曾经扬名于世界的铸炮窟，即澳门兵工厂，也是澳门葡人支援明廷抗拒满人入侵而制造军火的地方。它也曾经铸造过一些教堂用品，如铜钟和十字架等。

至于洋枪，则有长枪、手枪和自来火枪。《澳门纪略》记载：“其小者可藏于衣衫之中，而突发于咫尺之际。”<sup>①</sup> 惊叹手枪是多么小巧神奇。

兵器之外，葡人带进澳门的西方器用还有天文器、钟表、光学仪器等。<sup>②</sup> 玻璃已传入中国，以玻璃做成的镜子、灯、壶、杯和屏风等在澳门已很普遍。镜子有照身大镜、千人镜（悬之，物物在镜中）、多宝镜（合众小镜为之，远照一人作千百人），有千里镜（可见数十里外）、显微镜（见花须之蛆，背负其子，子有三四；见蝇虱毛黑色，长至寸许，若可数），有火字镜、照字镜、眼镜，等等。时人也有玻璃镜诗、眼镜诗咏之。这些西洋奇器，当时令中国人赞叹不已。

### 五、语言文字

中西方语言文字的交流是从广东民间开始的。先是葡萄牙人来中国贸易，不通中国语言，依靠简单语言和辅助的手势开始了交流。逐渐出现了一些能与葡萄牙人

<sup>①</sup>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6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75页。

进行贸易上的语言沟通的岭南人，叫通事。他们并不真懂葡萄牙语，但能用中国语言来表达葡萄牙语的意思，正如美国人亨特在他的著作《广州番鬼录》里说的：“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通事’，是因为他们只通中文，并不懂外文。”<sup>①</sup>由通事们掌握的这种早期中西语言交流的工具，被称为“广东葡语”。

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后来居上，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伙伴，中英贸易额占全部中外贸易额的80%，美国也占有不少贸易额。这样，两个英语国家的强有力的加入，使英语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为了适应中外贸易的需要，岭南地区又出现了由通事们创造的“广东英语”。“广东英语”就是后来在上海滩风行一时的“洋泾浜英语”。

通事、买办们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受过外语的正规培训，他们只是在与外国人接触的过程中领会到外国语言的意思而进行交流的，而且他们所懂得的仅仅是局限于商业活动方面的语言和口头上的语言，并不懂书面语言。

这两种语言前者在明末流行于澳门，清朝开后，逐渐流行于整个广州口岸；后者在清朝乾隆中叶以后，开始在澳门与广州流行。

中外语言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不可能永远是单向的。外国商人可以依靠中国通事，但外国传教士就不能依靠他们，而必须自己学会用中文宣讲教义，所以也有外国人学习中文。早期天主教为了要在中国发展教务，开始鼓励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1579年，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到达澳门，按照教会的指示，学习中文。1582年，另一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也到了澳门学习中文。以后，有更多的传教士在澳门修习中文。据说，自罗明坚起到明朝末年，起码有数十名耶稣会士学会了中文并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但是，由于清政府在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禁天主教，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颁发了《防范外夷规条》，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成为犯法的事，只能偷偷地学，懂中文的人便越来越少。据说，到鸦片战争前夕，懂中文的外国人便只有马礼逊、德庇时、裨治文、郭实腊、伯驾和亨特等几名。

关于“广东葡语”的特点，《澳门纪略》一书篇末附有一个“广东葡语”的单词表（澳译）可供研究。而关于“广东英语”的特点，美国人亨特的《广州番鬼录》提到当时广州商馆附近的书店出售一本名叫《鬼话》的小册子，可以为证。<sup>②</sup>

这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只有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词汇表，里面只包含了几百个外语单词。中国人在使用它们时不是遵循它们本身的语法和句子结构，而是依照中文文法和句子结构来排列，发音方法也是中国式的。

<sup>①</sup> 威廉·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sup>②</sup> 同上。

而外国人学习中文，也常在中国字旁附以拉丁文拼音，以便记诵，逐渐编成字典。1584~1588年间，利玛窦和罗明坚合编了一本《葡华字典》，这是第一部葡华字典，用拉丁文注音。1625年，比利时籍天主教士金尼阁编写了一本更加完善的用拉丁文注音的中文字典——《西儒耳目资》。金尼阁把汉字分为29个音素，以拉丁字母符号，编成韵母、声母、叠韵母等几类，与其相对应。比如韵母有5个：A（啊）、E（额）、IA（丫）、O（阿）、U（午），叠韵母有50个：AI（爱）、AO（澳）、AN（安）等等。这种注音法，与我们今天的汉语拼音十分相近，可见它对中国字注音的影响之大。

1817~1823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出版了《华英字典》，这是第一部汉英对照字典，共收入汉字4万多个，是当时最完备的一部中西文字交流大典，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此后，《广东省土话字汇》（马礼逊编），《汉语百科词典》（加略利撰）、《汉英字典》（麦都思著）、《广东方言文选》（裨治文编）、《简易汉语教程》（卫三畏著）等由外国人编写的汉语学习用书不断出版，加快了中西语言文字的交流。

正规的西方语言教育也在澳门首先兴办。1800年，由澳门当局提供经费，开办了王家学院，兼收中、葡学生，教授葡语、拉丁语、算术、修辞、哲学和神学等课程。1834年，德国籍传教士郭实腊的英国籍妻子温施娣在澳门的寓所内开办一所女塾，后又附设男塾，招收当地贫苦人家的孩子入学读英语和基督教义。1839年年初，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堂，除教授英语外，还教授一些西方科学知识。

## 华夷观念与律劳卑事件

鸦片战争前夕的1834年，在广州发生了一起中、英两国之间的外交冲突事件——律劳卑入粤事件。威廉·约翰·律劳卑来华负有叩开中国大门的使命，是英国多次试探用和平的外交方式取得对华贸易自由权的继续，也是最后一次尝试的失败。这次失败使英国坚信，中国的大门非用暴力不能打开。律劳卑事件是鸦片战争前夜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于这个事件的评述，过去往往只强调英国蓄意挑起事端，制造紧张局势，逼清政府让步，从而扩大在华利益的一面，而对当时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所持有的闭关思想和僵化政策一笔带过，甚至忽略不提。其实，清政府的态度和做法对激化中英矛盾冲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且显然不利于中国对外的正常开放。因史学界

对后一方面的探究尚少，笔者试作一粗浅分析，以期从这一历史事件中取得更多的启发。

律劳卑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华的呢？

中国进入 19 世纪以后，中英贸易迅速发展，贸易额约占中国整个对外贸易总额的 80%。其中，鸦片是最大宗的输入品。但是，虽然中英之间贸易频繁，两国政府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政府官员间平日也没有任何来往与接触。这在现在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事情，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要解释这个奇怪的历史现象，就不能不提到那时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华夷观念。

中国地处亚洲大陆东部，西面、北面横亘着高山荒漠，东面、南面面临着大海汪洋。这种封闭型的地理环境限制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限制了中国人的眼界。古代中国人逐渐把黄河流域看成是世界的中心，把四周围看成是蛮荒。加上中国在中世纪曾经攀上人类文明的高峰，更加深了这种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优越感，华夷观念也就随之产生，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必定高出于一切外族，华夏与夷狄，一为文明，一为野蛮，其位置不能颠倒，只能“用夏变夷”，绝不能“用夷变夏”，两千年来似乎已成为不可动摇的信念。

除了地理、历史的原因外，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和等级制度也使这种观念不断强化。封建社会内部尊卑贵贱的规则被统治者搬到国家关系中，便是建立藩属和朝贡关系。封建统治者不论对被征服的国家还是对和平共处的异族，都要求他们承认和接受君臣关系，向自己称臣并进纳贡物。这种国家关系使华夷观念显得更加理所当然。

华夷观念对于中国及其邻邦早已是司空见惯和无可争议的。但对于生活在世界另一头的西方人来说，却是很不习惯和非常反感的。因此，在近代中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大碰撞中，这种观念的影响不可忽视。

英国曾经为了贸易上的利益，向清廷要求派公使驻北京，以便建立国家间的关系，但屡遭拒绝。1793 年，英政府以补贺乾隆皇帝 80 寿辰为名，派遣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目的是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减少在广州贸易的限制和取得在广州以外各地贸易的自由。马戛尔尼的来华应该说是西方国家打算向东扩展的一个信号，但清政府毫无警觉，仍把大不列颠视为朝贡之国，以为其遣使来华无非是输诚向化、恳求加恩而已。本来马戛尔尼提出的扩大通商的要求并非都不可以协商解决，其中有的对改善两国贸易关系和增进了解与互利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乾隆一点都不加考虑，就以“与天朝体制不合”、“应仍照定例”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

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等理由一概加以拒绝。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来华，提出建立外交关系，企图取得驻节北京的允诺。但阿美士德一来，首先就碰到“夷夏之防”的障碍。一个清朝官员把“贡使”二字刻好挂在他入京的快艇桅杆上。对于这一屈辱的称号，阿美士德很为反感，但为了达到面见皇帝的目的，只好装做没看见。后来，嘉庆皇帝认为他既是前来朝贡的藩属之臣，便理所当然地要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这下再也忍受不住了，坚决拒绝下跪，皇帝一怒之下，命他即日回国，所以这次什么也没有谈成。不可否认，英国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但清政府拒绝的原因却不是洞悉其奸，而只是为了维护传统的藩属关系和朝贡制度，满足皇帝的虚荣自大而已。

1834年，英国对华贸易到了一个转折时期。这一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和管理权宣告结束，英国政府向英国私人企业完全开放对华贸易，大量的英国自由商人涌到广州。这一变动标志着“英国在工业上和政治上显然都正在厉兵秣马，以期夺取和把握住亚洲的市场”<sup>①</sup>。

在东印度公司包揽对华贸易期间，公司在广州设有特派委员会，专门管理公司的商务，委员会的主任，被称为“大班”。由于中英没有外交关系，所以中英间的接触只是商务接触，即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与中国广州十三行“行商”之间的接触。东印度公司撤局后，“大班”不再担任中英间贸易的管理人了，而改由英国政府直接派出它任命的商务监督来管理对华贸易。这样，律劳卑便作为第一任对华商务总监督来到广州。

律劳卑动身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给他以重要训令：第一，不要干涉鸦片走私贸易；第二，要设法扩张英国商业势力于广州以外更广大的地区；第三，要在中国沿海觅取一些地方，以便一旦发生敌对行动时，英海军可以安全活动。<sup>②</sup>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律劳卑没有带国书以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巴麦尊只是指示他“到广州后应立即以公函通知总督”，并要他“采取步骤把他自己由一个纯粹的商务监督即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班身份，变成一个代表英王的使节身份”。<sup>③</sup>这样，律劳卑来华除了负有管理商业的任务外，显然还负有开辟中英外交途径的特殊使命，他势必要再次触犯中华帝国的“夷夏大防”观念和一切旧章成法。

①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5页。

②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页。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39页。

## 二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乘英国小型军舰到达澳门。澳门是葡萄牙的租借地，可让外国人随意进出居住。但是，外国人如果要从澳门进入广州，按清政府当时的通商制度，必须领取红牌（即通行证）。如果外国人有什么事要求广东官府解决，则一律采用禀帖写明，由行商代为转禀两广总督。但律劳卑认为自己是英国商务官员，与一般的公司职员身份不同，不愿意遵循这个惯例。他没有与公行商人联系，便于7月25日在穿鼻洋的虎门口改乘小船驶入中国内河，住进了广州城外的夷馆。第二天，他派书记官阿斯特尔到两广总督衙门呈递他本人致总督卢坤的信，这封信也没有采用禀帖的形式，而是使用了平行款式，封面写有“大英国”字样。信中声称他有保护与促进英国在华贸易的责任，需要取得政治和司法方面的权利，并要求面见卢坤。律劳卑显然是故意这么干的。

这种在清方看来是无礼冒读的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两广总督卢坤断然拒绝接收律劳卑的文书，并接连发出四道布告，严词申斥这一违章行为。他说：“查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sup>①</sup>他命令行商伍绍荣开导这个“化外之人”，使他懂得遵守中国的法例；又命令广州协副将韩肇庆向外国人宣布：“天朝制度，从不与外夷通达书信，贸易事件，应由商人转禀，不准投递书函。”<sup>②</sup>8月4日，粤海关监督中祥又把当时约束外商的章程重新发布，以示中国原有制度坚持不变。他们警告说：“外夷在粤通市，系圣朝嘉惠海隅，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英国与我贸易已越一百数十年，诸事均有旧章，该夷目既为贸易而来，即应遵守章程，否则不准在粤贸易。”<sup>③</sup>

清朝官吏对律劳卑投书的反应，表现了他们在处理中外关系时缺乏平等的精神。夷夏大防的观念往往使他们在称谓、文书格式、措辞和礼节这些小地方上过于拘执，而且认为屈辱对方才能显示自己的崇高尊严。他们对律劳卑指责最重的是这样几句话：“该夷目不肯接见洋商，旋赴城外，呈递致臣卢坤书信一函，封面系平行款式，且混写‘大英国’等字样。”<sup>④</sup>

① 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

② 同上书，第119页。

③ 同上书，第120页。

④ 同上。

“其意以为外夷官目与内地官吏并无尊卑之分，欲思抗礼。”<sup>①</sup>

看来，律劳卑最大的错误就是企图以西方的外交对等方式进行国家间的交涉，而这是清廷最不能容忍的。

律劳卑并不妥协，他强调中外官吏并无尊卑之分，以后一切事件，都应与各衙门文移往来，不能照旧通过行商传达，行文方式也不能用下级对上级的禀帖，只能用文书传递。

律劳卑不遵守成法，又不听规劝，令公行商人十分为难，因为他们负有管束外国人的责任，并充当总督与外国人之间的联系人。现在律劳卑一意孤行，使他们难以向官府交代，所以行商只好采取断然的措施。8月15日，他们致函全体在粤英商，宣称：由于律劳卑不恭顺，他们不敢和英国通商了。第二天，他们就停止了与英国商人做生意。过了两天，8月18日，总督卢坤颁发一个布告，以“封舱”威吓律劳卑。布告说：“……仰体皇上圣意，天朝内外，一视同仁，停止贸易，夷人痛苦，于心不忍。……第念该国王向来尚属恭顺，该国散商，均属安静，若因律劳卑一人之过，概行封舱，未免向隅。……如其悔悟恭顺，照常贸易，倘再违执，即行封舱。”<sup>②</sup>

律劳卑竟然对此亦不加理会。此时，从英国又开来一艘军舰，与前来之军舰同在虎门口外洋面停泊，船上洋兵有190人。两广总督紧张起来，马上派官员前往夷馆查询。因律劳卑不信任中国通事的翻译能力，要求用通晓汉语的英国人传话，清方又不同意，双方无法沟通，事情不但没有弄清楚，反而加剧了对抗情绪。

9月2日，总督卢坤宣布封舱，严禁一切对英贸易，并下令夷馆里雇用的通事、买办、厨师、仆役等所有中国人退出夷馆，否则以汉奸论。在广州夷馆及在澳门的英侨住宅里所有的本地人仓皇恐惧，逃避一空。广州城内外加派了清军巡防，夷馆自然也受到监视，英国侨民的生活发生了困难。

律劳卑也以强硬方式进行反应。他以加强保卫英侨及其财产为名，命令停泊于外洋的两艘军舰开来广州。9月7日，两舰开进虎门，舰上约有军队三四百人。布防于珠江两岸的大角炮台、晏臣湾炮台、横档炮台、阿娘鞋炮台见英舰入侵，各个发炮轰击，英舰也开炮还击。本来，内河水浅，礁石林立，英舰行驶不快，清军又增加了炮台兵力，居高临下，处于有利地位，要击沉两舰并非难事，但奇怪的是，清军不仅未能击沉两舰，而且未能阻止它们前进。9月11日，两舰竟突破清军沿途数重封锁，到达黄埔抛锚。

<sup>①</sup> 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22页。

英舰直驶城下抛锚，广州轰动。总督一面布署兵力驻守水陆各处，一面把这个非常情况奏报北京。道光皇帝闻讯极为震怒，打回奏文，加上朱批：“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sup>①</sup>并下令革去水师提督李增阶、水师提标中军参将高宜勇之职，给总督卢坤的处分是革职留任，戴罪督办。

两艘英舰虽然胜利地进入了内河，但它们马上陷入了清军的包围之中。总督调集了大船12只，每只运大石块10万斤，横沉江内，用粗大铁链、木排封锁河面；调集大小师船8只，内河巡船20余只，配兵备械，严密巡防，调拨兵丁1200名，壮丁300名，整备枪炮，在两岸陆路守备，又加固炮台防御工事，预备大小船只100多只，暗藏硝磺柴草引火之物，预备火攻。英舰进退不得，无所作为。

自从8月中旬开始停止中英贸易，至此已将近一个月，英国商人的贸易利益受损不少。这年因为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开始自由贸易，来广州的英商船比以往哪一年都多，聚集于广州的英商有数千人，他们大多是资本较少的散商，忍受不了长期停止贸易的亏折，渐渐不再赞成律劳卑的做法。现在纠纷的焦点集中在律劳卑身上了：因为只有他退出广州，中英通商才可以恢复。律劳卑想以军舰恫吓清廷没有成功，9月14日，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写了一封信给在粤英国商会会长博伊德，信中说：“……我觉得我进一步努力说服总督阁下采取更为适当的行动方法，都是徒劳的。1834年9月7日，（粤）海关监督对惠特曼公司申请开放贸易的批复，要我离开广州去澳门之后，才能恢复通商。现在我请您将泊在澳门的英国大艇调来，俾我早有机会启程。”<sup>②</sup>英商库力基等代律劳卑向清廷认错，要求发给红牌让他离开广州退回澳门。

清朝广东地方官员认为：“律劳卑虽有妄诞之想，尚无不法实迹，未便遽加剿除。且该国商稍数千人，俱以夷目不遵法度为非，无一附和，更未便玉石不分。今律劳卑已认错乞恩，众散商节次吁求，自应宽其一线，逐令出口，俾番夷震慑之下，仍感天朝仁慈宽大之恩。”<sup>③</sup>决定准其退走。

9月21日，律劳卑被清方押逐出口，两艘英舰亦于同日开行，押出虎门海口。9月29日，总督发出了开舱贸易的命令，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秩序。10月11日，律劳卑在澳门病死。

<sup>①</sup> 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29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132页。

## 三

清政府以“封舱”的经济手段制服了律劳卑，便以为取得了胜利。皇帝的上谕称：“今既将该弃目等押逐出口，是该督等始虽失于防范，终能办理妥善，不失国体，而免衅端，朕颇喜悦。”<sup>①</sup>而且，皇帝还以为一切又可以照旧，无须变通了。他指示：“英吉利夷人与内地通市，向来不通文移。然必须有统摄之人专理其事。着该督等即饬洋商等令该散商等寄信回国，派另大班前来，管理贸易事宜，以符旧制。”<sup>②</sup>

但是，这一事件对中英关系的紧张、恶化与破裂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华帝国的前途隐伏着极大的危机。

19世纪以后，开辟远东市场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中英贸易迅速增长。但英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受制于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贸易对象，必须通过行商，价格由其操纵，除了广州他们不能到沿海其他口岸进行交易；他们不能自由雇用中国人做通事、买办和仆役；日常用品不能直接购买；行动步步有人跟随；有事不能直接向官方申诉，加以海关管理混乱，作风腐败，营私舞弊，陋规繁多，勒索无已，使本来不算高的税率变相增加。这一切使他们十分不满。他们除了用走私、行贿去破坏清政府的贸易政策外，更希望通过适当的途径，比如用外交谈判与中国皇帝订立商约的办法来改善通商条件。但现在，他们对这一点感到从来未有过的失望。他们说：“在《大清会典》里，我国是与高丽、暹罗等国列在同等级位的，只要我们仍被作为中国的封臣和诸侯中的一员看待，向他们建议订立平等互惠条约，或要求他们给我们的公使或商人以比过去更好的待遇，终是枉费心机。”<sup>③</sup>

除了对清政府的贸易改善感到失望外，他们更因为被清政府所轻视而恼怒。律劳卑在离开广州时向广州的英国人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由于中国军队的压迫，也由于施加于英国商人身上的凌辱，现在我们就要离开此地。总督的措施损伤了与中国皇帝同样神圣的英国皇帝的尊严，现在他可以随意地采取勇敢的行动。英国皇帝惩罚总督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的。”<sup>④</sup>

外国人在广州创办的报纸《澳门月报》（即《中国丛报》）对此发表了大量激烈

① 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6页。

② 转引自《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道光14年（1834年）第五十五号，第21页。

③ 转引自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52页。

④ 转引自陈舜臣著《鸦片战争实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9页。

的评论，抨击清政府的封闭、落后、自大和愚昧，大造侵华的舆论，迅速影响了英国人的思想。他们说：“中国皇帝狂妄地自认为他和他的子民都是比别国君王子民高一等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必须对这种妄自尊大行为作坚决的驳斥和打击。”<sup>①</sup> 他们抨击清政府的通商法律是不公正的，因此他们没有义务去遵守它：“中华帝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有制定他们自己法令的权利，但任何国家也没有权利绝对排外和闭关自守。”<sup>②</sup> 按照这个逻辑推论，他们便认为发动一次通商战争迫使清廷屈服是正确的。他们说：“从这些事实里，我们可以得出好几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辞谦语卑的禀帖取得什么，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就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sup>③</sup> 律劳卑策动两只小型军舰顺利通过虎门要塞直达广州城下的经历，增强了他们武装干涉的信心和决心。他们说，中国虽然土地广阔，拥有三亿六千万人口，却是极其衰弱的，这种衰弱，也是中国政府所洞悉的。因此，只要能够太平无事，清政府就会不惜牺牲一切，以保这个外强中干的局面。对于道光皇帝的软弱性格，他们竟也摸得一清二楚。他们说：“道光，中国目前的皇帝，秉性极其和平，他很不愿意把对外贸易扩大，但是如果……摆在他面前的除了勉从我们的建议外别无他路可走，我们深信他是会从容地向表面上的必要低头的。”<sup>④</sup> 看来，他们努力收集情报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结果，已把清政府的虚弱无能、色厉内荏的本质了解得十分透彻，说起来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因此，他们提出不需大动海军，也不需多费钱财，只需要几只中等和小型的军舰，由一个志坚意决的人率领着，并带着一份拟就的要清廷签字的条约稿本直接到北京去便成。

律劳卑事件使中英关系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局势。鸦片商人乘机叫嚣发动战争，即使不愿诉诸武力的人，也认为应该采取强有力和有决定性的办法来对付这个“高傲的、半开化的、专制的中国政府”。这样，英国政府中的侵华分子便有了战争的借口，加紧了侵华的步伐。5年之后，鸦片战争就爆发了。

鸦片战争固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但清政府由于不谙世界大势，固守“华夷观念”，没有处理好外贸、外交关系，又暴露了海防空虚的军事弱点，而终于使中国近代的对外开放失去了主动权，出现了被迫、被动和痛苦的过程。这个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① 转引自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5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 19 世纪中叶中英冲突的由来及结果

19 世纪中叶，英国工业进入了飞跃发展时期，为了开辟市场和寻找原料供应地，英国政府加紧对东方进行侵略，导致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相继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欧洲 1848 年革命的失败而流亡伦敦与曼彻斯特，他们一边认真总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一边继续以英国为主要对象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了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必然要联系它侵略殖民地的历史，而且把世界的东西方联系起来考察是马、恩研究工作的一贯做法，也是他们的特点和优点。所以，他们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十分关注东方。从 1847 年开始，他们就不断发表论述中国的文字了。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们写下了 10 多篇专门论述英中冲突的文章，以时评的形式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些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 120 多篇文章中，最为集中地反映了 19 世纪英中关系的著作，其中所表述的有关西方殖民扩张和东方民族运动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是马、恩在这一时期取得政治经济学光辉研究成果之外的另一些引人注目的篇章。

马、恩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论述，是顺应着战争的进行而随写随发的。1851 年 1 月和 3 月所写的《英中冲突》和《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是针对战争起因“亚罗号事件”而写；1857 年 4~5 月发表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以及《波斯和中国》，是针对战争的进程而写；1858 年 8~10 月所写的《鸦片贸易史》、《中国和英国的条约》和《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是针对《天津条约》的订立而写；1859 年 9 月和 11 月又写了《新的对华战争》4 篇及《对华贸易》，指出战争扩大化的恶果。这些文章组成了马、恩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完整看法，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这次战争的起因、本质和后果有极大的帮助。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由“亚罗号事件”为导火线而引起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此事所作的评论，一般来说都认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轻视了进行鸦

片买卖的一只小船上的英国国旗”<sup>①</sup>。但是，马克思对这次战争的直接原因的分析却与他们截然不同。

1856年10月8日，广州发生了“亚罗”号船事件。这天上午，清朝水师登上了停泊在海珠炮台附近的“亚罗”号走私船，以海盗嫌疑逮捕了船上12名中国水手。“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但曾经在香港注过册，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抓住这一事件，乘机进行讹诈，他一口咬定船上的英国国旗被扯下，国威受到侮辱，借此扩大事端。1856年10月21日，巴夏礼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第二天，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领军舰越过虎门，向广州进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在英国国会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一派认为“亚罗号事件”是一件损害英国名誉的严重事件，赞成以此为由向中国开战；另一派虽然不同意滥用武力，但是对于大英国旗遭受侮辱一事，亦表愤慨。原因是，两派在辩论中所依据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即是以《关于在华侮辱的来往信件》为题的28件所谓中国人在1842~1856年间对英国人及其他外国人所犯暴行的记录。英国首相帕麦斯顿为了给这次战争寻找理由，以逃避国内舆论的谴责，便抓住这些材料和“亚罗号事件”，作了不少蛊惑人心的演说，宣称：“我们认为，我国备受欺凌。我们认为，我们的同胞在地球的遥远地方遭受到种种侮辱、迫害和虐待，对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认为，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政府有责任保护海外同胞”。<sup>②</sup>

为了抨击帕麦斯顿的这种战争叫嚣，必须先弄清事情的真相。马克思在1857年1月7日根据最新、最直接的材料进行分析，写下了《英中冲突》一文。马克思抓住了“昨天早晨由‘亚美利加号’轮船带到的邮件”，这些邮件中有许多是关于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当局的冲突和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的军事行动的文件。马克思在仔细研究分析了这些中英双方的往来公函之后，得出了独立的、鲜明的、公允的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sup>③</sup>马克思首先断定“亚罗”号不是英国船，因而不能指责中国人违背条约。他说：“英国人硬说，造成冲突的原因似乎是某些中国官员没有向英国领事提出请求而自行登上了停泊在珠江江面的一只划艇，强行带走了几名中国罪犯，并且扯下了飘扬在划艇桅杆上的英国国旗。但是……领事硬套用于这只划艇的条约规定，只适用于英国船只，可是许多材料表

① 赖德烈：《中国的发展》，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②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5页。

③ 马克思：《英中冲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2~117页。

明，这只划艇从任何意义上来看，都不是英国的。”<sup>①</sup> 马克思还考究出，这只船是“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的”<sup>②</sup>。这样，“亚罗号事件”就不是一件侮辱英国尊严的事件了，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显然，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借口。所以，马克思说：“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sup>③</sup> 然后，马克思又指出，违背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因为西马糜各厘强行侵入广州城的行为违反了1849年中英双方的协定。马克思说：“这出外交兼军事的话剧就截然分成两幕：在第一幕中，借口中国总督破坏1842年的条约，开始炮轰广州；而在第二幕中，则借口那位总督顽强地坚持1849年的协定，更猛烈地继续炮轰。起先广州遭轰击是因为破坏条约，后来广州遭轰击是因为遵守条约。”<sup>④</sup> 这些话鲜活地画出了英国侵略者们蛮不讲理的嘴脸。

为什么英国要寻找借口挑起战争呢？马克思援引伦敦《泰晤士报》的观点，揭穿了英国的侵略政策，指出其目的在于逼使清政府修改条约，以满足他们的扩张野心。《泰晤士报》是这样不打自招的：“由于这次爆发了军事行动，现有的各种条约就此作废了，我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了。”<sup>⑤</sup>

《关于在华侮辱的来往信件》具有很大的蛊惑力，但它们却是虚假的、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们只提到英国方面受到的所谓侮辱，却没有一件提到英国人如何在中国违反法律、进行毒品走私、贩卖苦力等骇人听闻的暴行。所以，马克思还对资产阶级新闻、宣传机构的片面报道提出严厉的谴责。他说：“中国人针对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99件控诉。可是英国的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牛马都不如的奴隶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致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sup>⑥</sup> 显然，或者

① 马克思：《英中冲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2页。

②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③ 同上书，第14页。

④ 同上书，第113页。

⑤ 同上书，第114页。

⑥ 同上书，第15页。

是别有用心，或者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傲慢与偏见使他们不能对事情的真相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

马克思虽然也是一个西方人，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西方人，他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智慧过人的学者，他那不带任何西方偏见的头脑、客观公正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认真细微的作风使他敏锐地抓住了“亚罗号事件”中的几个关节点，很快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并有力地驳斥了帕麦斯顿的“侵华有理论”，旗帜鲜明地宣布，战争的起因是英国政府捏造理由、挑起事端、用兵先犯、蓄谋已久，罪责完全在英国方面。并对英国政府以无中生有的借口侵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英国议会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起来揭露和抨击内阁的侵华政策。例如，上议院的议员得比伯爵就曾经指出，亚罗号船“是由中国人建造、中国人俘获、中国人出售、中国人购买的，船员是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sup>①</sup>另一位议员林德赫斯特也对英国公使包令明知故纵的讹诈行为提出愤怒的指责，痛斥他提出的口实是虚伪的，行为是可耻的。由于较多议员的反对，1857年3月下议院投票时以16票之差否决了侵华议案，但坚持殖民政策的帕麦斯顿扬言“政府将诉诸全体国民”，解散了下议院，重新选举。40天后，英国又选出了一个拥护其侵略政策的国会，从而使侵华战争政策得以实施。

## 二

随着战争的逐步展开，马克思开始思索和探求引起英中冲突的更为深层的原因——英国对华贸易和鸦片贸易问题。1858年8月，他写下了《鸦片贸易史》一文，1859年11月，他又写了《对华贸易》一文。

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追溯和论述了鸦片贸易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和概况。他说，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是供医疗使用的，为中国法律所许可，后来，东印度公司开始插手鸦片贸易。1798年，东印度公司成了鸦片的生产者，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销售。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2000箱。虽然中国政府一再下达禁止外国人输入毒品的命令，但因为鸦片贸易已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财政系统不可分割的部分，英印政府在鸦片贸易上获得暴利，所以英国人用行贿和走私的卑劣手法不断破坏中国当局的禁令，使鸦片贸易的规模日益扩大。1834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达到21000多箱。这一年，东印

<sup>①</sup> 转引自马克思《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9页。

度公司垄断贸易的特权被取消，对华贸易完全转到英国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不顾中国政府的抵制，在1837年使鸦片输华达到39 000多箱。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因为鸦片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没收和焚毁走私的鸦片。这成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导火线。

在回顾这一段鸦片贸易发生、发展的历史时，马克思分析说，当时的英中贸易主要是鸦片贸易，因为从1816年起，在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走私的鸦片贸易总是占着大得极不相称的比例；而非法的鸦片贸易，又是英印政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所以，当清朝采取断然措施时，旨在维护鸦片贸易的对华战争便爆发了。

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一向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战争因鸦片而起，是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战争是为了打破中国不正常的贸易形式——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例如，日本陈舜臣先生在《鸦片战争实录》一书中说：“在日本世界史教科书中，有这样的说法：‘为了打破中国不正常的贸易形式，借口英国商人的鸦片被销毁，英国对中国宣战。’只能通过公行的贸易形式是不正常的，但打破这一形式是否就是战争的真正目的？事实真相恰好相反，迫使中国承认鸦片贸易才是战争的主要目的，打破不正常的贸易形式不过是一个借口。英国国会议员同意支出战费，绝不是为了打破‘中华思想’这一目的，而是因为英国臣民的财产——鸦片被没收。总之，战争是为了鸦片的战争，打击‘中华思想’和打破公行垄断只是战争的结果。”<sup>①</sup>而我觉得，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由于英国对华贸易在进入19世纪后，主要是鸦片贸易，这使中英通商史几乎成了鸦片贸易史，所以打破一口通商制度与维护鸦片贸易，两者是很难分开的，这两者都是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强调第一种观点的人，着眼点在于指出战争的不正义性及其特征；强调第二种观点的人，多是想避开“鸦片”这个不光彩的名词以突出其历史的进步性。其实，在19世纪，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进行的商业战争，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残暴的一面。因用工业品打不进中国市场，便动用了鸦片和大炮作为武器。向中国进攻的结果是既打破了清朝的闭关政策，也迫使中国承认了鸦片贸易合法化。不论是工业品还是鸦片，都是英国政府想要输入中国的商品，从事鸦片贸易的港脚商人与从事一般正常贸易的英国商人在使用战争迫使中国开放这一点上利害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希望通过战争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对政府的战争政策表示了支持。英国迫使中国签订的条约也反映了这两种人的利益。所

<sup>①</sup>（日）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页。

以，马克思并没有把鸦片战争的起因和目的单纯化，他在《鸦片贸易史》中说：“英国以签订条约结束了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说：“……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sup>①</sup>这两段话并没有自相矛盾之处，而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鸦片战争的原因和目的。从本质上说，鸦片战争是英国在全球发动的通商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这场通商战争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点，这就是以维护鸦片贸易为具体的直接的目的。因而，它比别的地方进行的通商战争更加残酷和丑恶。

但是，指出鸦片战争的起因和目的并不是马克思最想阐明的问题，指出鸦片战争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才是马克思最想阐明的。

1858年，当英法联军逼使清政府签订了新的条约——《天津条约》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社会普遍感到欢欣鼓舞，陶醉在从此可以大大扩充对华贸易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针对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马克思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通过战争所取得的特权——增开通商口岸和鸦片贸易合法化，就真的能大大扩充对华贸易吗？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因为1842年的《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签订后，并没有扩大英美对中国的出口，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1847年的商业危机。原因是条约引起了西方人对市场的幻想，因而拼命增加生产，而这个市场却并不存在。

马克思虽然反对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但他并不赞成中国闭关自守。他主张中英双方进行和平、互利的交流，赞成扩大合法、正当的贸易。而且，他比当时一般人看得更深、更准。马克思指出，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一些十分虚妄的见解，说什么由于打开了天朝的大门，美国和英国的商业一定会得以推进。这个见解是十分有害的，它使人们轻易地支持现政府的战争政策。他说：“商人们由于企望扩大交换范围，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这样一种情况，即认为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措施阻碍了他们。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措施。正是这种谬见，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拼命支持每一个答应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的大臣。”<sup>②</sup>

那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对华贸易的发展呢？马克思认为，对华贸易的障碍有两个：第一，鸦片贸易的扩大，妨碍了正常贸易的发展。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19页。

② 马克思：《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61页。

法贸易不相容的，中国人购买力有限，他们不能同时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所以只有取消鸦片贸易，才能扩大工业品的对华输出。第二，中国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对外国商品具有顽强的抵抗力，而这种封建自然经济并不是靠英国发动的对华战争就可以打破的。一般人只看到清朝的闭关政策是对华贸易的障碍，而马克思则认为这不过是表面的原因，而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

马克思通过分析对华贸易的两个障碍，说明了发动这场造成千万中国人家破人亡的战争并不能解决对华商品输出问题，它不仅给中国人带来灾难，而且对英国人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从而对英国政府的战争政策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 三

《天津条约》签订后，暂时出现了中外相安的局面。但是，在1859年6月英法公使由上海前去北京换约时，发生了“白河事件”，结果中外冲突重起，和平烟消云散。马克思把《天津条约》后发生的战事称为第三次对华战争。

为什么在《天津条约》换约的时候又会节外生枝产生新的矛盾冲突呢？英国自由派报纸指责中国破坏条约，阻拦英国公使前往北京，并叫嚣要报复。伦敦《每日电讯》写道：“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并得到物质上的保证，担保以后不再发生袭击”；“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穿蟒袍的官吏……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sup>①</sup> 马克思驳斥了这些无耻的谰言。马克思认为，英法公使不走陆路，而是带领一支海军远征队强行闯入白河，这本身就是一个入侵行为。清军发炮还击，是自卫行动，他们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此外，马克思还指出，战事重起不是偶然的，白河事件是英国政府有预谋的行动，从而揭穿了英政府蓄意挑起战争的阴谋。马克思说：“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sup>②</sup> “白河冲突并非偶然发生的，相反的，是由额尔金勋爵预先准备好的。”<sup>③</sup> 从马克思的分析里，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思维方法所产生的深邃的洞察力，是十分惊人的。

①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8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早在白河事件发生前一年，当英国由于从清政府那里逼出了《天津条约》而到处受人祝贺的时候，马克思就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判断。他指出，天津条约并不值得祝贺，因为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惟一强国是俄国，而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时，从政治观点看，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马克思是怎样得出这个不同凡响的结论的呢？他把《天津条约》的主要条款拿来仔细研究和分析。

首先，对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条款，马克思认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然未曾明确满足英政府关于“弛禁”的要求，在《南京条约》中没有把鸦片贸易合法化写进去，但是实际上却默许了英国鸦片贩子的走私活动，给了他们既不受法律制裁又不纳税的实惠。而现在把合法化写进《天津条约》后，中国政府无论从政治上和财政上着想，都将准许在中国栽种罂粟，并对外国鸦片征收进口税。如果中国这样做了，那么印度的鸦片垄断以及印度的国库一定会受到致命的打击，鸦片贸易很快会成为亏本生意，约翰牛的算盘将完全落空。

其次，《天津条约》关于中国应偿付的商亏和军费，两项总共才 133.4 万英镑，而在 1842 年的条约中，中国皇帝却应该偿付 420 万英镑。由上一次的 420 万英镑外加香港，减少到这次只有 133 万英镑，毕竟不是一桩漂亮的买卖。因勒索得不够多，满足不了英政府的胃口。而且，这笔赔款还需要向广东省去索取，无异于英国还需要再派 5 000 名士兵去重新占领广州才能取到。占领广州将使英国人继续耗费钱财，所以在英国人看来，这是空前未有的大错。

再次，《天津条约》中涉及贸易的条款，并未向英国提供它的竞争者没有享有的任何利益，而且这些条款在目前条件下只是空洞的诺言。比如，开放长江沿岸的各口，因它们处于太平天国的占领之下，英国人实际上进不去。新增加的子口税，使英国商人感到怀疑和不满。

最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条款，并不能增加英国对中国政府的影响，相反的把中国推向俄国的怀抱，使俄国利用外交上的优势和调停者的身份取得中国政府的好感，从而获得了黑龙江沿岸大片领土及一切贸易方面的好处，而且还使俄国公使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大大高于英国公使，野心勃勃的俄国在中国势力的增强，将会使不列颠统治中国的梦想完全破灭。

根据以上分析，马克思指出，由于英国政府感到从《天津条约》中获得的利益太少，极力想利用换约的机会，进行新的勒索，所以战争的重起是必然的。果然不出所料，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

那么，英国政府扩大战争会获得什么后果呢？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说，9 月中旬，过去叫嚷流血叫得最凶的《泰晤士报》和《经济学家》的论调最近发生了急

剧的转变。前者说：“我们恐怕不能责备那些抵抗我们向白河炮台攻击的蒙古人背约。”过了几天，又说：“毫无疑问，如果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恳请清朝官员护送他们进京，他们是有可能使这个条约获得批准的。”<sup>①</sup>后者说：“既然敌对行动完全由我方发动，而且我们的司令官当然在任何时刻都能从中国方面只是为了保护炮台才发射的凶猛炮火中退却，那么，我们就不能确证中国方面有任何背信弃义的企图。”<sup>②</sup>它们开始对白河事件说些比较公允的话了，认为白河事件不成为战争的理由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显然不是因为动了恻隐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战争会影响对华贸易的正常进行。当时，英国除了它本身对中国直接贸易外，另外有其他三种重要的贸易与中国有关。这就是印度与中国、澳大利亚与中国、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澳大利亚和美国从中国进口茶叶和生丝，却没有可以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于是澳大利亚向英国出口黄金，美国向英国出口棉花，再由英国从印度向中国输入鸦片来填补这个差额。所以便出现了这样的结局：英国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将是一场很大的灾难。英国工商业资本家对此忧心忡忡，有的议员在内阁会议上强烈反对战争，并使议会推迟了关于战争的表决。马克思指出：新的侵华战争将会加剧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英国遭到巨大的危险，“最近、将来的结果必然是现政府的垮台，因为该政府的首脑是这次对华战争的罪魁，而它的主要成员却因为这次战争而对他们现在的首脑表示了不信任”。<sup>③</sup>

战争的后果正如马克思所料，英国政府虽然又用新的战争逼使清政府订立了《北京条约》，但英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却不断加深和激化。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对华贸易不仅没有出现突飞猛进的奇迹，发展反而迟缓下来，鸦片输入中国虽然有所增长，但主要是一些老牌的商行在操纵，中国因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仍未打破，西方的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没有销路，又由于其他地方的竞争，原本的丝茶贸易衰落了，再加上186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多家外国商行的衰落，靠鸦片贸易起家的英商颠地洋行在1867年的倒闭，更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追求展拓对华贸易为目的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并未获得它的发动者们所期望的结果。

①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8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 《循环日报》的创办与西学在岭南的传播

鸦片战争前的 80 多年里，由于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广州成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得洋气在先，接触西学比内地早，思想比较开放。鸦片战争爆发以及其后一系列的反侵略斗争、条约口岸的开放等因素，造成了岭南地区此后几十年对外贸易的低落，发展比上海、天津缓慢。而与之相连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受到较大影响。有学者提出，这个时期岭南文化形态是封闭的。积极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人物，不能在广东省内有所作为。如洪秀全要到省外传教；康有为要到上海买书；孙中山要到海外求学，这与广东省内较为封闭的文化氛围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文化封闭的岭南何以产生如此众多的维新和革命领袖？岭南的“封闭”与中国内地的封闭有什么不同？这是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掌握史料对解决历史问题十分重要。发现新材料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缩小分歧的途径之一。近年，笔者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作研究的过程中，看到了 1874 年在香港创刊的《循环日报》影印缩微胶卷，存报的日期为 1874 年 2 月~8 月、1880 年 2 月~1886 年 1 月，计有近 6 年。《循环日报》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公开宣传变法的报纸，而早期的报纸在内地已无存。这些早期《循环日报》是在英国、日本发现而复制回来的，对我们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无疑大有用途。笔者现据这些史料，试对《循环日报》创办的背景和该报的内容进行考察，并就学术界颇有争议的岭南地区在鸦片战争后一段时期内，文化是封闭还是开放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 一、《循环日报》创办的背景

香港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发源地，鸦片战争后除西方人士在此地创办多种报刊外，华人办报也最早在此出现。19 世纪 40 年代在香港出版的报纸可以考查的据说有 9 种。<sup>①</sup> 1853 年后开始有中文报刊出现，华人从参与编辑出版业务过渡到主持编

<sup>①</sup> 参见简丽冰、朱陈庆莲《香港开埠以来之期刊及报纸》，《冯平山图书馆金禧纪念论文集》，1982 年自行印刷，第 1 页。

辑出版业务。在《循环日报》创办以前，香港起码已有4家中文报纸先后创刊。<sup>①</sup>《循环日报》的开创性，不在于它是否第一家由华人当主笔的中文报纸，而在于它是第一家由华人出资开办的报纸。它的华资性质是该报创办者一再申明的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也是他们为此而谨守的民族立场和自决原则的基础。

《循环日报》创办于1874年2月4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sup>②</sup>，在试刊期间所登的广告和启示中，一再说明该报“所有资本乃出自我华人，与各家新报馆有别”，“是报之行专为裨益我华人而设”<sup>③</sup>，强调“我华人一心一德”共同办好报纸的重要性。

这里引证二则启示：

谨启者 本局于月之中旬设立循环日报，皆系华人为之倡始。其总司理为陈蕙廷，正主笔为王紫诠，皆由同人所公举，无非为专益华人起见。盖以近来各处日报虽亦以华字颁行，而要为泰西人所开设，即延华人为之主笔，而措辞命意未免径庭，且往往束缚之使不得逞其胸臆。兼或操觚之士未稔西情，则又不免详于中而略于外，求其能合中西为一手者实罕其人。惟敝局现设之日报悉由华人主裁，已延鸿才博学者四人为之广加搜罗，详为翻译，无非冀以广见闻，通上下，佐中治，稔外情，详风俗，师技艺，俾利弊灼然无或壅蔽上尊……

癸酉嘉平月二十五日

中华印务总局值理人 冯明珊 梁鹤巢 陈瑞南同顿首<sup>④</sup>

启者 本局倡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是以特延才优学博者四五位主司厥事，凡时势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

甲戌年正月初一日

中华印务总局谨启<sup>⑤</sup>

<sup>①</sup> 此4家中文报纸是：《遐迩贯珍》，1853年9月3日创刊；《香港船头货价纸》，1858年创刊；《中外新报》，1858年创刊；《华字日报》，1864年创刊。

<sup>②</sup> 关于《循环日报》的创刊日期：1932年，《循环日报》刊印了《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回顾了该报创办和发展的经历，但由于早年资料的缺失，错把创刊日期说成为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即阳历1874年1月5日），此后，言者大都以此为据。1989年，国内学者夏良才访问香港期间，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借阅到该馆从英、日等国复制的《循环日报》缩微胶卷，写了《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一文，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该文订正了《循环日报》的创刊日期为1874年2月4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至此，《循环日报》创刊日期才得以真正确定。

<sup>③</sup> 《本局日报通启》，载《循环日报》（影印缩微胶卷，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刊印。下同，不再另注），1874年2月12日。

<sup>④</sup> 见《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sup>⑤</sup> 见《循环日报》1874年2月17日。

这样的一张报纸之所以首先在香港出现，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鸦片战争后香港的割让，使西方文化率先进入此地区。而西方咄咄逼人的侵略，也使居于此地的中国人最早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危机而产生御侮自强思想。

《循环日报》是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创办的报纸，而中华印务总局的主创人黄胜则是与中国近代第一位留美大学生容闳、留英大学生黄宽一道赴美的同学。1847年，西人在澳门（后迁香港）所办之马礼逊学堂教师缪塞尔·布朗回美时，携此3人到美留学，先到芒松中学读书。黄胜因身体健康不佳，1年后辍学回国，没有能像容闳、黄宽那样一直读到大学毕业。虽然如此，但他所具有的英语水平及西方知识已使他能香港西人所办之文化机构任职。他先在《德臣西报》（china mail）打工，后来又在英华书院印刷局任印务监督。他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当校对员而受到理雅各的感谢和赞扬，他曾参与香港第一家中文刊物《遐迩贯珍》的出版工作，他亦主持过香港《中外新报》的主编和经营管理工作。<sup>①</sup>所以在1871年伦敦会决定解散英华书院印刷局时，黄胜说自己已在此任职20年。由于黄胜的身份和多年积累的经验与财力，使他得以组织几个中国人集资21000元的鹰洋买下了印刷局的机器和铅字，而于1873年创立第一所中国人自办的西式印刷厂——中华印务总局。在中华印务总局印刷出版和代售的书籍中，中国古籍、西书译本、时人政论、西方语言文化历史地理政教风俗之书占绝大部分。他热心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曾为北京购买了大小铅字两副，亲送到京，呈于总理衙门。当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时，黄胜不在香港，正带领第二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但早在一年前酝酿办报时，他是主持人之一。

《循环日报》的主笔王韬，原籍江苏吴县（今苏州），早年上海墨海书馆任职13年，主要工作是为西书的翻译作中国文字的润色和修改。时与西方传教士多人相识，与英国教士伟烈亚力、麦都思、慕维廉等饱学之士友善，并视麦都思为“海外知己”。1862年，因有通太平天国之嫌受清廷通缉，逃亡香港。开始他帮助英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为英文，并因之而得到一个游历欧洲的机会，在苏格兰一住近3年，其间两度赴法国。当时中国文人往西方者极少，而住下来进行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的更是没有，所以王韬是近代第一个迈出国门的中国学者。1870年2月他返回香港时，思想已发生极大变化，开始自己动手写书著文介绍西学。他先著《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同时也为香港《近事编录》、《华字日报》等报刊撰文，后来还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华字日报》编辑。王韬于办报不但熟悉且有独到见解，他是《循环日报》的灵魂。在每期《循环日报》下均署有“中华印务总局

<sup>①</sup> 林友兰：《近代中文报业先驱黄胜》，载《报学》1967年第3期第4卷。

王韬刊印”字样。

辅助王韬办报的其余几个人，除王韬的女婿钱昕伯为来港学办报的浙江人外，均为广东人。主要有番禺县诸生洪干甫、东莞人冯翰臣、番禺人洪孝充与郭赞生、南海人吴琼波等，稍后，三水人胡礼垣（后为著名改革思想家）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翻译。<sup>①</sup>

由此可知，《循环日报》的创办首先得力于岭南有了一小群了解西学的人才。没有他们对西学的认识，便没有创设现代报业的动议和决心，而对于外国事物的介绍，王韬认为自己是最有条件做好的，因为其他中文报刊的“操觚之士未稔西情，则又不免详于中而略于外，求其能合中西为一手者实罕其人”，因此颇有“舍我其谁”的气概。

另外，《循环日报》的创办也与香港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香港自鸦片战争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商港，西人开辟多条航线以扩大香港与中国沿海、东南亚、日本、欧美等地的交通贸易。出于商业发展的要求和英国管治的需要，报章杂志不断出现。且随着商业的流通，报纸的销路不错，而其文化传播功能和社会沟通作用也日益为中国有识之士所重视。加以港英政府初期的文化政策自由放任，思想钳制比较松懈，办报人竟可以在办报宗旨上宣称“凡时势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以致华人办报多选在香港而不在清政府统治下之广州。

粤、港、澳三地是相邻的，当时香港、澳门虽然已割让和租借出去，不属于中国政府管辖，但三地的人民仍可以自由往来，且由于商业的发展，交通畅顺。《循环日报》在广东有9处订售点<sup>②</sup>，广东读者要阅读它很方便，所以就民间而言，鸦片战争后西学在岭南的传播并未停止，而是潜滋暗长。由于西方文化可以不受约束地从香港、澳门输入，而两地的中西文化交流，又比内地走得更快更远，所以广州吸收西方文化的渠道不但没有堵死，而且少受洋务派“中体西用”价值观的限制。广东官方封闭的意识阻止不住商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循环日报》以商业行情为头版，以新闻、评论为二三版，以广告船期为末版的经营策略，既是以商业经营维持报纸生存的需要，也为商业带动文化传播打开了一条新路。在经过港、澳输入的西方文化的直接熏陶下，岭南成为维新和革命领袖辈出之地，其

<sup>①</sup> 见《循环日报 60周年纪念特刊》，循环日报出版社1932年版，第13页。

<sup>②</sup> 《循环日报》1874年中多期均刊有“中华印务总局告白”，称：“兹特于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我华人所驻足者，皆有专人代理，如各行店及外埠士商欲惠顾本局新闻纸者，请赴就近代理人处先为挂号，自当如期送至决不有誤。谨将各埠代理人开列如左：粤东省城联兴街广隆宝号，杨仁南广记宝号，同安街永安信馆，沙面瑞记洋行，澳门仔之臣蔡裕堂翁，人和公司陈瑞生翁，佛山公正市新广记宝号，东莞城铁镗街胜聚宝号，虎门公盛米店……”总计在广东的订售点有9处。

原因也就不难解释了。

## 二、早年《循环日报》剖析

现存最早的《循环日报》是1874年2~8月的，亦即是创办之初的6个月的。这头半年，是主办人王韬全力以赴投入办报活动，且创造力异常旺盛的时期，《循环日报》的特点和风格发端并定型于此时。据说几年以后，王韬兴趣转移，对办报“意兴阑珊”，把业务大部分交给了他的副手。1884年，他离开《循环日报》后该报的影响更日趋下降。由此笔者特意选取1874年这一时段的报纸进行研究，以观察19世纪70年代西学在岭南传播的情况。更兼19世纪70年代的中文报纸能留存至今的极少，这半年的报纸向我们提供的岭南地区史料也是极为珍贵的。

《循环日报》版式和栏目编制颇有中西合璧的意念。它的报头横排，下面的出版日期分署西历和中历。先用小字排西历，再用较大的字把中历排在正中位置。而当时的很多中文报纸包括著名的《申报》仍未在报头排上西历，《循环日报》在历法上注重中西对照，鲜明地表现了该报的特点，具有世界眼光。

该报的第一版全是商业经济行情，第一个固定的栏目是“香港目下棉纱花疋头杂货行情”，详列每日各类棉花、洋纱、原布、白洋布、羽绸、剪绒、洋毡等货物的市价。第二个固定的栏目是“各公司股份行情”，罗列有香港上海银行、于仁保险公司、中外保险公司、香港黄埔船澳公司等20家公司的股票行情。

该报的第二版是新闻，首为“京报全录”，次为“羊城新闻”，第三栏是“中外新闻”。《循环日报》对西学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中外新闻”栏目里。这个栏目的特点是信息量大，内容丰富，报道及时，夹叙夹议。在文风上生动通俗，观点鲜明。不少新闻在报道完事情经过之后，加上几句表达编者观点的评议，作为点睛之笔，兼收开通民智、影响舆论、淳风化俗之效。比如《循环日报》1874年5月22日有一则报道说：“有华人某甲致书于《德臣西字日报》馆曰，吾近阅日报知华人每好出言无礼而呼西人曰‘番鬼’，西人无不闻而恶之。顾西人每谓华人之辨曰‘碧爹劳’，译即言‘猪尾’。彼则呼人为鬼，此则将人作畜，窃以为皆非所宜也……”末尾评论道：“呜呼，中外交际已30余年，而犹不能使之彼此相见以天，一泯其畛域之思隔阂之见，是诚吾有所不知已。”

第三版续上版新闻占了约半个版，另半版是“船期消息”与“电报”。

第四版全为告白。

在全报的四个版中，新闻约占一个半版。全报1.8万字，新闻约占7000字。以商业带动文化传播的特点一目了然。

在19世纪70年代，不要说一般人士，就连提倡洋务的开明官员，对西方知识

都是一知半解。曾国藩认为应向西洋效法的仅限于“船炮”，李鸿章也只限于科学技艺和一些轻工业与交通建设，对西方政教法制，茫然无知。而西国之一切学术常为中国耻笑。因痛感中国人对外国不了解而带来的危害，《循环日报》对西方的介绍不遗余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声光化电，无所不谈。既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手段，也称赞西方思想解放、制度优越与科技先进。《循环日报》也很注意西人言论，不时加以选登，以收兼听则明之效。

下面选择三个方面来谈谈该报报道的西方事物和所持之观点。

1. 追踪西方科技新成就，力倡学习西方最新技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循环日报》在是年6月1日报道了“美国新法水雷船”，6月22日报道了“法国火器精益求精”；6月24日报道了“英国炮台新法”；6月27日报道了“英国新铸大炮”，全是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就。在《新法水雷船》一文中，不但报道了这种新式武器的构造、性能与攻击力量，并提供了制造厂家的地址：“美国于班布碌船澳新制一水雷船，现已竣工。厂名曰畏苏威亚，系水师官葛地尼所创建。其船计长90尺，阔22尺，舱深11尺，可装241吨，中用暗轮两个，机器之猛厉可抵360匹马力……人尽匿于船内，似闻可从水底游行。虽制造之巧妙新奇尚未详悉，而总之以遇金革事即至巨之铁甲船亦无不可洞坚摧锐，诚战舰中所从未有也。”这些科技信息，对中国国防建设学习和赶上西方是十分重要和及时的。

《循环日报》在报道和盛赞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常常流露出“中国仿行西法事事每虞不逮”的忧虑心情。7月7日的评论说：“泰西诸国新法迭出，日变而不穷，总以精益求精，奇益求奇，日臻乎上。虑一法之未善，惕他人之我先，其心思才力，斗胜竞巧，至有不可以拟议者，迩来枪炮变而战舰亦变……反观福州炮局所造火船，旧式为多……均当改制！”

当时中国的守旧派是非常反对效法西方的，经常用“靡费”一词指责洋务派，以致中国在引进西方先进武器时总是缩手缩脚，只求价廉，不求物美。《循环日报》常借西人之口批评中国这种错误思想，指出这是中国在武器上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而直接导致在战争中不能取胜的重要原因。7月23日《循环日报》转载了《西字日报》一则报道，文中说：“中国炮舶永保驶往仰船洲，装运火药共计3600桶，重约8万磅。船上有新法洋枪，然西国已以为旧制矣。惟华人见之则以为灵便异常，极能命中及远，故是枪销路遂广。此由于华人不知精于选择，初不知其货之美恶，而但求其价之廉减。不知火器者三军之所以托命，器精而利，于临阵之时可以有恃而不恐，而制胜之券即操于此。”

2. 对洋务运动有赞扬和批评。洋务运动到1874年已进行了13年多。在这个开创阶段取得成绩不少，可检讨之处亦多。《循环日报》对洋务运动倾注了极大的

期望，常撰文予以鼓吹，对其成绩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对其政策的缺失也直言不讳地进行了批评，并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献其所知。

1874年，上海第一家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正在艰难创办之际，《循环日报》不时刊登有关它的进展信息。5月16日报道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招商局轮船将往来于日本。”文章说，从前这条航线只有美国公司的一艘轮船行走，现在招商局分派火船走这条航线运货，使得对日贸易的华商减少滞留日本之忧，且与洋人争利于外洋，打破洋人垄断航运的局面，“其利市三倍固可操胜而卜之”。6月1日的消息对轮船招商局创办的进步作用加以肯定，7月27日对轮船招商局扩大业务至邮递公文又加以报道和鼓吹，并提议：“若民间信局亦由船舶代递而官吏略抽经费以为津贴，一如西国驿务之法则招徕必广。”

架设电线是顽固保守势力极为反对的事，认为有害于风水。《循环日报》极力宣传电报之利，不断报道外国人在中国架设电线以获取利益，力主中国人尽快架设自己的电线。7月3日报道的“福州设立电线”的消息说，由于日本发动了侵略台湾之战，福建省尤其处在扼要地位，今闽浙总督李制军首先倡设电线，由罗星塔至城中，于战事甚为有利。而由此可知，将来电报之设必可遍行于中国，这是形势所迫。7月18日报道“福州所造电线，自罗星塔至城中督署，现已葺工”。8月8日报道“自吴淞口入上海所断电线已行续好，可以传递如常”。这些报道使中国官民渐知电报有益于军国商旅之事，不再由于愚昧而反对电信业的发展。

1874年7月8日，《循环日报》刊登了一长篇论说，对早期洋务运动在制器、造船、练兵、海防几方面空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文章的题目是《书中外新报论中国后》。文章提出洋务运动中有四种弊端必须克服：一是采办洋枪“人弃我取”，捡别人淘汰的旧武器；二是各省防兵没有汰虚额，核实数，操练营规未变，弓矢刀矛未悉易以枪炮；三是海疆除天津外，鲁江浙闽粤俱无重险劲旅以资镇守，海防空疏，危机四伏；四是中国仿造之炮舰只可用于巡防缉盗驰递驿文运粮运米，不足以抵御外侮，“徒靡国币数千万而西人观之不值一嘘”。该文还指出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是“不能破除成见”、“因循玩愒坐误事机”、“漠不关心哀如充耳”、“言之者有人行之者无人，即或行之而但得其一二未得其全也”。认为如能在鸦片战后“亟从魏源之言而尽行之，何至有津门之辱和今日台湾之衅”。这些批评一针见血，痛心疾首，但由于洋务运动终未能克服这些弊端，以致中国对外战争不能避免一败再败的结局。

3. “甲戌日兵侵台事件”的连续报道引起国人关注边疆危机。世界大势和中外关系是《循环日报》关注的问题。1874年，中国对外交涉最重大的事件是“甲戌日兵侵台事件”，时间从1874年5月7日日本陆军中将西乡重道率先遣队登陆台

湾琅峤社寮开始，到同年10月31日签订《中日台湾事件专约》为止，历时共5个多月。现存的《循环日报》虽仅有1874年2~8月的，但刚好是该事件的开始和中期，但我们从中亦可看到《循环日报》对此事报道之重视和评论之中肯精辟，在当时的华文报刊中罕与其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以下略举数例以兹说明。

早在日军侵台前，该报已开始连续刊登《台湾番社风俗考》数篇，以引起人们对台湾问题的注意。登在1874年5月19日《循环日报》上的《台湾番社风俗考五》已考到凤山县，文中说：“凤山一县更有所谓生番者，其居处饮食衣饰器用婚嫁丧葬皆与熟番不同，而其分社则无异也。”全文1000余字。6月18日有《台湾沿革考》一文，细述台湾从隋朝开始逐渐开发的历史掌故，并向国人叙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史实。这类介绍台湾历史和风物的文章现在可见的共10多篇，增强了国人对台湾的认识和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观念。

自日本兵船侵入台湾后，《循环日报》对中日军事动向密切注意，报道甚多，每两三天必有日本消息和台湾消息。内容有“台湾生番与日本兵士角战”、“现日本兵士云集于台岛之南约有三千”、“闻日本火船虽重价购得而皆有名无实”、“现闻我国已简遣钦使持节驶赴日本，大旨则请日国速撤师旅毋乖辑睦”、“闻有日本铁甲战舰驻泊于福州海口，窥其意将以杜遏我国援台之师也”，等等。可以说，这些集中、连续和大量的报道，对吸引国人关心国事、了解时势及调动人民的爱国热情有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及时报道时事外，新闻评论也紧紧跟上。在现存的《循环日报》中，有关甲戌日兵侵台的议论（包括转载西人言论）便有《西人论战事之变》（5月19日）、《论日本往剿台湾生番》（5月23日）、《论日本使臣之言不可信》（6月6日）、《日本不肯撤兵》（6月18日）、《论与日本交兵情形》（6月20日）、《西字日报论日本伐台之非》（6月22日）、《论李制军筹办台湾近日情形》（6月23日）、《西字日报论中国保卫台湾名正言顺》（6月23日）、《议林华书馆东洋伐台湾论》（6月24日）、《论东洋伐生番》（6月27日）、《论日本之必可胜》（7月1日）、《字林日报论台湾事》（7月3日）、《书中外新报论中国后》（7月8日）、《论铁甲战舰之足恃》（7月28日）、《西人甲乙论》（7月28日）、《西人论中国当与日本和》（8月4日）、《论日本举事之谬》（8月10日）等20多篇。其中论点也颇有足取。如指出日本侵台的口实没有根据，揭露日本的野心，预料日本强大后极力向外扩张终成亚洲大患，痛论清廷自强之无实，等等。这些言论表现了论者忧心如焚的感情和洞若观火的理智。

当时国人对报纸不甚关注，但《循环日报》创刊后，当年即有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循环日报》无隐无饰、直言不讳的作风和客观及时的报道，获得了人们的

喜爱，不但报纸的销路打开，重要的是使国人渐知新闻之有益和舆论之重要。

### 三、《循环日报》在岭南地区的影响

岭南地区在鸦片战争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内，由于西方侵略者对广州的蹂躏而产生的民众抗拒西方的情绪及持久的官方控制，妨碍了广府地区吸收西学。以官学为代表的政治文化表现了封闭的倾向。以报业言，西人在广州所办报纸从 1839 ~ 1843 年间几乎全部迁往香港、上海；而在其后的 40 年间，香港、上海中文报纸陆续刊行之时，广州相对沉寂，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才开始有人办报，且动受官方指责与封禁。1883 年 12 月 20 日，广州市内出现了“私自刊刻的新闻纸”，南海、番禺两县即出示禁止。<sup>①</sup> 1884 年后，广州好不容易有了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述报》和《广报》。但《广报》一直不见容于封建顽固势力和当道者。1891 年，因发表一条某政府大员被参的新闻，触犯了两广总督李瀚章，被李下令封禁。封禁令指责该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胆大妄为”，并责成番禺、南海两县“严行查禁”。该报被迫迁往沙面租界，改名为《中西日报》。但是，官方文化封闭的政策阻止不住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流播，香港报纸随着商品的流通进入了广州，《循环日报》等报纸弥补了广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国人自办的中文日报的空白。

《循环日报》是一张香港报纸，但奇怪的是它有“羊城新闻”专栏而没有“香港新闻”专栏。笔者认为，这与当时广州、香港之间密切而特别的关系相适应。当时香港是一个新开发的通商港口，又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人除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渔民以外，大部分是从广东到香港谋生的商人和雇工，他们大多不在香港定居，只把香港作为暂时居留的营商打工之地，而把广州和内地作为真正的家园，家属和产业都留在后方。那么对这些香港人来说，家乡的新闻是他们所关心的。另外，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广州而不在香港，报纸的读者群比较集中于广州，也是开设“羊城新闻”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循环日报》虽然是一家香港报纸，但它与广州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对广东的影响也是相当广泛的。

《循环日报》是一张在岭南地区销路不错的报纸，它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欢迎。据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时，学堂中就订有《循环日报》和上海的《万国公报》供学生研读。<sup>②</sup> 《循环日报》所宣传的改革思想和办报思想对康有为、梁启超等有深刻的影响。清代文字之祸，穷古未有，社会由是而蕙懦成风，以明哲

<sup>①</sup> 方汉奇、谷长岭、冯迈著：《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载《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4辑。

<sup>②</sup> 王庚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下册，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5页。

保身为要，以无事自扰为戒，浸淫于人心者至深。王韬因应潮流，感发时势，论政言事，却除忌讳，于报章中权衡国是，开文人议政之风。虽然王韬在《循环日报》中常感叹人民无权过问军国大事，但出于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性，对国家大事无不感奋激昂，勇于发表言论，以供当事者采择。在《日报有裨于时政论》一文中，王韬表明自己“以清议维持国事”的志向时说：“慷慨谈兵，激昂论政，熟刺外事，旁涉民风，于欧洲列国情形，每娓娓而谈必使竭尽而后已，高谈雄辩，刊布驰行，位卑言高。吾束发受书时固早以致君泽民为己任，乃既不获如志，悠悠忽忽以至日暮途穷而犹瞻顾彷徨。使生平之见解不得托诸空言，身似寒蝉，岂非真负天地生我君师成我父母育我之德乎？”<sup>①</sup> 其时，西法模仿为政治中心问题，但士大夫无识，群儒迂陋，能知洋务者绝少，且对中国之改革无根本之认识。王韬学贯中西，见识超卓，改革议论，震聋发聩，在19世纪70年代，是岭南言论的重镇，改革的先驱。其所撰政论，观点新颖，议论精辟，文字雅达，为时人争相阅读。“国有大事，士林皆重其所出”，各地报纸乐于转载。<sup>②</sup> 康有为22岁时“薄游香港”，见闻一变，时王韬正主持《循环日报》，又出版多种西书，更兼自撰的新书也很畅销，康有为应有所披阅。康后来故见尽释，思想一新，于1888年写了“上清帝第一书”，其受王氏影响，当无可疑。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办报，更是以该报为样板。他在《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一文中说：“时务报筹创时，重要策划人之一汪康年，曾力主办日报，欲与天南遁叟（王韬笔名）一争短长。”其实这个想法，梁启超也一定有。可以说，《循环日报》对培养岭南地区的一代革新人士是功不可没的。

<sup>①</sup> 见《循环日报》1874年2月6日。

<sup>②</sup> 赖光临：《王韬与循环日报》，载《报学》1967年2月第9期第3卷。

# 香港与中国近代改革思潮

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香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促使中国人在国土沦丧的耻辱中，不但认识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看到了富强的西方国家活生生的事实，感受到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从而在自满自大的迷梦中觉醒，在痛苦屈辱的现实中寻找振兴中华的出路，这样坏事又转化为好事。近代中国，改革思潮一浪又一浪地扑面而来。而香港作为中国人探视西方文明的窗口，也就成了改革思潮的一个重要的萌生地。洪仁玕、王韬、康有为、孙中山……这些不同历史阶段改革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都曾从香港获得过启示和灵感。而他们的努力，亦为中国重振雄风，最终收回香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一、中西比照下改革思想的萌生

如果说，鸦片战争的教训仍不足以惊醒国人，那么香港殖民地的存在，便像一根钢针时时刺激着国人的神经。

本来，战争已经把中国的落后和积弱不振，暴露在世人面前。但是，战后的北京，却是一派苟安气象：“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严有诗书偶语之禁。”<sup>①</sup>显然，清朝统治者并未从战争中吸取教训，一切仍从旧章，不思改进，更无迎头赶上之意。

与此同时，香港却是另一番景象：英国殖民主义者搬来西方那一套管治方法，建立警察局、行政局、立法局，颁布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英王制造》（即《香港宪章》），兴建马路、医院、教堂、学校，修筑码头、货仓，创办报刊，编印图书，改善卫生和居住环境，使这个原本只有几千人的地方在短短的20年里，发展成为拥有10多万人口、初具规模的商港。一位外国青年在1859年第一次踏上香港的时

<sup>①</sup> 《软尘私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9页。

候，对它作了这样的描绘：“维多利亚（指香港）像海峡的哨兵一样，从海边一直伸展到山上。山的四周矗立着岁月剥蚀的花岗石，构成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的壮丽背景。坐落在山腰点缀着花园的高贵屋宇是欧洲商人与官员的住宅和英国政府的官署。山上间有葱翠小谷，一些小山顶上盖满了亚热带的绿荫。这个绿色岛屿一边矗立着怡和洋行大厦，另一边则是密集的丛林。港内有无数的木船和欧洲轮船停泊，那些在行驶中的船只，往来交织，呈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使这个原本是空旷饶薄的地方，提供了引人入胜美丽如画的神韵。”<sup>①</sup>过了3年，当另一位中国青年从长江口逃亡到香港避难时，面对这个南蛮之地的变化也发出惊叹：“香港蕞尔一岛耳，固中国海滨之弃地也。丛莽恶石，盗所藪，兽所窟，和议既成，乃割界英。始辟草莱，招徕民庶，数年间遂成市落。设官置吏，百事共举，彬彬然称治焉。遭值中国多故，避居者视为世外桃源。商出其市，贾安其境，财力之盛，几甲粤东。呜呼！地之盛衰何常，在人为之耳。故观其地之兴，即知其政治之善。”<sup>②</sup>

鲜明而强烈的对比，使注重现实的中国人改变了对夷人的看法，承认西方之先进，希望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的愿望由此而产生了。这种改革的思潮分为激烈与平和两种不同的倾向。

香港是反清思想的一个发源地。香港自从1841年被英国占领以后，清政府便不能把它的统治力量伸展到这个小岛，一部分与清廷离心离德的人便把这里作为他们暂时脱离清朝统治的避难所。而西方政治的开放和自由不但使得人们自然地把香港和内地进行对比，也使得人们可以在此大胆地表达他们对清廷的不满。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英国人呤喇来到香港，便感到这种强烈的气氛。他记道：“我正在看精彩的戏法表演时，一个身材魁伟显然有钱的中国人走到我面前，向我说了一句‘洋泾浜英语’。我靠运气而不是靠理解力总算猜到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变戏法的很有本领，并问我喜不喜欢这套戏法。他又说了几句同样含糊的‘洋泾浜英语’，他的朋友也一起插进来说话，使得谈话更加含混不清，终于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请我去吃一顿中国的好饭菜。我没有什么事，又想趁这机会打听一下中国的情况，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一同走进附近一家餐馆。在那里，我十分愉快地消磨了一些时光。我告诉这些中国人关于铁路、气球、海底电线等等的情况。他们也告诉我许多香港的生意经和中国政治的消息。我的朋友们一致大声赞扬这个殖民地，说香港的一切都是呱呱叫，但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清朝政府，则激烈表示不满。后来我要回

①（英）呤喇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②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八，《送政务司丹拿返国序》，清光绪23年（1897年）长洲王氏上海重排铅印本，第216页。

去值夜班，只得匆匆离开他们。临别时，我们互相祝福，其中最突出的一句话就是‘英国人刮刮叫，中国人呱呱叫’。”<sup>①</sup>显然，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是把满清统治阶级排除了。

香港也触发了晚清改革派康有为的“仿洋变法”思想。1879年，康有为第一次到香港，他看到英国人把香港治理得井井有条，十分惊讶，他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感受说：“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sup>②</sup>他在香港偶遇任中国驻日公使馆英文翻译的同乡陈焕鸣，并在他家里看到了丰富的外国藏书。康有为还在香港购买了世界地图，选购了一些译本西书。香港之行，使他大开眼界。从此，他摒弃了夷夏大防的迂腐观念，益发留心收集有关西方的书籍，随着见闻增多，逐渐形成了“仿行万国之美法”的改革思想。

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萌发，也与香港有密切关系。1923年2月20日上午，孙中山应香港大学学生会的邀请，回母校作公开演讲时说：“很多人问我的革命和现代化思想是从哪儿来的？答案是，从这个地方，这个香港殖民地。”接着，他提供了很有趣的细节。他说他30多年前来到香港读书，闲时总爱在街道上散步，因为一切是那么井井有条，一切是那么和平宁静，大家各适其式而没有任何纷扰骚乱。一旦放假回到香山老家，马上就换了一个天地，一切都是那么杂乱无章，鸡犬不宁。他把香港和香山作比较，两地才相隔50来英里，何以竟有天渊之别。经过研究分析，他认为关键在于两地政府的管理方法不同。所以，有一次放假回乡时就说服乡耆模仿香港，先搞点小试验，从清洁乡里街巷开始。于是他独自扫街，不久就有很多年轻人来参加。接着他提议建筑一条小道与邻乡连接起来。乡耆同意了，但表示没有经费，他就与青年伙伴们自己动手，但走出乡界，麻烦就来了，迫得停工。于是他跑去见县官，县官很同情他的主张，并答应他下次放假回乡时予以援助。但等到他再放假回乡兴冲冲地跑往县城时，发觉已换了县官，原来有人花了5万块钱买通了他的上司而取代了他的职位。结果孙中山欲在其乡搞个香港试点的宏愿就付诸流水了。这个经验让他领悟到，光有管理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于是就把香港政府和香山政府作比较，发觉廉洁在前者是普遍现象，在后者则属例外。他觉得省政府肯定要比县政府好，于是跑到广州考察，又发现官阶越高，贪污越大。他不服气之余，认为中央政府肯定要比地方政府廉洁，否则怎成

<sup>①</sup>（英）呤喇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sup>②</sup>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15页。

世界？于是他跑到北京考察，发现那儿的贪污比广州厉害何止百倍！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把全中国变成像香港那样廉洁安宁有秩序。于是他开始研究英国史，发觉几百年前的英国曾像广州那样黑暗残酷，但英国人奋起而改变之。这就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和勇气。“英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肯定都能办得到。”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中国政府。<sup>①</sup>

## 二、英国模式对改革思想的影响

香港移植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中国人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比较真切地观察、比较直接地感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运作方式，这对中国人学习西方带来了方便，而在香港华人中萌生的改革思想也含有较多借鉴英国模式的成分。

1852年，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逃避清廷迫害来到香港的洪仁玕在香港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而正式成为基督教徒。从1854~1858年4年中，他与英国伦敦会著名传教士理雅各共事3年，与湛马士共事约1年。除从事传教事务外，还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据《洪仁玕自述别录之一》载：其时，他在“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洪仁玕认为英国“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从此奠定了他效法英国进行改革的思想。1859年春，洪仁玕离开香港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向天王洪秀全进呈了他的建国方略——《资政新篇》。在这篇文章中，洪仁玕将自己在外国传教士处学到的知识加以消化，变成具体的建议，供洪秀全裁定。《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全面学习西方，改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治国方案，是鸦片战争后20年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最丰硕的收获。从整体来看，它的改革主张主要是以英国为模式的。“以风风之”、“以法法之”和“以刑刑之”三条主要改革措施中，每一条都注入了学西方、主要是学英国的内容。

比如，在“风风类”条中，洪仁玕把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改革的思想前提和改革的重要内容。他说：“革之而民不愿，兴之而民不从，其事多属人心蒙昧，习俗所蔽，难以急移者，不得已以风风之，自上化之也。”即应该从上而下提倡表扬美德善举，批评鄙弃可耻之行，培养优良的道德风尚，提高人们改革的自觉性和迫切感，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他认为中国人崇尚虚骄、奢侈的习俗和强烈的物欲，价值观很成问题，因而提出破除旧的价值观，树立新的价值观。而新的价值观便是以英国传教士的价值观为标准：“夫所谓上宝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圣神爷

<sup>①</sup> 黄宇和：《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思想溯源》，1996年11月讨论会论文。

之风，三位一体为宝。一敬信间，声色不形，肃然有律，诚以此能格其邪心，宝其灵魂，化其愚蒙，宝其才德也。中宝者，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文闻见之精，此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sup>①</sup>即他认为，基督教是上宝，有用之物是中宝，骄奢之物是下宝。他还用了很多的篇幅说明基督教的好处。他说，英吉利为最强之邦，花旗邦（美国）礼义富足，两邦皆以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立教。另外，德国、法国亦是信上帝、基督之邦，邦势亦强；而土耳其邦不信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仍执摩西律法，不知变通，故邦势不振，俄罗斯邦百余年前亦未信天兄，受人欺侮，后来大兴政教，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也。他又列举了亚洲的一些落后国家，如波斯、马来西亚、蒙古、新加坡和印度等，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所以他说，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基督教是强国的宗教。既然基督教与国家富强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中国也必须信仰耶稣。他又从中国的情况来分析，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风俗浇薄，需要一种宗教提高人民的精神道德，而由于中国原有的儒、释、道三教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所以他提出了以基督教作为提高人民精神道德的法宝。他说：“释聃尚虚无，尤为诞妄之甚；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sup>②</sup>也就是说，洪仁玕把信仰基督教作为挽救人心风俗败坏的法宝，富国强兵的捷径。希望借此振奋人民的精神，推动中国前进。

在一个文化大系统中，精华和糟粕往往并存。中国人在学西方的过程中，开头是不可能很清楚地分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中国国情，只能在不断的探索中改正错误抛弃废物，洪仁玕学习西方宗教便是一例。由于洪仁玕看到西方富强之邦皆信耶稣基督，便认为立耶教与致国强有必然的联系。另外，他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也知道耶教是劝人向善、提高道德水准、安定社会人心的思想工具，认为不妨吸收利用。这个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况且，洪仁玕接触西方思想虽然是从基督教开始，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学习西方宗教上，而是不断地扩大其学西方的内容。从宗教而至科技、军事、政治、法律、经济等等，说明他向西方寻找真理是有一个过程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模式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一批早期的维新人士努力探求中国之所以落后，西方之所以先进的原因时，开始陆续地、或多或少地提到了

<sup>①</sup>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3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1页。

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性。王韬 1874 ~ 1884 年在香港主办《循环日报》，鼓吹变法自强，他以英国为例指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家强盛的重要作用。他说：“英之立国，以商为本。”<sup>①</sup> 英国商人主要从事对外贸易，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而纳税于本国，因而导致国富兵强。王韬认为富是强的基础，应“先富而后强”。而求富则必须“兴利”，在“兴利”方面，他又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矿业与交通运输业的问题。他说，兴利之法有开矿、炼铁、辟煤、开五金、用机器织布、修铁路和造轮船等。他认为中国应大兴工商之利，以华商分西商之利，然后开辟海外贸易，打开国际市场，与列强争胜。在变革封建专制制度方面，王韬对比西方三种不同的政体后，提倡仿效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他说“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泰西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sup>②</sup> “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以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都愈吁佛，犹有中国三代以上遗意焉。”<sup>③</sup> 他认为，君主立宪政体是英国富强之本，立国之本。中国只要借鉴英国进行改良，便可达富强之境：“英国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sup>④</sup> “由此观之，中国欲谋富强，固不必别求他术也”，只要与民“共治天下”，就能“地有余利，民有余力，闾阎自饶，盖藏库帑无虞匮乏矣”。<sup>⑤</sup> 王韬的主张，直接影响了 20 年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

### 三、八面来风和取法乎上

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对各种文化思想一般采取不干预的政策，允许不同的文化共存。海风把异国帆樯吹送到香港的同时，也把各地的文化思想带到这个地方。在港华人便可利用这种条件多方了解各国情况，选择最先进、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改革思潮的高峰，是他学习和消化了西方各

①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4《英重通商》，清光绪23年（1897年）长洲王氏上海重排铅印本，第109页。

②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1《重民》（下），清光绪23年（1897年）长洲王氏上海重排铅印本，第23页。

③ 同上书，第23页。

④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4《纪英国政治》，清光绪23年（1897年）长洲王氏上海重排铅印本，第107页。

⑤ 同上书，第107页。

国社会政治学说的精华而提出来的一个“取法乎上”的改革方案。它的形成和提出，与香港也有一定的关系。

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便结识了一群具有反清思想的人，如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以及辅仁文社骨干分子杨衢云、谢缙泰等。这些受到西方思想影响而起反清的激进人士在香港的出现，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政治特点有关。他们最早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把反清思想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是由兴中会的誓词最早提出的。对于革命后建立民国的目标，杨衢云比孙中山更为坚定和明确。杨衢云少年时便在香港学习机械和英文，对西方作品有广泛的阅读，他在谈起革命理论和历史时，以权威自居，据说他在这些题目的讨论中处于支配地位。杨衢云的性格、抱负和所受的教育与孙中山有相似之处。据孙中山自己的回忆，杨衢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而杨衢云坚定的主张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孙中山曾对《大同日报》的编辑刘成禺说：“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衢云与予大闹，几至用武，谓非民国不可。衢云死矣，衢云死矣，予承其志，誓成民国，帝制自为，予必讨之。”<sup>①</sup>这个早产的民主主义思想当时只有少数革命党人有清楚的认识，而大多数参与革命的群众则仍是“反清复明”或“反清兴汉”。即使在1900年后，日本留学界中有巨大影响的章太炎提出反满论时，对于民主主义也是很少提及。由此可见，孙中山民主主义的提出得力于在香港一群同道者的影响。但孙中山所要建立的民国，不是英国式的，而是美国式的。1903年，孙中山十分明确地指出了革命后要建立的是“民国”，而这个“民国”便是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他所制定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几个原则：主权在民、议会制度、立宪制度，都是参照美国的政制得出的。这是孙中山比较了各国政治的优劣而提出的一个“取法乎上”的主张。当时改良派认为，民权使权倾于下，君权则使权倾于上，只有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最为适中，而且社会进化要一步步来，不可躐等。孙中山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学外国要取法乎上，要选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中国。民主共和制度是现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制度，我们要改革，定要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民生主义则是孙中山敏锐地抓住了世界潮流，把革命后如何建设一个源于欧美、高于欧美的新型国家制度的问题仔细加以考虑后提出的。1905年冬，香港《中国日报》发表了冯自由撰写的社论《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这篇洋洋2万多字的文章，在《中国日报》上连续登载了10多天才登完，后又转载于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

<sup>①</sup>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

和东京《民报》第四号，它是同盟会成立后阐明民生主义学说的第一篇文章。该文把人们的眼光引向世界，从世界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吸取借鉴，避免欧洲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贫富悬殊不平等现象在中国出现，建设一个大多数人得享幸福的新社会。表现了作者对世界潮流的了解及对于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关注。民生主义的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它的土地方案将会消除地主对土地的垄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节制资本也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民生主义中蕴涵的对人民大众利益的关心也将有益于社会矛盾的调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民生主义可以说是带有理想化色彩最自觉、最激进的中国近代化方案。

由此可见，以香港为革命基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对西方的了解更多一点，也看得更远一点。他们把中国和世界的思想联系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学习和吸收外国最先进的思想改造中国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三民主义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和中华民族的觉醒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 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官僚制度的批判

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批判和改造“官制”视为变法之“本原”。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康有为在答复总理衙门大臣关于如何变法的询问时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加明确了。请看《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的记载：“廖（寿恒）问宜如何变法，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曰：‘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答以：‘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sup>①</sup>这里把官制必须全改的观点及理由，都摆明了。谁都知道，维新派是企图用和平的手段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把君主专制政体逐渐地变为君主立宪政体，从而实现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的目的。但在戊戌变法时期，他们认为马上向皇帝提出君主立宪的要求，时机是不成熟的。所以，他们没有把立宪法、开国会作为政治纲领，而只是提出了设制度局

<sup>①</sup>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40页。

和改革官僚制度的要求。与封建君主专制相适应的官僚制度，是作为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是君主专制的基石。既然维新派把改变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作为最终目的，那么先提出官制的改革是顺理成章的。

清末的官僚制度是在闭关时代形成的，其目的是为了统治人民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其手段是使社会各阶层处于分散与隔绝状态，禁锢他们的才智和进取精神。这样的制度在“大地忽通、强敌环逼”的形势下，把中国深深地陷入任人宰割而无所作为的绝境，旧官制对中国社会前进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

维新派对官僚制度的批判和改造主要着眼于机构、人员、作风三个问题上。而在这些问题上，无一不表达出他们想参与政权、左右时局的愿望。

关于机构，维新派指出现行体制冗滥，机构重迭，办事效率低。康有为上清帝书中反复申明此意，他说：“六宫万务所集也，卿贰多而无所责成，司员繁而不分任委，每日到堂，拱立画诺，文书数尺，高可隐身，有薪炭数斤之微，银钱分厘之所，而遍行数步者。”<sup>①</sup>“京官则自枢垣台谏以外，皆为散客，各部则自主稿掌印以外，徒糜靡禄，堂官则每署数四，而兼差反多，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繁琐。”<sup>②</sup>“县令之下，仅一二簿尉杂流，未尝托以民治，县令任重而选贱，俸薄而官卑，自治狱催科外，余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辖，经累四重，乃至督抚，而后达于上。藩臬道府，拱手无事，皆为冗员，徒增文书费厚禄而已。”<sup>③</sup>梁启超说得更为激烈：“中国举国几半冗员也，蠹民实甚。”<sup>④</sup>因此，精简机构首先被提了出来。康有为把精简机构的主张概括为六句话：“文书繁密之当删，卿寺冗闲之宜汰，堂官数人之当并，兼差数四之宜专，吏胥之宜易用士人，百官之宜终身专职。”<sup>⑤</sup>因为裁汰冗员能节约开支，附和维新的人又纷纷上折要求汰冗员，废卿寺，所以这个建议很快被光绪皇帝采纳，1898年7月14日（农历）上谕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山东的东河总督也同时裁撤。维新派又鉴于机构的臃肿表现为上大下小，认为裁汰上层冗员的同时，还必须减少官阶层次和充实基层，加强县一级机构的实际办事能力。康有为提出，把知县以上的藩臬道府四级撤消，使县一级的奏报可直达省级，减少层次，提高知县的官品为四品，慎选有实际能力的人担任，知县以下增设六曹三老，六曹长官由州县进士担任，三老乡官由人民推举，把那些不学无术的杂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28页。

② 同上书，第150页。

③ 同上书，第201页。

④ 同上书，第82页。

⑤ 同上书，第182页。

流置换下来，精简机构与整顿双管齐下，才能见效。但以上诸条，对机构的改革都不过是个小修小补，类似的改革方案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维新派机构改革的大手术在于设立新的机构和新的官职，这就是：设立制度局，作为商榷和施行新政的机关。制度局设于内廷，属中央机构，是皇帝身边的参谋。局内“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sup>①</sup>局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十二局，分别掌管各个方面的变法具体事务。地方上则每道设一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地方自治事宜，民政局可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可以自辟参赞随员，政府拨给经费以便创办新政。每县设民政分局，除刑狱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办理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等等皆由其次第举办。这个方案如果实施，虽然旧机构还暂时不动，但新机构取代旧衙门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了。这是康有为通过新机构向顽固派争夺权力的大胆尝试，它马上遭到了顽固派的反攻。于是，流言纷纭，京朝震动，外省惊悚，都说康有为要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了。旧官僚惶惶不可终日，军机大臣说：“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他们以敷衍迁延相抵制，结果，康有为“所请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乃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于是制度局一条了矣”；“所请开法律局，定为每部派司员，改定律例。夫司员无权无才，无从定之，又非采集万国宪法，与本意大相反矣”；“所请民政局，则拟旨令督抚责成州县妙选人才了之”。<sup>②</sup>在顽固派旧官僚的抵制下，新机构的成立，实际上皆成虚文。

关于官吏的选择和任用程序，维新派反对卖官鬻爵，反对以八股取士，反对循资格用人。他们说：“州县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赋税教养合责于一人，一盗佚、一狱误，一钱用而被议矣，责之如是其重，而又选之极轻，以万余金而卖实缺焉。”<sup>③</sup>因此，强烈要求“首停捐纳”。他们又批评政府举官的方法和标准极其落后过时：“若吏部以选贤才也，仍用铨叙，武举以为将帅也，仍用弓石，翰林以储公卿也，犹讲诗字。”<sup>④</sup>用这样的方法选出的官吏，怎么能胜任早已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的要求呢？他们还指出，循资格用人的结果，造成了执掌要政的高官大吏皆为老朽的局面，这些人精力衰竭，循常守旧，死气沉沉：“尚侍督抚，非资深年耆不得至，

① 《杰士上书汇录》，转引自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63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28页。

④ 同上书，第128页。

政繁事剧，精衰力颓，其于世界新学，各国新政，翻译新书，皆未暇讲读，遂至茫然罔知，无可如何。其所谓才练公忠者，皆不出闭关之旧法，报之今日，若以车渡水而扇御寒也。”<sup>①</sup> 况且循资格升迁，只有利于平庸谨慎的人攀上高位，得不到才智杰出的真才：“盖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才，用耆老者，可以得守常，不可以得应变。汉高之于樊哙，克城乃增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授大拇。同治中兴诸臣，多出草泽，共明效也。盖用人者，用其气而已。”<sup>②</sup> 维新派主张“惟才是举”，“破除常格，不次擢用”，认为这是“大圣人用人之良法”。并提出选才的四个方法是：“一取于翰林”，把投闲置散而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加以起用；“一取于荐举”，令各级官员在民间广泛搜罗和发掘人才；“一取于上书”，在审阅上书中发现人才；“一取于公推”，由士民推举出公认有才能的人。一句话，扩大取材范围，要在科举之外选拔人才。更为新鲜的是求人才有了新标准，“怀抱热血”、勇于任事、学贯中西的维新救时之才是挑选的对象。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在《保荐人才折》里是这样推崇康有为的：“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其所著述有《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等书，善能借鉴外邦取资法戒。其所论变法，皆有下手处，某事宜急，某事宜缓，先后次第，条理粲然，按日程功，确有把握。其才略足以肩艰巨，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sup>③</sup> 撒开其中的溢美之词，可以看到维新派人才标准的两个要点：一是具有西方知识，二是具有改革思想。基于这个标准，维新派竟大胆地向皇帝提出：“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分遣亲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未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政。”<sup>④</sup> 这番议论，无异于在旧官僚群中投下了一颗炸弹！

对于清末的官僚作风，维新派认为“尊隔”是最大的弊害。当时的情形是：“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sup>⑤</sup> 皇帝对臣民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他与臣民的隔绝却是最严重的：“皇上九重深邃，堂远廉高，自外之枢臣，内之奄寺外，无得亲近”，“小臣引见，仅望清光，大僚召见，乃问数语”，“每日办事，召见枢臣，限以数刻，皆须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42页。

② 同上书，第172页。

③ 同上书，第336页。

④ 同上书，第194页。

⑤ 同上书，第152页。

了决”<sup>①</sup>“召对者只限堂官，上奏者只许御史，外官司道以下，朝官京卿以下，不得上言”<sup>②</sup>。皇帝接见的人很有限，而接见的时刻又十分短促，加上天威严穆，被召见者“伏跪屏气，敬候颜色”，不能畅所欲言。那么，皇帝所了解的下情究竟能有多少？又怎么能做出英明的决策呢？尊隔不仅使社会各阶级阶层分隔远离，一盘散沙，而且使高踞于人民之上的整个官僚集团和人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日益加剧，以致这个统治枢纽失去了调节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功能：“今之知县，品秩甚卑，所谓亲民者也，而书吏千数人，盘隔于内，山野数百里，辽隔于外，小民有冤，呼号莫达，书差讹索，堂署威严，长跪问讯，刑狱惨酷，乃至有人命沉冤，鬻子待质，而经年不讯者。若夫督抚之尊，去民益远，百县之地，为事更繁，积弊如山，疾苦似海，漫无省识，安能发之奏章？况一省一人，一月数折，闭塞甚矣，何以为治？”<sup>③</sup>维新派认为尊隔造成了上下之情不通，不通则不能通忧共患以合天下之心志，不能集思广益以致富求强，譬如人患咽喉病，饮食不下导，血气不上达，则性命危殆。他们认为解决的办法是，皇帝放下架子，打破等级观念，增设训议之官，广开求言之路，尽量创造条件，使“人人得尽其言于前，人人得献其才于上”。维新派对于西方的议会制度是十分向往的，严复认为“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sup>④</sup>。梁启超说：“欧洲各国……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议，其大国得是道也，乃纵横汪洋于大地之中而莫之制，其小国得是道也，亦足以自立而不见吞噬于他族。”<sup>⑤</sup>由于维新派受到了西方议会制的影响，所以他们除阐发“下诏求言”、“辟馆顾问”、“开府辟士”以通下情等老生常谈外，还提出了“开门集议”、“设报达聪”等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开门集议”的做法是：“令天下郡邑十万户而推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sup>⑥</sup>这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相去不远。难怪被顽固派目为“求言进才，徒增干进之士；开院（门）集议，有损君上之权”<sup>⑦</sup>。维新派想利用初步的分权来减轻官僚作风的为害，这种做法无疑也是较为进步的。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52页。

② 同上书，第241页。

③ 同上书，第152页。

④ 《原强》，《严几道诗文集》卷一，上海国华书局1922年版，第26页。

⑤ 梁启超：《西政丛书·序》，《饮冰室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63页。

⑥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84页。

⑦ 同上书，第186页。



我们也要看到，维新派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反对官僚政治是极其妥协、不彻底的。康有为虽然在理论上主张旧官制应该“尽撤”，但实际上他为了缓和顽固派旧官僚的对抗，“向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旧。用宋人官差并用之法，如以尚书翰林同直南斋，侍郎编修均兼学政，亲王、京卿同任枢垣总署，提督、千把同作营官，专问差使，不拘官阶，故请开十二局及民政局，选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旧人”<sup>①</sup>。这种妥协的做法，不但谈不上精简机构，反而使机构更为臃肿了。维新派的思想也是十分矛盾混乱的，他们一方面想以民权限制君权，用分权法反对一个人说了算的封建专制作风；但另一方面又想利用君权变法，希望皇帝一纸诏书就能改变局面。他们在反对官僚政治的斗争中又不自觉地陷进了官僚政治的密网里。而且，他们对官僚政治的批判和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澄清吏治，给新政的实施铺平道路，还谈不上从根本上否定和动摇封建主义的官僚制度。

## 岭南革命派对确立三民主义的贡献

“三民主义”最早产生于岭南，主要得力于岭南对外开放的社会环境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孙中山是“三民主义”的创立者。

在孙中山的周围还有一大群岭南人，他们与孙中山意气相投，最早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宣传、讲解和发挥。可以说，“三民主义”并不单单是孙中山一个人的创造，除了孙中山之外，其他的岭南革命分子对“三民主义”的创立也有着不可抹煞的贡献。

—

地处岭南的香港，是反清思想的一个发源地。香港自1841年被英国占领后，清政府便不能把它的统治力量伸展到这个小岛。许多不甘臣清的岭南人便把这里作为他们暂时脱离清朝统治的避难所。而西方政治的开放和自由不但使人们自然地把香港和内地进行对比，也使人们可以在此大胆地表达他们对清廷的不满。对此，英人伶俐很有感触。他记道：“香港深得中国人的欢心，他们为了逃脱清朝统治者的暴虐和掠夺，于是抑制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成群结队地移居到香港来。”<sup>②</sup>“自从

<sup>①</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57页。

<sup>②</sup> （英）伶俐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香港殖民地建立以来，本地人跟外国人有了来往，熟悉了所谓‘外夷’的优越的法律、政体等等，这使他们更不满意自己的国家制度。”<sup>①</sup>

伶俐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清廷正是因为害怕对外开放会导致不满清朝统治的沿海人民与外国势力相结合而共同反清。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反清革命沉寂了几十年，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后，由深重的民族危机而引发的对清政府的强烈不满，才又发展成为新的反清革命高潮。其时，岭南的反清革命思想先于全国出现，标志是1894年的兴中会成立和次年在广州策划的起义。

在岭南，聚集了反清的精英人物。

孙中山与郑士良是较早萌发反清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郑士良从小仰慕太平天国的英雄，不满清廷的腐败，在1883年加入家乡惠阳淡水的三合会组织，常到会馆练武，“渐具反清复汉思想”<sup>②</sup>。在广州，他又结识了许多三合会员，孙中山因是他的挚友，与会党自然也有所接触。1888年，郑士良返回家乡专门从事联络会员，被推为三合会首领。郑士良的主导思想是反清，他在探讨中国复兴的道路时，十分赞同孙中山提出的“勿敬朝廷”的口号。孙中山和他志同道合，引为知己，在思想上互有影响。

兴中会的四大寇——孙中山、杨鹤龄、尤列和陈少白也是因为具有共同的反清思想而走到一起的。“孙、陈、尤、杨四人每日在杨耀记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之。”<sup>③</sup>在乙未广州起义时牺牲的陆皓东是孙中山的同乡，亦是关心国事之人。他在牺牲前的“供词”中说到自己反清思想的来源，一是“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二是受到孙中山反清思想的影响。

香港的另一新学团体辅仁文社，也是由具有共同反清思想的人组织起来的。其骨干分子杨衢云，对西方作品有广泛的阅读，他在谈起革命理论和历史时，以权威自居，据说他在这些题目的讨论中处于支配地位。杨衢云的性格、抱负和所受的教育，与孙中山有相似之处。另一骨干分子谢缙泰，1890年在香港认识了杨衢云，“知衢云蓄志反清复汉，遂与订交，极为相得”。当时民智闭塞，不能公开谈论革命之事，他们便以开通民智为号召，1892年2月在香港组织了辅仁文社，在研究社会和文学的幌子下讨论反清革命问题。辅仁文社的座右铭是“尽心爱国”。<sup>④</sup>加入者有刘燕宾、陈芬、黄国瑜、罗文玉、周超岳、温宗尧和胡干之等16人。

① (英) 伶俐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②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页。

③ 同上书，第9页。

④ (美) 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三民主义中最先揭橥的战斗旗帜民族主义，便是由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尤列、杨衢云、郑士良、陆皓东等一批革命分子最早提出来的。

反清民族主义思想除了在香港和广东地区最早发生和传播外，同时在檀香山、日本的广东籍华侨中也找到了响应者。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后重游檀香山，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后实行反清复汉之举，得同志数十人，于是成立了檀香山兴中会。这在当时“华侨风气尚极闭塞，视中山反清言论为作乱谋反，足以导致破家灭族之灾”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1894年冬，孙中山从檀香山归国，途经日本。船在横滨停泊时，孙在船上向乘客及登轮侨胞演讲逐满救国。在横滨的华人，逐渐接受了反清民族主义的思想，对孙中山的活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响应。

兴中会成立后，便准备利用中日甲午战争所造成的动荡局势在广州发动起义。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各种具有反清动机和思想的人如杨衢云、谢缙泰、黄咏商等，在兴中会的大旗下集拢。

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救国的思想，而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又对《兴中会章程》进行了修订，更为鲜明地揭橥反清的旗帜。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民族主义以反清仇满为主要内容，它继承了太平天国的反清思想和朱元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观念，但又比它们进步，因为它的兴起与中国近代面临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反清的直接目的是避免被瓜分的命运，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建立强大国家。这个特点在兴中会的章程中表达得很清楚，章程没有提出反帝的口号，但要把中国从外国的欺凌中拯救出来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它直指清政府“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反清是为了“兴中”，振兴中华。这与单纯的复兴汉族在中华民族中的支配地位和改朝换代是不同的。民族主义在它一开始便具有了近代民族独立运动的鲜明色彩，这是洪秀全和朱元璋的民族观念中没有的东西。

广州起义虽未成功，但表达了岭南革命派的反满情绪，南中国最早举起了反清革命的民族主义大旗，震动了中外社会。

## 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权主义几乎与民族主义同时产生。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入会盟书的内容是“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

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sup>①</sup>。

在中国，把反清思想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便是由兴中会的誓词最早提出的。对于革命后建立民国的目标，杨衢云比孙中山更为坚定和明确。

据孙中山自己的回忆，杨衢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又据陈少白的回忆，杨衢云的确曾因为孙中山对创立民国的目标不够明确而与他大吵了一通。陈少白说：“孙先生学医，后坚决排满，于共和制度尚有出入，与衢云交，既莫逆，衢云则非造成民国不可。一日议论有出入，衢云持先生辩，盛气欲殴之。予在旁，分开两人。”<sup>②</sup> 这个早产的民主主义思想当时只是在岭南少数革命党人中有清楚的认识，而大多数群众则仍是“反清复明”或“反清兴汉”。1903~1905年，反满的革命思潮勃然兴起，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主义思潮则相对比较薄弱。著名革命宣传家章太炎的文章里，反满言论俯拾即是，而民主共和思想则难以找到。有的革命刊物，排满言论激烈，民主言论不足。如《浙江潮》第9期上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认为，只要把满人的政权换成汉人政权，革命便完成了，建立什么政体关系不大：“果为中国人之中国，立宪可，专制亦未尝不可。”《中国白话报》第3期林獬的文章说，若是汉种人做皇帝，“我们百姓自然应该忠他”，“我们爱的是自己汉种的皇帝”。《江苏》第6期柳亚子的文章说：“公等今日其勿言改革，唯言光复……与其臣事异种之华盛顿，无宁臣事同种之朱温。”因此，可以说不少人并不是“三民主义”者，甚至连“二民主义”也不是，只是个“一民主义”者。

在这种情况下，岭南革命派对于民权主义的认识和宣传便显得极为难能可贵了。他们由于多为华侨或留学外国的知识分子，或在香港等地接触过西方政治制度，对于民主政治了解和研究比内地的革命分子更多一些，而反对专制统治也更为坚定一些。

对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性质共和国的设想，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是逐步明确起来的。1897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向一俄国人推荐他的英文著作《伦敦蒙难记》，当时，该俄国人与其他几个外国人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您希望在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来取代现存的制度呢？”孙中山回答说：“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

① 《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② 《国史馆馆刊》创刊号，见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页。



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又问：“换句话说，您是希望中国大体上能出现日本那样的变化了？”答：“对。不过，日本的文明其实就是中国的文明，它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sup>①</sup>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希望中国向西方学习，像日本那样进行改革，但又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政制。他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的概念还不是十分明确。

同年，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把共和与“人群自治”联系起来，认为人民自议、自理的制度，便是共和的精神。他说，中国古代的“三代之治”以及当时僻地荒村的“敬尊长所以判曲直，置乡兵所以御盗贼，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议之而自理之”，便是共和的“神髓”了。

1900年6月，孙中山和杨衢云、郑士良等从日本横滨乘船赴香港，在行前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sup>②</sup>这是最为明确的关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公开表述。

1901年，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在访问了孙中山后报道说：“以联邦或共和政体来代替帝政统治，这是孙逸仙的愿望。”<sup>③</sup>

直到1903年，孙中山才十分明确地指出了革命后要建立的是“民国”，要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等革命派在同盟会的宣言中明确规定“国体”必须变革，并对共和政体进行了扼要的概述。

鉴于中国广大人民，甚至是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共和”的认识很肤浅，孙中山等岭南革命派在1905年前后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多说明，主要观点如下：

1. 以社会进化论为武器来论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落后到进步、由野蛮到文明的。它经历了“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和“君权时代”，现在已进化到“民权时代”了。所以，我们应该推翻君权，建立民权。

2. 批驳反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谬论。改良派认为，民权使权倾于下，君权则使权倾于上，只有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最为适中，而且社会进化要一步步来，不可躐等。革命派则认为，学外国要取法乎上，要选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中国。而民主共和制度是现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制度，我们不要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亦步亦趋，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发挥人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88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211页。

的主观努力，其进步方速。

3. 论述民主革命是改造中国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岭南革命派认为，民族革命可以去掉恶劣政府，但单纯的民族革命是不够的，还要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去掉恶劣政府的根本。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自由平等的国民所堪受的。政体不好，国家不能富强，即使推倒了满清统治者，外人一样来欺负我们，民族危亡何日可了？要去掉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推翻清朝政府之后，要同时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这便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是使中国避免亡国厄运的根本。

4. 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实现民主共和制的步骤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国方案，这个思想和方案要在中国成功地实行，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于是，孙中山设计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具体程序和保障国民权益的五权宪法。即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分立的基础上，把考选权和纠察权也分立出来。这样，民主制度便更加完美了。

孙中山与岭南革命志士们是最早和最自觉地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建立民国的革命目标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前进过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飞跃，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也使中国近代的群众运动进入了“自觉的民主运动”的阶段。

### 三

当孙中山被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拥戴为他们共同的革命领袖时，正是反清的民族主义高涨之际。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目的，是他们联合的基础。而对于革命成功后建立一个什么政权，实行何种社会政策，大家是有分歧的。特别是对于“平均地权”一条，很多人不理解，不赞成，或根本就不理会。虽经孙中山剖切讲解后大家表示同意，但仍没有引起重视。有的人认为这个问题是“不急之务”，用不着多加关注。有的同盟会本部干事，因觉得难以向入会者说清楚“平均地权”的涵义，干脆将其删去。欧洲同盟会成立后1年，有几位同志曾另组“公民党”为同盟会之预备会，而“公民党”的誓词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三事。东京同盟会成立后3年，会员张伯祥、焦达峰等在联络长江沿岸各会党时，又因嫌盟书中“平均地权”一项意义高深，非知识幼稚的会员所能了解，而另组“共进会”，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可见，即使在革命队伍中，要确立民生主义，亦非易事。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逃亡海外后，专心研读各种政治经

济书籍，比较深入地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考察和研究而逐渐形成的。

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中对民生主义作了初步的定义，但由于忙于组织政党和筹划起义，对民生主义没有作更加明确和具体的阐述。

1905年冬，香港《中国日报》发表了冯自由撰写的社论《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这是同盟会成立后阐明民生主义学说的第一篇文字。文中，冯自由对土地私有和土地国有两种不同的所有制进行了对比，鼓吹土地国有的好处：（1）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居奇，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2）土地家屋的价格，由政府调整，以保其平准，使大多数人得脱地主专制之牢笼，实救治贫富不均之良法。（3）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政体，其矿山、森林、道路大都官有，故举行土地国有的政策，实较其他国家为易。

土地国有之后如何赋课租税，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技术性问题。冯自由经过研究各种税法之利弊认为：“其最适合于吾国政治社会之状态者，盖莫如单税论之切实易行矣”。因为单税法有四大好处：（1）调和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弊害。税率确定后，可免贫民于地价腾涨之困厄。即使腾涨，也是损失与利益由国民共担，不会产生贫富不均。（2）维持财产之增殖力。对工商业征税过多会减少生产力，对社会进化之前途不利，如果土地国有，而单向之课税，则其生产力，国家将有以维持之，其增殖的利益为一般社会共享，不会因害怕产生贫富悬殊而压抑财产增殖力。（3）课税简单易行。税种单一，课税自然简单易行。（4）收入确实。列国对于各事业之课税，以征集纷扰，咸有不确定之弊，若实行单税法，税率又已确定，则其收入将较为确定，于国家之预算十分利便。<sup>①</sup>

冯自由的文章把平均地权的理论来源、精神核心、原理原则、操作方法都讲得较为透彻，是当时宣传民生主义的权威性论著。

1906年冬，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对三民主义又作了一番说明，其中特别对民生主义解说甚详。他说到民生主义是一种科学学说，具有理论基础，说到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在欧美已经积重难返，社会革命不可避免；说到中国人的眼光要看得远一些，要防患于未然；说到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说到解决土地问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最后，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与革命目标联系起来，突出了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宗旨。他说：“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

<sup>①</sup>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3页。

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sup>①</sup>

另外，胡汉民在《民报》发表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和《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一系列文章中也对民生主义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胡汉民认为：“近世文明国家所病者，非政治的阶级，而经济的阶级也。于是而发生社会主义。其学说虽繁，而皆以平经济的阶级为主。”指出民生主义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他认为，土地国有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土地国有的目的和后果是消灭了地主阶级。因为，土地国有“使人民不得有土地所有权，惟得有其他权（如地土权、永小作权、地役权等），且是诸权必得国家许可，无私佣，亦无永贷。如是，则地主强权，将绝迹于支那大陆”。国家成为地主以后，由国家决定地租的高低，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国家之课于地土上者，必经国会之承认，亦必无私有营利之弊，以重征以病农。”土地的收入为国民所共享，保证了经济上的平等，“吾国已为民权立宪政体之故，则地利所入虽丰，仍以为民政种种设施之用，其为益愈大”，“而民权立宪国家之富，尤共产也。夫均地之政，至平等耳！”

民生主义的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它的土地方案将会消除地主对土地的垄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节制资本也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在各自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民生主义中蕴涵的对人民大众利益的关心也将有益于社会矛盾的调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三民主义可以说是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最自觉、最进步的中国近代化方案。

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岭南革命派最早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水平。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革命团体能提出更为完整和更有远见的思想。如华兴会提出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科学补习所提出的口号是“革命排满”，光复会提出的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等等，都没有能把革命后如何建设一个源于欧美、优于欧美的新型国家制度的问题仔细地加以考虑，更没有提出可行的办法。可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岭南革命派由于对西方的了解更多一点，也看得更远一点。对世界潮流的了解和关注，是他们比其他区域的革命思想家高明的原因。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 清末实业救国思潮兴起之原因

实业救国思潮，过去曾为学术界所贬责，认为它救不了国，阻碍了反清民主革命的兴起，是一服有利于维持清朝统治的麻醉剂。近年来，此说已有改变。承认其为中国近代一个进步的社会思潮，恐怕已无疑问。不过，对于此思潮发生、形成的时间及其最初的表现，似未有进一步的研究，甚至有论者认为在清末并无所谓“实业救国思潮”的存在。

对此，笔者提出如下看法：实业救国思潮萌芽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它随着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加深而产生与扩大，又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爱国的和革命的运动高涨而深入与发展。庚子事变前，是实业救国思想的产生期；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10年间，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社会思潮，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思潮开始高涨，并成为推进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进步思潮之一。

这里意在探讨这个思潮产生的主要原因。

### 一、对西方富强之路的认识

实业救国的思想大约在1895~1900年间产生，但它的酝酿却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阶段。因为它是在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后，中国人对西方认识逐步深化的成果。

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一批早期的维新人士，努力探求中国之所以落后、西方之所以先进的原因时，开始陆续地、或多或少地提到了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性。

王韬1874~1884年在香港主办《循环日报》，鼓吹变法自强时，以他当时对西方的认识水平，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家强盛的重要作用。他以英国为例说：“英之立国，以商为本。”<sup>①</sup>英国商人主要从事对外贸易，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而纳税于本国，因而导致国富兵强。王韬认为富是强的基础，应“先富而后强”。而求富则必须“兴利”，在“兴利”方面，他又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矿业

<sup>①</sup>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四《英重通商》，清光绪23年（1897年）长洲王氏上海重排铅印本。

与交通运输业。他说，兴利之法有开矿、炼铁、辟煤、开五金、用机器织布、修铁路和造轮船等。他认为中国应大兴工商之利，以华商分西商之利，然后开辟海外贸易，打开国际市场，与列强争胜。

出身于买办的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和改革家郑观应“与异国人接触”较多，又特别留心观察西方国家的情况，愤中国之积弱不振，求可以攘外安内之计，于1880年前后写成《易言》一书，书中论及中国富强之道，认为：“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故公法约章宜修也，不修则彼合而我孤，兵制阵法宜练也，不练则彼强而我弱；枪炮器械宜精也，不精则彼利而我钝；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不兴则彼速而我迟；天球、地舆、格致、测算等学宜通也，不通则彼巧而我拙；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不举则彼富而我贫。”<sup>①</sup>明确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

薛福成在1889年奉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他在考察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以后，在日记中推寻欧洲各国强盛的原因时说：“欧美两洲各国勃然兴起之机，在学问日新，工商日旺，而其绝大关键，皆在近百年中，至其所以横绝地球而莫与抗者，不过恃火轮船车及电线诸务，实皆创行于六七十年之内；其他概可知矣。”<sup>②</sup>他由此而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大讲西学与大兴工商业。

承认西方比中国进步已经不容易，能认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则更不容易。这些进步的思想家们既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练兵制器、轮船火车、科学技术等方面比中国先进，又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其富强的主要原因，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在寻找什么是富强的根本时，开头并不是很明确的。

由于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表现出来，外国商品大量地涌进中国市场，冲击着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因此19世纪70~90年代初期维新派的著作中，不少人提出了“商”是立国之本的看法。

曾作为洋务人员被派往欧洲学习过一段时间的马建忠的看法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在1890写的《富民说》中谈到：“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进口货溢出口者不利；然则天下之大计知矣，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sup>③</sup>薛福成也认为：“欧

① 郑观应：《论公法》，夏东元著：《郑观应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②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③ 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纪言纪行》，中华书局1960年版。



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而尤推英国为巨擘。”<sup>①</sup>

应该说，这些重商主义的倾向是值得肯定的。首先，他们提出“以商立国”，对传统的“以农为本”思想具有极大的冲击力量和进步意义。其次，他们在大谈“以商为立国之本”的时候，并没有忽视工业和农业，他们所讲的“商”，往往也包含了商品的生产，即发展工农业的内容。

但也应该指出，他们对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还没有认识到工业近代化是西方国家富强的基础。对近代大工业和国际商业之间的辩证关系，未曾厘清。过分强调流通对生产的指导作用，并且不适当地把这种作用夸大为决定性的作用。

19世纪末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对华输出资本，人们的认识也走向深化，流通带动生产，生产决定流通的辩证关系开始出现在不少人的议论中。“以商立国”的主张逐渐被“以工立国”所取代。

最早提出“工是立国之本”的人，是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他在1877年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已经提出：“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习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sup>②</sup>当时还只是封建洋务大员幕僚的张謇，在1886年时也开始觉悟到：“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士大夫先之。”<sup>③</sup>薛福成也越来越多地谈到发展工业对商业的重要性，他在1892年出版的《出使日记续刻》中说：“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

这个道理，更随着邻邦日本的强大，而日渐为国人所注意。日本学习西方，在国策上与中国有所不同，正如上文郭嵩焘所讲，学军事的人少，学工业的人多。薛福成也说：“西人论日本近数年来，造器日精，出货日多，种植制造蒸蒸日上……此则已胜于中国矣。”<sup>④</sup>这种看法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而变得更为明朗。一个蕞尔小国打败了泱泱大国，更多的人认识到日本学习西方的路子对头，值得效法。

1895年，“以工立国”的说法流行起来。康有为在《请励工艺奖创新折》中，提出了把中国“定为工国”的主张。他说：“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僨乎？皇上诚讲万国之大势，审古今之时变，知非讲明国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不能为国，则所以导民为治，自有在矣。”<sup>⑤</sup>梁启超在《变

①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② 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0页。

③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卷下，民国14年（1925年）排印本，第54页。

④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⑤ 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27页。

法通议》中，也提出了“以工立国”的口号。<sup>①</sup>但是，把这个问题讲得最为明确的是张謇，他在1895年写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对“立国之本在于商”的说法提出了鲜明的不同意见，甚至批评为“皮毛之论”。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如日本，尤重工政，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sup>②</sup>

至此，发展近代工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的思想产生了。这是中国近代探索西方富强之路的新进展，也是学西方思想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应该指出的是，“实业救国”思想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与维新改革思想处于对立的地位，是为了反对在政治上进行改革而提出来的。不过，实业救国论者认为当时政治改革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主张先从振兴实业入手，以实业为救国之急务。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比较缓进保守的地位。

## 二、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感是“实业救国”思想产生的催化剂。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筑路、开矿权利，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马关条约》给予外国在华投资设厂权，中国的民族工业面临被窒息的威胁，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面临着破产和失业的苦难。中国利源外流，民穷财尽，生计日蹙，危急甚矣！

民族危机的加深，激起了更多有志之士奋起投入爱国救亡运动。1895年，维新人士发动的以“公车上书”为标志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同时兴起，表现了中国的救亡运动进入了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强国样板的新阶段。“实业救国”便是顺应当时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以及力图阻止中国沦为外国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一种救国思想和方案。

1895年，郑观应重新修订刊行《盛世危言》，着重加强对“商战”的论述。把他的“富强救国”的思想更加丰富、明确、深刻和强烈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他说：“夫亚洲各国，贫弱者无论矣，最大者首推中国，次则日本。……日本初亦受其腴削……国势已形岌岌。厥后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窥见利病之故，乃下令国中，大为振作，讲求商务，臣民交奋，学西洋之制造，以抵御来源；仿中国之士

<sup>①</sup>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页。

<sup>②</sup> 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中华书局民国20年（1931年）聚珍仿宋刊本。

货，以畅销各国；表里图利而国势日兴，纸钞悉数收回，府库金银充溢，此日本近日通商之实效也。”<sup>①</sup>《盛世危言》在此时重刊，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在朝廷重臣孙家鼐等人的推荐下，清廷命刊印2 000部散发朝臣阅读，而坊间书贾为适应社会需要，更是不断地翻印，以致后来发现此书的版本多达20种以上，可见其影响之大。

郑观应在此书中说：“中日战后，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故未言者再尽言之”。它比1894年版的《盛世危言》新增正文47篇，附录未尽之词及中外通人救时之文100多篇，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商战、商务、商船等。<sup>②</sup>他的“商战重于兵战”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在清廷中曾任军机处章京等职务的陈炽，在甲午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振，积极提倡变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一道组织“强学会”。1896年，他写了《续富国策》一书，自称此书“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提出只有生产才是“富国之源”，主张大力发展经济，并要参照西方的制度和做法举行。这部著作分《农书》、《矿书》、《工书》和《商书》四卷，全面论述了发展各种经济事业的具体项目和措施，他所宣传的发展农工商矿等近代生产事业以救亡图强的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实业救国”思想的最初表述，虽然还没有概括出“实业”这一个名词来。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他悲愤异常，时常“高歌痛哭”，于1900年含恨而逝。

“实业救国”的另一倡导者是江苏南通的张謇。他也是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而鼓吹“设厂自救”的。张謇从小受封建教育，1894年高中状元，本来他想走中国传统的由状元到宰相的道路。但是，时代变了，清政府官场黑暗，言路堵塞，勾心斗角，他的仕途并不光明。就在这时，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的思考之中。他深知中国中世纪的陈旧武器抵挡不了资本主义的坚甲利兵，“今日之敌，迥非昔比”，那么，什么才是救国良方呢？

日本是一个小国，自从明治维新以后，不过30多年，就能够打败中国，张謇认为这是日本实行变法，大办西学、大兴工业的缘故。所以，他主张“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今外洋各国与我交涉日

<sup>①</sup>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5页。

<sup>②</sup> 夏东元著：《郑观应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深，机局日迫，我持此因循之习，固陋之才，浮游之技艺，断不足以御之。”<sup>①</sup> 1895年，张謇丁父忧在家。是时，清政府迫于形势和舆论，不得不表示提挈工商，谕令各省招商设厂。洋务首领、两江总督张之洞指示张謇在南通办厂，张謇“自审寒士，初未敢应”，后来转念一想，要救国就要办教育，办教育需要资金，不办工厂怎能积蓄教育经费呢？反复考虑了几天，终于答应了。从此弃官从商，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在实业与教育之间，张謇其实更重视教育，他说：“中日马关约成，国势日蹙，私忧窃叹，以为政府不足惜，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然非先兴实业，则教育无所资以措手。”他为了筹集办教育的经费，不得不从“士大夫所不齿”的实业开始，并为此付出了更多的精力，最后使得“实业教育并进迭用”。

张謇在1925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謇……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自计既决，遂无反顾。”<sup>②</sup>

从张謇的例子，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培育出的士绅在“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指导下，为了救国可以改变自己一生的道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任何一种救国的思想和方案，都是直接产生于国家民族危急之际，这是不言而喻的。

### 三、权衡形势后的选择

“实业救国”思想是一部分人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中国的改革步骤有自认为是正确的主张，从而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实业救国”论者虽然不排除其他温和的救国方式（在前期它与反清的革命方式相抵触），但把发展实业放在首要地位，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富强的基础，这是“实业救国”思想区别于其他救国方案的主要特征。可以说，“实业救国”思想是其倡导者们基于自己对形势的认识所做出的选择。

<sup>①</sup>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中华书局民国20年（1931年）聚珍仿宋刊本。

<sup>②</sup> 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八，中华书局民国20年（1931年）聚珍仿宋刊本。



郑观应是最早明确提出在中国设议政制度的人，也是在甲午战争前夕要求设立议院实行立宪制最激烈的一个人。但是，当改良主义从一种思潮变为政治行动的时候，他却认为太急躁了。他认为光靠一个皇帝，而没有支持皇帝的大批中层力量是不能成功的。他说：“康、梁办事毫无条理，不知度德量力，将来必有风波。”<sup>①</sup> 郑观应对戊戌维新取消消极态度，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政治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而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洋商洋厂，夺回利权，不失为切实可行之策。

张謇与帝党官僚翁同龢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在帝党支持康、梁进行变法时，他也列名“强学会”，对维新变法给予一定的赞助。但因嫌康有为的变法要求太急太高，认为“不大平正”、“不很审慎”<sup>②</sup>，又看到保守派力量大大超过维新派，料定变法之举必不能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就没有积极参与变法，而是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兴办实业，为变法积蓄经济力量和开通绅民知识，期望逐步为中国的富强打下一些基础。

由于他们对中国当时国情的估计与戊戌维新派有差别，对清廷中枢的了解比康、梁更多一点，导致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也更现实一点，这样便产生了对救亡的方略与步骤的不同意见，形成了与戊戌思潮的侧重点稍有不同的“实业救国”思潮。

尽管他们的主张不如康、梁激进，他们的实业活动也不如康、梁所发动的戊戌变法那样轰轰烈烈，但是，他们那种扎扎实实的工作也是值得赞许的。

#### 四、从部分人的思想发展为社会思潮的契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又经历了两次震撼人心的事变——戊戌政变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两次事变使中国社会受到极大的震动，遂使“实业救国”思想渐为世人所注意，从而发展成为一股社会思潮。

在维新思潮盛极一时的19世纪末年，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不大，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使政局发生了变化，政治上的改革暂时落入低潮，从实际出发的人们只能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进行革新。这样，随着戊戌思潮的退落，便有另一思潮进来补充，国内政治形势的收紧促成了实业救国思潮走向高涨。

八国联军侵华，与清政府订立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中国民生，犹如雪上加霜，举国上下，蹙蹙然患贫。为了救贫，宽筹生路，必须广兴工业，于是全国人民的眼睛都不约而同地转移到发展生产、振兴实业上来。发展实业不单是救祖国于强邻之手，更是救国家于乱民之手，有文章指出：“今日忧时诸君

<sup>①</sup>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24年（1898年）9月。

<sup>②</sup>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传记》，中华书局民国19年（1930年）版，第64页。

子，莫不奔走相告曰：外患凭陵，危亡在即，非速开国会，无以挽救。此固异口同声之辞也。然余戚戚思虑，独以为我国将来之大祸，不在外患而在内乱……推将来内乱之所由生，不在盗贼党会，而在贫民……是故欲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必于农工两业加以提倡而维持之，以冀富裕下等人之生计。”<sup>①</sup> 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又有了一个新的推动力。

20 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侵华手段。这种侵略手段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而加剧。20 世纪的头 10 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各种条约、合同等共 200 多个，把铁路、工厂、矿山、银行的开办权拱手相送。为了讨好洋人，1901 年年初，朝廷尚在西安，便急忙下诏变法，举办新政。一方面，中国面临更深刻的民族危机，如果外资企业遍地，举国便将成为洋人的奴隶；另一方面，新政颁布了有利于农、工、矿业发展的条款，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同时开了方便之门。这样，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便获得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从 1901 ~ 1910 年 10 年间，是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上自中央，下至地方，乃至海外华侨，都受到这股思潮的熏染。

梁启超在 1910 年对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作了如下的描述：“全国人心营目注器器然言振兴实业者，亦既有年矣。上之则政府设立农工商部，设立劝业道，纷纷派员奔走各国考察实业，目不暇给，乃至悬重爵崇衔以奖励创办实业之人，即所派游学及学生试验亦无不特重实业，其所以鼓舞而助长之者，可谓至极。下之则举办劝业会、共进会，各城镇乃至海外侨民悉立商会，各报馆亦极力鼓吹，而以抵制洋货挽回利权之目的创立公司者所在多有，其呈部注册者亦不下千家。”<sup>②</sup> 另一论者则说，实业救国主张“久为智者所扼腕称道，其憬然流布于人心者亦既有年，稍明时局之人固已共晓……”<sup>③</sup>

这股思潮的中坚人物大多是思想开明、敏锐、务实的知识分子和从事工商业的人士。主要有郑观应、张謇、汤寿潜、吴桐林、汪康年、曾铸、江修义、陈震福、陈颐寿等。而《东方杂志》、《商务报》、《华商联合报》、《华商联合会报》、《中外日报》、《时报》等为其重要喉舌，甚至一些革命派刊物，如《晋乘》、《河南》、《滇话》等，也都有文章呼吁发展实业以救国。<sup>④</sup> 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在辛亥革命前

① 张肇熊：《各处宜亟兴工厂以救民穷议》，载《东方杂志》第 7 年第 10 期。

② 沧江（梁启超）：《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载《国风报》第 1 年第 27 期。

③ 胜因：《实业救国悬谈》，载《东方杂志》第 7 年第 6 期。

④ 吴雁南等主编：《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44 页。



10年间，“实业救国”确实成为了一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思潮。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1905~1908年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第二次投资热潮，这是自从1895~1898年的第一次投资热潮后的再度高涨。这时，民族企业已从沿海推及内地，散布于25个省区。据统计，1901~1911年全国兴办民族企业达585家，是此前30年总数的两倍多。

20世纪初期，“实业”一词开始流行，张謇对“实业”的概念进行过这样的解释：“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sup>①</sup>用“振兴实业”代替过去的“振兴商务”的提法，无疑是更为科学和全面的。

总的来说，实业救国思潮的产生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收获，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近代国情发展的必然结果。

清末民初的实业救国思潮，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的、保守的生产关系，主张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经营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的生产力和经营方式，用开放主义代替闭关自守，用振兴工商的政策代替重农抑商政策，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大造舆论，大开绿灯，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层的人民热心参与实业活动，使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实业热”，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实业救国论者鼓吹中国要在世界经济战争中自强保种，竞胜争雄，掀起了“保护国货，挽回利权”的运动，极大地调动起人民的爱国心、合群心，促进了国产品的创新和改良，有力地保护和促进了民族工业。实业救国思潮中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工业化体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 辛亥革命与实业救国思潮的高涨

萌芽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实业救国思潮，是中国近代进步的社会思潮之一。从这一思潮的发展过程来看，庚子事变是一条分界线，辛亥革命也是一条分界线。甲午战争后，“实业救国论”作为一种思想主张，首先在一部分希望依靠清政府救亡图存的改良派人物中流行，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先觉者的群体意识，此为实业救国思潮的产生期。庚子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使鼓吹和献身实业的人迅速

<sup>①</sup> 《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张季子九录·文录》卷二，中华书局民国20年（1931年）聚珍仿宋刊本。

增加，实业救国成为一股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社会思潮，此为发展期。辛亥革命后，在政治革命已经完成的观念支配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大批加入实业救国的队伍，与立宪派一道鼓吹产业革命，从而使实业救国思潮广为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此为高潮期。

笔者意在探讨辛亥革命如何促成实业救国思潮的高涨，以及这个思潮在辛亥革命后有什么新的发展。

## 一、革命胜利带来实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倒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主要的政治障碍——清王朝，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国实业的发展也因此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良环境，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令，意在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封建性桎梏，为工商业的振兴创造条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不用说，鼓励提倡实业不遗余力，就是袁世凯上台后，也对实业的发展做出种种支持、扶助的姿态。他也需要利用实业的发展来增加税收，解决财政困难，不完全是作假。

1912年3月通过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得到了保护。政府提高华侨的地位，并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为此，财政部拟订了海外汇业银行则例。政府宣布对于劳苦农民要严加保护，“其有耕种之具不给者，公田由地方公款、私田由各田主设法资助”。其救济费用，“秋成后，计数取偿”<sup>①</sup>。1914年，农商部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规定：“国有荒地，除政府认为有特别使用目的外，均准人民按照本例承垦。”<sup>②</sup>给予承垦人种种便利和权益。同年，农商部还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公司条例》，规定公司受法律保护，“凡公司均为法人”<sup>③</sup>，国家对民营企业实行保息扶持，拨出公债券2000万元作为公司股本的保息金，鼓励社会资金流向实业。后又颁布《商人通例》、《公司注册条例》，保护商人权利，放宽公司注册条件，降低注册费，为民间兴办实业大开方便之门。这些法令条例，调动了人们振兴实业的积极性。

另外，南京临时政府和随后的北洋政府在民国初年相继发表了以发展实业为首务的施政纲领，并举行实业研讨会，发动社会关注实业问题。1912年4月，第一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425页。

③ 见《政府公报》1914年1月14日。



届国务总理唐绍仪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强调实业的重要性。他说：“从前社会趋势，专讲究文字而不研究实业，致以地大物博之中国几变为世界最穷之国家，以致非借外债即不能办兴利之事务，新政府成立后即分设农林、工商二部，其宗旨即在振兴实业。交通一部关系尤重，路权航权等均须切实办理……嗣后国家之发达全在于此。”<sup>①</sup>同年9月，工商部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工商业家代表会议，工商总长刘揆一在会上宣布了政府政策，发动与会代表为发展国民经济出谋献策。到会的100多位代表十分兴奋，发言踊跃，提出议案80多条。

中央各有关部门也都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职权范围制定了相应的鼓励实业的细则和条规。如财政部拟定了《商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开办银行，收集资金；又筹建中华惠工银行、庶民银行、劝业银行等，作为筹集资本的机关。工商部为鼓励发明与改良工艺品，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凡发明或改良制造品，可向工商部申请奖励，核实后，或于营业上给予5年以内的专利，或于名誉上给予褒奖。对于保障营业自由、提供贷款、奖励创业成就等都制定出了具体的政策和办法。

中央如此积极，各省政府也不甘落后。除了贯彻中央的政策方针外，还努力扶持、发展本省民族工业。如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政府有的宣布废除厘金，有的减免过境税，有的改厘为捐使税率有所下降。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湖南省政府从财政开支中拨出“实业行政费”、“工商费”，帮助一些欠债的公司摆脱困境。广东省政府募集“劝业有奖公债”，帮助民间集资办厂。各省政府还以爱国主义为号召，纷纷发出通告，力劝人民抵制外货，劝工厂使用本国原料，改良工艺，与外货争夺市场。

此外，中央和各级政府还支持创办实业报刊，建立实业团体，开设实业教育机构及劝业场、劝商场、国货商品陈列所等。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确实为振兴实业创造了一个优良的社会环境。

虽然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黄金时代”是短暂的，但它却是实业救国思潮在民初10年勃然高涨的最大社会原因。

## 二、革命派推动了实业救国思潮的高涨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立宪派，因在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互相对抗。革命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实业

<sup>①</sup> 见《申报》1912年4月2日。

救国成了两派的共识。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前对发展实业不甚热心，是因为他们认为清廷不推翻，一切无从谈起，现在则感到政治革命的目标已达，工业革命的时期马上就要开始，发展经济、建设新国家是当务之急。革命领袖孙中山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赶回国内，在归途中便有这样的计划：“此后社会以工商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sup>①</sup> 回国后，更以极大的热情号召国民广办实业。他说：“以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sup>②</sup> 他主持的临时政府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便发布实业法令50款，实业部办理各类实业事项40多起。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更加专心于实业建设。他在上海、武汉、福州、广州、北京等地视察，所到之处都热情地宣讲实业救国的道理，解释民生主义的涵义。1912年4月17日，他在上海实业界欢迎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sup>③</sup> 黄兴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sup>④</sup> 1912年8月，孙中山、黄兴与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对于发展实业取得一致意见。孙中山、黄兴在会谈后分别担任了全国铁路总裁和汉粤川铁路督办。有了这些领袖人物的倡导主持，一时之间，实业救国的热潮在全国涌起。

革命派报刊在此时期也纷纷著文鼓吹发展实业。《民国报》认为，革命已获成功，“政治上之问题告终，经济上之问题伊始”。并断言20世纪是世界各国经济竞争时代，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终将避免不了成为“隶属国”的命运。<sup>⑤</sup> 《民国汇报》发出号召：“今后政体既革，吾国第一流雄骏才智之士，发扬蹈厉于此东亚祖国者，其投身实业者欤？”<sup>⑥</sup> 于是孙武等革命党人纷纷以其私产投资兴办实业。孙武以1万元入股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并任董事；又以4000两白银入股汉口大旅店，成为拥有1/2股权的大股东。陈其美与伍廷芳、于右任、宋教仁等共同发起蒙藏交通公司，还担任兴中实业总公司的名誉总理。谭人凤任汉粤川铁路督办，胡汉民帮助筹办南华邮船公司，陈炯明参与发起惠潮铁路有限公司，阎锡山赞助全晋保商总会。<sup>⑦</sup>

本来倾注全力于政治斗争的人们，现在大都把他们的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7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8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9页。

④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2页。

⑤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页。

⑥ 《民国汇报》第一卷，第862页。

⑦ 胡绳武、程为坤：《民国初年的振兴实业热潮》，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来，把振兴实业作为辛亥革命后救国的根本之策。这使清末以来的实业救国思潮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增加了新的力量，出现了辛亥前无法比拟的新局面。

### 三、辛亥革命并未消除民族的危机感

实业救国思潮的急剧高涨，也与民族危机的加深密切相关。辛亥革命推倒了压在民族工业头上的一座大山——清朝封建势力，但另一座大山——外资势力却未伤一根毫毛。新政府反而因为希望借助外力巩固政权而对它们妥协，给予外国资本更多进入中国的便利。新政府除了继续承认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外债赔款外，还借了更多的外债。除承认帝国主义国家和个人在中国所夺取到的一切特权和利益外，还发布命令：“妥飭兵差认真防范，保护外人生命财产。”<sup>①</sup>因此，民国初年，外国在华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中国丧权比晚清为甚。这样，中国经济界对于民族工业的危机感便大大增加。为抗衡外国势力，呼吁振兴民族工业的声浪更高了。

袁世凯上台后，从1912~1916年，共举借外债近5亿元。除海关关税收入外，把中国的盐务收入也拱手送与外人。为了逃避国人谴责，袁世凯后期尽量不用政治名义而用经济名义借款，以铁路修筑权作为担保，导致帝国主义再次在中国掀起掠夺铁路权益的高潮。从1911~1914年，帝国主义在中国获取到修筑权的铁路长达1.8万公里<sup>②</sup>，大大超过了列强在19世纪末年掀起第一次瓜分中国狂潮中所取得的铁路长度。

此外，中国的大型煤矿、铁矿也相继落入外人之手。1912年出卖了滦州煤矿给英人；1913年汉冶萍公司被日本人控制；比利时、俄罗斯也分别以合营方式控制了河北省宛平的裕懋公司和吉林东宁的绥芬金矿公司。在1912~1914年间，外国公司控制的煤矿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年产百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全部为外国公司所掌握。<sup>③</sup>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投资迅速增长，1914年占其对华投资总额的67.3%，绝对额是1903年的1倍，直接投资于中国的机械、造船、纺织、食品等工业。在棉纺织工业中，从1912~1914年间，外资纺织企业的纱锭数由23.9万枚增加到46.5万枚，增加近1倍。而同期的华资厂纱锭，仅增长9%。<sup>④</sup>外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页。

②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③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3~125页。

④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势力的增长及其对华资企业的排挤、倾轧，使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

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得一些有识之士一再提醒人们：“今日中国之工商，实已为外国经济势力所压倒，无论何种职业，皆失其自存之力。非大为革新，以谋抵御此潮流，则全国人民，舍为外人苦力之外无他事可图也。”<sup>①</sup>经济独立、实业救国成为辛亥革命后国人追求的一个必然的目标。

#### 四、辛亥后实业救国思潮的新发展

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思潮无论在思想内容、理论深度、政策措施，还是模式设计上，都比前清时期前进了一大步。前清实业救国思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对发展实业重要性的论证，认为“救国的根本在于实业”；其次是提出兴办实业的各种具体主张。总的来说是一种初步的、浅层的思想。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思潮有了如下一些发展。

##### （一）增加了很多新鲜内容，整个思潮显得丰满和活跃

除了继续论证实业发展在新时期的重大作用之外，对于经济立法、理财方针、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关系、保护工商业政策、对外开放政策等重大原则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特别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设想，使实业救国思潮登上了一个高峰。

1. 经济立法思想。建立一个法治的国家，是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致力一个目标。在制定宪法的同时，经济法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1912年11月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上，资产阶级代表向北洋政府提出重新厘定各种经济法的要求，他们认为，没有完备的经济法，“则工商必日就衰微，永无振兴之一日”。当上农商部长的实业家张謇，批评前清对“农商行政，向无法规为之依据”，或“虽有法而不完不备”<sup>②</sup>，致使封建势力任意对工商业进行摧残。他认为发展实业的第一条措施，便是“乞灵于法律”。他说：“法律作用，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20年来，所见诸企业者之失败，盖不可以卒数，推原其故，则由创立之始，以至于业务进行，在在皆伏有致败之衅，则无法律之导之

<sup>①</sup> 梁启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页。

<sup>②</sup> 张謇：《实业政见宣言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中华书局民国20年（1931年）聚珍仿宋刊本。

故也。”<sup>①</sup>他在农商部长任内制定了《公司法》、《商人通例》、《公司保息条例》等20多种农林工商法案，鼓舞了更多的人投资于实业，保护了工商业者的利益，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2. 理财救亡论。一国的财政状况与实业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正所谓“振兴实业，首重金融”。但民初的财政极为凋蔽，对于实业的发展很不利，所以民初理财思想甚为丰富。孙中山在1911~1923年间，为了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在理财方面提出了一些应急措施。开始是举借外债，提出借外债的三条原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但由于四国银行团的封锁借不到外债，孙中山便把眼光转向国内，提出举办国民捐和不兑换纸币作为权宜之计。1912年年底，还提出了一个币制改革方案——钱币革命论。梁启超因任职时间较长，先后出任过司法总长、财政委员会委员、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职，比较注意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提出了标本兼治的理财总纲。他说：“处今日之中国而言理财，非补苴罅漏所能有功，必须立一根本的大计划焉。其纲领旨趣，则在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租税政策冶力一炉。”<sup>②</sup>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中执掌交通、银行大权的梁士诒，提出了整顿税制、改革币制、发行国内公债、发展金融业等一系列理财方案。虽然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政局不稳，很多理财措施无法实行，财政也始终一片混乱，但这些理财思想还是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对后来中国财政逐步走上正轨提供了不少好的意见。

3. 发达国家资本论。民国初年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是由两个派别从不同的出发点提出的。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从防止贫富悬殊和避免阶级矛盾激化的愿望出发，主张中国实行大工业国有，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一面图国家之富强，一面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孙中山把资本区分为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认为对私人资本要加以一定的节制，而对国家资本则主张优先大力发展。另一派是以周学熙、梁士诒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家，他们在政府中身任要职，他们主张发达国家资本，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不过他们主张发达国家资本，对外亦具有抵制外资入侵的意图，对内则着眼于调和劳资矛盾和巩固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军阀大买办政权。

民国初期出现的“发达国家资本论”，是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在当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由于清政府的压制和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国的民

<sup>①</sup> 张謇：《实业政见宣言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中华书局民国20年（1931年）聚珍仿宋刊本。

<sup>②</sup> 梁启超：《治标财政政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

族资本并不发达，几乎都只是中小资本。铁路、矿山、电力等大型基础工业，以中小资本家之力，难以进行高速度的建设，如果由国家经营，比较容易发展起来，此其一。外国资本在中国势力雄厚，中国私人资本难与之竞争，发达国家资本，有利于建成独立的资本体系与外人抗衡，并收回利权，此其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已发展到高峰，并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西方国家都在纷纷调整资本制度，控制私人资本的过度膨胀，这使中国的经济界人士感到中国不应再走这条“西方文明的旧路”，此其三。中国一开始步入工业化就走一条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道路，这种想法是具有独创性和合理性的，只要政权问题获得完满解决，不失为一种快速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正确方针。

4. 保护主义与开放主义。保护主义有两个内容，一是保护国内市场，一是保护生产环境。要求政府制定保育政策，扶持幼稚企业的成长；要求减免税收，提高国货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梁启超在民国初年就提出政府要实行保育政策的6点理由。<sup>①</sup>张謇认为，要振兴实业，政府必须致力于奖助。他提出扶持实业的两种政策，一为奖励，二为补助。<sup>②</sup>

开放主义是辛亥革命后思想解放的产物。在民初林林总总的开放主义言论中，以孙中山的开放思想最为系统、深入和理论化。孙中山从理论上阐述了开放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批判清政府“荒岛孤人”的思想及排外惧外的政策，大胆地提出“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的主张。当时要实行开放主义，会遇到很多难题，比如怎样在引进外资时不失主权？怎样避免外人操纵把持企业？怎样筹还欠债？等等。对于这些具体问题，孙中山、张謇、梁启超等人都提出了各种原则和办法。

## （二）对经济理论的介绍、探讨与运用比前有所强化，并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选择取舍

梁启超在这一时期写的经济论著用通俗流畅的语言引用了不少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发表的关于发行公债、推行银行制度、美国准备金制度和不换纸币制度等议论中提到许多近代经济观点，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十分新鲜的。他的财政金融理论吸收西方各家各派而形成，比较庞杂，但他能对这些西方货币理论全面系统地进行比较研究，不是生吞活剥，

<sup>①</sup>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6页。

<sup>②</sup> 张謇：《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中华书局民国20年（1931年）聚珍仿宋刊本。



而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独到的解决中国币制问题的意见，显示了当时中国向西方学习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比辛亥革命前大进了一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辛亥革命后有了很大的发展，理论水平也大大提高了。1919年孙中山写成的《实业计划》是理论上有突破性发展的宏篇巨制。

据统计，西方经济学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传播，辛亥革命前，出版了十六七部译著，国人自编的只有几本。辛亥革命后，从1912~1919年间，出版了20多本经济学译著，其中国内学者自编的占2/3。辛亥革命前，报章杂志上刊载私人撰述的经济论文多出自西人之手，而辛亥革命后，这些撰述基本上为国人自撰。而其范畴，则都属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类型。<sup>①</sup>

辛亥革命后的实业救国思潮也表现出对北洋政府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以及一些脱离实际的倾向，但总的来说，这一思潮集中表明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们对实业发展所进行的宏观和微观的观察与思考，有力地影响着中国后来工业发展的方向、道路与模式。张謇的“棉铁主义”，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梁启超的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设想，都从宏观方面探讨和提出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路线、方针以及国民经济体系的构架、规模等问题；而梁士诒的理财思想精细入微，张謇的企业管理经验丰富，孙中山的开放主义设想周到，又从微观方面对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具体问题予以理论的指导和提出解决的办法。这些思想直至今天对我们来说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理财救亡论：孙中山、梁启超、梁士诒之主张

财政状况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盛衰，这在清末民初尤为明显。清季财政的破产，是清王朝崩溃的根本原因之一。民国成立后，政权是否巩固与财政是否好转更是紧密相连。已有不少学者指出，财政困难是逼使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直接原因，而袁世凯的倒台，又与当时两大国家银行空虚大有关系。由于民国初年财政问题极为严重，不少志士仁人喊出“理财救亡”的呼声，提出了种种理财方案。虽然，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财政始终是一片混乱，可以说几乎从未脱离恐慌的处境，但在这期间提出的理财思想，对后来中国财政逐步走上正轨贡献了不少好的意见，对今天的财政工作也仍有启示。

<sup>①</sup>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4页。

## 一、“理财救亡论”的提出

中国自从庚子事变后财政便深深地陷入了困境。清政府因签订《辛丑条约》，每年要偿付的外债本息达4 000万~7 000万两白银。另外，贸易入超额每年为6 000万~2亿两白银，两项合计，平均每年起码有2亿两白银流出中国。

国内的生产事业发展不起来。原有的官办工业和民间手工业，在外资企业的冲击之下，衰落日甚一日。加之人口增加，求业日艰。1910年，梁启超以极其悲痛的笔锋描写了这种触目惊心的事实：“中人之家，恒苦不赡，食力小民，丰岁犹且饥寒，一遇水旱偏灾，则饿殍塞途，转徙而之四方者，常数万计，其稍悍者，则迫而为盗贼……若夫通都大邑，十年前号称殷富之区，今则满目萧条，而商号之破产，日有所闻，金融紧迫，俛然不可终日之势。”<sup>①</sup> 正所谓“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清朝统治者把整个国家拖进了民穷财尽的苦难深渊，从而也宣告了自己的灭亡。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新政权面临严重的问题：除了难以偿清的赔款和外债之外，战争所造成的对生产的破坏，使各项税收难以完纳；帝国主义银行团扣留了关税和盐税的大部分，不交给革命政府；各省独立后，对前清额定应解中央之款及摊派的赔款指标，均不再上缴；而为了保卫新政权，又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致使军费支出激增。

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就清楚地认识到财政问题是新生革命政权能否存在的关键。他在致美国朋友咸马里的电报中说：“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sup>②</sup> 为了筹款他四处奔走，求助于外国资本集团，希望能带一笔巨额贷款回国支持革命。回国后，他把理财工作放在建设工作的首位，经常宣传：“我中华民国成立，今正当建设之始，财政为急。”<sup>③</sup> “今民国注重建设，其首要当在财政。”<sup>④</sup> 袁世凯得外国财力的支持而上台，对财政问题自然更为重视。他在北京就职时，亲临参议院开院礼，并致演说辞，其中提到：“百废待兴，要在财政……故先订整理财政大纲，增加财政信用。”<sup>⑤</sup> 特设财政委员会，筹划全国财政。制定章程10条，任周学熙为财政总长，梁启超、陈威、越椿年、徐恩元、刘炳炎和管象颐等为委

① 梁启超：《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4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1页。

④ 同上书，第369页。

⑤ 凤岡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17页。



员。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兼财政部次长梁士诒发表《告国人书》，指出：“民国存亡，以财政为最大关键，稍有常识者所知。若于此千钧一发之时，不求爬梳整理之法，外之则债权逼切，监督之祸，固等于瓜分；内之则公私困穷，破产之危，亦何止瓦解。”<sup>①</sup>理财救亡论被正式提出来了。

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以后，先后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财政委员会委员、币制局总裁，以及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等职，把主要精力放在治理国家财政工作上，为争取财政的好转而努力。他到处宣传世界经济大势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指出只有经济振兴，中国才能真正取得独立的地位，从而深化和提高了理财救亡论的内涵与意义。

民国初年的实业界亦十分关注财政问题，因为财政状况与实业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财政的好转需要实业的发展来支持，财政的整顿和改革又是实业发展的前提。实业界人士希望政府制定有利于实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

可见，在民国初年，财政问题引起了社会上下的高度重视，理财救亡论也成为民初社会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 二、孙中山的应急之计

各省独立之初，不论革命派或立宪派，都曾把举借外债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最为简捷有效的办法。上海实业界翘首期待孙中山从国外带回外资，孙中山也把希望寄托在外债上。他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并不急于回国，而是到处奔走，与各国财团洽商借款，并乐观地估计：“俟临时共和政府成立，则财政无忧不继，因有外债可借，不用抵押，但出四厘半息，已借不胜借。”<sup>②</sup>在筹划借款的具体条件时，他对胡汉民、廖仲恺说：“满清借债之弊，第一则丧失主权，第二浪用无度，第三必须抵押。”<sup>③</sup>为避免重蹈覆辙，他提出借外债的三个原则：“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sup>④</sup>他特地任命有借外债经验的陈锦涛为财政部长，办理对外借款。但现实与孙中山的想法相去甚远，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对他的借款要求置之不理，而日本则乘机提出以企业铁路作抵押的苛刻条件，遭国内实业界强烈反对而借款无成。

① 凤岡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页。

②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791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8页。

④ 同上书，第568页。

孙中山在四国银行团封锁而借不到外债的情况下，把眼光转向国内，曾提出举办国民捐与不兑换纸币作为权宜之计。

国民捐的捐纳办法是：“大要以资产计算，除不满五百元之动产不动产捐额多少听国民自便外，其余均以累进法行之”；“政、学、军、商各界及各工厂之职工等，除以资产计算捐纳外，应按其月俸多寡，分别捐十分之一二，以三个月为限。月不满十元者，捐纳多少听便”。<sup>①</sup> 这个运动主要是向富有者征收，一方面发扬人民的爱国精神；另一方面也带有义务和强制性性质。如果举国上下同心，发愤图强，共渡难关，并非不可以办到。但由于国内派系众多，意见分歧，加上袁世凯的破坏，这个运动流产了。

后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但在二次革命前，与袁世凯仍处于合作关系，所以对中央财政问题还很关注。1912年5月，袁世凯与六国银行团签订条件苛刻的垫款合同，孙中山反对以牺牲国权作交易，提出发行不兑换纸币以筹集资金。是年年底，沙俄乘乱策动蒙古独立，为筹集军费“抗强邻而保领土”，孙中山修改完善了自己推行纸币的设想，正式提出了币制改革方案——钱币革命论。

起初孙中山提出发行不兑换纸币时，这个建议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比如，梁启超发表的《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就较有代表性。他认为：“不换纸币者，借法律强制之力，而暂以纸代表货币也。凡言代表，则必须先有被代表之主体存焉。……必有货币之国，然后能行不换纸币，而无货币之国决不能行。”<sup>②</sup> 梁启超认为中国是无货币之国，因为当时中国货币十分混乱，大部分用生金生银，另外还有龙圆、小银元、铜元以及外国纸币、外国银元等，相互的比价没有一定标准，还随时涨落，没有一种能作为标准货币。所以他认为，要发行不换纸币，第一，要定好币制本位，立起一个系统，然后才能发行代表它的纸币。否则，添乱而已。第二，不换纸币因制作容易，如果当局不能严自约束，在财政困难时极易滥发，一旦滥发，大患无穷。第三，目前中国法律强制之力十分薄弱，能否强令人民以毫无价值之纸代替金银，还要打个问号。如果人民不乐于用，即无用也。中国银行监督吴鼎昌在致大总统和国务院的电文中说：“发行不兑换券需要三个条件：一、政府信用厚固；二、国家主权健全；三、本国金融机关完备。”<sup>③</sup> 国务总理唐绍仪则认为：“发行不换纸币，固属救急之法，然按之事实上有势不得行者二：一、国民对于政

①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3页。

② 梁启超：《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③ 见《政府公报》1912年6月4日。

府尚无信用；二、发行此项纸币必须强迫行使，国民不察，恐或群起反对。”<sup>①</sup>

反对者的意见，有不少是中肯和切合当时中国实际的，使孙中山也意识到自己的纸币方案有缺点和不够妥当的地方。1912年7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共商国事时，又与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商讨如何取信于民。梁士诒说：“币制为物价代表，饥不可食，夫人知之。惟中国数千年来币制之由重而轻，由粗而细，皆以硬币为本位，若一旦尽易以纸，终恐形格势禁，未易奉行，故必先筹其所以取信于民之方法。”<sup>②</sup>梁士诒认为要推行纸币，一是先要建立信用，国家要有准备库；二是要重视人民千年来形成的习惯，假以时日，不能太急。

在听取了各种意见的基础上，1912年12月，孙中山在《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通电》中，提出了货物保证制的纸币制度方案。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纸币制度思想。他的方案大体包括如下内容：

1. 发行制度。由国家统一发行纸币，不准金银在市面流通，使纸币成为惟一货币。国家用法律手段建立起纸币的信用。发行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用国家赋税为保证而发行的纸币；一类是以民间收来的金银、货物或产业为保证而发行的纸币。这样便能把货币的发行量控制在财政收入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严禁违额滥发。

2. 货物担保制度。为了纸币的信用，拟用货物作为担保，办法是由国家建立公仓工厂，以公仓储备货物和工厂产品作为发放纸币的担保。

3. 回收制度。设立销毁局，以税收形式收回的纸币和以出售货物收回的纸币是已经失去担保的死票，悉交销毁局毁之。

孙中山这个方案，对如何建立纸币的威信、如何使纸币成为市面上流通的惟一货币、如何防止滥发的流弊等问题都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但是，纸币制度要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实行，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商品、货币的分布、流通、调节问题十分复杂，国家掌握的商品的数量、品种能否满足市场的需要？商品价格起落如何控制？以货物、商品、工厂和产品为保证而发放的货币能否满足流通的需要？收回销毁纸币的工作是否妥当？孙中山对这些问题都来不及研究和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这使纸币制度缺乏实施的前提。同时，孙中山认为在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发达的情况下，通过发行纸币就可以不必再借外债，“财政立可活动”，“工业振兴，前途无量”，一举而解决财政困难和统一币制两大问题，只是幻想。而且，孙中山已经不掌握政权，虽有好的想法也无法付诸实施。

但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仍不失为一个独具特色和远见的币制改革设想，对于建

<sup>①</sup> 见《申报》1912年6月12日。

<sup>②</sup> 凤岡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24页。

立一个中国自己的现代货币体系具有启迪意义。

### 三、梁启超的“标本兼治”

梁启超在民国初年因出任司法总长、财政委员会委员、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职，对国家财政问题一直很关注。

梁启超的理财思想与孙中山有很大的不同。他另辟蹊径，提出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对策。他的“治本”，是以增加岁入为主要内容，“治标”则是“综核岁出”。他说，这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他反对在外债、国民捐、不换纸币等问题上大家争论不休，消磨日月。

关于“治标”，梁启超在民国元年（1912年）发表了《治标财政政策》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财政，确非岁入羸薄之为患，而实岁出浮滥之为患。从而把节省财政支出作为治标的主要精神。

他列举了当时政府公布的财政数字，逐条指出其中的浮滥、虚报和浪费贪污的严重现象。梁启超激烈地批评了冗官冗吏，说他们是一群高级无业游民。他说，前清由于绞尽全国的膏血以养这群高级无业游民，以致引起人民革命，命既革而此种现象不革，则革命何为？革去一群无业游民，而复由他群之无业游民照数以承其乏，则必酿第二次革命而已。故今日造新政府，其第一义在使署无滥缺，缺无滥员，员无滥俸。

梁启超提出以“核综名实”为解决之方。他认为，只要派出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实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一一评估出各项开支的数额，压缩不必要的支出，便可大大裁减经费。即使不增加岁入，也可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另外，还可参照日本、美国政府的行政设置和经费支出，来决定我国政府人员的数额和薪金。别人用10个人可以做的事，我们不要用10个以上的人；别人生活程度在我们之上，我们薪俸亦只能比别人少而不能比别人多。如果政府人员能出以公心，此事亦不难办到。

梁启超还从理论上提出了衡量政费支出是否适当的三个标准及财政上是否浪费的四条原则。他说：“财政学家论政费支出之当否，悬三种标准以为衡：一曰以国家职务最狭之范围为标准；二曰以各种职务必要及有益之程度为标准；三曰以办理此种职务所需最少之劳费为标准……财政上浪费与非浪费之区别，常立四原则以绳之：一曰有劳费无效果者则为浪费；二曰可以无须尔许劳费而能得到同样之效果或更良之效果者，则其额外所用皆为浪费；三曰将以求大效果之劳费而用以易小效果则为浪费；四曰当用此劳费时，预计可以得若干之效果，而后此乃反于其所期，或

绝无效果，或虽有而不逮预计远甚者，则其所用皆为浪费。”<sup>①</sup>

“治标”之策抓到了清末民初财政上的要害问题，具有革命的眼光。但此种“大手术”，在北洋政府时期，不可能施行。

梁启超不光着眼于解决目前危机，还强调要“治本”，因而提出了一个治理财政的总纲。他说：“处今日之中国而言理财，非补苴罅漏所能有功，必须立一根本之大计划焉。其纲领旨趣，则在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租税政策冶为一炉。”<sup>②</sup>

改正税则，增加岁入，是梁启超提出的治本之第一策。他认为，我国为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而岁入仅及三万万。从数字上看，人民平均负担甚轻，其轻程度，可为世界之最。但人民却感到负担太重，主要原因是税制不良之故。不良的税制既使国家收税不足，而人民又得不到轻税之利，所以应按学理建立起一个正当的租税系统。他认为，如切实整顿税制，3年内国库收入便会增加，加以有减缩政费支出的计划相辅助，财政便可好转，如年年收入递增，数年后，不必增设税目，不必增征税率，国库收入便会改善，财政基础可以大定。

整顿金融，改革币制，为治本之第二策。梁启超提出的办法是，扩充中国银行，巩固其兑换券之信用，用银行兑换券吸集现金，发行公债作为兑换保证准备，以兑换券易收滥钞，从而达到发达银行、统一币制、改良国库的目的。

梁启超认识到腐败的政治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巨大障碍，所以他又提出银行业务要独立于政府政治之外，市民要行使自己作为银行债主的权利，监督银行业务的正常运行。同时希望人民通过管理金融，逐步学会管理国家。他说：人民要管理国家，可先从管理金融开始，千万不要受几千年祖宗遗传的影响，以为越少管闲事，自己越舒服、越安全。今天的世界与往日不同，金融界一个乱子闹出来，任你万贯家财，立时完蛋，恶政治一个波浪没头没脸地打来，直打得你片瓦不存，葬身无地。生于今日之人若要不管政治，你就别想再活得成。他根据自己的金融知识，还提醒市民要注意监督五件事。人民对银行行使监督权，是梁启超政治民主思想在经济上的反映，也是他的理财思想历史进步性所在。

整顿官办企业，特别是铁路、邮政和电报等大宗收入的企业，为治本之第三策。梁启超认为，我国铁路进款不但因作弊多报销不实而减少，更重要的是开车太少、脚价太昂以及种种设备不完招待不周致使营业不能发达。只要大力加以整顿，可成为政府一项莫大的财源。

<sup>①</sup> 梁启超：《治标财政政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

<sup>②</sup> 同上。

梁启超的理财思想具有系统性和针对性，且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他用通俗流畅的语言引用了不少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并对这些理论加以消化，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自己独到的解决中国财政问题的意见。所以，他的理财思想在民国初期经济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 四、梁士诒的理财方略

民初的理财救亡论者中，还有一位代表人物不应忽略，这就是被誉为“理财能手”的梁士诒。梁士诒是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中枢人物，曾为促进南北和谈、清帝退位、袁世凯上台积极奔走，袁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授梁士诒为总统府秘书长，使之如左右手。民国初建，梁士诒极想有所作为，主张首先融和内部，团结人心，因此极力撮合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北京会谈，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后孙、袁破裂，梁为保存禄位，仍依附、效忠于袁世凯。他执掌交通、银行大权，对外借款，对内搜刮，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筹集经费。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逃亡香港。1918年才回到北京，又出任安福国会参议院院长。在政治立场上，梁士诒是不足道的，但在民族立场上他表现出一定的爱国思想和实际行动，他对于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表现出很大的关注，对振兴经济、发展实业做过不少的努力，他的经济思想、理财方略、实业政策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民初，梁士诒作为主管财政部的代理部长，经常与梁启超等人商讨财政问题，而两人的观点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梁士诒认为举借外债要受制于人，而且以外债充行政之需，尤为财政原则所大忌，故对外债不甚赞同，而极力主张以新税、内债和实业为弥缝财政入不敷出的办法。但由于政府在人民心目中向无坚固信用，又经近年政局更迭，内债募集为艰，改良税法在国体初定之日、积重难返之时，各省诸多制肘，新税新法根本无从实行。而银行实业，首需资本，一时更无从筹集。所以，他先提出治标之策四条：（1）励行节饷主义。裁遣各省余兵及不急之军事机关，军费不要超过预算。（2）励行减政主义。去不急之政务，并骈枝之衙署，以清其源，裁冗滥之官吏，节浮糜之俸给，以核其实。（3）增加新税。推广印花税、所得税和契税，增加烟酒税率，试办牙税。他把西方的最新学说引入中国，这就是英、德等国在19世纪下半期新设所得税的税制改革论，从而把租税的源泉从“生产事业”扩大到“一般的收入”，认为这样不但能使纳税负担符合普及、公平的原则，还可以收到增加巨额国库收入的功效。（4）整顿旧税。他说，我国各税，无一税无弊，即无一税不待整理，惟弊之最甚而极待整理者，莫如盐税。政府从盐税均税下手，以平全国人民之负担，而为将来改革之准备。另田赋、关税、厘金亦要

逐一研究，详求整顿之策。首先要力图恢复旧额，以固财政之基础。以上四策，(1)(2)两策为节流，(3)(4)两策为开源，这个税制改革主张，就其理论上说，有合理之处，实行起来，也会增加北洋政府的税收，但这样会大大加重人民的负担，在民力凋蔽之时，显然不合适。但为了救财政的“倒悬燃眉之急”，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1914年，欧战发生，外债难借，北洋政府决定举办内国公债，委任梁士诒为内国公债局总理。梁士诒为了办好这次公债，先对前清和民国元年(1912年)多次举办公债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认为第一是我国风气未开，民情扞格，人民不知公债之利；第二是政府信用未立；第三是经理不得法；第四是定额过高，还本时间过长，发行不易。为此他制定了相应的措施。首先，宣传公债的好处和意义，让大家明白公债是西方各国通行的一种成功的理财方法，能调剂全国金融，发达人民生活。他总结出公债有利于人民的好处五条，大造购买公债利国又利民的舆论。其次，在建立信用上下工夫。在历次内债信用破坏无余的情况下要建立起信用确实不易，梁士诒殚精竭虑，订下了各种规则。比如，推举有声望的人为公债局董事，以增加人民的信心；募集不假手于吏胥，而由各省财政机关代募，并严格规定只准劝募，不准勒派；针对人民对外国管理方式较为赞许的心理，采用中外合办方式，参用洋员；为力求征信之确据，指定确实基金为还本付息之保证；制定保息办法，筹足全年利息交存外国银行，不得挪作他用，等等。在管理上也订立了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最后，为推动发行，第一期制定相应的优惠措施。如定额不高，并缩短还本付息时间，第一期购买者还可获优惠条件、九四折扣等。在发售方法上推行包卖制，大部分公债由资本集团承包。由于主要用经济手段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去举办公债，因而民元、民四公债的发售都超过了定额，创造了我国内债史上的最好成绩。据当时人回忆，民三冬间在天安门搭棚公开举行爱国、军需两种公债抽签还本付息活动，结彩悬灯，佐以乐队，“旧都人士诧为未睹”。自是以后人民大众知道公债与捐税大异，而踊跃乐购，认为是一种商业投资行为，风气因之大开。此后20年凡国库缺乏时，例发公债，都是遵照梁士诒所订立的条规去办理。可见，梁士诒确实是开创了内债成功的先例。他把西方理财方式成功地引用到中国来，转移了人民的心理，使民间窖藏不出及浪用无度的货币吸引到生产流通领域中来，使人民逐渐习惯于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并活跃了中国近代金融业，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梁士诒的理财成就对实业发展的帮助是很有限的。他募集的大部分债款没能用于实业，而是用于维持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弥补其军政费用之不足。所以，梁的经济才能被他的政治立场所限，未能对国计民生有重大的裨益。

民初的理财家们虽然呕心沥血，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割据、混战连年不断，政局多变，财政改革无法进行，财政亦终无好转。1913年，岁入总额为3.339亿元，1919年只增加到4.395亿元，收入的增长甚少。岁出总额则从1914年的3.57亿元增长为1919年的4.958亿元，支出不仅无法缩减，甚至控制不住，始终是入不敷出。政府靠借债度日，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依赖日益加深，理财救国，终成画饼。

## 20世纪思想界之开篇：民族主义

### 一、民族主义的提出

在近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中，民族主义是最为重要的思潮之一。比较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在20世纪开始时才在中国兴起的。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为镇压义和团所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的刺激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侵略战争，它使中国人民感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1901年后，中国的杂志上触目可见的是对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局的沉痛陈述和对悍勇的民族精神的呼唤。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于日本横滨的革命刊物《开智录》在1901年刊登了两篇颇具震撼力的文章：《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20世纪世界之前途》、《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提出了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一个是20世纪是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是中国人应当如何进入新的时代。文章认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中国已成为20世纪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对帝国主义肆虐亚洲的景象作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描绘：“基督纪元20世纪开幕所演之大剧也：忽然乌天黑地，云黯风号，于是若碧眼，若血口，若长臂，若高足，种种离奇怪相舞蹈而来者，狰狞之恶鬼也；既而又山摇岳动，木拔海翻，于是或尖牙，或利爪，或斧头，或剑尾，色色凶残猛暴跳跃而出者，酷毒之猛兽也。凶凶然，逐逐然，扰攘欧洲以外之天地，非帝国主义之恶相乎？……此列强殖民之时也，此虽曾稍演于19世纪之末，而实为20世纪之先导也。”<sup>①</sup>那么，中国人民将如何对付即将到来的灾难和考验？文章认为，帝国主义是“膨胀主义”，是“扩

<sup>①</sup> 《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20世纪世界之前途》，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6页。

张版图主义”，是“侵略主义”，是“强盗主义”，对之，中国人惟有“奋发尚武之精神”，争自主，争独立：“然欲破其势，挫其锐，摧其锋，屈其气，败其威，非高摇自由自主之旗，大鼓国民独立不羁之气，必不能。”<sup>①</sup>因此，文章作者热情歌颂义和团的爱国反侵略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认为这是“中国之民气未尝泯然息没”的证明，期望“我国民精神可从此振刷”，一洗睡狮病兽之态，勃然而起，辟创一新世界。<sup>②</sup>

中国人自古以来便视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皇帝是天之骄子，君临天下，泱泱大国如海纳百川，对其他周边弱小国家有极强的文化融合力。由于长期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因而竞争意识不强，国家观念薄弱。国家观念薄弱则不能建立真正强大的国家。如何振刷民族精神？爱国志士们急急从西方国家的武器库中取来了民族主义这个利器。

1901年年底，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引德国大政治学者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将欧洲中世纪与近世国家思想的变迁，介绍到中国来。他认为，欧洲各国当18与19两世纪之交，是处在民族主义飞跃发展的时代，国家思想和民族主义运动勃兴，列国崛起，成今日之强势。他们所建立的新帝国，已不是过去时代以君主为主体的独夫帝国，而是以全国民为主体的民族帝国，这便是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所以欧洲列国强大之后，便向外扩张，从民族主义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他还指出，中国今日却处于民族主义尚未发达的时代，这自然不可能同欧洲各国相匹敌。每个国民都应该认清这个形势，急起直追，“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sup>③</sup>。1902年，梁启超再写《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分析20世纪中国所处之国际环境，指出：“新世纪中民族竞争之大势，全移于东方，全移于东方之中国，其潮流有使之不得不然者耶”；“今日欲救中国，无它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sup>④</sup>

在这些文章里，作者初步提出了有关民族主义的一些观点。

首先，什么是民族主义？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

① 《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20世纪世界之前途》，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6页。

②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2页。

③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页。

④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页。

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无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sup>①</sup>

其次，欧美民族主义发展的规律是怎样的？梁启超说：“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sup>②</sup> 欧洲之明君贤相因势利导，故能建造民族的国家。可以说，“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但民族强大以后，要求向外扩张，“于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遂成 19 世纪末一新之天地”。并认为，这种变化，“皆迫于事理之不得不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sup>③</sup> 而“自今以往，则大帝国与大帝国竞争之时代也”。梁启超由此而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观点，他认为英、德、俄、美是今日世界第一等国，是帝国主义之代表。其他国家，则分为两类：一类是“怀抱帝国主义以进取为保守，而尚未能达其目的”者；二类是“为他人帝国主义所侵噬，而势将不能自存”者。“全地球八十余国，可以此三者尽之矣”；“脱来焦氏所谓国际历史，势将压迫第二流以下之国家，使失其独立。诚哉，天地虽大，而此后竟无可以容第二等国立足之余地也”。<sup>④</sup>

最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梁启超认为，以卢梭为代表的平权派的理论“天赋人权”、“民约论”等是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以斯宾塞为代表的强权派的理论“进化论”等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常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之进步，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sup>⑤</sup> 梁启超指出，世界思潮已随着近代列强的对外扩张政策而为之变，以优胜劣败为天演公例，从前视为蛮暴的侵略行为现在则认为是文明的常规，优等人类斥逐劣等人而夺其利，就像人类斥逐禽兽一样天经地义。

显然，梁启超对民族主义及其发展到民族帝国主义的历史具有客观唯物主义的

①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20 页。

②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0 页。

③ 同上书，第 13 页。

④ 同上书，第 23 页。

⑤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9 页。

认识，而对两者的历史作用也进行了有利有弊的正反两面的评价，成为当时中国人对民族主义最早的阐述。但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很不够的，表现了软弱和无奈。

## 二、两种民族主义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面临的民族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外国民族压迫的问题，一个是受满洲封建贵族统治的国内民族压迫问题。为寻求自存之道，适应竞争之世，救中国于亡国灭种之灾，民族主义这个武器被运用得最多最广。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的最初阶段，由于国内外矛盾的交织，两者的关系不容易处理好，有关如何运用民族主义的争论也非常激烈。大致可分为以改良派为代表的矛头主要对外的民族主义和以革命派为代表的矛头主要对内的民族主义。

前者认为，提倡民族主义，目的是凝聚国内各民族的力量，对付外来民族的挑战，追求中国的独立自强。这一派对国内民族矛盾采取了淡化的态度。1902年，《新民丛报》刊登的旅美华人叶恩等《上振贝子书》中说：“今日列强并立，无不以民族帝国主义为方针，故其国民团合，视国家为一体，兢兢焉与万国争强。今满汉也，皆黄种也，同一民族也，同一民族则宜团为一体，不宜歧视。为今天下各州县，开地方自治议会，准其自治，久之开各省会议，又久之开议会于京师，确立宪法，汉满民族，同担义务，同享利权，则中国不数年而强，大清之统不万年而存，未之有也。”<sup>①</sup>同年，该报又刊登康有为《辨革命书》，中说：“又今言自立，则必各省相争，即令不争，而十八省分为十八国。此日本人之所党言，而旅日者之所深感也。然使果分十八国，则国势不过为埃及高丽而已，更受大国之控制奴隶而已……弱小之邦，岁月被灭，不可胜数……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物之理也……国朝入关二百余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除近者荣禄刚毅挑出此义，已相忘久矣。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其教化文义，皆从周公、孔子，其礼乐典章，皆用汉、唐、宋、明，与元时不用中国之教化文字迥异，盖化为一国，无复有风微之别久矣……则国人今日之所当忧者，不在内讧而在抗外也。欲抗外而自保，则必当举国人之全力，聚精会神而注于是，或可免也。方当同舟共济之日，若为内讧，则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恐为阿坤鸦度之能脱于西班牙，而适利美国之渔人。”<sup>②</sup>他们认为，满洲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同化于汉人，因而具有了

<sup>①</sup> (美)叶恩等：《上振贝子书》，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0页。

<sup>②</sup> 康有为：《辨革命书》，载《新民丛报》1902年第16期。

构成一个混同民族的资格，不要把满洲视为异族，可由满汉等民族“合为一国”，“团为一体”，建成多民族的国家，实行“满汉不分，君民同治”，渴望清朝统治者变法图强，以御外侮。

后者则认为，提倡民族主义，首先应排除满洲封建贵族在中国的统治，恢复汉族对中国的统治地位，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从而以多数优等的民族实行国家的改造和建设，振兴中华。这一派对于如何解决外国侵略的民族问题没有提出直接的主张。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作者最早在公开出版的期刊中提出了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我国人日言为外人奴隶之耻而不知为满洲奴隶之耻，日言排外种而不知排满洲之外种。满洲贼之盗我中华也，二百八十年于兹矣……满贼毫不恤尔民之艰辛，民不聊生，瞠若罔觉；甚至觅食异国，亦无兵舰之护卫，徒派暴官以残剥。嗟我同胞，何堪此苦！为外人之奴隶，不过身羁外人之土，谋外人之财，犹可言也。乃竟对一大贼强盗，夺我之土，握我之财，凡外人之要求也则顺手与之，我方镂心镌骨以图夺回之不暇，孰料计不出此，引为同族，认为慈父，旦夕承欢于其膝下，不亦慎乎？”从而得出“倾此二百余年根深强固野蛮无纪之政府，灭此不可枚举尸位素餐冥顽不灵之满族”的结论。<sup>①</sup> 革命派中不少人提出建立由汉族组成的单一民族国家。他们认为，中国除东三省为满洲之分地外，渝关以内十九省为汉人之分地，今十九省为满人入主，便是外族入侵，中国已亡，汉人已沦为奴隶。所以，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光复我民族的国家”。<sup>②</sup> 孙中山、章太炎都把满族斥之为“异种”，要“逐满”，使归其分地。他们认为，把中国的自强振兴的愿望寄托在满洲统治者身上是空想。陈天华在其《绝命书》中对改良派反对“排满”予以批驳，他说：“去岁（1904年——笔者注）以前，亦尝渴望满洲变法，融和种界，以御外侮，然至近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实；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则彼进，岂能望彼消释嫌疑，而甘心愿与我共事乎？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而卵育之。”胡汉民则指出解决国内民族矛盾是解决国外民族矛盾的前提：“以吾多数优美之民族，钳制于少数恶劣民族之下，彼不为我同化，而强我同化于彼，以言其理则不顺，以言其势则不久，是故排满者，为独立计，为救亡计也。”<sup>③</sup>

①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③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第3号。

综观革命派的反满民族主义可知，一是它并非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二是它不仅仅是种族之争，在更大的意义上是政治策略之争。因为世界潮流，趋于民主，反对少数人独裁，而满洲统治所代表的正是封建独裁的政治。孙中山就曾经说过：“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这种民族主义是包含了民主精神的新的民族主义。对于这种反满的民族革命思想，改良派担心会导致中国内部战乱，外人乘虚而入，瓜分灭亡中国。康有为说：“不顾外患，惟事内讼，同室操戈，他人入室。无端生此大波，立此乱说，于伦理为悖则不顺，于时势为反而非宜。”<sup>①</sup>而革命派对于反满革命会招致列强干涉的观点不以为然，也表现了他们对外国帝国主义认识不足和存在幻想。

改良派与革命派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既有具体主张上的分歧，也有民主立场上的分歧。改良派反对排满虽有理论上的合理因素（满族非异族），但其要害是对清朝统治者仍抱有很大幻想，希望互相妥协。而革命派的排满除政治策略上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他们反封建的民主性更为强烈。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争论，并不妨碍他们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根本目标的一致。在以后不断发展的认识中，大家都从幼稚走向成熟。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对改良派反对“排满”的软弱性的有力批判，而革命后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民族统一”则说明了改良派对清代的国家民族融合问题的观点是有客观事实根据的。

### 三、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

民族主义在实行的过程中，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向：一是民族主义过渡发展而成为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一是从民族主义而过渡到世界主义。

在辛亥革命时期，主张反满革命的人不少都有或多或少的大汉族主义，这是民族主义在运用中的一种偏差。当时便有人对此进行了批评：“近岁学者……或谓种族既殊，即不能同居一国，或谓即同居一国，亦当服从汉族之政治。由前说，则为狭隘；由后说，则为自尊。既欲别他族于汉族之外，则回民苗民，亦不当与汉人杂处；既欲他族受制于汉族，则与今日汉、蒙、回、藏受制满洲者奚异？且民族帝国主义之说，亦将因此而发生，此学理之误者也。”<sup>②</sup>所以，反满革命，要加以正确的引导，明确反满主要是反对满族的特权，而不是反对满汉的民族融合。否则便会走向狭隘的种族主义。对外方面，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里，中国处于弱国地位，

<sup>①</sup> 康有为：《辨革命书》，载《新民丛报》1902年第16期。

<sup>②</sup> 《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51页。

很需要运用民族主义作为护卫本民族利益的武器，这种防御性的自卫很容易引发排外主义的情绪和倾向。义和团运动后，有识之士曾就排外主义予以精辟的论述，他们把排外分为“文明排外”和“野蛮排外”两种类型，力主既反对外国侵略又师夷长技的“文明排外”，反对逞意气、背公理、于事无补的“野蛮排外”。他们说：“野蛮排外的方法，全没有规矩宗旨，忽然聚集数千百人，焚毁几座教堂，杀几个教士、教民以及游历的洋员、通商的洋商，就算能事尽了。洋兵一到，一哄走了，割地赔款，一概不管。……若是有爱国的心肠，这野蛮排外断断不可行的。”<sup>①</sup>显然，对弱小民族来说，笼统的排外主义并不能真正保护本民族的利益，而且对民族的发展不会有好处。

世界主义是对民族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的发展。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比较喜欢提倡这个主义，他们批判民族主义是落后的、自私的、违反公道真理的，主张取消种界、国界，追求无强权、无争斗、互助和睦的大同世界。他们说：“今之仅倡民族主义者，其谬有三：一曰学术之谬。如华夏之防，种性之说，虽系中国固有之思想，然贵己族以贱他族，不欲与彼杂居，系沿宗法时代之遗风。……二曰心术之恶。今之倡革命者，有一谬论，谓排满以后，无论专制立宪，均可甘心，故于朱元璋、洪秀全，均深诵其功。不知朱元璋、洪秀全之虐民，不减于满洲。吾人之革命，当为民生疾苦计，岂仅为正统闰统辨乎！……三曰政策之偏。今一般国民，虽具排满思想，然今之所谓革命党，不外学生与会党二端。夫一国之革命，出于全体之民，则革命以后，享幸福者亦为多数之人，若出于少数之民，则革命以后，享幸福者仍属少数之民。……举此三事，则知无政府革命，凡种族革命之利无不具，且尽去种族革命之害。况实行无政府，则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均该于其中，若徒言种族革命，决不足以该革命之全，此无政府革命，优于种族革命者也。”<sup>②</sup>无疑，世界主义是非常合乎人道公理的一种理想主义，对于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民尤其有吸引力，但是由于它与现实距离太远，几乎没有实践意义。而且，在列强交争的世界上，世界主义往往被企图吞并弱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所利用。孙中山就曾经说过，帝国主义国家“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窄，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sup>③</sup>又对英国和俄国的世界主义进行了批判：“英俄两国现在生出了一个新思想……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思

① 陈天华：《警世钟》，《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

② 《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51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3页。

想……，简单地说就是世界主义。……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民族主义是人类自下而上的工具，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便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sup>①</sup>孙中山在反对英俄的“世界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而是积极地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开拓道路。他认为被压迫民族应联合起来，互助合作反对霸权，推进国际间的和平和发展，才能走向真正的世界主义。

中国既要独立自主，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也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孙中山提出的观点，也是他所设想的实现世界大同之道。胡汉民、廖仲恺等人曾向孙中山提出了组织“民族国际”的计划，获得了孙中山的肯定和赞同。“民族国际”是把民族主义从国家范围发展到国际范围的一个步骤，这就是中国应该同被压迫的东方民族联合起来，造成“大亚洲主义”，反对欧洲列强的压迫，学习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同时用中国的仁义道德作为平等联合的纽带，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振兴亚洲。这种反对霸权、平等地实行国际合作、逐步地把民族主义发展为世界主义的思想，为民族主义的走向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 孙中山梁启超社会主义观之比较

社会主义思潮或思想，早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已由西方传入中国。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他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即以为西方在总体上比中国先进，值得效法。但到了20世纪初，当中国的先进分子满腔热情地企图按西方国家的模式对中国进行改革时，却发现西方国家陷入了一个新的危机之中：生产的发展一落千丈，而生产资料为少数人垄断，人民的生计日苦。贫富悬殊所激起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新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情况，有的中国人对西方社会采取了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转而回归中国传统；而另外一些人则继续观察西方社会的发展，吸收西方的新思潮，对西方文化进行新的选择。当时西方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是影响最大的，思潮的流派众多，运动声势浩大。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6页。

作为关心世界潮流和中国命运的改革家，孙中山和梁启超都率先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加以消化，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自己的思考和选择。由于各自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对中国国情了解的程度不同，以及对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不同，等等，他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如何实行社会主义有着很多不同的观点。但由于他们又都是为中国繁荣富强而斗争的战士，有着相同的追求，这些不同的观点又有着互补共存的关系。回顾前人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追求，有益于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 一、孙、梁对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

走向世界关注西方的孙中山和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接触和介绍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两人思想上造成了相同的印象，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是对资本主义罪恶膨胀的一种抗争，是自然的合理的运动。他们对社会主义同样都抱有肯定和赞成的态度，也都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将来的前途，但又都认为以阶级斗争为革命手段这一方式给人类带来痛苦，给社会造成破坏，应该加以避免。

孙中山 1896 年在伦敦蒙难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在大英博物馆等处图书室认真研读西方国家有关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农业、畜牧、矿业以及机械工程等方面的书籍，并参观考察英国社会状况，对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开始有所了解，而由始知道富强发达的欧洲列强还未能使人民幸福，所以欧洲志士掀起社会革命运动，是为第二次革命。欧洲的革命是分两次完成的，孙中山为了使中国避免第二次革命的痛苦，提出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1903 年 12 月，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夫欧美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sup>①</sup> 1905 年，孙中山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生主义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孙中山和他的一些同志认为把 Socialism 译为“民生主义”比译为“社会主义”更为允当。

孙中山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他对人民充满了热爱和同情，他不是为少数的资本家利益服务的政客，而是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领袖和伟人，所以他提出中国要避免出现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陷人民于贫困痛苦的惨境，因为这样的社会不是他所追求的社会。他在民国初年的多次演说中，对这个问题谈得特别多。1912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28 页。

年4月1日，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说：“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sup>①</sup> 1912年4月10日他在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作演说时也谈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盖专制皇帝，且口不离爱民，虽专横无艺，犹不敢公然以压抑平民为帜志。若资本家则不然，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sup>②</sup> 1912年4月17日他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上说：“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sup>③</sup> 不能让资本家的新的专制暴政代替封建君主的旧的专制暴政，这是孙中山考虑问题的新的角度，既然要压抑资本家的专制暴政，那么社会主义便呼之欲出了。这是一个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任务，也是只有孙中山这样具有人民性和进步性的革命家才能提出来的。

孙中山不希望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资本家专制局面在中国重现，更不希望由于这种暴政的出现而要进行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他说：“如果我们中华民国存在之日起就不去考虑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在最近将来的滋生崛起，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比清朝专制暴政还要酷烈百倍的新专制暴政，要挣脱这种新的暴政就必须用流血手段。那是何等暗淡的前途。”<sup>④</sup>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比孙中山不会晚多少，而他向国人介绍社会主义的文字则比孙中山发表得更早，而且一开首即介绍了“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他在1902年10月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一文中特别引述了颉德的话说：“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马克思的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sup>⑤</sup>

①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9页。

② 孙中山：《在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3页。

③ 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0页。

④ 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6页。

⑤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6页。

1903年梁启超漫游美国时，开始接触到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他在《新大陆游记》中记载：“余在美洲，社会党员来谒者凡四次。……其来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劝以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著手云云。……余以其太不达于中国之内情，不能与之深辩，但多询其党中条理及现势而已。……社会主义为今日全世界一最大问题，吾将别著论研究之。”他还说：“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sup>①</sup>这时他在学习和考察资本主义，但他对社会主义并没有拒绝接受，而是在认识和思考之中。

1907年，他写了《社会主义论序》一文，为吴仲遥所著之《社会主义论》作序，并阐明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看法。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既关注中国，也关注世界，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大问题，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影响，值得加以重视和研究。他说：“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为世界惟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此问题之发生，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我国今当产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虽然，为国民者，不能以今日国家之现象自安，明也。但使我国国家既进步而得驰骋于世界竞争之林，则夫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自无一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所必至也。然则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sup>②</sup>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已有更多的认识，在探索中国要不要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这种思想开头散见于一些归国演说辞中，后来则在1921年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可以肯定的是，梁启超看到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资本家十之八九是“将本求利”之徒，资本主义的罪恶他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同情使他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深深痛恨，但他又感到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来振兴中国经济，所以在要不要用社会主义的方法限制、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上，他陷入了苦闷矛盾的思考之中。

梁启超认为，在欧洲与美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是用以解决经济上不平等的问题，是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所提出的要求，所以自己对于社会主义本身何去何从已经没有什么疑问，而“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他说：“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故在欧美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欧美忠实求业之人，略皆有得业之机会，

<sup>①</sup>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sup>②</sup> 梁启超：《社会主义论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但其操业所应得之利益，有一部分被人掠夺，社会主义运动，则谋所以抗正之恢复之，其事为适合于多数人地位上之要求”；“‘劳动者地位改善’之一语，在欧美言之，则一针见血”。<sup>①</sup>也就是说，梁启超是赞同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认为是改善多数劳动者地位的运动，是必须进行的运动。而在中国，梁启超虽然认为目前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需要，但仍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将来的前途，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已。当中国的工人阶级（他称为劳动阶级）成长起来之后，便可实行。并认为由于外国资本家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工人阶级将会担负起埋葬世界资本主义的重大责任。他写道：“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局之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吾确信在稍远之将来，必有全世界资本家以中国为遁逃藪之一日，而中国劳动阶级最后之战胜，即为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株断灭全世界互助社会根本确立之时”。<sup>②</sup>

可见，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是持肯定和赞同的态度的，认为在欧美是必须进行的运动，而在中国也是将来要进行的运动。

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同的忧国忧民思想感情使孙中山和梁启超认同了社会主义，并看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前途。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较肤浅，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误解，以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要比欧美更为容易。

比如，有的人认为社会革命必须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实行，中国虽然将民族、民权两革命成功了，社会革命却只好留以有待。孙中山反驳说：“这句话又不然。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英美诸国资本家已出，障碍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难。中国资本家未出，障碍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试设一问，社会革命尚须用武力乎？兄弟敢断然答曰：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所以，刚才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难，中国社会革命易，亦是为此。中国原是个穷国，自经此革命，更成民穷财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但因此时害犹未见，便将社会革命搁置，是不可的。譬如一人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国方可。”<sup>③</sup>孙中山又说：“欲解决土地问题，我国今日正一极佳时期也。趁此资本未发达，地

<sup>①</sup>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9~320页。

价未加增之时，先行解决，较之欧美，其难易有无可同日以语。”<sup>①</sup>

梁启超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若近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于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盖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以土地尽归于国家，其说虽万不可行，若夫各种大事业如铁路、矿务、各种制造之类，其大部分归于国有，若中国有人，则办此真较易于欧美。”<sup>②</sup>

## 二、孙、梁社会主义观的内容和实质

19世纪后期，西方的社会主义流派多种多样，据粗略统计，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派别有五六十种之多，研究学者有千百家，出版的研究著作有千百种。对于万花筒一样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思潮，先进的中国人如何去认识、鉴别和挑选，从而找到自己合用的东西便十分重要。

孙中山与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动和深化的过程。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认识不可能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而他们的社会主义观也缺乏系统严谨的理论基础，直观感受的成分比较多，表达得也比较含糊。孙中山从中国实践可能性出发吸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形成了他自己的富有创造性和综合性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梁启超则从学理的准确性出发把握社会主义的实质，形成了保守、渐进的社会主义思想。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世界各地游历，接触到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对社会主义思潮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理论有较多的了解，特别注意到“社会主义中的圣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建树，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孙中山说：“尝考欧西最初社会主义之学说，即为‘均产派’，主张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贫富激战之风潮既烈，政府取缔之手续亦严；政府取缔之手续既严，党人反抗之主张益厉。无政府主义之学说，得以逞于当时，而真正纯粹之社会主义，遂淹没于云雾之中，缥渺而不可以迹。厥后有德国麦克司（即马克思）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

<sup>①</sup>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0~522页。

<sup>②</sup>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惟现社会主义，尚未若数理、天文等学成为完全科学，故现在进行，尚无一定标准，将来苟能为科学一种，则研究措施更易着手。”<sup>①</sup>“社会主义学者……最初之思想甚属简单，固未尝为事实上计也。厥后学说精进，方法稳健，咸知根本之解决当在经济问题，有是亨氏之土地公有，麦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sup>②</sup>孙中山虽然认为马克思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真髓”，但他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有偏颇，特别是忽略了它的革命性。所以，他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只是说它“方法稳健”，并说它是一种和平解决劳资矛盾的方法：“各国社会主义者鉴于将来社会革命之祸，岌岌提倡麦克司之学说，主张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决，以免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sup>③</sup>

孙中山除了认为马克思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真髓以外，还认为亨利·乔治的学说也是社会主义的真髓，也应加以吸收。同时又结合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平均主义思想和累世同居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以及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国情，从而提出了带有他个人特点的、比较接近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但在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手段上又与之有重大差别的社会主义思想。无以名之，只能说它是孙中山式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的福音。他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者也，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sup>④</sup>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态，孙中山作了这样的描述：“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sup>⑤</sup>孙中山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态，虽然论述得不是很充分和完全，但生产资料公有，物质极为丰富，人民各尽所能，老幼病弱者皆有所养，社会关系平等、自由、博爱等基本内容都已包括在内。孙中山还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不同阶段，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上乘。在

①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页。

② 同上书，第518页。

③ 同上书，第520页。

④ 同上书，第510页。

⑤ 同上书，第523页。

共产主义阶段，“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但是，由于“今日一般国民道德之程度未能达于极端，尽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数，任取所需而未尝稍尽所能者，随在皆是”，所以现在谈无政府共产主义还为时过早，但对于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孙中山是同意的，而且认为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大同之世。这些论述是符合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的。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态没有予以专门的论述，但认同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则是无疑的。他说社会主义是大同太平之世，是最平等的理想<sup>①</sup>，是“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株断灭全世界互助社会根本确立之时”<sup>②</sup>。他没有对这个社会形态的具体内容进行说明，他更多地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来加以研究，对这个运动的目的、本质、阶级基础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比如，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要改善工人阶级地位，实质是要对社会经济组织进行根本的改造，运动的阶级基础或主体是工人阶级。这种认识水平在中国当时是没有多少人能达到的。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实质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他能将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区别开来。梁启超在《国际劳工规约评论》中说：“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改造的方法虽然种种不同，或主共产，或主集产，或主生产事业全部由能生产的人管理，或主参一部分，或用极端急进的手段，或用和平渐进的手段，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政策？它是在现在的经济组织之下，将那些不公平之处，力图救济，救济的方法，或从租税上求负担平均，或保护劳工，不叫资本家虐待，虽然许多良法美意，却与根本改造无涉。”<sup>③</sup>即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所签署的《劳工规约》只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劳工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制定的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而不是推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与劳工阶级相联系的事业，是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事业，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性、社会主义的动力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他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更加鲜明地指出：“以社会主义运动的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指工人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有劳

① 梁启超：《俄罗斯虚无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页。

②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③ 梁启超：《国际劳工规约评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1页。

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sup>①</sup>

由于孙中山与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实质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如何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便有着不同的主张。

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刻不容缓的。除了以上谈到的，社会主义与孙中山梦寐以求的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符合，中国必须预防防止资本主义弊病出现等原因外，还因为孙中山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在当时是有实行的可能性的。

孙中山主要采用了亨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主张土地公有；又采纳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张资本公有。综合二人的学说，而成自己的社会经济政策。孙中山的地价税方法部分得自约翰·穆勒的地价税方法，也多少受到英国在殖民地实行的地价税方法的影响。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思想则来源于德国俾士麦的社会政策。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核心是土地公有和资本公有，那么在中国如何推行呢？

土地公有，具体做法是规定地价和征收地价税。“即调查地主所有之土地，设定其价，自由呈报，国家按其地价，征收地价百一之税。地主报价欲昂，则纳税不得不重，纳税欲轻，则报价不得不贱。两而相权，所报之价，遂不得不出之于平。国家据其地价，载在户籍，所报之价即为规定之价。此后地价之增加，咸为公家所有，私人不能享有其利，地主虽欲垄断，其将何辞之可藉哉？”<sup>②</sup>当时，孙中山的这个想法，由广东率先响应，并提出了议案交省议会议决。这个主张，其实是防止地主垄断土地、无偿地分沾资本主义发展后的高额利润的不合理现象。土地归公后，地税收入和国家据地价征地二项也有利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事业。

至于资本公有，是指大资本公有。因为中国没有什么大资本家，也谈不上垄断，据孙中山的看法，不必没收资本家的资本，其实是保留了中小资本家的财产。这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孙中山的政策是防止大资本家的发生，他的做法是大资本国有化。那么，中国的大资本企业如何发展呢？孙中山认为应先发展铁路，用交通带动其他生产事业的兴旺。他曾提出，可以用中外资本办全国铁路，40年后尽收为国有，国家用土地和铁路的收入，兴办生产事业，利也归公。“则大

<sup>①</sup>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sup>②</sup>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2页。

公司大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专制矣”。他在广东的一次演讲中也说过：“国家社会主义云者，国家各种大事业由政府借债经管，如农田、水利、铁道、电气及其他可专利的事业概收归为国营。”<sup>①</sup>

孙中山是这样看的：中华民国是人民的国家，公有即为国有，国有也即民有。“国家以所生之利，举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公共事业的利润既大，工人的工资，便可按社会生活程度渐次增加，人民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但孙中山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他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法国、比利时等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一些国有化措施都视为“国家社会主义”，把中华民国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也说成是人民的政权。而且，他的土地国有政策没有消灭地主，资本国有政策没有消灭资本家，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没有根本的改变，即使他的社会主义实现了，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在实质上是一种防止私人资本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避免出现贫富悬殊恶果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心目中的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他强烈地希望中国富强，同时又热切地希望人民幸福，他感到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而社会主义所提倡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达到他的愿望。由于他的主张已经吸取了当时欧洲的某些社会主义原则，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所以孙中山把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名之为“国家社会主义”。虽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但孙中山把这种思想运用于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就不是这样简单了。中国正在寻找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路既源于欧美，又高于欧美，这就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选择吸收当时国际上先进的思想理论，创造出新的社会模式。孙中山的中国式资本主义道路其价值在于，当中国政权的阶级性发生根本变化之时，便可以转变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孙中山的创造性思维对中国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与孙中山急切要求中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不同，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显得保守、缓进和注重阶段性。这与他正确理解和严格遵守社会主义的原理有关。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极度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是劳工阶级为自己而建立起来的自由平等的、合乎人道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中国在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劳工阶级尚未成长之时，还谈不上实行社会主义。

他说，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运动，而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没有多少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1页。

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准备”；“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殆如此”。<sup>①</sup>

梁启超为中国所谋划的是一条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这条道路的走法与欧美国家是不同的。这就是把资本主义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资本主义阶段中，既要利用资本家以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资本主义所随带的罪恶的膨胀，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要防止分配的不公。

梁启超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事业，所以他把社会主义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的身上，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身上。他说：“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可以我国劳资战争最后之胜负决之。”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天，也就是全世界资本主义消灭，进入世界大同的时刻。他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欧美资本家在本国已经陷入了无产阶级的包围之中，不久的将来，必有全世界资本家以中国为逋逃藪之一日，所以一举把全世界资本主义连根拔掉的任务，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无产阶级最后的胜利，便是宣告了全世界资本主义灭亡的消息。

但由于梁启超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长成，其工会组织更是处于“胎教时代”，所以他把社会主义运动，放到了遥远的未来。这种保守的主张，虽然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却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以他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批判。

可以看到，由于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当时的社会要求和趋势，社会主义又是中国将来的前途，所以孙中山和梁启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条既发展资本主义，又限制资本主义的道路。

### 三、孙、梁对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设计

在孙中山和梁启超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起来，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出现危机，革资产阶级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兴起。中国如何追赶这个历史潮流，在短时期中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来走过的路，与世界一同进入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大同之世，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可以具体地归结为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面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必然发展的趋势，孙中山和梁启超各自提出了限制资本主

<sup>①</sup>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义过度膨胀的方法。

孙中山提出的是土地国有和发达国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的主张。

孙中山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领导国家的政府身上。他设想建立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善良政府，他说：“公天下，……就是把政权公之天下。”<sup>①</sup> 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做到“国有”即“公有”，“公有”即“民有”，一旦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国有化，社会主义便实现了。他想把因辛亥革命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建成一个理想的政府，《同盟会宣言》中规定：“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他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如果“常为人民谋幸福”，也可以成为“良好政府”，可以依靠它实行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数年间，英、美、法等国政府为缓和工人阶级的不满增加了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孙中山便称道此三国人民有“良好政府”<sup>②</sup>，做到了“少有所长，老有所养。未成年以前，国家设校以教之；壮岁以往，有各种农工商以役之；至于衰老，国家有年金以养之”<sup>③</sup>，是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一大步。可见，孙中山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某个阶级领导的运动，而是由善良政府调和和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促进社会进步的事业。这种社会进化观点在他晚年表现得更为明显，1924年他根据“欧美近年来之经济进化”及其推行的阶级合作措施，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原则提出了怀疑，他说：“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sup>④</sup> 孙中山对于在中国甚至全世界，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应采取什么手段和方式，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以国家政权为主导，以政权建设为核心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建立一个代表人民的政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既有阶级调和的倾向，亦有开拓人们思路的作用。

在实践上，孙中山把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看成是“预防大资本家发生”。他采取的措施，是“绑住一个，放开一个”，即绑住私人资本，放开国家资本。但是，当民族资本主义举步维艰应该加以扶持的时候，过早地对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私人资本加以限制，不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正常发育。发展国有资本，对一切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对带垄断性的生产部门和大型企业的经营，均交由国家负责而不

① 《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0页。

② 同上书，第506页。

③ 同上书，第349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8页。

委诸私人，具有发达社会生产力和预防私人垄断的双重作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其中也含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对国家资本发展的道路，孙中山在国家极度缺乏资本无力举办大型企业的情况下，提出了借外资外财的办法，带有很大的幻想性。他有一句名言，“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sup>①</sup>，甚至洋洋 10 万言的《实业计划》，也主要是希望西方国家把本来用于战争预算的巨额款项在大战结束后转而投向中国，实行国际资本共同开发中国。但是，这个想法，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还不可能实行。另外，国有资本如何管理才能不至于落入官僚手中，成为官僚资本，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个政权刚刚脱胎于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制定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法律和颁布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宣言，但整个政权要真正资产阶级化却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极为浓厚的封建思想和衙门作风渗透在各级政治机构中，各级官吏的素质也很成问题。在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新生产资产阶级政府中，过快地实行土地国有和资本国有，无异于又把全国的生产资料集中到一批不懂生产的官僚手中，可以想见，洋务运动官办企业的弊端将重新出现。这样，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搞好的。孙中山所设想的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前景和社会主义的极为丰富的物质条件将很难实现，社会主义也只是一句空话。

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与孙中山有较大的分歧。

梁启超认为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高素质的工人阶级队伍是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条件，而这个条件的创造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主张首先要顺应时势，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国家贫穷、人民失业的现实也使梁启超认定只有发展资本主义大生产才能救贫救死。所以，他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若不谈生产只谈分配，其运动是毫无意义的。

梁启超说，中国的社会问题与欧美的社会问题不同：“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十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欧美有业无产之人所处之境遇，在我国一般人视之，已若天堂。其已得有此境遇之人，方且兢兢守之，惟恐失坠。欲其冒险而从事于向上之运动，闻之将掩耳而走。抑此类人在全国中，不过占千分之一二耳。吾辈若专为此类人谋，而忘却其他，则社会所能救济者几何？是故，‘劳动者地位之改善’之一语，在欧美言之，则一针见血；在中国言之，则隔靴搔痒也。彼求进一工厂，每日做十二点钟不停手之工，尚且费几许情面方能得之，今乃告之曰：‘汝何不加入八点钟同盟也？’彼方踟躅街市，无所栖托，今乃告之曰：‘汝宜要求加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98 页。

工价。’此真‘何不食肉糜’之类也。故今日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地位取得，然后改善乃有可言。”<sup>①</sup>梁启超清楚地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是资本主义，这个阶段是不可逾越的。

梁启超还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中国没有大资本家，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很薄弱。要抗衡外国侵略势力，争取经济独立，没有强大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行的。应该竭力提倡发展中国自己的资本家，并发达其势力，使其能与外国资本家相抵抗，从而使中国在世界上有自立之地。如果认为外国有社会主义，我国也不能不仿效，而致不敢发展本国的资本家。那么，外国资本家就会主宰中国的实业，控制中国的经济界，全国国民也会沦为外国资本家的奴隶。即使本国没有资本家，中国人也还是受到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只不过是外国的资本家而已。

他说：“在数十年前，中国人民尚有安居乐业之概，若夫今日，则全国困穷，各业凋蔽，人人有生计艰难之叹矣。我人曾亦知今日生计艰难之所由乎？是非世界无端而有变迁也，是乃各国之经济势力侵入我中国之后，破灭我中国之职业，吸尽我中国之利益故耳。譬如，以资本而言，则外国之公司资本，皆在数百万数千万以上，我中国之商业，则数千数万之资本，已为大业。欲求一数十万资本之业，实寥寥不可多得。况以生产之器具而言，则外人动以数万马力一日可成货物无算之机器，为生产之器具。我中国则舍手工所用简单粗朴之器具以外，尚有何种器具可名为生产之器具？……总之，中国今日之工商实已为外国经济势力所压倒，无论何种职业，皆失其自存之力，非大为革新，以谋抵御此潮流，则全国人民，舍为外国苦力以外无他事可图也。……是以我辈之主张，则谓今日当竭力提倡中国之资本家，发达其势力，以与外国之资本家相抵抗，庶我国之工商业，可以发达，而我国民尚有自立之地。若以外国有社会主义，我国亦不可不仿而行之，则舍全国国民为外国资本家之牛马奴隶以外，又安有他种结果可言乎？”<sup>②</sup>所以，对于消灭资本家的主张，他是不赞同在中国实施的。他甚至认为，为了经济的发展，“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即使“稍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然为国家计，所不辞也”。<sup>③</sup>由于他对官办企业无甚好感，而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

但梁启超也主张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行限制，他说：“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

<sup>①</sup>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sup>②</sup> 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页。

<sup>③</sup> 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载《新民丛报》第86号。

局之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过渡之事物，而一任其自然之运，必将成为尾大不掉，积重难返，虽将来终有剥复，然元气所伤太多，非社会之福。”<sup>①</sup> 但限制的方法，他不着眼于限制生产而着眼于限制分配，他主张采用政府立法和社会监督，不容资本家过度掠夺剩余价值，以致激化劳资矛盾。他说：“将来勃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成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容许。惟当设法使彼辈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殊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sup>②</sup>

对防止私人资本垄断国计民生方面，梁启超提出了一个与孙中山不同但也很有见地的限制办法，就是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也发展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事业。这是在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之外的另一种改造私人资本的办法。这种非资本主义生产事业，包括国营事业、地方公营事业和协作生产事业。特别是各种“协社”，可认为是劳动者自己经营的集体事业，是社会主义的生长点。他说：“现在为振兴此垂毙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却不能恃资本家为国中惟一之生产者，致生产与消费绝不相谋，酿成极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时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并进。一面政治上若稍有转机，则国家公营地方公营之事业，便当画出范围，在人民严密监督之下，渐图举办。一面各种协社，须极力提倡，以传教的精神策进之，但使能得数处办有成效，将来自可联合扩充，倘能令生产的中坚力，渐渐由公司之手以移于协社之手，则健实之经济社会，亦可以成立矣。”<sup>③</sup> 协社的发展，可以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这是梁启超设计的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办法。

孙中山和梁启超关于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思想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sup>①</sup>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同上。

# 洪仁玕与基督教

洪仁玕（1822~1864年），字益谦，广东花县人（今广州市花都区）。太平天国干王。太平天国起义前数年，他开始学习基督教，1853年正式成为基督教徒，此后一直是基督教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他是晚清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徒之一，而且是一个不平凡的信徒，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反映了19世纪中叶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契机和困难。

## 一、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

我们只要浏览一下洪仁玕的个人简历，便不难看到，他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较早也较密切。洪仁玕1843年受洪秀全启发，与洪秀全一起“拜上帝”。1847年，他和洪秀全前往广州投美国传教士罗孝全门下学道，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外国传教士。

洪仁玕在罗孝全处学习了《圣经》的汉译本，阅读了传教士写的劝世文，增加了基督教的知识，又参加了礼拜，学习了基督教的组织、仪式。1851年，当洪秀全在广西发动起义并头一次占领城市的时候，曾派人回广东召洪、冯两姓族人参加他的队伍，于是洪仁玕带领族人前往，但到达约定地点时，队伍已经转移。由于清政府缉拿起义者及其亲属甚急，洪仁玕为了避祸，到了香港，1852年4月见到了瑞典籍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文，要求加入基督教。他把太平天国发动起义的经过口述给韩山文，由韩用英文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由此得以把洪秀全的初期活动记录下来。不久洪仁玕返回广东，1853年11月又第二次赴香港，终于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洪仁玕的信教，与当时中国黑暗腐败的社会状况令人失望有关，也与他自己被追捕寻求教会的庇护有关。基督教及其异端思想成为中国反叛者的一个归宿。

皈依基督教后，洪仁玕与传教士接触渐多。1854年春，他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想取道上海赴南京，但因交通阻梗，未能如愿，便在上海逗留了5个多月。其间，向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等学习天文历算，并帮助传教士工作以维持生活。他在传教士麦都思的指导下，写了一本注解新约的书，与许多传教士建

立了友好的关系。折回香港后，因韩山文已故，洪仁玕为伦敦会接受，任伦敦会布道师。1854~1858年4年中，他与伦敦会著名传教士理雅各共事约有3年，与湛马士共事约1年。除从事传教事务外，还努力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据《洪仁玕自述别录之一》载：其时，他在“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他从广泛接触到的西方书籍中接受了西方政治、军事、科技、经济、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知识。洪仁玕与西方人的交往很广，据《资政新篇》所记，与他“相善”的英、德、美和瑞典等国传教士就有理雅各、湛马士、米士威、合信、慕维廉、艾约瑟、韦律、罗孝全、俾治文、花兰芷、黎力居、叶纳清和韩士伯以及韩山文等22人。可见，洪仁玕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很深，他的西方知识也主要是得力于他们的传授。

很多传教士知道洪仁玕与洪秀全的亲戚关系，想通过他的关系到南京开礼拜堂。理雅各开头反对洪仁玕去为叛逆效忠，后来知他已到天京，便多次写信给他，“希望他将可改正他们的许多错误”。艾约瑟认为：“干王经过几年基督教传教士的指导和影响之后来到南京，可能对洪秀全的思想起点作用。”<sup>①</sup>另一传教士杨格非也认为：“洪仁玕到南京也是饶有兴味的事。……他对基督教、外国人和世界大事的知识，要比他的族兄（洪秀全）深刻和正确得多，他被封为干王，表示天王对他的钦佩与宠信。他的职位，将使他可以纠正天王的谬误。”<sup>②</sup>西方传教士想利用洪仁玕在太平天国中传教及利用太平天国扩大基督教在华影响的用心昭然若揭。

1859年，洪仁玕如愿以偿到达天京，他想把他学到的本事用来辅助天王。这些本事包括宗教、政治和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在宗教上，洪仁玕想纠正拜上帝教的“上帝说”，他在其著作《资政新篇》和《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等书中一再说上帝是个纯灵，是无形的，否定上帝是人神同形的观念。另外，又说上帝、基督、圣神风（圣灵）三位一体，并尝试推行基督教伦理观中关于“爱”的内容，论述“勿杀”的圣诫。他不相信东王的异梦（指其代天父传言），不同意称东王为圣神风和劝慰师。洪仁玕还在太平天国首次较准确地概述了耶稣一生的行迹，宣传耶稣替世人赎罪的伟大爱心及意义，从而劝世人信教。总之，洪仁玕可以说是一个对基督教教义具有正确认识并真诚信仰的合格的教徒，他确实是想把拜上帝教改造为真正的基督教。他在1860年6月《致英教士艾约瑟书》中说：“前于戊午由香港至京朝主，区区之意，实非有贪禄位，盖欲翼赞王献，广扩福音，使率土之滨，扫清

① 见《北华捷报》1860年7月4日第520号。

② 转引自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23页。

泥塑木雕之物，共归天父上帝、天兄耶稣之圣教也。”<sup>①</sup>但是，到了洪秀全面前，在天王惟我独尊的威严之下，洪仁玕在宗教问题上，很难有所作为。所以，他对艾约瑟表示了歉意：“惟恨学识短浅，体道未深，是所歉仄。幸于接见真圣主以来，时蒙圣训指示奥义，其一切见解知识，迥出寻常万万，言近旨远，出显入深，真足使智者踊跃，愚者省悟也。余日侍圣颜，渥聆圣诲，故不觉心地稍开，志趣略进，时觉此中乐趣无穷。回忆此生得力之处，是皆由昔与众先生讨论于前，今沐圣主训迪于后也。”<sup>②</sup>这表示洪仁玕在无可奈何之中，不想再对拜上帝教加以纠正，只想含混了事。对于基督教和拜上帝教的歧异已经不想区别，只想调和。

1860年8月，洪仁玕邀请洋教士到太平天国参观。他在教士们面前脱去长袍、王冠，遣走侍从的官员，然后与他们共进午餐。“进餐前，他提议共同唱赞美诗并祈祷，他选了一首麦都思的诗，首先唱起来，唱得既准确而又富于热情和力量。接着由艾约瑟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祷，才就座进餐。”<sup>③</sup>洪仁玕对教士们说：“他从香港去南京的惟一目的就是想在太平天国境内老百姓中传播基督教。所以，他一到南京便求他的族兄洪秀全准许他做这事，可是洪秀全不同意，坚持立刻封他为王。虽然他很效忠天国，并决心与之共存亡，但他一再表示，尽管现在位高权大，反倒不如以前在香港当传教助手时快活。”<sup>④</sup>1861年，洪仁玕又对他的好朋友觉士说：“传教士不应该来到南京。天王不允许除他自己以外的任何教义。”洪仁玕是忠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也是忠于天王的，不会因为他和洪秀全在宗教上的分歧而影响他们在政治上的合作，这自然会引起传教士们的不满。所以，理雅各说：“……干王在他所处的地位，仍不能克服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人们对他有多种责难，但实在是冤枉他的。然而，我们有理由深为忧虑，即他已经毁掉了信仰和良心。”<sup>⑤</sup>洪仁玕把宗教服从于政治，这不能不使传教士们感到非常失望。

## 二、洪仁玕视基督教为西方文明之“上宝”

洪仁玕从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宗教开始，进入了学习西方知识、认识西方世界的历程。基督教是洪仁玕认识西方文明之媒，而基督教本身也是西方文明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洪仁玕不可能把宗教从西方文明中分离出来。且看他对外方文明

① 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727页。

② 同上书，第728页。

③ 转引自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39页。

④ 同上。

⑤ 转引自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的认识：“夫所谓上宝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圣神爷之风，三位一体为宝。一敬信间，声色不形，肃然有律，诚以此能格其邪心，宝其灵魂，化其愚蒙，宝其才德也。中宝者，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sup>①</sup>“中地素以骄奢之习为宝，或诗画美艳，金玉精奇，非一无可取，第是宝之下者也。”<sup>②</sup>从这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到，洪仁玕认为，西方文明是一个先进的、高于中国的文明。在西方文明这个总体中，又可以把其中的内容分为上宝、中宝和下宝三个层次。基督教是上宝，科学技术产品是中宝，而中国素所宝贵的骄奢之物则是下宝。他不但把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完整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接受下来，而且把它列为“上宝”，这便是洪仁玕的“西方文化观”。洪仁玕对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的关系，还有如下看法：

洪仁玕认为，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基督教新教是西方强国的意识形态，凡是信仰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其国力必强。他说，英吉利为最强之邦，花旗邦（美国）礼义富足，两邦皆以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立教。另外，德国、法国亦是信上帝、基督之邦，邦势亦强。而土耳其邦不信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仍执摩西律法，不知变通，故邦势不振。俄罗斯邦百余年前亦未信天兄，受人欺侮，后来大兴政教，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也。他又列举了亚洲的一些落后国家如波斯、马来亚、蒙古、新加坡和印度等，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

实际上也是这样，基督教新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而基督教本身也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中得到了改造。洪仁玕并没有对基督教与西方富强的关系做出理论上的研究，只是从归纳法上直觉地感知基督教与西方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洪仁玕对于西方文明的总体认识比之一般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更为全面。而满脑子儒家思想的中国士大夫们对基督教义充满了鄙视。即使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开明分子，也只是从某个角度去观察西方世界，看到某一点好便主张学习某一点，他们认为西方文明这个整体是可以切割的，而且各部分可以孤立地存在，只要把它们逐个地从资本主义机体上切割下来，简单地移植到中国的机体上便成了。因此，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反对改变中国中世纪的政治专制主义传统和精神信仰；

<sup>①</sup> 洪仁玕：《资政新篇》，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30~47页。

<sup>②</sup> 同上。



维新派虽提倡改革中国政治但固守孔子学说。而洪仁玕对西方文化的总体认识，使他提倡学习西方的时候，一入手便体用并进，器道并学，学习的范围比当时很多学人所提倡的要丰富得多，表现了他以更开阔的眼光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开放心态。从这点上说，洪仁玕较之同时代的改革人士走得更快更远。

洪仁玕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启发了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新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新精神、新道德的起点。但是，洪仁玕对西方的了解毕竟还少，没有给中国人找到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先进文化意识形态，这是历史给他的巨大局限。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既背离科学，也背离了中国国情，中西文化的巨大反差和中国人对西方入侵者的敌视和反感，使基督教始终不能为大多数国人所接受。由于时代给洪仁玕的局限，使他无论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存在着认识上的缺陷。简单地以基督教教义代替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割断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延续，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中国的新伦理道德，要在中西文化的选择和交融中重新结合而成。

### 三、洪仁玕尊崇基督教的动机和效果

如何看待和分析洪仁玕对基督教的尊崇？我认为可以考察一下洪仁玕尊耶教的动机和效果。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洪仁玕尊耶教的出发点。上文提到，由于洪仁玕看到西方富强之邦皆信耶稣基督，便认为立耶教与致国强有必然的联系，既要学西方就必须把它的宗教也学到手。所以，他的第一个出发点是向西方学习强国之道，这个良好的愿望是可以体会的。另外，他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知道了耶教是劝人向善、提高道德水准、安定社会人心的思想工具，认为不妨吸收利用以改造中国人的素质。可见，第二个出发点是与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和改进精神状态有关。

他分析了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风俗浇薄，需要一种宗教提高人民的精神道德，但是他又认为中国原有的儒、释、道三教是不能指导中国前进的，必须寻找新的宗教信仰，于是他提出了以基督教作为提高人民精神道德的法宝。他说：“释聃尚虚无，尤为诞妄之甚；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sup>①</sup>也就是说，洪仁玕把信仰基督教作为挽救人心风俗败坏的法宝，富国强兵的捷径，希望借此振奋人民的精神，推动中国的前进。他说：“甚矣习俗之迷人……且观今世之江山，竟是谁家之天下。无如我中花（华）之人，忘其身之为花（华），甘居鞑妖之下，不务实学，专事浮文，良可

<sup>①</sup> 洪仁玕：《资政新篇》，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30~47页。

慨矣。请试言之：文士之短筒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稟帖面陈，俱是谗谄赞誉。商贾指东说西，皆为奸贪诡谲，农民勤俭诚朴，目为愚妇愚夫，诸如杂教九流，将无作有，凡属妖头鬼卒，喉舌模糊，到处尽成荆棘，无往不是陷坑”；“如男子长指甲，女子喜缠脚，吉凶军宾，琐屑仪文，养鸟斗蟀，打鹤赛胜，戒箍手镯，金玉粉饰之类，皆小人骄奢之习，诸如此类，难以枚举。……凡此等弊，则立牧师教导官，亲身教化之，怜悯之，义怒之，务去其心之惑，以拯其迷也”。<sup>①</sup>如果说洪秀全对西方宗教的吸收主要是“惟一真神”的观念和“平均平等”的思想，那么洪仁玕对西方宗教的吸收便主要偏重于宗教的价值观念和教化作用，把宗教作为开民智、新民德的工具。洪仁玕说：“此理（基督教之理）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非基督之弟徒，天父之肖子乎，究亦非人力所能强，必得圣神感化而然也。”<sup>②</sup>虽然基督教不是西方文化最先进和最优秀的部分，而且带有浓厚的神学说教，但在资产阶级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还没有真正传入的情况下，洪仁玕注意到宗教对人的精神意识的重大影响，从而产生了利用它改造中国风俗人心的愿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洪仁玕把人的精神道德，即所谓国民性的改造提到了重要地位，并认为可以通过吸收西方的精神道德优点进行改造，这就比士大夫阶级坚持三纲五常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要勇敢得多、革命得多。这种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可以说既是对魏源提出的要去除“人心之寐患”和“人才之虚患”，使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sup>③</sup>的目标，予以有力的回应，也是对40年后梁启超“新民说”的提出做出了前期的探索。他们对提升中国人的民智和民德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洪仁玕对耶稣教的吸收是否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在中国当时儒家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和中国面临反侵略斗争的背景下，要中国接受基督教确实不易。但是，耶稣教在太平天国风行一时却是不可抹煞的历史事实。而且，一个新的宗教有时会对人民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英国传媒在报道太平天国起义时说：“太平军在1500英里的长途进军中，经过了人烟稠密的富饶地区。在亚洲战争中常见的奸杀掳掠，太平军是用死刑来严加禁止的。他们较之清教徒更为严格地来对自己同胞所珍爱的各种官能享受进行内部

<sup>①</sup> 洪仁玕：《资政新篇》，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30~47页。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魏源：《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

战争。他们严守基督教的十诫，并且加以严格的解释。丢邪眼，唱邪歌，以及一般激起淫欲放纵的事物，都被禁止和铲除。饮酒、吸烟、赌博、说谎和咒骂，尤其吸食鸦片，都是以一种丝毫不苟的道德决心予以禁止的。”<sup>①</sup>“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sup>②</sup>宗教虽然是一种非科学的东西，但也是中世纪农民的人生哲学和精神寄托。当偶像崇拜已经不能让他们得到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归宿时，信仰的崩溃便带来了道德的堕落。这时，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权威和力量鼓舞他们向前，而西方传来的宗教适逢其时地被洪仁玕们顺手拿来充当了这个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基督教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作用，说明中国社会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加以改造。

应该指出的是，洪仁玕由于与西方传教士关系密切，视西方人士为朋友、为兄弟，导致他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认识不清，对基督教入华的侵略性一面未能觉察，因而不能鲜明地揭发反侵略的旗帜，有力地指导反侵略的斗争。

太平天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革命随宗教而起，宗教随革命而长，而太平天国的失败也直接导致了拜上帝教销声匿迹。虽然基督教与拜上帝教不是同一个宗教，但是它们却信同一个上帝。因此，拜上帝教的命运，导致基督教在华传教更增加了困难。

## 王韬与早期中西交流 ——以《循环日报》为中心

《循环日报》1874年2月4日创刊于香港。前10年（1874~1884年），该报主笔是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改革思想前驱的王韬，后期因王韬离开香港返回上海，由何冰甫、何雅选继任总编。1941年因日本侵华战争蔓延到香港而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至1947年最后终结，前后出版达73年，是一份历史悠久、名声很响的报

<sup>①</sup>（英）呤喇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sup>②</sup>同上书，第51页。

纸。在王韬主持笔政的10年里,《循环日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可忽视,它的特色可归结为:(1)不遗余力地传播和普及西方知识,推介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2)及时反映中外时局变化,关注世界大势;(3)鼓吹改革,推动洋务新政。《循环日报》在我国第一批由华人自办的报纸中,是经营最为成功的一家,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立场,最早公开提倡变法。过去对《循环日报》和王韬研究,没有注意到它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取向,笔者试图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对该报早期报纸进行研究,以说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在沟通中西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效果。

### 一、黄胜、王韬创办《循环日报》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割让香港与英国,英国随即宣布香港为免税自由港。于是,外洋商船不再靠泊广州黄埔,而是把香港视为中国领海内第一停泊处所,运来的货物先在香港起卸存储,再分运中国各处销售,从中国出口的土货,也多由珠江直运香港,以逃避广州海关的税收。这样,便使得鸦片战争前在广州进行的大量中外贸易被吸引到香港,大量的中国商人、手工业者和雇工也被吸引到香港谋生。加上鸦片战争后20年间广东内地社会动荡妨碍了商业的正常运行,不少华侨和外国商人将其营业机关从广州移设香港以图安全。银行、汇兑、运输和邮政等辅助贸易的业务,也随之迁徙。为了扩大贸易,在港西人开辟了多条航线,使香港与中国沿海各地和东南亚、日本、欧美等地的交通非常便利。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迅速崛起成为南中国新兴的近代商城。

商业发展对信息的需求直接催生了近代报刊业。在欧美一些国家发达的商业城市中,商人们早就有了看报的习惯。在香港,最早创办报纸的是西方人士,19世纪4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报纸可以考察的有9种。1853年后开始有华文报纸出现,但由于都是外国人出资创办的,所以直接反映了外国人在华利益和贸易需求。香港开埠初期,外国商人为主要经济推动力,到了七八十年代,中国商人渐渐发展壮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据资料统计,1876年香港纳税最多的20人中,有12名欧洲人和8名华人;到1881年,香港纳税最多的20人中,仅有3名欧洲人,却有17名华人。3名欧人纳税16038元,17名华人纳税99110元。也就是说,到1881年,在香港最富有的商人中,无论是纳税总额,还是人均纳税额,华商已经超过了西商。<sup>①</sup>很多昔日为西商经营的项目,已为华商所参与或代替。华商的崛起,为中

<sup>①</sup> 刘蜀永:《香港的历史》,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文报纸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客观的有利条件，《循环日报》的创办正好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它是由华人出资，由华人担任主笔和经营管理，反映华人利益和立场的第一家华人报刊。

办报既要资金，也需要人才。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官方严守中外大防的旧习，不与外国人接触，但民间的中外交往却在小事张扬中进行。除商业流通外，西人通过传教、办学等渠道，通往社会下层。一部分民间人士最先接触到西方文化，成为当时不可多得的了解西学的人才。

1847年，西人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带出了3名中国留美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黄胜归国后，先在香港西人所办的《德臣西报》中任职，后在英华书院的印刷局任印务监督。1873年，集资创办了第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印刷厂——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又出资创办了《循环日报》。

王韬原籍江苏吴县，早年上海墨海书馆为西人当编辑。主要工作是为西书的中译作文字的润色和修改。1862年，王韬有通太平天国之嫌受清廷通缉，逃亡香港。他帮助英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为英文，因而得到一个游历欧洲的机会，在苏格兰一住两年多，其间两度赴法国。欧洲之行使他开阔了视野，对西方国家有亲身了解，还养成了关注世界形势变化的浓厚兴趣和习惯。他于1870年著《普法战纪》，及时记录和评述了震惊世界的普法战争。国人争相购阅，还被译成日文。此书的成功使王韬博得“识议宏远”之誉，他已是当时一个不可多得的中西学兼通的名人。他同时也为香港《近事编录》、《华字日报》等报刊撰文，后来还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华字日报》编辑。王韬于办报不但熟悉而且有独到见解，是《循环日报》的灵魂。西方国家以报纸作为舆论工具，起到人民参与国政和监督政府的作用，王韬十分赞赏，决心学习。王韬的改革主张在《循环日报》中大量发表，他以英国为例指出发展工商业对国家强盛的重要作用，又提出仿效英国式的资产阶级立宪政体，这些思想都以“论说”的形式表达出来，使《循环日报》成为中国第一张公开宣传变法的报纸，也是一张以议论见长的报纸。

辅助王韬的其余几个人均是民间穷苦的读书人，其中广东三水人胡礼垣为《循环日报》当翻译，后来成为著名的改革思想家，与何启一起写了不少提倡效法西方改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论文。由于在香港出现了中国第一批了解西学的人才，《循环日报》就在他们的手中诞生了。

## 二、《循环日报》对沟通中西所作的努力

### （一）沟通中西为《循环日报》之要务

近代报刊具有传播社会信息、交流思想文化、表达政治意向的功能。《循环日报》创办时正处于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的早期，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甚少，而西方之强大又使国人很想知道，所以它的创办者们很自然地就把沟通中西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使命。王韬把办报方针制定为“通外情、广见闻”和“博采群言、兼收并蓄”。《循环日报》的评论说：“报中所登之事无非独抒管见以备当事者采择而已。……采录海外事，凡土地之广狭、风俗之强弱、技艺之良苦，言之纂详，必随事随时译而录之者，盖即孙子所谓知己知彼之意也。”<sup>①</sup>《循环日报》的启事说：“本局是用博采群言，兼收并蓄。凡民生之休戚、敌国之机宜、制造之工能、舟车之往来及山川风土祸福灾祥，无不朗若列眉。俾在上者知所维持，在下者知所惩创，此区区之微意也。……其有关中外者必求实录，不敢以杜撰相承。”<sup>②</sup>当时华文报纸对西方消息的编辑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原因是主笔者并不熟悉西方社会和文化，往往详中而略外，且对西方世界的介绍总是不能做得恰当和准确。以王韬对中学造诣之深、对西学了解之广，实具有沟通中西的良好条件，因此《循环日报》认为自己可以也应该成为中西沟通的桥梁。

报纸这类传媒所具有的宣传效应，常使政治家和商人对它青眼有加，因此办报人以政客或商人居多，带有较强烈的功利目的。王韬虽十分关注政治，但自从逃亡香港后，仕进之途已无望，在本性上他也绝非商人，这种在野的文人身份确实有利于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以他为主笔的《循环日报》便有了一种较多地摆脱孜孜言利而包容涵蕴广大的文化气度。过去对王韬的研究，较多注意他的变法言论，实际上作为一个文化变迁的见证人和推行者，他的思想远远越出了这个界线。他的沉潜于变法议论之下的文化思考多姿多彩，这种思考包括他对中国文化的估量、对西方文化的评价以及对中西文化的分析和比较。他不像郑观应那样喜谈经济，不像薛福成那样多言政务，也不像马建忠那么专心外交，他的言论包罗很广，表现了一种宏观的文化变革思想。

① 《日报有俾于时政论》，载《循环日报》1874年2月6日。

② 《本局日报通启》，载《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 （二）栏目的安排和特色

《循环日报》的固定栏目有“香港目下棉纱花疋头杂货行情”、“各公司股份行情”、“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船期消息”、“电报”、“告白”等。除了“京报全录”和“羊城新闻”两栏外，其他栏目中都有西方世界的信息。中外贸易行情、中外商品价格、中外企业股票涨落、国际时事、中外交通、中外言论……翻开报纸，琳琅满目。而“中外新闻”栏目对西方报道最多。

在“中外新闻”栏中，几乎每日有评论1篇，有时不止1篇。该报的评论文章，一般不署作者姓名，只有少数文章署名。后来有一小部分文章收入《弢园文录外编》，世人才知为王韬所作。这个栏目的特点是信息量大、内容丰富、报道及时、夹叙夹议。现以1874年5月16日为例作一统计。该栏共刊登了33条新闻，其中有关外国的新闻18条，占总量的一半以上。报道的有美、英、日本、高丽、俄罗斯、荷兰和阿比西尼等国，中国国内则有香港、澳门、广州、佛山、上海、京师、台湾和烟台等地。内容有灾害报道、商业消息、交通消息、社区新闻、国际关系、华侨情况、科技新知、宗教节日、婚嫁异事、科举考试、旅游、教育、法制、医学、洋务、罢工、缉私、慈善等，内容丰富多彩，有闻必录。不少新闻在最后还加上几句评论，申述编者的观点，影响读者的思想和社会的舆论。

“告白”一栏对宣传和推介西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也非常积极。如1881年4月19日有一则新书告白：“启者，《地理全志》一书本为前人所著，早已风行海内，谈洋务者莫不仰之如泰斗，奉之为南针。惟近世各国局面一新，古今异辙，惜此书作自咸丰初年，故于时事不无遗缺。今本堂特请梁柱臣、区奉持二君详细校订，从新刊印，举二十年间大小列邦事无巨细概已补入。并有风雨界图、山河里数图及五大洲各国界限图，一一叙列明晰易于稽查，共订二本，白纸价银一圆五毫，赤纸一圆二毫。如蒙赐顾，在港请至九江巷口文裕堂，在省请至沙基大街福音堂购买可也。”另一则告白是这样：“屈臣氏大药房采选妙药精制各项膏丹丸散……另有泰西各种奇巧制药器皿玩器杂物发售……溯洋人在中华卖药者固以本药房为始创第一家，即中华向洋人购药者亦以本药房为最驰名，所制之戒烟精粉风行各省外埠，迭蒙列位大学士督宪抚宪各大人分验著效，陆续赏赐匾额。前经布告，谅邀洞鉴……”类似的西书新书、西医西药、洋枪洋炮、西方工业品等广告每日均有好几则。可见，及时传递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信息也是“告白”栏的特色之一。

## （三）全景式的西方世界扫描

因痛感中国不了解西方所造成的危害，《循环日报》对西方的介绍不遗余力。

通观它开始 10 年的报纸可见，它对西方世界的介绍是全景式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声光化电，无所不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宗教和民俗及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而且做到“随事随时译而录之者”。对西人言论也不时加以选登，以收兼听则明之效。这些做法对开通民智的作用极大。以下略举数例：

政治方面有：《英开议院》（1874 年 2 月 9 日），《西人论日本新政》（1874 年 6 月 1 日），《西报论中国当一变》（1874 年 12 月 29 日），《日本拟裁减官员三分之一》（1880 年 2 月 20 日），《日民（日本人民）要求行泰西选举议政局员之例》（1880 年 4 月 5 日），《英国党人考》（1880 年 4 月 15 日），《美举总统》（1880 年 5 月 29 日），《美邦官制》（1881 年 2 月 9 日），《合众国总统加非路被刺颠末》（1881 年 8 月 4 日）。

经济方面的有：《印度种茶代烟》（1874 年 2 月 9 日），《英国验茶新章》（1874 年 7 月 29 日），《西国招工月给佣值甚优，较之贩人出洋相去霄壤矣》（1874 年 5 月 27 日），《中国宜亟设电线论》（1880 年 3 月 12 日）。

科技方面的有：《西人李毕士利用光学原理改进照海塔灯》（1874 年 5 月 26 日），《英国现造一铁甲战舰巩固非常，能载 8 000 多吨，机器可抵 7 000 匹马力》（1874 年 5 月 27 日），《美国新法水雷》（1874 年 6 月 1 日），《英国炮台新法》（1874 年 6 月 24 日），《自西人创设电线而信息通传千里，有如咫尺》（1880 年 2 月 20 日）。

军事外交方面的有：《甲戌日本侵台事件连续报道》（1874 年 5 月~10 月），《俄国朝廷主动与欧洲各国厘订公法》（1874 年 6 月 5 日），《泰西各国之例，凡简派公使驻扎其都者，得以随时瞻觐》（1874 年 6 月 5 日），《论法图越南》（1880 年 2 月 20 日），《日本军饷总数》（1880 年 3 月 12 日），《英近日与日耳曼订立约章》（1880 年 4 月 2 日），《俄廷拟筑炮台于黑龙江之西部》（1880 年 5 月 29 日）。

风俗文化方面的有：《普鲁士禁天主教》（1874 年 2 月 9 日），《英国新婚俗例》（1874 年 3 月 2 日），《西国角力之戏》（1874 年 3 月 26 日），《美国纽约州地理形胜》（1874 年 5 月 25 日），《俄王嫁女之盛会》（1874 年 5 月 27 日），《英律禁止买卖婢女》（1880 年 2 月 17 日），《论港督振兴文教》（1880 年 2 月 17 日），《日人注意舟车，横滨议设马路》（1880 年 4 月 5 日），《埃及古迹》（1880 年 5 月 29 日），《西国日报之盛》（1880 年 7 月 28 日），《檀香山考》（1881 年 3 月 12 日）。

这种全景式的世界扫描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对“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旧观念起到了强烈的冲击和潜移默化的转移作用。

### 三、《循环日报》的文化观念及其影响

在中国和西方接触的早期，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争论



和排拒。王韬通过《循环日报》以自己独到的思想言论，提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看法和中西文化融会的新思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一）“外患之来适足以强中国”的化害为利思想

1840年和1856年发生两次鸦片战争后，1874年又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日本在“明治维新”初见成效后迅速向外侵略扩张，中日矛盾激化，冲突频繁，对抗尖锐。中国人在开展反侵略斗争的同时，排外情绪也高涨起来，不能正视西方的先进和主动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循环日报》常发表“卧薪尝胆、化害为利”的言论，力劝国人改变对“夷狄”传统观念，弃旧图新，以西方文明来改造落后的中国。1874年7月27日，《循环日报》评论西人观点时说：“《西字日报》云，日本用兵于台湾，久留不去，其与中国盖岌岌乎有将战之势矣。……中国必当益整其海防倍精其兵法，将来或与欧洲诸国构衅启争。”文后的评论写道：“呜呼！外患之来适足以强我中国耳，惟西人之有此言则我之励精图治益不可缓，此正天所以提撕警觉我也。”希望中国从战争中得到警惕，并把战败当做上天的考验，抓住机会，学习先进，迎头赶上，把祸患化为动力，把危机转化为振作的时机。

### （二）中西文化互有优劣的文化互补思想及中西融合的世界趋同思想

1874年12月某日《循环日报》刊登了一则外国评论，题名为《西报论中国不能变通》，其观点十分尖锐，颇有振聋发聩的力量。文中批评“中国儒者既泥古而不能通，今其一切法度律例又但知守旧而不知从今，动以祖宗之成格不可不遵，圣贤之前规不可不守。……即有新奇之法绝不思一为仿效，漠然视之。……故民间有奇才异能之士于西国之格致器艺奇技绝巧，其所制作可以裨益中国，而官吏闻之非惟不为之助反为之制，以为是辈欲取利耳。于是有忠之士怀才莫试，不得一展其所长”。又说：“中国遇有新法可获利者则必妒忌之，以为孔孟之书俱在，未尝教人熔取金银以获利也，凡市利者则目之为鄙夫。”西人对此种观念甚为骇叹，认为是中国前进的巨大阻力。《循环日报》借西人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写下了编者按语：“以上皆西人所云，其言亦有中肯者。”<sup>①</sup>对西人批评中国儒者重义轻利、守旧不变的意见表示赞同，对守旧儒者阻挡社会前进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鞭挞。与此同时，王韬又以署名文章指出，中国文化与西方不同，中国重精神道德，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往往包容改造了武力征服中国的外族。以柔克刚，这是

<sup>①</sup> 因该年12月的《循环日报》无存，12月的三则评论被上海《申报》转载，故此文转引自《申报》1874年12月22日。

中国文化的优越之处。他说：“我中国收效之法，无欲速，无见小利，能以至柔克至刚。初视之若以为无用，而久之且为其所化而不知。呜呼，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西国特偏于器之一端耳。将来六合之中其道大同，东西合一，四海相通，其时齐强弱、无大小，亦安有彼此之异，西人抑何所见之小也。”<sup>①</sup> 王韬认为中西文化的趋同融会是历史趋势，天下各国将来必齐强弱无大小而归于大同。中国文化的“道”与西方文化的“器”是各擅所长，“道”与“器”相结合会达到东西合一、四海相通的新境界。而西人不知中国文化的精髓，其见识是不够远大的。

### （三）天道循环、人事变迁的进化思想

在上述评论发表后不久，《循环日报》又继续发挥自己的文化见解。王韬以自己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指出，中国目前虽弱，但弱是可以改变的。由弱变强，合于天道循环之理，中国自不必灰心丧气。他说：“苟以目前观之，则强弱之势似已形见，然强弱之机，弱即强之渐。普国昔常受制于法，而勃然以兴不过十数年间耳，是岂英、法之所及料哉！他若意大利以盟主而中衰，俄罗斯以地广而骤成，或日本改法而自强，暹罗求新而图治，皆数十年中事也。……似乎数十百年以前，英可以纵横于欧洲，至今日而地大物博仅思以自保。虽人事使然亦天为之也。天之所兴不能废，天之所亡不能存。不观乎罗马盛于汉，荷兰盛于唐，西班牙盛于宋，葡萄牙盛于明，而今竟何如？今日者西人之轻我中国也甚矣，每挟其所长以凌我。呜呼，是但知目前而已，未能默察天心，静观人事，由后而验前，由古而征今也。……道无平而不陂，世无衰而不盛，屈久必伸，困极必亨，此理之自然者也。”<sup>②</sup> 正是这种世事变化无常、国家盛衰相继的宇宙循环论支持着中国的改革者们，使他们对于中国前途抱有信心和希望。

《循环日报》创办不久，即引起世人注意。上海著名华文报纸《申报》及时报道了其创刊的消息，表示祝贺。《申报》在介绍《循环日报》时称：“披阅之余则见闻广大，笔墨精雅，正主笔乃是王紫铨先生，其余帮办想亦皆属积学名士，故能识见高明，文藻渊博。”<sup>③</sup> 次日，即转载了《循环日报》的《荷兰战争亚全》一条新闻。并且在日后不断地转载《循环日报》的新闻和评论，认为它是中国南方的舆论重镇。《申报》的推重，扩大了《循环日报》的影响。

<sup>①</sup> 因该年12月的《循环日报》无存，12月的三则评论被上海《申报》转载，故此文转引自《申报》1874年12月22日。

<sup>②</sup> 见《申报》1874年12月23日。

<sup>③</sup> 见《申报》1874年2月13日。

《循环日报》当时的销路，现在已无法确知，但从其订售点之多，可以想见。1874年5月20日刊登的《中华印务总局告白》称：该报“在国内各省会市镇及别府州县并外国诸埠，凡华人驻足之处，皆有专人代理销售业务”。订售点分布在广州、澳门、佛山、东莞、厦门、福州、牛庄、京都、日本横滨、安南西贡、新加坡、旧金山、新金山、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以及日本长崎和神户等，总计订售点有30多处，在广东的订售点有9处，可见其销售网络相当大。当时国人对报纸不甚关注，但《循环日报》创刊后，其无隐无饰、直言不讳的作风和客观及时的报道，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创办中途，“各埠士商报名取阅者源源而至”<sup>①</sup>。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以报纸这种方式对人民大众进行西方知识的普及，《循环日报》是走在全国前面的，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 容闳：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1850年的耶鲁大学，可能不似今天的显赫和具有世界知名度，但在这一年，这里发生了一件至今令中国人难以忘怀的事情——它吸收了一名中国青年进校读书。这个青年来自广东香山县，名叫容闳。正是这个受过耶鲁大学熏陶的青年，20多年后，以中国官方代表的身份带领120名中国幼童横渡太平洋，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河。江泽民主席1997年访美、胡锦涛主席2006年访美，都特别提到耶鲁大学和容闳的名字，并以此作为中美人民200多年友好交往的光辉例证。

### 一、走进耶鲁大学

容闳（1828~1912年），是南海之滨（具体地点是今珠海市的南屏镇）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到了7岁上学的年纪，他的父亲连送他进私塾读书的学费都几乎交不起，是什么机遇使他进入美国的大学读书？今天的人可能想象不到，晚清时期到外国读书是非常冒险和无奈的事。因为贫穷，容闳才被他的父亲送到基督教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这种学校不收学费且供食宿）。而因，为想找到一份买办或通事

<sup>①</sup> 见《循环日报》1874年7月4日。

之类薪水较好的职业，容闳在马礼逊学堂毕业后，家人又同意他跟随他的老师布朗博士赴美求学。在鸦片战争前后，这并不是令人羡慕值得炫耀的事情，相反，在交通极其落后的年代，远赴异邦骨肉分隔的痛苦、漂洋过海艰难险阻的旅途、背井离乡人地生疏的困窘，都使国人把出洋视为畏途。

但是，容闳毕竟是受过9年西式教育的人，观念更新，眼界比一般人开阔，在教会学校读书时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意想之纽约游》，对神奇的西方世界充满了求知的渴望。1847年，他终于到达他向往已久的纽约。

麻省的孟松学校是美国当时最好的预备学校，布朗博士为他和另外两名学生黄宽和黄胜办好了入学手续，他心地善良的母亲则当了他们的监护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两年后，容闳决心继续留在美国求学并把考入耶鲁大学作为努力目标，他对渴望他尽快回乡挣钱养家的母亲说出了这个愿望，请求她的谅解。容闳说：“自从来到这个国家，我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英语，到去年冬天又学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以求符合大学的要求。”<sup>①</sup>

入学考试可以凭自己的努力，但学费如何筹措呢？孟松学校有一种为贫困生设立的奖学金，但受到资助者必须签订一个合约，承诺毕业后当一名传教士。容闳拒绝了，他认为传教并不能使他为他的国家谋取最大的福利。幸好，布朗博士想方设法为容闳争取到一个妇女协会的帮助，终于使他如愿以偿。

作为耶鲁大学同时也是美国大学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学生，容闳的表现令人钦佩。他的同窗好友白博士在60年后还以非常欣赏的口吻对他的学生、留美的胡适说：开头，容闳的异服异俗颇受人笑，但他两次在班上的英文比赛中得到一等奖后，便无人敢于揶揄他了。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背后拖着一条小辫子的容闳很快就成为校园人物。容闳内心却是孤独的，对家乡和祖国的思念时时煎熬着他。他托人带信给正在中国办报的美国人卫三畏，央求他把中国亲人的信息告知，他说：“我已经好久未得到家中的消息了，我的母亲是否还在人间？请写信告诉我一切重要的事情。”<sup>②</sup>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内乱蜂起的消息更使他心情沉重，坐立不安。他说：“我要使我们的下一代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到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sup>③</sup> 容闳在美国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后，认为复兴中国的道路要从学习西方开始，这种认识在

① 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② 1852年12月30日，容闳致卫三畏牧师英文未刊信稿，现藏耶鲁大学图书馆，转引自高宗鲁《容闳与中国留美幼童》，载《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③ 容闳：《我在美国和中国生活的追忆》，王蓁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3页。



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无人能及，在国人对美国和世界知之甚少的年代里，容闳是真正了解美国和西方的第一人，沟通中美文化的历史重任落在他的身上绝非偶然。

1854年，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因为有容闳这位大清帝国的子民而显得颇为轰动。人们远道而来观礼，知名学者布什内耳特地从哈特福德城赶来，为的是结识这位在报刊上谈论中国问题的青年。从容闳的毕业照可见，他已经剪去了辫子，外表完全西化，因居留美国已久，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而他在中国除了卑微的亲属之外，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记了，他的前景是黯淡的。他也并非不想留在美国，但是正如他的好友吐依曲尔说，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不会让他图私自利，不管前途如何，他还是决心回去。

## 二、艰难的破冰之旅

1855年，思乡深切的容闳带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回到了久别的中国。从这一年归国到1872年他带领首批留美学生重新走进美国的校园，整整经历了18年之久，其中的艰难曲折，恐怕他从耶鲁毕业时是没有料到的。在深闭固拒、守旧盈廷的晚清，一个平民百姓，要说服政府往外国派出留学生，几乎是痴人说梦。

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容闳就目睹了一场血腥大屠杀：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镇压响应太平天国的陈开、李文茂起义。政治的动乱，使他无法提出自己的教育设想。1855~1863年，他先是在香港高等法院当译员，后到上海海关当译员，又曾在英商公司为书记，都为时甚短，经常失业。在动荡、漂泊无定的生活中，他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广州刑场上目睹叶名琛滥杀7.5万余多人的兽行使容闳认为，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残暴的清王朝。1860年，他走访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向干王洪仁玕陈述了包括政治、军事、实业和教育等7点建议，因为与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一致，他还提出以基督教的圣经取代中国伦理道德。洪仁玕很重视他的意见，但当时太平军正在打仗，无法实行。经过观察和分析，容闳对太平天国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产生了怀疑，终于没有接受洪仁玕授予他的“义”字四等爵封号，失望地离开了天京。

为寻求实现理想的依托力量，他在1863年进入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府。曾国藩网罗容闳的目的是想办军械所，所以容闳只好把自己的打算暂时收藏起来，为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值得一提的是，他成功地说服曾国藩把引进机器母机作为创办工业的起点，使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少走了一些弯路。1865年机器运回中国，筹建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机器工厂——江南制造局。容闳因精通西学而为曾国藩所器重，但要说服清政府接受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就不是那么容易了。1868年，容闳首次向洋务大员丁日昌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设想，得到丁日昌的大力支持，但丁的条

陈却被“留中不用”。当时洋务派正遭受守旧派的攻击，其中一条罪名便是“以夷为师，可耻孰甚！”

容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曾文正（曾国藩）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sup>①</sup>所以，他对曾国藩没有失去信心，只是静待时机。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容闳充任译员随丁日昌到天津协助曾国藩处理教案。中外冲突虽暂时平息，但民心难平，民情汹汹。容闳再次向丁日昌提出留学计划，并以教案为例说明中西增加了解、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也许是痛感中国积弱不振，极须培养军事科学人才，在丁日昌的游说下，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入奏派遣留学生，很快就得到皇帝批准。

10多年怀抱的志愿终于实现，容闳惊喜交集，夜不能寐，他写道：“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sup>②</sup>并预言，此事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开一新纪元。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美国驻华公使卫三畏对此均表赞许。作为容闳的老友，卫三畏很高兴看到容闳多年的努力终于初露曙光。威妥玛则对李鸿章说：“英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派往。”伦敦、纽约的报纸很快就报道了这件新鲜事，对清政府的开明举动，表示欣喜。

容闳在写给自己的老师、耶鲁大学校长波特的信中郑重地谈及中国政府的意图：“派遣幼童赴美接受完整教育，以备将来在中国政府各部门服务。——他们不得入美国籍，或留美不归，也不得中途退出自谋他业，因为他们是官费学生，正如西点军校和海军官校学生对美国政府有应尽的义务一样。”<sup>③</sup>

1872年8月11日，詹天佑等第一批30名幼童奉旨钦赐官学生，穿上了官式丝绸长袍，束装就道，于9月12日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 三、边缘人的困厄

容闳是中国第一位获得美国著名大学学位的留学生。他在澳门和香港的教会学校读书9年，赴美留学8年，系统接受西式教育共17年。知识结构和道德观念已于此时定型，可以说是全盘西化。1854年大学毕业后容闳回到中国，其间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至1912年在美国去世。在这58年的日子里，有26年生活在中国，37年生活在美国，可以说是一个中美两栖人。

他崇尚美国文化和制度，信奉基督教，早在1852年就归化为美国公民，后来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91页。

③ 1872年2月17日，容闳致耶鲁大学校长Noah Porter未刊信稿，现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又娶美国女子为妻，视美国为其第二祖国。同时，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始终保有一颗中国心。但他的洋学生出身，使他很难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特别是介入清政府的权力结构之中，甚至难以得到某些权势人物真正的信任、接纳和支持，这对他的事业是一个严重的制约。虽然他手订留学计划，但由于没有科举入仕的背景，只能充当副职。首任出洋肄业局正监督是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他没有出国经历，对西方世界十分陌生。接任者也都是“中国饱学之文士”。李鸿章认为，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sup>①</sup>。

当容闳第一次回国时，在香港的海域上，竟不能用中国语说出“暗礁”和“沙滩”，自己也颇为尴尬。后来不得不花半年时间向一个外国传教士学习粤语。由于他的中文根基甚浅，日后他的条陈基本上请人捉刀，而其生平自传《西学东渐记》也只能用英文写成。虽然如此，他对晚清政治的黑暗腐败、官场的贪渎无能、人民的愚昧无知，感受却比别人痛切，提出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思想也为国内最早。由于对美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教育有较多了解，他多方面地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具体设想。而他的大多数设想落空、行动失败，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也和他的边缘人身份有关。

幼童留学方式及其实施对保守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激进了，引起很大的争议。因而，它不断地遭受来自各方面的猜疑、干扰，甚至破坏。不但守旧派认为幼童“抛荒中学”、“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学成亦不能为中国用”，连号称洋务干才的驻法公使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也说：“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国家无大益也。”<sup>②</sup>与容闳共事的历届留学事务所正监督囿于狭窄的知识范围和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幼童的游戏、运动、剪辫、信教等西化倾向统统视为大逆不道，攻击不遗余力。容闳和他们激烈地争论多次，结局是李鸿章命他不要固执己见，对幼童也不必多管。从此，正监督吴子登把持了出洋肄业局。吴对幼童的越轨行为十分震怒，说：“若令其久居美国，必至全失其爱国之心。”<sup>③</sup>他和陈兰彬都力主解散出洋肄业局，撤回留学生。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掀起排华浪潮，中国留学生要求进入军事学校也遭到拒绝。这使清政府感到花费如许金钱送学生出洋殊为不值。1881年，朝廷谕令4批共120名留学生全部回国，其时只有詹天佑、欧阳庚从耶鲁大学毕业，其他学生都正在各大、中学就读。中途退学，不论对学生本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905~1908年）印行，第34页。

② 曾纪泽：《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损害。

留学计划中途夭折，容闳一生的梦想归于破灭，不由仰天长叹：“苦心孤诣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是我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可行的办法。随着 120 名留学生的召回，我的教育事业也从而告终。”<sup>①</sup>

虽然如此，令容闳稍感欣慰的是，120 名幼童回国后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工作，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贡献突出。其中有“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邮电业奠基者朱宝奎、黄开甲、周万鹏、唐元湛，中国第一代矿冶工程师吴仰曾、邝荣光，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中国第一代海军将领容尚谦、蔡廷干、徐振鹏，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唐绍仪、梁敦彦、梁诚……这些事实证明，容闳无愧于“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

#### 四、“从头到脚，他身上每一根神经都是爱国的”

容闳的报国之心，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已经树立。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回忆当时立下的志向：“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用，不必遂大有为，或亦不难造一新形势。”<sup>②</sup> 所以当留学计划横被摧残之后，他仍然始终如一地关注着中国的盛衰安危，尽管他已经不再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

1883 年，正在中国述职的容闳因为美籍妻子病重而返回美国。1886 年，爱妻病故，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容闳“以严父而兼慈母”，尽心尽力抚育儿子健康成长。在幽居的日子里，容闳心系故国，郁郁寡欢。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容闳写信给他的旧相识、时在主战派张之洞幕下效力的蔡锡勇，提出一个向英国借款募兵购舰与日决一死战的建议。张之洞决定委派容闳赴伦敦筹借款项，容闳当即赶往英国。正在洽谈之际，借款之事被李鸿章否决，张之洞奏保容闳归国效力。容闳把张之洞的电召看成是祖国的召唤，心潮澎湃。他把两个正在读中学和大学的儿子托付亲戚朋友照管，毅然归国。

1895 年，阔别祖国 13 年的容闳回到上海。此时，中国已经战败并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容闳有关自强新政的建议也因太新、太激烈而未得到张之洞的采纳。容闳并不气馁，他与留学归国的黄开甲合作翻译了美国的《国家银行法》等一批书籍，携书北上赴京寻求财政大臣翁同龢、张荫桓的支持，又呈上《铁路条陈》，倡议成立铁路公司，设立铁路学堂，引进外资修建铁路。他的主张得到一些开明人士的支持，却遭到心怀叵测的人恶意攻击，终于流产。容闳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治腐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自序》，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自序》，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 页。

败，认为不改革政治体制不足以救中国。1898年，“百日维新”发生，改革风潮遍及京师。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康有为、梁启超认为“容纯甫（容闳）非常才人也，可以为胜、广（陈胜、吴广）”，容闳的寓所成了他们秘密集会之地。当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发兵勤王之夜，梁启超便在容的寓所等候消息，后来得知袁不能举兵清君侧，才决定避走日本。戊戌政变发生后，容闳因有涉案嫌疑，逃到上海租界避祸。

在“托迹租界”的日子里，容闳并未停止谋求维新的政治活动。1900年7月20日，他与维新人士唐才常等组织“中国国会”，被推选为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自立军的对外文告，明确宣告要建立一个立宪政府，废除慈禧太后及其老朽顽固派，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予之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勇气。自立军起事失败后，容闳被通缉，不得不逃亡日本、隐居香港，最终被迫回到美国度过他一生的最后10年。

对清政府完全失望的容闳决心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邀请孙中山到美国，请军事家荷马李和财政家布恩与孙中山会谈，商定发动起义的事宜，给了孙中山极大的鼓舞。不幸，筹划中的“红龙计划”因为筹款无着而搁浅，容闳也病倒了。1912年年初，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83岁的容闳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立即写信给香港的爱国华侨谢纘泰，请他代为向孙中山致贺，并说：“我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sup>①</sup>孙中山热诚邀请容闳归国辅政，称他为“老同志”。但是邀请函寄到美国时，容闳已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于1912年4月21日病逝，终于未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祖国。在他死后，他的两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儿子遵循他的遗愿，先后回国服务。

容闳是一位为中国近代化开辟道路的先驱者，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美国牧师吐依曲尔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律学校演说中，以诗一般的语言赞美容闳：“从头到脚，他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山河和伟大历史。”<sup>②</sup>

<sup>①</sup>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页。

<sup>②</sup>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 郑观应研究

### 一、坐言起行的革新者

郑观应（1842~1921年），广东香山县雍陌乡（今中山市三乡镇）人，晚清著名实业界前驱，中国近代改革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经营实业达60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企业管理经验。他首发商战思想和开议会的民主建言，洞见治乱之源、富强之本。其重要著作《盛世危言》开启了国人心智，也直接启迪了日后成为伟人的两位青年：孙中山和毛泽东。

#### （一）从洋行买办到洋务干才

1882年3月，原本在上海著名英资企业太古轮船公司任总买办的郑观应，正式接受清政府洋务大臣李鸿章的委札，出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帮办。从外资企业转入洋务企业，对41岁的郑观应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也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郑观应17岁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进入外国洋行当杂役，“供奔走之劳”。凭着勤奋刻苦和过人的才智，升迁迅速，不几年间便身居要职。19岁，受雇于英商宝顺洋行，正式当上了买办；26岁，与同乡大买办唐廷枢等人共同创立华洋合营的公正轮船公司；28岁，与好友卓子和开办和生祥茶栈，成为东家；31岁，出资10万两白银经营盐业，并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33岁，被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聘为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相当于总买办。1878年，当他还是太古公司总买办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会使他与李鸿章相识。由于别人的举荐，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委任他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使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厂，后又升为总办。郑观应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它具有经营近代企业的经历、知识和才干，其次是他极力主张引进机器生产。但是，郑观应以洋行买办的身份出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似乎令人不解。因为洋务派举办民族工业其中一个目的是与洋人争利，一个为洋人服务的买办如何能两头兼顾呢？其实这是洋务企业初办时必须借助外才的表现。郑观应熟悉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又了解外国机器技术水平和商业行情，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科学技术，为洋务企业借鉴外国提供方便。更重要的是，郑是中



国人，了解国情，有振兴中国的志向，乐意也能够办好中国自己的企业。所以，对于买办也要具体分析，不要一言蔽之，说他们都是洋奴。不过，由于买办一职毕竟与洋务要员的身份发生矛盾，所以郑观应“一仆二主”的身份在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必将发生转化。

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提出了效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新型工商业以致富强的救国之策。在洋务派的主持下，中国开始有了第一批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炼铁厂以及矿山、铁路、电报等近代企业。这些企业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对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郑观应是最早参与这个求富求强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是好几个重要企业的开拓者。

1881年，已经在多个洋务企业中担任要职的郑观应，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明年，他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工作合同期满，是续订合同继续留任还是离开太古全身投入洋务企业？他该何去何从？

这年夏天，名闻中外的洋务大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和会办徐润已经向他发出邀请，说由于招商局生意扩充，急需人才，乞请郑观应帮办局务，专管揽载事宜。其实，这是在他们背后的官方主管李鸿章和盛宣怀的主意。而另一方面，太古公司的总经理冷士惟恐郑观应被招商局拉走，不但极力挽留，而且做出“在太古工作20年以上，年老退休准给半薪养老”的承诺。显然，双方都在争夺郑观应。对郑观应来说，像从前那样一脚踏两船是不可能的了，只能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他的思想斗争异常激烈：他具有振兴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志愿，加入轮船招商局可以实现他的志愿，但由于深知洋务企业的弊端，又使他对能否实现这个志愿抱有怀疑。当然，其中也掺杂了对个人境遇和前途的考虑以及对两种不同的企业经营方式、人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适应程度的考虑等。老实说，他对洋务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充满了疑惧，他说：“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sup>①</sup>太古是英国的商办轮船公司，经营方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没有长官意志和衙门作风，又按合同办事，只认个人才能不认私人关系，使他感到放心。而招商局目前虽然也器重他，如果有朝一日官僚们“误听排挤者谗言，不问是非，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任意黜陟，调剂私人”，自己平日不善钻营，届时有谁来为自己说话？想来想去，不能决定。

在这几年之中，郑观应在官方洋务企业中介入很深，任职高，事务多，与李鸿章、盛宣怀的关系日益密切，所以一旦李鸿章出面邀请，他是很难拒绝的。1881

<sup>①</sup> 郑观应：《覆津海关道郑玉轩观察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9页。

年9月，李鸿章把郑观应之父郑文瑞及郑氏全家的赈灾义举上奏朝廷，恳准写入广东省志和本县志书，“以示优异”，使郑观应“感悚交集”。李鸿章为郑氏家族奏请朝廷封赏，这个天大的恩遇使犹豫不决的郑观应最终决定加入轮船招商局，为朝廷效忠。

从太古公司转入招商局，对郑观应的意义非同小可。不管个人的得失如何，这是 he 从一个洋行买办转化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的关键一步，是一心一意地把他的富强救国理想付诸实践的重要一步。经过以后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他终于成为一个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贡献重大的企业家。

轮船招商局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洋务企业，惟有这个企业有力量与外国轮船公司在中国的江河海面上—争高下，为中国航运业挽回一些利权，可以说它是与外人商战的一个重要阵地。郑观应进入轮船招商局时，正值招商局与“怡和”、“太古”两家外国轮船公司削价竞争白热化之际。两家洋行大打减价战，低价招揽客户，招商局生意被抢去不少。受此打击，招商局股票价格急剧下降，100两白银一股的票面，在1879~1880年时曾涨到140两，而今却跌至30多两。郑观应—入局，就面临着解救这个困局的难题。他使出浑身解数，倾力协助总办唐廷枢与洋人休战讲和：不能再打下去了，目前谁也吃不了谁，还是坐下来谈吧。

郑观应刚从太古洋行出来，自然对太古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为唐廷枢的决策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意见。谈判主要是实力和智慧的较量，洋人不是容易对付的，三方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整个过程是艰难曲折的，从开谈到最后达成协议，经历了近两年时间，1884年年初终于签订了为期6年的齐价合同。这个齐价合同使招商局在摊分水脚中占了较多份额。生意稳定了，股票由此大涨，面值100两的股票，市场价格由30两升至160两。这次谈判成功地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免于被外国公司打垮的命运。郑观应又拟定了招商局救弊章程16条，对整顿内部也卓有成效。由于他在经营企业方面的卓越才干，1883年12月，他被李鸿章任命为招商局总办，登上了事业的巅峰。

### （二）商战重于兵战

“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商战重于兵战”。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郑观应对于抵御外来侵略有了深一层的见解。

虽然提出与外人商战，但是中国力量很薄弱，如何战胜对手？郑观应很清醒地意识到，要用保护国家主权的办法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比如，对于长江等内河的航运权，开放与否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与其让外国船进入长江与我争利，还不如订约时把长江航运权收回，自己“独擅其利”。他提出商战的三个战略是：中西可共

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擅之利，思何以分之。

在开创中国电报事业中，他与盛宣怀携手，成功地夺回了中国自办“陆线”的权利。

电报是19世纪通讯方式的重大革命。1844年，美国科学家莫尔斯发明了电磁电报和莫尔斯电码，这项新的科技成果马上被应用到经济生活和军事设施之中。但在19世纪60~70年代，当英、美、法等国向清政府提出要在中国架设电报线的时候，却引起朝野极度不安。还在依靠“八百里快递”传递圣旨的清廷休于电报神通广大，无法匹敌，一次次地拒绝了外人要求。但西方列强岂肯善罢甘休，在他们软硬兼施之下，清政府只好同意他们在中国沿海口岸城市铺设电报水线（即海底电缆），但明确规定“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因为，当时中国尚不能自己兴建电报，外国人捷足先登，对中国甚为不利，只能消极地加以抵制。

19世纪70年代初，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沙俄的支持下，把电报线从中国东北海參崴下海，先铺到日本长崎，再由长崎伸到上海吴淞口，最后到达位于上海外滩的大北电报公司的房子。清政府在外国的淫威之下，不得不允许大北电报公司在吴淞口外设置趸船，在船上收发电报。也就是让他们设立海上电报房。这与广州的鸦片走私贩子把仓库设在海上同出一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不久，大北电报公司又出诡计，从香港铺设了一条水线到达吴淞口，先把水线牵上一条轮船，又把轮船停靠在长江口外的小岛旁边，再偷偷地把水线引上这个小岛。在岛上盖了一间小屋，这便是他们的第一间陆上电报房。过了一段日子，看到清政府无甚反应，又把水线偷偷拖进黄浦江，在浦东上岸，建立了第二个陆上电报房。清政府还是没有动静，他们得寸进尺，居然又把水线引上了外滩。此外，在厦门也如法炮制，把水线引上了海滩电房。

英国大东电报公司见了眼红，也如法炮制，在中国沿海架设水线，并企图将水线从香港引入广州沙面上岸。

在外国势力步步进逼的面前，中国政府将何以应对？

1881年，李鸿章上书奏请创设津沪电线（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以通军报。奏准后，派盛宣怀为津沪电报局总办，郑观应为“驻沪照料验收大北公司代购材料及分运各处事宜”，襄理局务。郑观应协助盛宣怀，挑起了创办中国电报业的重任。

盛、郑接下办电报的差使后，首先想到的是，要为中国电报业争取生存空间。因为继丹麦、英国在华铺设水线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想“利益均沾”。如果听任他们发展，中国电报业将无利可图。这样，摆在盛、郑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便是与洋人交涉：不能再让他们把水线弄上岸，已经上岸的要坚决拆除，以保障中国办内

陆电线的自主权。这事难度很大，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因不谙时势、不懂外交、虚骄蛮干，对外交涉处处挨打、节节败退，洋人气焰万丈。所以盛宣怀曾说，创行之始，人皆视为畏途。这是一场硬仗，没有政治智慧、外交手腕和个人胆识还真不行。

郑观应很早就知道，与洋人谈判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国际公法，以法律为武器才能迫使洋人服从。盛宣怀作为官方代表，拿出了清政府在1870年的规定，即“外国电线只能沉于海底，不能牵引上岸”，责令大北电报公司拆除其非法设置的上岸之线。大北电报公司违规严重，拿它开刀是必然的。但大北公司岂肯就范，还仗势欺人，虚声恫吓。盛宣怀不为所动，决不退让。他知道如果这块硬骨头啃不下来，以后就别想吃电报这碗饭了，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将接踵而来，争分一杯羹。盛宣怀谈不下来，就由郑观应接着谈，轮番上阵。郑与上海洋人熟悉，加紧咨询有关法规，得到一本《万国电报通例》，如获至宝，马上找人翻译出来，使之成为谈判桌上的利器。郑观应坚信，援引国际公法反复辩争，百折不挠，对方虽然狡滑，亦当无词以对。经过顽强的斗争，大北公司词穷理屈，只好同意拆除吴淞口到外滩的旱线，但拒绝拆除厦门旱线。郑观应侦知厦门海滩在1872年被洋人以极低的租金向当地政府租用，便请厦门官方与丹麦领事和丹麦公司商谈赎买事宜，出钱买回了厦门旱线。

由于制止了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水线上岸，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也就打消了香港水线在广州上岸的念头，这一个回合的斗争胜利了。

在与外国公司斗争的同时，郑观应还考虑如何与外国公司协调和合作。因为海底电缆是大北和大东两公司的，外洋电报和国内与欧洲的电报畅通与否，均掌握在两家公司手里。况且中国陆线也要与水线接通才能运作。郑对李鸿章陈说利害，建议“与其三家交情均坏，不如中、英、丹公司联络一气，免致参商”<sup>①</sup>。于是，盛宣怀又去找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谈条件，大家划定势力范围，分割利润。最后，还签订了“齐价合同”。既斗争又妥协的策略，使中国电报业在列强竞争之世争得一席之地，形成了中国境内电报三分天下的局面，而中国则牢牢抓住了陆电主办权。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个很大的胜利，是值得举杯庆祝的。

1881年5月，郑观应受李鸿章札委出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这是个关键的岗位，可以说上海分局的实际地位比天津的总局更重要，由此可见李鸿章对郑观应的器重。

津沪电报由于有军事上的需要，调用了军饷作为第一期的资金，工程进度很

<sup>①</sup>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3页。

快，天津到上海一线 1881 年 6 月动工，当年 12 月便告完工，在洋务企业筹建工程中堪称效率最高的工程。这除了资金到位快的原因外，盛宣怀、郑观应在洋人面前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津沪电报建成之后，郑观应立即呈请架设长江、闽浙等处电报，以利商务。经过清末 20 多年的发展，“电报商线纵横数万里，设局百数十处”，所设干线和支线，几乎覆盖全国，在边境地区又与国外线路相通，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电报事业是清代办得最好的近代企业之一。

### （三）使汉阳铁厂起死回生

汉阳铁厂位于湖北汉阳，是湖广总督张之洞花费大量金钱和心血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钢铁厂。1893 年建成，规模宏大，装备世界一流。有 100 吨炼铁炉 2 座，80 吨贝色麻钢炉 2 座，10 吨马丁炼钢炉 1 座，工人 3 000 名，投资高达千万两白银。但是，这个大家伙也存在致命弱点。厂址选择不当，与煤矿、铁矿产地距离较远，运费昂贵，成本高居不下。官办企业，长官意志第一，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浪费惊人。经营管理漏洞百出，侵吞盗窃原材料者比比皆是，加上产品销路不畅，种种原因，导致铁厂陷入负债累累无法维持的境地，张之洞疲于奔命，焦头烂额。

甲午战争后，财政极度困窘的清政府无力为各省官办企业提供财政拨款，指示汉阳铁厂招商承办。1896 年 5 月，盛宣怀从张之洞手中接过汉阳铁厂督办一职。盛接办后，急须能够扭转危局的人才，郑观应又成为了不二人选，他马上被任命为铁厂的总办。郑对办铁厂早有一套想法，他也曾对铁厂和张之洞其人发表过尖锐的批评，现在出任总办，自然可以大展拳脚了。

汉阳铁厂要扭亏为盈并非易事，郑观应认为必须解决四大问题：一是注入资金；二是解决燃料来源；三是培养技术人才；四是扩大销路。

先着手第一个问题。铁厂从官办转为官督商办后，筹集资金的方法不再是政府拨款，而是向民间集资，招股成为主要手段。盛宣怀和郑观应决定给予投资者以较高的收益来吸引商人入股，因此招商章程拟订，第一至第四年每股付年息 8%，第五年起付 10%，还承诺亏损不减息，盈利多派息。但如此优厚的条件都未能打动人，原因是这个负债累累的钢铁巨人前途未卜，让人爱不起来。

无奈之下，盛宣怀利用手中权力，把他控制下的其他企业如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资金调入铁厂济急。这样一来，对这些企业的发展和股东的权益造成了伤害。郑观应虽然提出异议，但是在资本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也无可奈何。盛宣怀靠这个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勉强地维持着铁厂的生产。当时，环顾海内，也只有这位“一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比喻其掌握洋务企业之多）的盛某能济此时艰。

第二个问题是解决燃料来源。铁厂兴建时，由于张之洞没有充分考虑燃料的供给问题，结果建成投产后，焦炭供应不上，生产受到极大制约，开工不足，甚至停工待料。所以郑观应说，“厂中之需煤炭，犹人生之需米谷”，燃料问题是“铁厂之要害”。<sup>①</sup>“觅焦炭”对郑观应是一大考验，他在长江上下游紧急找矿。经过1个多月的艰难查找，了解到萍乡煤矿煤多质好，如果炼工精究，是可以合用的，而且价格和运费也不高，决定开发萍乡煤矿。盛宣怀接受了他的意见，向德商礼利洋行借款400万马克，又招集了一部分商股，建成了萍乡煤矿，一举解决了制约汉阳铁厂生产的瓶颈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培养技术人才。落后的中国缺乏创办大型钢铁企业的科学技术、专门人才和管理经验，借才异域是必须的，但当时铁厂恰恰缺乏内行的主管和技术精良的专家。厂中长年聘用洋匠20多人，最多时达到40人，数量多，薪俸高，但不合格、不称职的不在少数，办厂者不辨良莠，洋人乘机鱼目混珠。郑观应首先对几个主要的洋工程师进行考察，提出要重新组合技术队伍，另聘有真才实学的人。与此同时，积极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

第四个问题是扩大销路。汉阳铁厂产品销路不畅的原因，并非由于质量有问题，也不是价格过高。它的产品精良，可敌洋产，钢的价格较之洋产，大致相同，生铁比洋产则价格更低。为什么卖不出去呢？张之洞开头也不明白。他办汉阳铁厂的本意，是开辟利源，抵制洋产，杜绝外耗，富国强兵，铁厂产品理应受到国内工业界的欢迎。从民族大义来说，中国的企业也应该购买本国产品才是。所以，张之洞希望政府经办的企业和铁路能消化汉阳铁厂的产品。他请求朝廷下旨，命各省一律向汉阳订购钢铁。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正如郑观应指出的，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往往成为官僚们贪污舞弊的利藪。承办者向外国人购货，大把花钱不计盈亏，因为作弊容易，也较为隐蔽。而同中国人交易，则无此便利，亦易暴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官场中矛盾重重，官僚之间互不买账，北洋不买南洋产品，关东铁路不买武汉钢轨。张之洞不由得叹道：“中国苦心孤诣，炼成钢铁，不异洋产，而各省办事人员，以意见为好恶，仍舍其自有而求诸外人，则中国何能自强？”<sup>②</sup>

张之洞的遭遇，使郑观应知道单靠朝廷行政命令并不一定能做到铁路路轨必定购于汉厂，必须把铁路修筑权抓到自己手里，汉厂的铁轨销路才有保证。所以，郑观应一再对盛宣怀说，如果抓不到铁路修筑权，铁厂的事就不要接手。盛宣怀也很

<sup>①</sup> 夏东元编：《郑观应文选》，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2002年版，第44页。

<sup>②</sup> 张之洞：《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折》，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9页。



认同这一点，在力争之下，朝廷同意委派盛宣怀为卢汉铁路公司督办。郑又进一步催促他谋取粤汉铁路督办的位置，不久，这个目的也达到了。铁厂产品的销路终于不成问题。

办厂的四个关键问题得到逐步的解决，与郑观应的思路对头和精明强干分不开，证明他是一个救危扶倾和起死回生的能手，不愧为晚清出类拔萃的企业奇才。盛宣怀视他为不可或缺的左右手，而郑观应则把振兴中国工商业的希望寄托在盛宣怀的身上。

盛宣怀果然官运亨通。不久，朝廷授予他太常寺少卿官衔和专折奏事特权，后来又升任工部左侍郎，会办商务大臣。1911年，官至邮传部尚书。汉阳铁厂在盛的手中得到大发展，成立了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三位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1907年，炼钢炉改造成功后，钢产量达到6.2万吨，经外国工程师化验，属于头等钢。由于质量好，不仅卢汉铁路、粤汉铁路使用该厂钢轨，修筑京汉、津浦铁路时，也大量使用了该厂生产的钢轨。1909年，公司接到的定单猛增，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汉冶萍公司谱写了中国近代以钢铁为龙头的重工业史的第一页。

#### （四）孙中山、毛泽东爱读《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晚清一部震撼朝野的巨著，是郑观应以一生的心血谱写的纲举目张的变法大典。它全面而系统地谈及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主张，逐项列篇，条分缕析，说理精辟，切实可行。它也是一部当时中国变法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大量收集了当时仁人杰士的名言伟论，向读者提供了多方面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张之洞推许该书是当时谈时务书籍中的上乘之作。他说：“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sup>①</sup>他还说：“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sup>②</sup>以张之洞的见识、能力，对该书予以如此非同一般的评价，极为不易。说明该书不愧为一部高水平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对中国的富强具有指引作用。

孙中山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具同乡之谊。孙比郑小24岁，属于晚辈。1887~1892年间，孙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亦在澳门养病，两人多有往来，相谈甚欢。改造中国与研习医学是他们共同的话题。《盛世危言》中的《农功》一篇，是郑观应与孙中山合作的产物；郑观应的《中外卫生

<sup>①</sup> 夏东元编：《郑观应文选·前言》，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2002年版，第1页。

<sup>②</sup> 同上。

要旨》一书，其中对西医的评说，也显然有孙中山的意见。1894年，孙中山想北上投书当道，一白其救国报国之志，行前撰写《上李鸿章书》，借用了《盛世危言》自序中的一段话。原话为：

“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sup>①</sup>

孙中山略为变通，改为：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由此可见，孙中山变革中国的思想主张，受郑观应的影响很深。

1894年6月，孙中山带着这份精心写就的陈情书到天津面呈李鸿章。临行，郑观应致信盛宣怀，请他荐孙于李。信中说：“（孙中山）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也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sup>②</sup>孙中山顺利地把上书送到李鸿章手里，但没有得到李的接见。后来，孙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上书的建议又得不到采纳，逐渐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近代学者邵循正认为，直到20世纪前10年，《盛世危言》仍对社会保持一定的影响。当时，包括革命者在内的维新人士，没有能够提出一个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方案，甚至没有能够写出一本较好的比较广泛地讨论中国实际问题的书，因此19世纪末年的新学，到辛亥革命前后对知识分子还能起启蒙作用。

最为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是《盛世危言》对少年毛泽东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时间是在1906年。据爱德格·斯诺在他的作品《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少年时的经历说：毛泽东8岁入学，13岁离开学堂，在家务农。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他常常在深夜里把屋子里的窗户遮盖起来，不让父亲看到灯火，以便整夜读书。他当时读的书很杂，但是最爱读的有两本，一本是《盛世危言》，另一本是《新民丛报》。毛泽东说，他非常喜欢它们，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认为，《盛世危言》的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作为一个10多岁的少年，能这样理解郑观应，非常不易。在闭塞的韶山冲，《盛世危言》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书中介绍的新式学堂极大地吸引了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文选·前言》，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2002年版。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文选》，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2002年版，第483页。

失学的毛泽东，激起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从家里跑了出来，到新式学堂去读书。毛泽东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刚满 16 岁，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从此，他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求索。

## 二、中法战争与“南洋策划”

郑观应在他的著作之中，屡屡言兵，而自己亲身参加的对外战争，则只有中法战争一役。他对这次短暂的军事经历，非常珍视，因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站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最前线，为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大义，挺身而出。他不避艰险，深入敌营，密约内应，谋袭西贡，颠覆法军之老巢。虽然此次谋划因谅山兵败饷绌而中止，中法之战终以中国妥协而告失败，但实现了他为国尽忠效力的志愿，也使得他对晚清军事改革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在南洋的经历，更使他的改革思想得到了升华，把改革君主专制制度提到了重要地位，为《盛世危言》的写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 （一）甲申中法战争

1884 ~ 1885 年的中法战争，其起因是越南危机。

越南是中国西南邻国，与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接壤。中越两国在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中形成了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这种宗藩关系，是基于双方统治阶级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促成的。越南国君接受清廷“册封”和向清廷“朝贡”，表示臣服，对内可树立其统治权威，对外可获取大国的保护；而清廷则以“天朝上国”君临天下来树立其国际影响并谋求边疆的安定。这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松散的国家关系，是根据传统和双方默认来确立的，无须签订条约却具有不成文的约束力。中越两国在名义上虽然有所谓上下之别、主从之分，但各自独立，互不干涉内政。这种宗藩关系与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有本质的区别。

在 19 世纪中后期，中国边疆的这种宗藩关系受到了西方列强的破坏，清廷的属国一个接一个地变成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之下的保护国。

1862 年，法国殖民者为实现其建立“东方帝国”的计划，发兵侵略越南，逼签《西贡条约》，占领越南南部六省。清廷则因刚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受英法联军重创，对法国之凶猛犹有余悸，更无力顾及越南之安全。

1873 年，法国远征军又攻陷越南的河内，第二年，胁迫越南政府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并企图割断中越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把整个越南置于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为制止法国的扩张野心，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提出抗议，声明中国政府否定法越所订之条约。

法国的野心不灭。1881年，法国议会通过侵越军事预算，1882年，法军进攻越南北部。占领越南首都顺化后，强迫越南与之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不仅要求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还要求清廷立即撤出应越南阮氏王朝之请进驻越北的清军，并开放云南边境通商等无理要求。

法国的步步进逼，不但即将吞并越南，而且危及中国边疆的安全，清廷还能坐视不理吗？

清政府内部发生了主战和主和的激烈争论。

主战派认为，越南与中国唇齿相依，越南的红河就是中国云南澜沧江的下游，红河若通行轮船，从越南海口到达云南只需10天，此事关系中国大局，不可小视。中国藩篱尽撤，后患将无穷期。侍讲学士陈宝琛等上奏，中国海防水师渐有起色，请以水师直趋顺化港、富春，向越南国王陈以利害，用兵攻略数城，与滇、粤两军相应，共歼法军。

主和派则认为，越南政府现已暗暗投靠了法国，不愿为中国统属，我又何必为这个离心离德的邻国行保护之义？况且，我与法开战，将会扰乱各国通商全局，似为不值。而中国“兵单饷匮”，更是不宜与法轻言开战的主要理由。

正在清廷举棋不定之际，1883年2月，狂热执行扩张政策的茹费理内阁在法国政府换届中上台。本年12月，法军总司令孤拔率领6000名法军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清军和刘永福的黑旗军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法军攻占山西后，1884年3月又派出1.2万名法军进攻由2万名援越清军驻守的北宁。清军统帅、广西巡抚徐延旭“迁延不进，株守谅山”，致使北宁失陷。法军乘机连陷太原、兴化，不到5个月，整个红河三角洲落入法军之手。

援越清军败退的消息传到北京，举国哗然。主战派的呼声更高，要求严惩败军之将，与法决战。清廷在震惊之中，把徐延旭革职拿问，又罢免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全部军机大臣，改由一向主张对法强硬的醇亲王奕譞上台执政。

奕譞摆出了一副与法决战的架势，指示负责前敌防御的新任广西巡抚潘鼎新：“如彼仍来扑犯，惟有奋勇迎击，勿稍松动。”<sup>①</sup>又派淮军宿将刘铭传赴台湾督办军务，派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全面加强海陆防务。皇上也发下谕旨，明白宣示与法决裂，中国进入战争状态。

<sup>①</sup> 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 （二）南洋策划

以钦差大臣身份入粤督办军务的兵部尚书彭玉麟是个激烈的主战派，屡次上奏折力阻和局。但他对于战争如何打法，心中无数。

1883年12月，郑观应从上海来到广东，为处理香港和广东电报之事奔走，正好遇上中法两国军队在滇越边境打响“山西之战”，中军与法军开始正面冲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郑观应素有抗敌御侮之志？他马上行动起来，找到他的朋友——在彭玉麟幕下效力的王之春共商对策。

王之春，湖南人，与郑观应同岁。曾任镇江驻军管带。1882年王之春编辑《国朝通商始末记》一书，彭玉麟为之作序，对他称赞有加，说：“以文人兼武事，驰驱江海间，防北塘，驻京口，游历日本长崎、横滨，于中外交涉事见闻周洽。”可见，王之春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1883年10月，彭玉麟为筹谋越南战事从京师奉派到广东督办军务时，对彭有知遇之感的王之春便跟随而至。

郑、王两人当下合谋，以这几年郑观应在开拓轮船招商局南洋事务时对东南亚国家的了解为线索，订下一条“暗结暹罗袭取西贡”之计。他们认为，鉴于滇、粤官军在越南北部战场失利，必须用间出奇，别开生面，开辟第二战场，用迂回战术取胜。暹罗国位于越南之东，与西贡接壤，出入西贡很方便。其国王郑姓，广东人，尊敬中国，重视乡谊，与郑观应熟识。其属下官员多为广东人，每谈及法越之战，亦为之不平，是可以联结的对象。暹罗之极东为英属殖民地新加坡，亦有10多万广东人在此定居。上海轮船招商局在西贡及新加坡均设有分局，由郑观应管辖。他们拟订了这样的计谋：由暹罗发潜师以袭取西贡，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颠覆法军之老巢。作为呼应，须以重金招募西贡、新加坡两处壮士数千人，密为内应，于暹罗兵到时举火为号，三路夹击，聚而歼之。

被前方战事弄得寝食不安的彭玉麟欣然接受了这个计谋，并煞有介事地向皇帝上了一道密折，奏称：

“臣军营务处候补道王之春密禀：现有三品衔候选道郑观应，广东香山人，自幼从海舶遍历越南、暹罗、新加坡等处，熟悉洋务，与王之春共事有年，每谈及法酋躐越寻衅广东，深同义愤。……臣拟密饬郑观应潜往各该处，妥为结约。……事有端倪，臣再派王之春改装易服，同往密筹。届时，密催在越各军同时并举，而不明言其故。西贡失，则河内海防无根，法人皆可驱除，越南或可保耳。”<sup>①</sup>

<sup>①</sup> 郑观应：《彭刚直公密筹暗结暹罗袭取西贡密折》，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

这便是著名的“南洋策划”，一个效法“假虞灭虢、围魏救赵”的故事充满了争议的奇谋。报国心切的郑观应致信彭玉麟，自告奋勇愿前往暹罗、西贡和新加坡等处密为联络布置，相机而动。于是，彭玉麟在1884年1月7日以办理水陆防务需员差遣为由，奏调郑观应到广东军营效力。正在上海为醇亲王奕譞的神机营采办枪炮的郑观应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他在写给醇亲王的禀文中提到这件事并表示尽忠报国的决心：“官应（观应）赴粤后，惟有黽勉从事，静听指挥。如稽查内奸、招集民团等事，知无不言，为无不力。联络邻好，不敢畏难，不敢避险，不敢言劳。以仰副培栽于彭帅，即以酬王爷期许之盛心，第使我武维扬，海波不起，则官应所默祷也。”<sup>①</sup>

在《留别沪上同人》一诗中，他表达了摆脱商务的羁绊，奔赴前线一展身手的快意和建功立业的抱负：

久客申江百事羁，不才恐负圣明知。  
还期破敌征心略，更出奇兵借指麾。  
半壁屏藩将尽撤，一篇图画界边陲。  
诸君送我殷勤意，早祝天山露布驰。

郑观应在交待了上海企业的事务后，于1884年3月10日启程，3月15日到达广东，谒见了彭玉麟和两广总督张树声。

张树声此时正在为一件事发愁，见到郑观应，大喜过望，如获救星。马上令他到香港交涉广东所买大炮事宜。原来，粤防当局委托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克虏伯厂购买了火炮25尊，已经运抵香港。正要提回广东之际，港方却因惠州会党滋事而禁止军械出口。张树声派出数人赴港交涉，均无结果。张树声认为，禁止从香港出口的军械应系专指由会党私行购买的军火，由官方购买并有印文凭据者断无禁止之理。他知郑观应“通达交涉事宜，于香港尤为熟悉”，便要他“速赴香港，会同起运毋违”。军机不得延误，郑观应二话不说，随即赴港拜谒香港英兵总理，陈说理由。果然不负所望，马到功成，数天后，所有大炮提运回省。

张树声与彭玉麟对办事干练的郑观应更为器重，3月22日，正式札委为“总理湘军十四营营务处事宜”。

郑观应在商务上是内行，在军事上却是外行，但他见多识广，有洞察力，能发人所未发。

<sup>①</sup> 郑观应：《禀醇亲王为报效德律风电报机器并呈仿照泰西英法俄美德创设水陆军学堂章程》，《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6页。

中法战争前夕，洋务自强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进行了足足20年，西方先进武器买了不少，自己也办起了一些军事工业，福建、北洋和南洋三支水师初具规模，湘、淮军等主要军队基本上都使用洋枪洋炮，各大城市之间也架起了电报线，中国国防力量比前大大增加。主战派认为可以与法国一决高下。郑观应也是主战派，但他考虑得更多一些。他看到军营里散漫无序，士兵缺乏训练，对武器一知半解，测量不准，打枪不中，心里焦急。他一再强调军队“器物未精，演习未熟”，除了有新式武器之外，还要有使用武器的人，人的因素不可忽视，中国军队的军事人才和士兵素质还远远比不上西方。接手营务处不久，他就分别向醇亲王、彭玉麟、张树声和李鸿章写报告，提出迅速开办水陆师学堂培养将才，并加强对军队的训练。

事实果然如此，没有现代军事人才的组织指挥，没有战斗员对武器的熟练掌握和使用，再好的武器也是一堆废物。经过中法战争，清廷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战后，陆续创办了一些军事学堂，此是后话。

### （三）深入敌后

法军通过北宁一役，基本上完成了对整个越南的占领，但是并不等于在越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越南军民反法斗争烽烟四起，刘永福的黑旗军和援越清军也高度戒备地与法军对峙着。不想与中越两个国家同时开战的法国便采取了各个击破的诡计，诱使清政府坐到谈判桌上来。

本来就处于战和不定之中的清政府此刻又倒向主和派一方，马上派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谈判，1884年5月11日，双方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但是，和约的订立并没有带来和平，反而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可欺。6月23日，清军从越南撤退的期限还没有谈妥之际，法军就以“接防”为由，突然进军谅山，在观音桥（北黎）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挑起所谓的“北黎事件”，战争风云再起。

彭玉麟早就不满中法和谈，为了挽回败局，决定把“南洋策划”付诸实行。他奏准朝廷派郑观应前往南洋侦察敌情，以便相机给法国以致命一击。

1884年6月11日，郑观应叩别彭玉麟，带了文案（秘书）罗宇弥，约同弁勇吕成，坐“保安轮”启程。出发时在船中寻觅不见吕成，郑估计他已先期出发，便与罗文案先到香港，再冒险换乘敌国公司的轮船东行，于6月16日到达西贡，住进了中国轮船招商局在西贡的驻地。果然，吕成已先到暹罗京城曼谷，于6月29日与郑会合。

吕成被郑观应视为荆轲一流人物，郑观应说：“吕成从少年时起即在南洋一带

贸易，往来暹罗、越南之间，豪侠仗义，徒党甚众，曾在西贡与法人为难，又曾与我陈说恢复之计，井井有条。我与他十分投契，欲收为国家之用。”<sup>①</sup>于是“厚赠资斧”，令吕成与其众徒深入越南、暹罗扼要之地，暗将西贡共有炮台几座、是何新式、每座有炮若干、是何等炮、能打多远、有兵若干、弹药房在何处等等，一一查明，又将西贡至金边、金边至暹罗的水陆炮台、兵房逐一绘图贴说。法人有何举动，随时用暗号禀报。

郑观应临行时，彭玉麟嘱咐他说：“此行宜缜密，毋贻国家羞！”郑肃然答道：“君事不密则失臣事，机不密则害成易。义宜凛矣！事之成否不可知，观应岂敢宣泄。”<sup>②</sup>一路上郑观应逐日写日记，把他所看到和听到的有参考价值的事情和言论记录下来，最后写成了《南游日记》一册。写日记的目的是提供法占西贡的各种情报，所以记录十分详尽。战争结束后，彭玉麟感慨万千地为此书题写了如下诗句：

远涉沧溟万里舟，一腔热血耿中流。  
洪涛百丈凭夷险，壮志千寻足智谋。  
拔剑有歌悲易水，击锥无地劈秦沟。  
归帆满载艰辛重，惆怅英雄愿未酬。<sup>③</sup>

此诗写出了郑观应历经万里波涛的辛劳、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壮志未酬的遗恨。

郑观应在奔波 64 日、往返 2 万余里的南洋之行中，在香港、西贡、新加坡、暹罗、金边、槟榔屿和麻六甲各埠之间穿行，屡遭法人之盘诘，出入于惊涛骇浪、蛮烟毒瘴之地，间关险阻，备尝艰难。但他发誓：“一腔热血从何洒？不破西戎誓不还！”<sup>④</sup>

在“南洋策划”的基础上，郑观应又形成并提出了“合纵御暴”的思想。他观察了各地抗法力量的分布，计划联络越南北部的刘永福黑旗军、暹罗国王、缅甸国王、东南亚华侨领袖吕成等，共同对付法国侵略者。

但实现这个想法遇到了不少困难。在新加坡，郑观应会晤了暹罗驻新加坡领事陈金钟，想请他从中斡旋。陈祖籍福建漳州，居此地三世。他听了郑的来意，不以为然，摇着头说：“越南亡矣，中国败矣，和议成矣，吾何知焉！吾何知焉！”郑

① 郑观应：《南游日记》，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47 页。

② 同上书，第 946 页。

③ 郑观应：《彭玉麟识 南游日记》，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43 页。

④ 郑观应：《南游日记》，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52 页。

先动以情，对他说：“君虽为暹罗之官，实中国之人也，中国受辱于西人，平心论之，君独不受辱乎？观应破浪乘风，不远万里而来，以为君识大体，力任时艰。”<sup>①</sup> 继而，他又对陈分析国际形势：“法、英假通商、传教为名，实则心怀叵测。越南已受其愚，须早合纵以御暴。若暹罗犹迟疑瞻顾，不联缅甸以事中国，将来必蹈越南覆辙。”<sup>②</sup> 最后，指出陈金钟有责任调整暹罗与中国的关系。郑观应说，暹罗本为中国藩属，却做了三件对不起中国的事。一是多年不朝贡；二是苛待华人（别国之人在暹不收身税，专收华商之税）；三是暹王之祖弑君自立，而其君本为中国人，已受中国敕封。暹王这样蔑视中国，理宜兴师问罪，君既食其禄，应分其忧。何况你还曾写信召我来此，现在为什么又食言？

陈金钟见郑观应义正词严，马上道歉解释：“吾非不知尊中国也，但恨君民之气不达耳，富强之策不兴耳。如必欲图之，则吾有术也。”

郑问：“其术若何？”

陈答：“即与暹罗通商而已。诚能通商，则奇谋秘计可得而措矣。”<sup>③</sup>

陈金钟的话很有道理，在 19 世纪下半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清朝如果再不发展与邻国的经济互利关系，藩属国将会离心离德，分裂出去。

于是，陈马上修书一封，交郑观应带到暹罗面见国王之弟利云王沙。利云王沙任官军机中书，兼管度支稽查银库事务，掌有实权。郑观应约上暹罗华商庆裕一同前往谒见并送上礼物。彼此握手为礼，以通事传话。

郑观应说：“我奉兵部尚书彭玉麟之命，向贵王问安。现因法国并灭越南，外间风闻有贵国助法攻越之说，其传言之误乎？抑确有是事乎？”<sup>④</sup>

利云王沙答：“助法攻越，敝国实无此心。今春二月，法领事曾向敝国言，欲借兵偕往东京助战，敝主已力却之。其领事已复书法廷，上国可以无虑。”<sup>⑤</sup>

郑说：“贵国不助法人，本道佩甚。然贵国臣贡我朝，世已二百年，世守恭顺，中外皆知。今既不助法以攻越，其复修贡职乎？抑助中国以图法乎？”<sup>⑥</sup>

王答：“贡职不修，敝国无罪。在昔二十八年，敝国遣使修贡，入广东境，途中遇盗，劫掠我贡珍，杀伤我贡使，翻译国书又多删改，敝国之意无以上达伸诉。

① 郑观应：《南游日记》，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52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 955 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自是以来，不敢效贡上国，无得以此相责难。惟助中图法，敝国甚愿，然必须订立条约，方能措手。拟派敝领事陈金钟赴粤东、天津，与彭官保、李傅相商议条约，上国其许我乎？”<sup>①</sup>

郑高兴地说：“贵国果能知几，我大臣必能体谅。”<sup>②</sup>于是大家相互慰劳而别。

郑观应在暹罗获得奥援后，又出发到金边。

在开往金边的船上，郑观应与丹麦船主、美国商人谈论中外交涉情形。船主对他说：

“以现在欧洲大势论之，水师以英为最，陆师以俄为冠，法国俗强悍而人勇鸷，普国勤训练而尚权谋，四国地广兵雄，船坚炮利，纵横海外，各有兼弱攻昧之心。而欧洲小国比利时、卢森堡等之所以能够自存，实赖有均势之心法，联盟之公会耳。”<sup>③</sup>

郑观应大感兴趣，问道：

“夫公会之法，不论国之大小，秩之尊卑，立约订盟，互相联合，共推盟主，与我国春秋时管夷吾一匡天下纠合诸侯之义是否相当？”<sup>④</sup>

船主说：

“正是。考欧洲各国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之别，均立议院，上下情通。果欲仿行，必须遵照新章，始有实效也。”<sup>⑤</sup>

郑观应顿受启发，合纵御暴的思想更为明确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朝化育万邦，控御八极，现下高丽、暹罗风气日开，富强可望，廓耳喀（柬埔寨），缅甸虽安固陋，尚堪自守。应简使臣分赴各国，晓以利害，怵以祸福，使之联合各邦，举行公会。”<sup>⑥</sup>

联合弱小国家组成公会，与列强对抗，以维持均势，这是郑观应御外思想的新发展，在战后他撰写《盛世危言》时这个思想得到更为详尽的表述。

郑观应在《南游日记》中的一段话，现在经常被历史学家引用，认为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最先提出在中国设立议院的政治改革言论，具有重要的开创性。这段话写于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九日（1884年7月11日），原话如下：

“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

① 郑观应：《南游日记》，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sup>①</sup>

这段话指出，中国之所以难以达到富强之境，是因为学习西方不得要领。西人立国的根本在于育才和论政，建立书院和议院，实行民主议政制度，达到了“君民一体，上下同心”。而中国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之下，向西方学习注重“用”——练兵制器，而不知道还要学习“体”——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结果是“遗其体效其用”，即遗漏了最要紧的、最根本的富强要素，只学习了西方的皮毛，所以到现在还达不到富强之境。他主张应该赶快改正过来，“体”和“用”都要学才成。

为什么郑观应能成为最早提出政治改革言论的先知先觉者？这与他在南游 60 多天中的见闻肯定有关。除了上文提到丹麦船主说的话之外，郑观应在与华侨华人的接触中痛感清廷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殊深，民心丧失，显然更是大有关系。

在郑观应出发前，彭玉麟对他提出具体的任务是：“前往西贡、暹罗、金边各处，不动声色，细心体察情形：西贡是否防守严密？该处华人是否蓄恨甚深、内应可靠？暹罗君臣果否实心乐助军力？该处华人果否真心报效、愿助饷需？以及若何进兵？若何攻击？地势若何？夷情若何？统凡一切作何规划之处，均须一一暗地密查确实，断不敢轻举妄动，致肇他衅。”<sup>②</sup> 对照《南游日记》，我们可以发现，郑观应做事机密，认真细致，完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他所获得的真实情况，也令他大为震惊。

“越南亡矣，中国败矣，和议成矣，吾何知焉！”“吾非不知尊中国也，但恨君民之气不达耳，富强之策不兴耳。”陈金钟这些愤恨不已的话，时时在耳边回响。郑观应与暹罗总管华人事务的官员刘乾兴会晤，刘本是广东嘉应州人，但“语以华事，漠不关心”。彭玉麟在奏折中称：“若攻打西贡饷械不继，彼国华民尚可报效捐助。”<sup>③</sup> 但郑在南洋看到，有钱的华民皆入外籍，不思故乡。欲劝南洋华商急公好义，而有心者无力，有力者无心，未能如愿。郑观应参加在暹罗潮州人的聚会，“酒酣，俱以暹罗苛待华人相告”，对中国不设领事保护华人甚为不满，并说：“现在各国或数千人或数十百人，无不设立领事，独我朝不设此官，是以华民受其苛虐，无处申诉，此亦中朝之缺事也，请为我民陈之。”<sup>④</sup> 郑“闻之惻然”。另外，

① 郑观应：《南游日记》，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55 页。

② 郑观应：《彭刚直公奏密筹暹罗布置附片》，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17 页。

③ 同上。

④ 郑观应：《南游日记》，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57 页。

华侨的“殷殷还乡之望”，却因为“回家为其乡人及本家捏词勒索”的惨痛遭遇而阻断；拳拳报国之心，也因为清军“未与法战而溃”的表现而心凉，丧失了捐助军饷的热情。“猪仔”流落海外，清廷没有派出领事加以保护，命运惨不忍言，更使郑观应叹道：“昔年早已沥陈当道，不意此风仍未绝也！”<sup>①</sup>

种种经历，使郑观应在震惊之中得到了启发，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披阅《易言》，觉昔日见闻，以今日证之，多未透彻。”又说：“是晚闲行船面，星稀月朗，抚时感事，不禁凄然！”<sup>②</sup>他对过去的思想进行了反省，觉得自己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还不够深入和确当，在苦苦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他终于悟到了中国改革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新的思想收获，促使他在53岁时又发表了新作《盛世危言》。

1884年7月30日，郑观应获知中法和议决裂，不日开仗，法国已下令封禁越南各处海口，不准华人往来，为避免滞留西贡，决定启程回国。在回国之前，他又绕道新加坡，与陈金钟再次相约，陈金钟对他说：“君以诚心相委，自必以诚心相报。”<sup>③</sup>郑观应才放心地踏上归途。8月12日，回到广东省城。他从南洋带回的情报还有《中越交界各隘》、《越南道路》、《西贡至金边水路程》、《西贡至金边旱路程》、《暹罗至金边路程》、《老挝部落》、《暹罗地图》、《暹王兄弟后妃及王城宫殿》等文字和图片。

郑观应对这次南洋之行寄托着无穷的希望，他在诗中写道：“曾从海外访同心，欲建奇功震古今。”并把此行视为生平壮举，引以为骄傲：“谁谓平戎措手难？出奇制胜有田单。”<sup>④</sup>可惜由于清廷腐败，中国国力未强，不敢与法决一死战，在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后，在“乘胜即收”的思想主导下，与法签订和约。和约承认法越之间的条约，开放中国西南口岸通商。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广西、云南两省成为法国窥视和侵略的对象。“南洋策划”自然也付诸东流。

#### （四）归隐故里

郑观应回粤后，因为台湾军务紧急，被彭玉麟和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派到汕头办理援台转运事宜。郑观应利用他在商务上的关系，租用中国和国外的轮船运送军队和粮饷，接济台湾的抗法斗争。不料，正当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汕头和厦门之

① 郑观应：《南游日记》，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8页。

② 同上书，第969页。

③ 同上书，第980页。

④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4页。

时，却被香港当局拘禁起来。

郑观应被拘禁的原因，与他两年之前向上海太古洋行保荐的人出了经济问题有关。1881年，当他离开太古洋行加盟轮船招商局时，向太古推荐了他的同乡杨桂轩。杨也是买办出身，有了郑观应和另外两位同行作保，当上了太古洋行总买办。杨答应以自己每年所得利润的2/10酬谢郑观应。但是，杨在任职期间，不但没有履行诺言，还利用职权私调太古资金与人联合开设茶栈，挪用资金回家建造房屋，加上经营失败，竟然亏空了太古公款10多万元。事发后杨桂轩逃去无踪，太古追究三个保人的责任，要他们赔偿损失。两个同保人赔了一些，还欠4万两，太古要郑观应照数赔足，郑一时无力偿还，太古便瞅准他到达香港之机，将他拘押。

除了被太古追讨保款之外，郑观应同时还欠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泰古钱庄的款，也被它们通过官方向他追讨。这两项欠款是在1883年的经济危机中因股价下跌而欠下的。郑观应债务缠身，陷入了从未经历过的困境之中。为了还债，他请求广东和上海的亲友解囊相助，但是欠款的数额太大，借筹也十分不易。郑观应只得按照“西例”，宣告“破产”，把原来存放在太古账房、栈房的家具尽数变卖，以抵偿债务。他与人合办的“太古昌揽载行”中属于他的股本也被没收。经过差不多1年的交涉，太古债务问题解决，才得以离开香港。而织布局和钱庄的欠款则要到1890年才最后还清。

将近1年的拘禁生活，对郑观应的身心造成极大的打击，他“抑塞愤懑，热血填膺，致成肝疾”。回到澳门家中，卧病在床3年整。他在诗中写道：

家惟千卷书，囊空无一钱。  
弟兄交相责，妻孥涕泪涟。  
我心不可转，穷通听自然。  
魔障应无法，一笑梅花前。<sup>①</sup>

不但贫病交加，而且因军功获得的仕途升迁的机会也因蹉跎岁月于香港而失去。事业失败的打击，欠债未清的压力，健康状况的不良，都令他心情沮丧，精神苦闷不堪。郑观应跌到了人生的冰点。

从1886~1891年（44~49岁），郑观应基本上幽居澳门，住在新建成不久的郑家大屋里。这座宽敞的大房子始建于1881年，正是郑观应春风得意之时。他们兄弟几个寄钱回家资助父亲建了这栋房子，现在，疲倦的游子回到这个生他养他的温

<sup>①</sup>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4页。

暖的窝，治疗身心的创伤。

1885年，当郑观应踏进这座新建成的家宅，便写了《题澳门新居》七绝两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侬家正住莲花地，倒泻波光接斗牛。”<sup>①</sup> 坐落在山海之间的家宅，“前迎镜海，后枕莲峰”，可以看到云影、波光、帆樯以及辽阔浩淼的大海汪洋，大自然的纯净和优美陶冶了郑观应的心灵，郁闷的心境开始舒缓下来。

郑观应年少时多病，壮年以后，又深受哮喘、肺结核等病困扰，为了治病，他接受了道教的养生之学。道教在中国民间颇为流行，郑在上海就时常“寻真访道”，“凡三教经诗、诸子百家、占卜术数之学，靡不研究”。在澳门闲居有暇，他又钻研起道术来。1886年，他专程赴广东道教圣地罗浮山，拜师学道。在山中，他结识了炼师彭凌虚，把彭传授予他的“三步口诀”编写成一本小书，他对道教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兴趣日益浓厚。

除了研究道术之外，郑观应还研究医术。他家中藏有不少医书，天天都翻看，还把其中的简捷良方抄录下来，登于报刊，以飨同好。日积月累，他编写了《备急验方》。他对西医也很感兴趣，认为应该把中西医学结合起来，他编写了《中外卫生要旨》一书，序中历述其受庸医之苦，对中医的局限，深有体会，对西方医学多有赞美，但他没有全盘否定中医，而是主张改良中医，会通中西医学，实行中西合璧。书中辑录了中西医学的理论和验方，使其互相参考，弃短取长。郑观应是最早提出“中西医合璧”主张的人之一。在书中，他还自题诗一首：“久病怜人苦，搜罗简验方。卫生中外旨，编刻当慈航。”表达了他一贯的推己及人、心忧天下的胸怀。

在幽居生活的后期，郑观应的债务逐渐理赔清楚，身体也日益康复，养家活口的责任不能让他继续“息影蓬庐，潜心邱素”，所以，他又计划着复出求职了。在盛宣怀、唐廷枢、王之春、经元善等众多好友和熟人的帮助下，他谋到了开平煤矿粤局总办一职，于1891年4月到广州上任。

### 三、道器观与中西文化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改革思想家，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改造中国社会。他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接触，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自然也是独到的，但是由于没有作专门的论述，人们对他的文化见解和文化取向不甚了然。下面试图通过

<sup>①</sup>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2页。

分析郑观应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作初步的评述。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的考察，对中国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如何保留传统、如何形成新的文化格局等问题，有所启发。

### （一）中国文化培养出救世情怀

首先，不言而喻，郑观应是由中国文化塑造出来的。从5岁入塾读书到17岁结束学业走上谋生之路，郑观应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两途：一是庭训；二是乡塾。

所谓“庭训”，就是家庭的教诲。郑观应自述：“官应夙秉庭训，夙闻先曾祖璧庄公性耿直，胆识兼优，为高祖坟地被富豪侵葬，不畏财雄势大，挺身赴县力争，经年讼始得直，合族德之。先祖鸣歧公俭朴寡言，敦品励节，均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先荣禄公……一言一行，动为世法，性孝友，重言诺，慷慨好义，有古杰士风。”<sup>①</sup>

由此得知，郑观应的家族传统是方刚正直、不畏强暴、讲求道德修养、慷慨好义、注重实学。他的父亲郑文瑞对他的影响最大。文瑞“生秉异姿，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手自校讎，丹铅殆遍，然澹于进取，敝屣科名，设帐授徒”<sup>②</sup>，是个学富五车的教书先生。他教育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把大量的先贤格言收集抄录下来，编成教本，藉以振聋发聩，用于化民成俗。他编的书有《训俗良规》、《劝戒录》等。这些书对郑观应的人格形成有重大意义，以致郑观应在晚年还把《训俗良规》整理付印，认为它“言虽浅近，事实淳详”，是“善书之最著者”。文瑞的慷慨好义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郑观应，他在家乡筹置义田，兴立善堂。凡地方上的水利、桥梁、义仓等公益事业，无不热心规划，尽力捐输。光绪五年（1879年），河北、山西等地遇上大灾，文瑞命家人售鬻衣饰捐资。时在上海经商的郑观应也邀集同志设立了协赈公所，募得数十万金，救了不少人命。由于郑父提倡赈灾最早，而郑家集款又最多，朝廷下旨褒奖其“一门义行”，颁给“乐善好施”四字。郑观应常说，自己所以不自量力地写下《救时揭要》等许多文字，无非是因为“夙承庭训，不敢自弃”。正好说明了他的社会责任感的最初来源是家庭的教育和影响。

乡塾教育，一是启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再学一些日用杂字。二是科举考试的训练，读四书五经、学写八股时文。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sup>①</sup> 郑观应：《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2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223页。

与政治学说则贯穿在教育的过程之中。郑观应接受能力很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道德标准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中国文化的和谐、求实、进取精神融入了他的血液中，“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价值成为他的行为动力和终生追求。

郑观应可说是中国乡塾教育的一个成功例子。在他 31 岁时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中，展现了他所获得的中华文化的优良精神道德和思想观念。郑观应在该书的《序》中说明自己写书的动机是经世致用，而其做法则是把中国古代的“道言精义”、“因果报应”等思想言论辑集起来，加上自己的见闻，进行推广发挥，以达到匡时救世、普济众生的目的。他说：“研性理则辑道言精义，论感应则集志果诸书，窃冀广推，妄灾梨枣；又复触景伤时，略陈利弊，随所见闻，频登《申报》，更伸鄙臆，撰成是编。”<sup>①</sup>可见，此时他的主要思想来源还是中国文化。

该书主要篇章为 19 世纪 60 年代所作，少数为 70 年代初所写，并在《申报》上刊登过。此时，郑观应刚从农村走进城市，见闻渐广，有些文章也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治国方略，有了采用西法的初步设想，但该书总的倾向还是把中国传统的“仁政”、“德治”作为治国的根本方法，以劝善惩恶为治人的根本方法。

他恪守古圣贤教诲，以之作为行动指南。该书几乎每篇都有引用先贤语录作为立论依据，或放于篇首，或放于篇中。如《澳门猪仔论》篇首是：“《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故先王行仁政以济贫乏，严法令以禁游民，使亿万人为一心，所以保天下之民，不使流离失所，投诸他邦，为日后执柯伐柯之患也。”<sup>②</sup>又如《拟自禁鸦片烟论》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入国问禁，入乡问俗。中外同情，断无或异”，认为外国既以重税禁止烟酒之泛滥，推己及人，也应同意我国以重税阻洋烟之入口。<sup>③</sup>在《或问守身要旨》一文中，讲到勤俭的道理时，他便引用了朱子的话：“一粥一饭，来处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类似的“吕祖云”、“文昌帝君曰”、“古云”、“经曰”、“书曰”等等在书中俯拾即是，可见郑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承接了中国的传统，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商人则有着与西方商人差别很大的文化面孔。

郑观应认为世道的好坏关乎人心，因此努力劝人行善积德，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在《救时揭要序》中说：“人之本何在？心是也。存其心则惟善为宝。而心广体胖，事无不安，人无不乐，天必将于其间降之以福；失其心则以恶为能，

① 郑观应：《救时揭要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 页。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 页。

③ 同上书，第 19 页。

而心悸神昏，事无不悖，人无不怨，天亦于其间降之以祸。”<sup>①</sup>就是说祸福都是由人心造成的。因此，他在《劝戒放生论》中说：“愿结同志，体天地好生之德，仿古人爱物之心，令一切物命出诸割烹之地……又能推爱物之心，为爱人之举，乐施孝友，济弱扶倾，救人一命，胜救百万生物，其功德不可量矣。”<sup>②</sup>他在《论三教要旨傍门惑世》中说：“信夫闻道之士，先贵积德。孝弟之道，通乎神明，此积德于亲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积德于世也；持其志，勿暴其气，此积德于身也；毋不敬，俨若思，此积德于心也。老子所云‘道生之，德蓄之。’求道不积德，犹饥而无粮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其斯之谓欤？”<sup>③</sup>他还举了某人做了好事得到好报、某人做了坏事得到恶报的例子，证明因果报应道理，以警醒世人。他在自述修身的目的时说：“余视富贵如浮云，欲修身以济世，何富贵之有？然大富大贵乃前生所定，祖德宗功。……为富不仁，……其子孙不能保也。”<sup>④</sup>道德高于功利，是郑观应不同于一般惟利是图的商人的地方。

无可讳言，郑观应的思想中同时存有中国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因果报应是不科学也不新鲜的观念，但他对中国文化的优良部分的继承是主要和大量的。

## （二）寻找救国良方：走近西方文化

大约在《救时揭要》刊行后10年（1880年），《易言》36篇本和20篇本相继问世。这些在19世纪70年代写成的篇章，显示了郑观应文化视野的拓展，西方文化成为他热心学习研究的对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势力入侵中土，苦力贸易、鸦片贸易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加上国内连年的水旱灾害、粮食不足、医疗落后，人民生活非常困苦。郑观应目睹时艰，忧心如焚，亟思挽救。他像一个医生一样，总是希望找到效力特强的药方。上海这个城市为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他从17岁开始到上海洋行当学徒、打工，业余时间又学习英语，曾师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傅兰雅是博学之士，郑观应从向他学习英语开始，又“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在积蓄了一定的资金后他自己开茶栈、办公司，从事对外贸易，常与外国商人打交道，在20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接触到不少西方人士，这对他了解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帮助。上海“自西人来后，风气先开”，成为西方文化登陆中国的第一站，西方书籍和报刊触目皆是，这对他钻研西学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③ 同上书，第48页。

④ 同上书，第51页。

郑观应非常勤奋好学，而学习目的又非常明确，就是研究泰西诸国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的原因，为中国的富强提供意见。他在《易言 自序》中说：“余质性鲁钝，鲜能记诵，长客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沪上为江海通津，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获从之游。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谏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而西人久居中国者，亦时时申其论说，作局外之旁观。……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sup>①</sup>可见《易言》不光是郑观应一人的见解，而是他与那些关心国事的人不断地讨论、反复地研究的结果。他如海绵吸水一般，广泛收集和吸取中外达人杰士的意见，再把各种零散的意见加工整合成系统、条理、切实可行的言论，郑观应所花费的心血非常人所能为，亦非常人所肯为。无怪乎当时思想最为开明敏锐的改革思想家王韬阅后叹道：“余读未终卷，而窃叹杞忧子为今之有心人也。”<sup>②</sup>郑观应到上海接触西方文化后，就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他对西方文化着迷，认为西方强国“富强有由，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sup>③</sup>。他从公法、通使、传教、交涉、开矿、铸银、铁路、电报、船政、税则、商务、国债、考试、水师、火器等方面论证了西方强邻有好的做法值得中国仿效。

《易言》一书的文化倾向，以郑观应的知己王韬说得最中肯：“（《易言》）于当今积弊所在，抉其症结，实为痛彻无遗。而一切所以拯其弊者，悉行之以西法。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者”；“诚能如杞忧生（郑观应）之言，自强之道在此矣！”<sup>④</sup>这时郑观应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1. 以世界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把两种文化置于平等地位。郑观应认为，“中国开辟最先，建立最久，数千年来，更群圣人之经营缔造，而文明以启”，由于中国长期统属于天子，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故有所谓内外之辨、夷夏之防。其实，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明之一种。他说：“天子号曰有天下，而实未尝尽天所覆，尽地所载而全有之，则固一国也。”<sup>⑤</sup>欧洲各国与中国同属地球上之一国，彼此并立，地位是平等的：“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sup>⑥</sup>欧洲各国的文明虽比中国晚起步，但后来居上，是中国的竞争对手：“欧洲各国，当中国汉时，始辟洪荒，至今未及二千年。故其风气敦庞，人心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页。

② 同上书，第61页。

③ 同上书，第65页。

④ 同上书，第66页。

⑤ 同上书，第175页。

⑥ 同上书，第67页。

坚定，较之中国，尚在春秋之世。……至于今，则欧洲各国兵日强，技日巧，鲸吞蚕食，虎踞狼贪，环地球九万里之中，无不周游贩运。中国亦广开海禁，与之立约通商。”<sup>①</sup> 他认为中国只要摆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自视为万国之一，那么中西文化便可平等交流，中国固有的优良文化也可以远播欧美：“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庶几圣人之道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文教之敷，于是乎远矣。”<sup>②</sup>

2. 肯定西方文化有很多优秀的地方，主张把好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郑观应认为，虽然西方强国是侵略我们的敌人，如狼似虎；西方国家的文明起步比我们晚，被斥为夷狄，但不等于就不应向他们学习。他说：“彼夫恶虎豹而服其皮，取其温暖也。斥夷狄而师其法，取其利用也。”<sup>③</sup> 我们要效其所长，出乎其上。因为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他对西方国家的涉外之法（包括公法、公使）、致富之道（包括商务、专利、机器、铁道、电报等等）、防御之方（如军制、海军、火器、练兵）、政事法令（如议政、廉俸、洋学、西医、考试等等）均细细考究，进行中西对比，常常赞叹西方国家“法甚善也！”提出广采西法以补中国之缺。

3. 郑观应虽然没有对中西文化的关系予以专门的论述，但他主张利用西法将中国的一切弊端悉加整顿，由此可知他认为中西文化是有共同性的、可以沟通和互补的，中西文化交流后，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此时，郑观应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以是否对应中国的现实需要为基准，而不管它是“器”还是“道”。西方文化为我所用后，便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但这种思想倾向在当时是触犯禁忌的。所以，王韬出于保护也可能出于纠偏的心理，在《易言·跋》中说：“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者。呜呼！此我中国五帝三王之道将坠于地而不可收拾矣。古来圣贤所以垂法立制者，将废而不复用。用夏变夷则有之，未闻变于夷者也。诚如杞忧生之说，是将率天下而西国之也。此书出，天下必将以杞忧生为口实。呜呼！是不知古圣贤之在当时，天下事犹未极其变也；而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sup>④</sup> 王韬为之辩解，为之说明，恐怕他遭人攻击和指责而使其好主张不能为当道者接受，用心可谓良苦。王韬还说，郑观应的论传教一篇，证明他是恪守孔子之道的。其实，郑观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27页。

④ 同上书，第166页。

应此时的反洋教，主要不是出于卫儒道，这个时候他对基督教还没有深刻的研究和全面的认识。由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激化了中外矛盾，教里教外的人互相仇杀，教案迭出，使他视基督教为扰乱社会的不祥之物，所以反对洋人在中国传教，他并无考虑到变器不变道的问题，但经王韬这一提醒，他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 （三）“道器论”与中西文化融合之途

《易言》刊行后十几年，经过不断增续，篇幅更大，内容更广，1894年改名《盛世危言》出版。《盛世危言》切中时弊，适应时代需要，不仅为世人所重，也为统治者赞赏。江苏布政司使邓华熙把它进呈光绪皇帝御览。皇帝大加肯定，命译署刷印，分散臣工阅看，这使其在士大夫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盛世危言》既是郑观应原创，又承几位同道之人及通时务者如余莲村、王韬、沈谷人、谢纛之、家玉轩、陈次亮、吴瀚涛、杨然青等人改正、参校、删定，不断完善和圆熟，体例也更加严整，同时也加进了他们的意见。由于当时鄙薄西学者还相当多，该书既是大讲西学，便不能回避对中学的态度立场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的说明，于是在书中特地安排了“道器”一篇，置于卷首。它既是全书的总纲，也是作者的表白之作。“道器”篇的主要观点如下。

1.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中国因有列圣相传，“道”是得到继承发扬的。但是，“西人却不知大道，囿于一偏”<sup>①</sup>。这里指出了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是关于万物与人性之本原的学问，即宇宙观、自然观、社会观和价值观，具体来说，就是孔子之道。

2. 中国自秦以后，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sup>②</sup> 这里是说中西文化各有优势。西学的优势，是在“器”，即物质文明方面。

3. 道与器是统一体，不可分离。虽然说道为本，器为末，但道中有器，器中有道，两者不能割裂。“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sup>③</sup> 这是说中西文化各擅其长，但两者不是排斥的，而是相容和互补的。中国所长与西方所长必须互相结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

② 同上书，第242页。

③ 同上书，第243页。



合，才得完备。“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所骛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约者何？一语以足以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未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sup>①</sup>这里描绘了中国文化吸收了西方文化后所达到的中西文化融合的新境界。

4. 中国由于有优越的孔子之道，必能“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sup>②</sup>，中国的以“王道”、“仁爱”为核心的文化取向必将克服西人所操的霸术，使世界归于和睦与大同。这里是说世界文化趋同的实现是由中国为主体和主导的，中国文化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总的说来，“道器”篇的中心思想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主体，以“化西为中”的手段吸收西方文化，使中国文化得到发展和完善，最终以王道宾服天下。这一方面是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保持发展中国文化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大趋势。对“道”与“器”的概念和内涵，郑观应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和逻辑的论证，大体上说，“道”与“器”可认为是文化结构中的两个层面：精神和物质。郑观应认为，物质文明西方胜于中国，精神文明中国胜于西方，把中西文化融合起来可以生成完美的文化。这种中西文化融合论的提出，在当时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它打破了中国人心中牢固的“夷夏大防”观念，为中国文化的更新改造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国近代较早形成的新文化观。当然“道器”篇也有时代的局限，因为郑观应认为“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sup>③</sup>，说明他对中西两种文化的认识是肤浅的，因而对两种文化的价值判断也不准确，更未能超越中国文化优越论和中国文化中心论。这些局限性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

#### （四）文化取向：仿泰西，复三代之法

郑观应对中国文化，是崇古抑今，对西方文化，是厚今薄古，而用“礼失而求诸野”的主张把两者联系起来。他赞扬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页。

② 同上书，第243页。

③ 同上书，第240页。

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sup>①</sup>，认为三代之时已达到鼎盛。他叹息本原文化在三代以后逐渐衰落：“我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唐、虞之时已臻盛治。迨乎三代，文化尤隆；设学校以教士，授井田以养民。其时庶物咸熙，人怀帝德，猗欤盛哉！……降及春秋，群雄竞伯，人各自私，生民涂炭，教养之道荡然无余……暴秦崛起，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此三代以下，人才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悲乎！”<sup>②</sup>同时，他却发现，中国在三代以后逐渐丢失的文化在西方得到保存、创新和发展：“试观英、德、法、美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sup>③</sup>“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诣精深，渊乎莫测。”<sup>④</sup>怎么办呢？惟一的办法就是“礼失而求诸野”。这个“西学中源论”、“礼失求诸野论”虽然在学术上讲得十分笼统粗疏，但对于说明中西两种文明兴衰的过程和这两种文化之间自古以来就互相交流的历史，大体上是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摆脱顽固派“用夷变夏”的指责和破除时人的心理障碍，理直气壮地接受西方先进文化。

在如何“仿泰西”的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了“西学自有体用论”。这是打破了洋务运动30年来的局限，加上自己对西学认识的深化而达到的新知。洋务派为了驳斥顽固派指责他们学西方是“失体孰甚”的观点，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示并没有“失体”，但同时也制约了洋务运动的健康发展。虽大讲富国强兵，但舍其本逐其末，有其名而无其实，国势未能张，外侮未能御。“西学自有体用论”最早是在1884年提出的，郑观应在《南游日记》中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sup>⑤</sup>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艺，同时明确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民主议政制度。他在1892年写的《盛世危言自序》中再重申：“（泰西）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sup>⑥</sup>

“中体西用”思想原则在洋务运动中获得改革人士的普遍认同，但对于哪些是中国固有而应该保留的，哪些是西方先进而应该学习的，不同的人则有不同的看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

② 同上书，第479页。

③ 同上书，第480页。

④ 同上书，第275页。

⑤ 同上书，第967页。

⑥ 同上书，第235页。

法。比较保守的人认为：“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夔然出于万国之上，莫能及也。”<sup>①</sup>即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经史文章、专制制度都是中国立国之“体”和“本”，比西方要高明得多，不应该变动。而郑观应却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应该学，并说西方的议院制颇与中国三代之法度相符，学习它是把中国原有的东西还之中国而已。这样，就像暗渡陈仓，把西方的民主制塞进了中国的立国之“本”中。显然，郑观应的“仿泰西，复三代之法”重点在于引进西方文化，因为西法是具体而详实可行的，三代之法是遥远而含糊的。郑观应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处理，实质便是如此。

为什么郑观应能达到这样的认识呢？这与他的社会实践有密切的联系。是改革社会的实践使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郑观应一生有 50 多年从事近代工商业的经营，既有在外国企业工作的经历，也有在中国洋务企业的工作经历，两种企业制度的对比，使他洞察中国官僚制度的腐败，而对中国官僚制度的批判则深化了他对中国文化在道德层面的弊端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积弱与皇帝、官僚们的道德行为大有关系。他说：“国之强弱系于君相，英明者必顾公益，举直错枉，兴利除弊，国小亦强；昏庸者只图私利，举枉错直，赏罚不公，国大亦弱。”<sup>②</sup>“中国官民分隔云泥，即亲民之官，于兵、刑、钱、谷之外无暇访求民间疾苦。且为官者，每存五日京兆之心，日事营求，只问缺之肥瘠，差之优劣，所以挟钻营之术者，干禄之意重，则爱民之念轻。虽有官箴、座右铭，作暮鼓晨钟，亦无以使之廉隅自守。”<sup>③</sup>他对中国专制独裁政治的批判不遗余力，把政治不良的根源归结为当道者的私心：“惟从来富强之国能久存者，君上有公天下之心，知国家非一人之私产，开诚布公，立宪法，讲道德，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sup>④</sup>“我国积弱数千年之原，由于怀私，怀私由于政行专制，只知利己，不知爱国。不知爱国，则不能合群，人心涣散。”<sup>⑤</sup>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郑观应指出，中国的官僚制度和道德滑坡成了中国改革的瓶颈：“我国地非不广，物非不博，人非不众。惟上下相蒙、失其教

① 邵作舟：《邵氏危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第 183 页。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 页。

③ 同上书，第 294 页。

④ 同上书，第 13 页。

⑤ 同上书，第 303 页。

养，以致富而反贫，强而反弱。”<sup>①</sup>“道德与富强等量，富强亦与道德齐观。”<sup>②</sup>郑观应认为，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不良和道德败坏，首先应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寻求精神启示，然后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可行之策，中西文化互补并用。在该书卷一，他首言“道术”，主张继承中国传统中的“正心修身，穷理尽性”，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该书卷二至卷十五，“言治道”，其中提到要以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来制约当道者们不断膨胀的谋私行为和改良君、臣、民的关系。他说：“……今欲反弱为强，须无利己之心方知爱国，既知爱国，必变专制。欲变专制，须开国会，设内阁，一以统合庶绩，一以固民志，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若臣民未有权利，安肯担任义务？”<sup>③</sup>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明确提出仿行西方议会政治的人，并认为此法可以改变中国政治的腐败。除了批判吏治外，郑观应还批评了中国的颓风败俗，如礼节的上尊下卑之深严、女子裹足的惨无人道、纲常名教的惨祸烈毒、八股取士的虚伪无实等。他在民国3年（1914年）写遗嘱教诲其家人时，除了使用中国传统道德准则外，还加进了“西哲”和“西例”。他说：“凡子孙读书毕业后及21岁后不愿入专门学堂读书者，应令自谋生路，父母不再资助，循西例也。”<sup>④</sup>“西哲查尔那比曰：‘困难愈甚，当愈劳苦，危险愈甚，当愈奋前。此后无困难危险矣。’帖木耳兰曰：‘人能忍耐勤劬，可以胜灾殃。后生小子而欲求自立于世界者，岂可怠惰安逸乎？’”<sup>⑤</sup>可见在郑观应的晚年，他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和西方在伦理道德上也有不少的共同性，不但对中外盛衰治乱之道，且对中外贤哲的道德教诲同时兼收并蓄，提倡“折衷中外教育”<sup>⑥</sup>。他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开始破除“变器不变道”的藩篱，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不再设置绝对的界线。而向西方学习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虽然在“道”方面，郑观应始终认为中国的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道是不能丢的，但与中国文化具有一致性和共通性的西方政治、教育、道德等内容也可以学，这就比同时代人的认识高出一个台阶，即认为西方文化不仅在“器”方面高于中国，在“道”方面也有优秀之处。可以说，郑观应对西方文化持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吸取的积极态度，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西学东渐的先驱人物之一。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③ 同上书，第303页。

④ 同上书，第1487页。

⑤ 同上书，第1496页。

⑥ 同上书，第243页。

综观郑观应的一生，他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总的倾向是中西融合而不是中西冲突和对抗。他认为西方文化“由外而归中”，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可生成一种“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的新文化。<sup>①</sup>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大力推广和探求，使“中西利病情形”了然于胸，然后斟酌损益，形成了“仿泰西，复三代之法”的建设新型文化格局的主张，并认为这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取向。他在《盛世危言 增订新编凡例》里说：“今昔殊形，远近异辙，海禁大开，梯航毕集，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君相同德，上下一心，亟宜善承其变而通之：仿泰西，复三代之法。广开民智，以御外侮。”<sup>②</sup>“仿泰西，复三代之法”说到底就是把体用兼备的西方文化作为合于三代之法的东西全面学习，说明郑观应已经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文化结合模式，他的文化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

郑观应立足于复兴中国文化，因而对中西文化价值判断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主张，既具有维护中国文化民族性的立场，也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他的思想大大开启了后人的智慧，对梁启超、孙中山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 四、香山文化精神的产儿

有学者说，文化是人化，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是人类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而文化的精神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指某种文化在精神层面上的特质。我们把具体的文化表现加以分析、归纳和概括之后，其中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本质内核便被提炼和抽绎出来，成为这种文化的精华。香山文化的精神和气质值得我们好好去总结，而这个工作又离不开对具体承载文化的杰出人物的研究，因为他们是香山文化精神的优秀代表。下面通过考察香山先贤郑观应的思想品格，试图对香山文化精神的某些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

### （一）敦品励节

敦品励节是香山乡土文化教育的重点，也是深厚的家族传统。

位于珠江三角洲的香山农村，人们喜聚族而居，宗族势力强大，宗祠、家祠遍布村中。族长、家长、绅耆们成为宗族发展的推动者、地方秩序的维护者、族人思想行为的导师和权威。在族规乡约的严厉管束之下，村民老幼少长均循规蹈矩，不

<sup>①</sup>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页。

<sup>②</sup>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7页。

敢稍越伦次。在清季，广东农村的宗族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一位长期居住广东而自称洞见粤人本质的外省人感叹：“粤省虽素称强悍之邦，而其民心犹重义礼。”证诸郑观应的家族，此言不虚。

郑观应的曾祖父郑璧庄在家族中很受称道，说他“性耿直”、“胆识兼优”。这缘于一次宗族争地斗争。曾祖的时代，郑家还比较贫弱，被人欺负是常有的事。一天，族人发现祖宗坟地被富家豪族侵占，非常气愤。但人家财雄势大，郑家如何斗得过？正百思不得其计，郑璧庄挺身而出，跑到县城衙门递了状子，诉讼经年，终于得直，坟地重归郑家所有，而璧庄的勇气和才智大受族人夸奖。郑观应的祖父郑鸣岐，“俭朴寡言，敦品励节”，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亦受到乡人尊重。

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是个教书先生——塾师。郑观应说他“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设帐授徒，从游者多享盛名，各有建树”。他的品格更值得称颂：“一言一行，动为世法。性孝友，重然诺，慷慨好义，有古杰士风。”<sup>①</sup>

郑文瑞的思想品德确实值得注意，因为他对郑观应影响甚大。郑文瑞从小聪慧，读书又极勤苦，但却未能考取功名。遵循郑家传统。读书不成，便当做工，所以他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出外跑码头，做做小生意。但是，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读书学习。他的想法富有儒家士绅对乡村社会的责任感，他认为，读书不是为了富贵荣耀和做官，人也不可能把所有圣贤经传都读完，但有用的书断不可不读。他认定劝善惩恶之书有关世道人心，是有大用的。他对先贤教诲和嘉言懿行特别感兴趣，一边读书一边抄录了大量格言和故事，然后把它们编辑成书，名之为《训俗良规》和《劝诫录》，自费印刷，广为派送，并热心为人讲解。他非常热衷于这种事情，以致对经商兴味索然。他在外跑了几年码头，有了一点积蓄后，便回归故里，做起了设帐授徒的教师工作。

郑文瑞作为乡村中的绅士，不但非常热衷于“睦姻任恤”的公益事业，为家乡筹置义田、兴立善堂、修建宗祠、书院、道路和桥梁等，而且对国家大事也非常关心。在澳门下环龙头左巷的郑家大屋里悬挂着一块横匾，上面写着“崇德厚施”四个金漆大字，上款是诰封荣禄大夫郑文瑞，落款是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曾国荃。这曾国荃是湘军首领曾国藩胞弟，与郑文瑞素不相识，为何纡尊降贵千里迢迢送来一块匾？确实令人费解。

原来，这曾国荃因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有功受封，1877年，任官山西巡抚。正遇上北方奇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光绪皇帝冒着酷暑一再祈雨，但无济于

<sup>①</sup> 郑观应：《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2页。

事；命李鸿章借拨海防经费也只得 14 万两银子，杯水车薪。眼看灾民连树皮、草根全吃光，只得“研石为粉，和土为丸”，塞入腹中。曾国荃在奏折中称：“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灾民无以为食，以“观音土”作食物，以致泥土在腹中发胀，撑破肚肠，情形惨不忍睹。更为甚者，“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货之者”，“父子相食，母女相食”，人间惨剧，莫此为甚。统计，山西一省之内，每日饿毙千人以上。

郑文瑞听到这个消息，忧心如焚。不但自己捐钱捐物，还发动亲戚和分散各地谋生的儿子们劝赈倡捐。当时郑观应在上海，听到父亲召唤，积极响应，筹办义赈公所多处，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还把亡母遗留的存银 1 000 两也全数捐出。所以，光是郑家一门就募得数十万两银子，救人不少。赈灾款送往山西，帮助曾国荃渡过了难关。曾国荃十分感激，所以后来郑家大屋在澳门落成时，便派人送来了这块匾。郑家的捐赈义举经李鸿章等朝臣上奏朝廷，圣上大悦，下令褒奖，御赐“乐善好施”四字，又命把事迹载入县志和省志，使郑家“一门义行”，声名远播。

从郑观应的祖先三代可知，给予郑观应以良好影响的家族传统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1）方刚正直，不畏强暴，颇有粤地强悍之风。（2）讲求实际，亦绅亦商，读书、经商两不废。（3）敦品励节，以儒、道两家伦理道德为准绳。（4）乐善好施，关注民生，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这虽然是郑观应家族的传统，但在香山县具有普遍意义，是当时香山士绅家庭崇尚的教养之道和社会习尚。

郑观应从 5 岁入塾读书到 17 岁结束学业走上谋生之路，他少年时代的教育主要来自乡塾和庭训，也即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特别讲求道德修养，对郑观应的人格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郑父教规极严，尤重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他本人则身体力行。这套教规的中心是“忠孝仁义”，即要对君主尽忠，对长辈尽孝，对人要宽容有礼，对朋友要讲信用，做人要勤劳俭朴，不义之财决不贪取，不能沾染不良嗜好，等等。郑观应的接受能力很强，领会很快。他对父亲编写的道德教本《训俗良规》等书特别感兴趣，不但记得很牢，而且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他也像父亲一样经常把道德格言挂在嘴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闻道之士，先贵积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等谚语格言，朗朗上口，对人说话，则随口而出，贴切妥当。这些人生格言不仅指导他如何做人处事，而且也是他日后劝人向善的理论依据。家庭教育和乡塾教育给郑观应以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和伦理道德操守，同时也带给他守分安命、恪守忠孝节义等时代局限。日后，郑观应成为上海著名的赈济慈善事业的主持人和正直廉洁的企业高层管理

人员。

### （二）忧国忧民

郑观应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时期之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清朝统治日益腐朽，人民苦难日益惨烈。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所有的爱国人士都在思索着用什么办法来救国保种。郑观应出身平民，而国家兴亡之责任须臾未忘。他在艰难谋生的同时，也深切地关注着国家的命运，积极探索中国的救亡和富强之道。

鸦片战争前后，正值西方列强在其领地上大搞开发的时期：西班牙占领的古巴正在开展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荷兰控制的爪哇群岛正在大力开发锡矿和种植橡胶、胡椒、咖啡等经济作物；英属圭亚那以及新加坡为中心的海峡殖民地种植、开矿和海运等行业也在扩展；秘鲁则决定开采鸟粪资源；而美国正要开发西部、修筑铁路。当这些工作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恰逢原来提供劳动主力的黑奴制度被禁止，劳动力来源成了大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西方国家便把眼球转向中国，前来招诱“苦力”——华工。

澳门的猪仔贸易，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迅速，与其他几个南方口岸相比，不仅在规模、数量上名列首位，而且手段之卑劣，令人发指。盘踞澳门的葡萄牙人，以招工为名，开设大量“招工馆”，包庇、纵容贩卖人口的罪恶活动。当地匪徒有此便利之处，更无忌惮，广东的拐匪竟然发展到数万人之多，以澳门为巢穴，拐骗手法狠毒，诡计百出，闻所未闻。他们深入墟镇、乡村，视不同的对象施以不同的拐骗、掳掠手段。对于有不良嗜好者，投其所好，诱以娼赌，一旦上钩，便被绑架而去。对于良民，则当街掳掠。一到黑夜，拐匪便四出游荡，潜伏于街头巷尾。

耳闻目睹同胞受苦受难，郑观应的心情无法平静，他不能袖手旁观，不能沉默，他要向世人揭露澳门华工贸易的黑幕，要谴责食利者的贪酷不仁，要呼吁中外政府共同起来制止罪恶，拯救人民于水火。弃学从商的郑观应又拿起了笔杆，把自己要说的话写下来，送到报纸发表，文笔犀利而流畅：

“余世居澳门，素知底蕴，非独窝娼聚赌，年投规银数十万，而又有贩人出洋之举。其中被拐见诱者，十居其九。父失其子，妻丧其夫，长离桑梓，永溺风波，有死别之悲，无生还之望，言之伤心，闻之酸鼻。此无殊设陷阱于境中也。溯自建立招工馆以来，为其所陷害者不可胜计，中国之人，无不发指涕零者。”<sup>①</sup>

这是发自心底的沉痛之声。

<sup>①</sup>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经求死者，有焚凿船只者。要之，皆同归于尽。即使到岸，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撻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噫！华民无辜，飘零数万里，而受如此之刻酷乎！”<sup>①</sup>

这是深切的悲悯之情。

“迩来大西洋人（指葡萄牙人）鹊巢鸠居，划疆分治，复创陋规，设猪仔馆，大开赌场。其招工之馆则何止百有余间也。其番摊之馆则已有二百余号矣。以致盗贼之风日炽，猪仔之流害弥深。”<sup>②</sup>

这是对盘踞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把澳门变成罪恶深渊的严厉谴责。

“为民上者，竟置若罔闻。本地绅衿，各顾身家，恐遭其害，又未敢大声疾呼，以讼言于葡萄牙之领事，请其舍此利息，以造苍生之福。”<sup>③</sup>

这是对那些不肯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有社会地位的士绅们表示强烈的不满。

郑观应写下了《澳门猪仔论》、《续澳门猪仔论》、《求救猪仔论》、《论禁止贩人为奴》、《救猪仔巧报》、《记猪仔逃回诉苦略》等多篇文章，除了揭露猪仔贸易的罪恶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禁绝猪仔贸易的办法。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三：第一是先绝其源。首先要与澳葡当局“理论”，“以义理折之”，责成他们设法禁止人口买卖。第二是清政府要设官治理华工出洋之事，保护人民。即“设澳门关监督专治之”。第三是对那些敢于继续作案的人“按照律法以拐骗之罪，船即充公，人即正法”。

在当年反对猪仔贸易的各种言论中，郑观应的言论颇受注意。上海《申报》评论说：“昨读贵馆《申报》登香山郑君《澳门猪仔论》一篇，可谓有心世道，洞悉时弊，其所论为不诬矣。”“四海之大，九州之远，知有猪仔之人少，而不知有猪仔之人多，即官粤土者甫经下车亦未知猪仔之情形，如此，其急而不可待缓也。”在郑观应提出的解决办法中，最具新见和远见的是遵循国际法与西洋人论理、交涉一条。刚刚成为洋人手下败将的清朝官员不敢再得罪洋人，把打击猪仔贸易的重点放在中国拐匪身上，所以人们看到当时官方有大量严惩拐匪的文告和奏折，但却没有看到他们对猪仔贸易的元凶——西方列强的谴责和斗争。郑观应与他们不同，他站在保卫桑梓同胞、维护社会正义和人道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反对澳葡当局的弊政。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澳门乃中国之疆土，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是“鹊巢鸠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③ 同上书，第10页。

居”，作为中国人决不可以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为所欲为。

当时郑观应身为买办，受雇于洋人，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民族气节，反而因知世界大势、各国关系、国际公法，对国家民族权益更加关心，更能提出中肯的解决办法。他为清政府献策：“盖万国律法，未有不衷乎义、循乎理者，以义理折之，亦当无词以对，则其禁止亦不难也。”<sup>①</sup>就是说要抓住西方国家标榜遵守法制的承诺，运用法律武器与他们斗争。

援引国际公法，迫使澳葡当局在猪仔贸易问题上做出合乎人道的改正，是郑观应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敏锐地发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当时的中国政府与人民对国际公法是非常生疏的，更不会用国际公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郑观应的提议，体现了先知先觉者的睿智和对国人的启蒙作用。

郑观应这些文章收入了《救时揭要》，他自述其写作的动机时说：

“庚申（1860年）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sup>②</sup>

《救时揭要》共3万字，收入他写的政论文24篇，顾名思义，书的内容是揭示挽救时局的要点，表达了他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愤怒和不满，以及匡时救世、普度众生的悲悯情怀。他的文章更因切中时弊而备受世人称许。

### （三）勤勉进取

勤勉自励，拼搏进取，是郑观应对待学习和工作的态度，他一生勤劳，手勤、口勤、脚勤、脑勤、笔勤，一刻也不愿意停下来。他在多个重大洋务企业担任要职，百务缠身，工作量大，但任劳任怨，尽职尽责，成效显著；他随时留心世事，读书看报，广收博采，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艰苦的著述，写下了洋洋数十万言的巨著；他孜孜不倦，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时他已经是80岁的高龄。勤勉进取不光是郑观应个人的生活习性，也是大多数香山人共有的生活方式和优良传统，成为当时香山社会良好的风尚。

郑观应由于家贫，17岁时便不得不结束学业到上海投奔叔父，进入洋行“供奔走之劳”，做一名学徒。郑观应进入宝顺洋行不久，就作为洋人的随员之一，被派到中国北方新开的商埠天津了解商情。他坐帆船到了天津。时值隆冬，北方大雪漫天，郑观应是南方人，从未遇到过大雪，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棉袍御寒，但他努力工作，不以为苦。挨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次年才回到上海。他的工作表现，使

<sup>①</sup>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73页。



东家对他刮目相看。不久，他就独当一面，老板让他管理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事务。

郑观应有个突出的优点是吃苦耐劳，勤勉自励，这种品格在他青年时代就养成了。为了充实自己，他一刻也不愿闲下来。工作之余，他与另一个好学的广东青年梁纶卿一同到英国博士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院读夜校，以白天微薄的收入支付学费。读了两年，他基本上掌握了英语，这对他日后的发展好处无穷。1860年，郑观应正式当上了买办。

在宝顺干活，东家要求很严，虽然郑观应有亲朋的庇荫得以进入宝顺，但能否站住脚跟不被竞争所淘汰，最终还是靠自己。郑观应年老时对其子女训诫说：

“人之一生，犹一岁之四时乎。春风和煦，草木萌动，一童年之活泼也；夏雨时行，草木畅茂，一壮年之发达也；经秋成实，历冬而凋，则由壮而老，由老而衰矣。然冬尽春来，循环不已，而人之年华则一去不返。老者不可复壮，壮者不可复少。语曰‘时乎，时乎，不再来’。凡我少年其识之。”<sup>①</sup>

这是经验之谈，从小就懂得珍惜光阴的郑观应在宝顺学到不少终身受用的知识和本领。宝顺内部的能人很多，个个都很努力，成功的例子也不少，他们都是他业务上极好的老师。宝顺外部竞争激烈，商场变幻多端，优胜劣败，宝顺前期兴盛后期衰败，它的兴衰是郑观应认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生动实例。郑观应说，他“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宝顺10年是他学习商战的重要阶段。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企业的奇才。洋务大员盛宣怀认为郑观应“商情熟习”，不愧为商战高手，很多重大事业都倚重他。郑观应三次进入上海轮船招商局，使其扭转危局，起死回生，有人传说他有“秘术”。郑观应解释说：“并无秘术，不过诚意相孚、实事求是耳。固无奇才异能，何敢贪天之功为己有？”撇开郑观应的自谦之词，我们可以看到他确是有奇才异能的，这种出色的才能不仅由于他对商务熟悉，还源于他对外情的了解。正如他经常批评清朝大员们“其病由于不悉外情，致为他人所胁制”。不谙外情是清廷外交失败的一大原因。要不为外人所胁制，必须熟悉外情。为了进一步推动招商局的业务发展，郑观应经常走出去，巡视各埠商务情形，进行实地调查。1893年3月30日，他携招商总局文案吴广霁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行。他们途经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宜昌、万县，于5月6日到达重庆。5月16日东归，6月10日回到上海，合写了《长江日记》及一批调查报告，为招商局日后制定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如果说郑观应有什么“秘术”的话，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也是郑观应成功的“秘术”之一。郑观

<sup>①</sup>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0页。

应在招商局脚踏实地，辛勤劳作，廉洁自律，使招商局焕发生机、健康发展，成为招商局历史上的大功臣。

郑观应一边从事商业活动，一边手不释卷地读书思考写作，关注社会和民生。他志向远大而心思细密，为了集思广益，他广收博采，随时把自己所听到、看到、读到、想到的各种议论一一记录下来，加以综合整理，消化吸收。一旦恍然有得，便写成文章，或寄给朋友，或登于报刊，提供世人参考和选择。他像蜜蜂采蜜一样精心制作他的文章，而且随着见闻的加深和增广而一改再改，不断完善。1873年，郑观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救时揭要》；1880年，又出版了第二部著作《易言》，这是他著述活动的开端。这些文字表达了他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也道出了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由于勤学多思，他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中观察中国和世界，提出了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主张，成为晚清维新变法思想的前驱。

#### （四）务实创新

郑观应的务实作风和创新思维，集中表现在他花费了一生心血撰写的著作《盛世危言》之中。

《盛世危言》是晚清一部震撼朝野的巨著，这部著作的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涉及的社会改革非常广泛，包罗丰富。政治上，要求变君主专制制度为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改善吏治；经济上，主张集资兴办新式工商业，增强市场竞争力；军事上，讲求训练兵将，培养现代军事人才；外交上，呼吁修约谈判，捍卫国家主权；教育上，强调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财政上，主张开源节流。其他关于改造颓风陋俗、兴办社会慈善和赈济、提倡妇女教育等等主张，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开一代风气。这是最早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文化结合模式进行批判的言论，为改革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吹响了号角。《盛世危言》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其所展示的广博的西方知识，深刻而敏锐的见解，全面而系统的改革主张，实事求是的精神，直言无隐的勇气，使当时人读后无不为之感动。

《盛世危言》出版不过几个月，就被江苏藩司邓华熙看中，将其抄录呈荐光绪皇帝。邓在奏折中说：洋务肇兴以来，仿效振作，但却前败于法，近败于日，天下臣民痛心疾首，不胜太息愤懑！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非一时一事之贻害，而是大有原因的。他推许郑观应的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查该员

游历诸邦，留意考究，其坚心刻苦，诚为可用之才”<sup>①</sup>。

光绪帝读后，也认为颇有可采。遂命总理衙门印刷 2 000 部，发给大臣们阅看。皇帝的赞赏使该书身价大增，京城大员们都争相阅览，思想上受到震动。郑观应自己排印的 500 部，也很快求索一空。“都中各处求者”，仍“络绎不绝”。《盛世危言》中所谈论的问题，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

封疆大吏、洋务大员张之洞也推许该书是当时谈时务书籍中的上乘之作。他说：“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他称赞该书“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sup>②</sup>。以张之洞的见识、能力，对该书予以如此非同一般的评价，极为不易。说明该书不愧为一部高水平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对中国的富强具有指引作用。

1897 年，一份外国人办的报纸报道说，《盛世危言》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指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选拔人才的考试也从该书中出题，可见该书当时在世人心中的地位之重和普及之广了。接着而来的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等维新派所提改革建议，显然受到此书极大的启发。毋庸置疑，郑观应是维新运动的思想先导。

受到香山文化哺育成长的郑观应，也为香山文化增添了光彩。

## 梁庆桂与晚清广东维新运动

梁庆桂（1856~1931 年）<sup>③</sup>，号小山（亦书作筱山、筱珊），广东番禺黄埔村人。他是康有为的好友，参与公车上书，列名保国会，虽未被视为“康党”而遭缉捕，但确实是个维新派。戊戌政变后，他继续积极参与新政改革，推进中国的独立富强

<sup>①</sup> 郑观应：《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布政使臣邓华熙跪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6 页。

<sup>②</sup> 夏东元编：《郑观应文选》，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 2002 年版，第 1 页。

<sup>③</sup> 据梁嘉彬考，梁庆桂生前无自传，歿后有哀启行状亦已逸。有关其生年的记载有两处：一为梁庆桂撰《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戴护理两江总督江宁布政使梁府君（肇煌）行状》内附语，记为清咸丰八年（1858 年）。一为 1971 年 2 月台北文粹阅影印清代广东历科乡试录光绪二年（1876 年）丙子科文乡试题名录，是科正主考王之翰、副主考郁昆，正榜共取 89 人，庆桂名列第 20，系填报 21 岁，官生。如填报岁数属实，则庆桂应生于咸丰六年（1856 年）。又《番禺黄埔梁氏家谱》，亦记录咸丰六年（1856 年）九月十日生。

运动。作为改革派的后起之秀，他更稳健和讲究策略，往往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站在斗争的前列。他在清末争回粤汉铁路自办权、倡导广东地方自治、掀起立宪运动、改革教育制度、创兴华侨教育等方面起着推动、领头和指导的作用，并取得不少的成功。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广东维新派在戊戌后的动向。20世纪初期广东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形成广泛的社会参与热潮，与他们的努力不无关系。

## 一、积极参与戊戌维新

梁庆桂的家乡广东番禺黄埔村是清代著名黄埔港所在地。在广州一口通商期间，黄埔是广州的外港，所有到广州做生意的外洋海轮均于此处下锚，办完报关交费、查验货物、投行担保等手续后，便可把货物换到驳艇上运往广州出售。1749~1838年间，进入广州的外国商船来自20多个国家，共有5000多艘，其中大部分从黄埔口岸进入广州。随着外贸的繁荣，黄埔港名闻海外。

由于黄埔铺地与广州城西十三行仓库之间有驳船来往穿梭承接装卸货物业务，清政府在黄埔村中设有税馆、夷务所、买办馆和永靖营等机构，担负着广州对外贸易的许多职能，所以全村人几乎都参与对外贸易活动。梁庆桂的曾祖父梁经国从当洋行伙计做起，进入商界，最后发迹成为十三行的行商。

梁庆桂的祖父梁同新（原名纶机）是梁经国的第七子，走的是读书入仕之路。父亲梁肇煌亦仕途通达。梁庆桂于光绪二年（1876年）乡试中举。后任官内阁中书。29岁时，父丧，居乡里潜心文史，与同邑梁鼎芬、南海康有为等时相往来，为兰契交。在梁庆桂后人所辑的梁庆桂遗稿《式洪室诗文》中，可看到梁庆桂与康有为的书信文字往来，其中所表达的友情是十分真挚亲密的。<sup>①</sup>据康氏近亲所述，康有为常自南海县到广州梁庆桂家借书阅读，又或在梁家住下读书。而且康有为入京考试的费用也常由梁家供应。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二日，与卓如（梁启超）同入京会试，寓盛祭酒伯熙邸。……既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寓”；“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偕卓如、梁小山入京”。<sup>②</sup>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惨败。翌年，中日议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梁庆桂偕康有为联袂上京应试，参与公车上书之事，入强学会，请求朝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强学会被查封。1898年，瓜分惨祸迫在眉睫，康有为再倡保国会于京师，梁庆桂积极参与，列名保国会，集谋

<sup>①</sup> 梁庆桂：《与康长素书》，《式洪室诗文》，民国20年（1931年）铅印。

<sup>②</sup>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28~129页。

保国之策，其爱国之热忱当为天下所共见。<sup>①</sup>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京。但落难之时，慈禧太后却仍不忘享乐。到达西安后，又下令各省把应解京城钱粮转输西安，并把南漕改道由汉水入紫荆关，溯龙驹寨运送西安。但这些供奉仍然不能满足皇室的花费，于是又在官吏中大搞报效，相继有人“以入货取九卿”。梁庆桂和另外四位广东士绅黎国廉、陈昭常、谭学衡和马庆荣长途跋涉，于1901年4月到达西安，贡献方物。由此，各得晋升。梁庆桂从内阁中书升为侍读。此后，梁庆桂返籍居乡，但为国家雪耻之事常记心头。

## 二、成功领导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斗争

进入20世纪，西方强国渐次收敛了瓜分中国的叫嚣，改倡所谓“保全主义”，扶植清廷实行“以华治华”之策。国际垄断财团扩大对华资本输出，在中国争夺开矿权、筑路权、设厂权，加强了对华经济侵略。其中，从19世纪末开始的争夺中国铁路修筑权的斗争在20世纪更为激烈。1900年，清廷与美国合兴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订立了贷款美金4000万元修筑粤汉铁路的合同，到1904年该公司竟不守信用，私下以铁路股份的2/3售与比利时公司。此事引起朝野关注。当时，梁庆桂之子梁广照在京任官刑部主事，他认为，比利时已经承修芦汉铁路，粤汉铁路若再交与比利时，恐怕中国南北两大动脉皆为比利时背后的法国和俄国资本集团所攫夺，故力倡废约。广照上折弹劾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起初刑部堂官不允代奏，但此时报章杂志已大肆宣传，言论鼎沸，不得已乃为之代奏。朝廷命商部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妥筹办理。1904年12月28日上谕军机大臣等：“刑部代奏：主事梁广照条陈粤汉铁路一折，粤汉铁路前经谕令张之洞妥议筹办，兹据奏称路权放失，亟应收回自办，不可迁延贻误等语，著商部、张之洞妥筹办理，以挽路权，原折著钞给阅看。”<sup>②</sup>翌年2月，因梁广照再奏请著张之洞责成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赶紧设法挽回粤汉铁路路权。上谕又令张之洞力保路权，不得延宕贻误。可见，粤汉铁路废约保路之事是由梁广照一再上书引起国内君民注意，从而产生了巨大反响。<sup>③</sup>梁广照的爱国思想和行动当亦受其父梁庆桂的影响。

湖广总督张之洞迭奉上谕，深知大局可虑，不敢怠慢，力促铁路大臣盛宣怀、

<sup>①</sup> 康有为：《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03~404页。

<sup>②</sup>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八册卷五百三十八，台湾华文书局发行影印本，第10页。

<sup>③</sup> 梁嘉彬：《梁庆桂传》，《广东文献季刊》第7卷第1期。

驻美大使梁诚与美国办理废约的交涉。另一方面，又鼓动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商与舆论给盛宣怀施加压力。广东绅商对此十分积极，成立了路权公所，刊印传单，发布公电，展开一系列收回路权的斗争。美国政府闻讯十分震恐，为了保住利权，主张由美国国家资本赎股。于是，美国方面派人来华游说，倡言以美接美，广东、两湖因之民心骚动。梁庆桂等粤绅致电张之洞，一针见血地指出以美接美既不合公理又丧主权，表示坚决反对，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为影响盛宣怀的决策，张之洞又把梁庆桂等人的电文发往盛宣怀。电文称：“……现在中美交好，美国素敦信义，谅必不袒背约之商，致碍公理。倘坚持不废，三省商民另筑一路以图抵制。粤民万众一心，有进无退，我公忠义，中外同钦，务望设法维持，三省托命，禱甚。”<sup>①</sup> 粤汉铁路废约之事演变成一次颇具规模的群众运动。当时正处于日俄战争期间，为避免与外国发生国家间关系的紧张，清政府决定把这次中外交涉化为商务行为。于是，三省官绅转趋于从经济上解决，积极筹备款项赎路，赎回后交由商办。梁庆桂父子联合广东士绅集股作赎路准备，再由御史黄昌年以三省绅民公意为词，奏请收回路权。由于以商对商，克服了不少外交上的困难，中国终于在1905年8月与合兴公司签订合约，赎回了粤汉铁路的利权。粤汉铁路的收回，是美国对华投资首次受挫，也是近代中国人民赎路自办的首次胜利，表现了中国人民要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反对列强欺凌的斗志。其中，广东绅商以及他们的代表梁庆桂等人在斗争中的表现是出色的。

铁路收回自办后，是商办还是官办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广东商绅力主采用商办的方式修建，并拟订“招股大纲”9条，其中关于办路之权，明确规定“以实权全归股东”。不料张之洞看到后，大为不满，指责广东绅商“欲置官于事外，而且紧要为难处，仍须役使驱策官长，太欠平允”<sup>②</sup>。他还授意两广总督岑春煊，一定要设法筹足官款，以保官之权。由于粤汉铁路是三省共有，必须三省官民取得共识，但广东绅商与两湖的商人经济实力不同、主张不同，在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广东绅商只能争取粤汉铁路的广东段商办。因此，在赎路合约签订之后，广东绅商集会讨论粤汉铁路事宜，提出了三省合承分办的主张，推举梁庆桂、黎国廉为代表到武昌会同湖北、湖南的代表一起谒见张之洞。经过一番争取，最后达成了三省各筹各款、分段筑路的方案。但梁庆桂与黎国廉坚持广东段商办的意见，与岑春煊的官办方针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因梁诚、梁庆桂对粤汉铁路权的收回有功，广东商绅公推梁诚为铁路总办（梁

<sup>①</sup>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九十二，中国书店1990年版。

<sup>②</sup> 同上书，卷一百九十四。

诚的驻美大使职务应于1907年任满)、梁庆桂为副总办。<sup>①</sup>但岑春煊不予理睬。由于官商的分歧一直相持不下,广东的筹款在赎路数月后仍毫无着落。1905年年底,岑春煊提出了一份《粤汉铁路筹款议》,拟向全省“加收炮台经费、三成粮捐、沙田亩捐,并试办基塘租捐,商渔船捐,盐斤加价”<sup>②</sup>,用征收苛捐杂税的办法来筹款,而且把人民的财产变为官款。另外,还打算借外债以抵制商办。岑春煊的这一做法显然损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商人的利益,从而导致了官民矛盾的激化。1906年1月10日,广东绅商集中在广济医院开会。会上,梁庆桂和黎国廉等赴鄂代表向绅商报告了三省商定的筹款协议以及他们对岑春煊的筹款办法的否定,与会人士大多数表示反对岑的筹款办法和坚持商办的方针。两天后,广州知府陈望曾等受岑春煊派遣,到广济医院会同绅商讨论筹款办法,梁庆桂、黎国廉等代表绅商发言,言词激烈,不但反对官府抽捐,还痛斥了官场腐败。

广东绅商不合作的态度激怒了岑春煊。当天晚上,岑春煊密令番禺知县柴维桐拘捕梁庆桂、黎国廉。梁庆桂获报急忙化装避往香港,黎国廉则于深夜被捕。岑又上疏奏请褫去梁庆桂的侍读、黎国廉的道员职衔,得到清廷谕旨认可。消息传开后,引起极大风波。绅商一致谴责岑之卑劣行径,广州总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全城大小商号,宣布全体罢市,清廷一日不严惩岑春煊,商民则一日不复业。舆论呼吁“去岑安粤”。<sup>③</sup>旅港粤商亦致电张之洞,声称“黎绅一日不释,即国民多一日之怨望”。<sup>④</sup>1906年1月15日,绅商在广州明伦堂召开千人大会,在籍前闽浙总督许应骙也到会。会议拟将本案始末详情电请北京同乡京官代奏,撤革岑春煊,以平民气。越秀书院山长吴道镕起草疏文,当晚便派人赴香港拍发电报。唐绍仪与伍廷芳也联名上奏,支持绅商,要求清廷派员到粤查办。为了救出黎国廉,使岑春煊强加在绅商头上的“破坏路政”罪名不能成立,广东绅商决定迅速筹集股款,1906年2月3日,由广州九大善堂和七十二行商会组织开会,会上决定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实行商办,并拟定集股2000万元。会后认股活动在各地迅速展开。这时朝廷亦先后派出袁树勋、张人骏和周馥赴粤查核,认为梁、黎等人全无抗捐情事,且粤民已认股2000万元,遂下旨要岑释放黎国廉,岑不得已在1906年2月14日将黎释放,并同意了绅商集股商办的要求。

1905年6月11日,朝廷降旨开复梁、黎原有官衔,继再降旨同意岑春煊恳请

① 参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八册卷五百四十八,台湾华文书局发行影印本,第5页。

② 岑春煊:《奏为就地筹款举办铁路折》,梁庆桂撰:《粤汉铁路全案》,清光绪1873年抄本。

③ 见《大公报》1906年2月2日、15日。

④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九十五,中国书店1990年版。

开缺的奏折，后调岑为云贵总督。广东绅商争取粤汉铁路广东段商办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争回粤汉铁路利权的斗争，开始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肆意攫夺中国利权，后来发展成为反对国内封建官僚剥夺人民利权，是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也是他们登上政治舞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端，反映出中国民族资本摆脱封建束缚独立发展的势头。在这场斗争中，广东士绅与商人相结合，形成了有力的领导核心，为斗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绅商结合成为清末民初广东地区改革运动经常呈现的斗争方式、特点和面貌。从梁庆桂身上，可以看到广东士绅正在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梁庆桂由商而绅的家庭背景，也是广东士绅与商人有天然联系的一个显例。

### 三、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和地方自治运动

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宣布“变成法、行新政”。由于教育改革已刻不容缓，清廷于1905年9月下诏“立停科举”。同年12月，统辖全国学务的行政机构学部成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当时学部尚书为荣庆，左侍郎为严修，右侍郎为达寿。1906年张之洞被召入京兼管学大臣，与梁庆桂交情甚厚的浙江学政李家驹（号柳溪，甲午翰林）被擢为京师大学堂提调（即校长）、学部右丞。由于李家驹的大力举荐，梁庆桂到京师任职，积极参与了教育法规的改革和制定，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到兴学育才的事业上。

1906年1月，清廷派出的考察政治大臣端方、戴鸿慈到达美国，他们得知在美华侨难以受到中国文化的教育，不得不附入美国学校读书，便提议：华侨如欲设立小学堂，本大臣当奏请政府立案，俾海外华侨小学堂归钦差管理，他日学生毕业领照，与内地学堂无异。于是，纽约、旧金山两埠商董，以华侨在美国受教育屡遭种族歧视为由禀奏学部，请求清廷协助兴办侨校。1907年1月29日，学部奏请派内阁侍读梁庆桂赴美筹办华侨兴学事宜，又派留学毕业生、新授法政举人董鸿祯总理南洋各埠学务，是为清政府着手华侨教育之始。

梁庆桂的任命，除了他个人的因素以外，还得到了李家驹、梁诚和唐绍仪的大力促成。现观梁庆桂在1907年上学部的手折，表明他对华侨教育的重要性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奏折说：“……伏念西国殖民政策，无不以文字语言为化合力。……若使旅外侨民于祖国之文字语言道德习尚渺无所知，则习外之见愈深，爱国之情渐淡。查北美侨民以十万计……惟限于教育无人，不得不附入彼国之学校。若能提倡激劝，则中文学堂之成立，可计日期。……我国学生凡普通毕业后欲习专门者，尚需咨送赴美就学，若以该处侨民就近附学，其经费岂非较省？……拟请奏派专员赴



美，提倡华侨学堂，俾侨民博通中学，俟毕业后再入彼完美之学校，或使彼中已习专门科学者补习国文，则中西融洽，造成全才，足备国家官人之选。因势利导，莫便于此。”<sup>①</sup> 梁庆桂出于为国家尽快培养人才的动机，想到了目前在西方国家生活、对西方有所了解的华侨子弟。他认为，在中国读书的学生接受了普通教育后，如果要学习专门知识，还需咨送赴美就学。如果在美国华侨中选送子弟就近学习，所需经费便可较省。但华侨子弟自幼即入美国学校，不熟练中文，将来成才以后恐怕回国难以找到工作，甚至只能留在外国，于国家是个损失。他认为提倡华侨学校，使华侨子弟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于国于己都是有益的。

出国前在广州期间，梁庆桂还倡导了广东地方自治运动。1906年9月，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旨，各地闻风而起着手筹组和建立立宪团体。1907年7月，为树立预备立宪的基础，民政部特饬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倡导地方自治。8月，又通咨各督抚仿照直隶办法，择地试办。1907年11月，广东成立了两个地方性的立宪团体，即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和粤商自治会。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是由梁庆桂倡议，联合许秉璋、杨晟、张璧封、梁致祥、孔昭璽、莫鸿秋和罗国瑞等发起、组织的。梁庆桂在论述该社缘起时说：“天下大势，有宪法之国恒强，无宪法之国恒弱。……大地博博，时局僂僂，此亦天运一大转机哉！今天子下明诏定立宪，寰海萌庶延颈望治，于是天津首创地方自治研究所，江苏设立预备立宪公会，若闽若吉若鄂，以次递举，而吾粤缺焉未讲，是则士大夫之责也夫。……爱合同人组织斯社，以研考宪法为体，以编辑地方之政治、调查地方之政俗为用。立社省会定总汇也，联合各府州县期普及也。外达于京省仕宦，远布于五洲华侨，则又广知识资切磋也。”<sup>②</sup> 梁庆桂认为，君主立宪政体是政治进化的新阶段，实行立宪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改变落后面貌的一个机会。而立宪政体对中国来说又是件很新鲜、很复杂的事，必须好好研究，才能成功运作。他衷心希望清政府的新政改革能够救中国，而他极愿为此而出力。

1907年11月6日于广州文园开成立大会，与会者90余人。10日，召开第二次会议，投票选举梁庆桂为社长，易学清、杨晟、许秉璋、卢乃潼为副社长。名誉社长为邓华熙（前贵州巡抚）、戴鸿慈、唐绍仪、梁敦彦（外务部右侍郎）、陈庆桂（给事中）、胡恩彤（军机处帮领班章京）、梁鼎芬（湖北按察使、礼部顾问官）。17日，召开第三次会议，议定了该会职员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的编辑出版事宜，

<sup>①</sup> 梁庆桂：《光绪三十三年上学部手折》，《式洪室诗文》，民国20年（1931年）铅印。

<sup>②</sup> 梁庆桂：《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序》，《式洪室诗文》，民国20年（1931年）铅印。

确定莫鸿秋等4人为编辑，卢乃潼、张树柅为总编辑，编辑大多数是留日学习法政的毕业生。从发起人刊布的公启中可知该社的宗旨：“宪政之要，必以地方自治始……同人公议，爰合斯社，以忠君爱国为首务，以研考宪法为宗旨，上以副朝廷求治之盛心，下以养国民自有之能力，广通音问，交换知识，是则本社之微旨也。”<sup>①</sup>

自治研究社经常派人到各地演说自治原理，将章程分寄各城乡。在其带动下，许多府州县及一些家族都成立了自治研究社（所），不少研究社（所）把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看做上级自治团体，请求派员指导工作，有的直接申请成为支社。所以，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发展很快，是全国立宪团体中人数和单位数较多的一个。

### 四、开创北美洲华侨教育事业

1908年3月7日，梁庆桂赴美，同行者有译员何葆珩，学生何焱森及随员朱兆莘、程祖彝、曹冕。一行人于4月2日到达美国。

1908年前后，华侨散居美洲达到10万以上，而需要接受教育的华侨子弟人数也达万人以上。以前华侨办有一所大清书院，由于办理不善，徒具虚名，鲜有实效。所以，梁庆桂等人抵埠后，受到华侨的欢迎。时驻美公使伍廷芳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他札饬新任美国总领事许炳榛等协助梁氏筹办，并转谕各会馆绅商董事知照。

但是，困难也不少。首先，华侨对清廷的态度不一，对于办学，意见分歧很大。在梁庆桂到达美国的第二天，保皇会所办的《世界日报》便发表了主笔谢瑞林所撰的论说《论政府之派海外劝学员》。文中说，内地未能劝学，遑论海外。朝廷此举是以劝学之美名，行羁縻之政策。《中西日报》则对朝廷派员来美兴学竭力支持。后来经大力宣传，才获得大多数侨民的赞同。其次，华侨宗派林立，各会馆绅商董在办学经费、地点等问题上争执不休。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遭地震之灾时，清廷曾以华侨受灾甚众，发帑银4万两，由外务部汇与驻美大使梁诚为赈灾之用。赈灾的余款，后经研究决定用于建立中西兼授之学堂一所。但全部款项落入三邑会馆主席谢某、冈州会馆（新会鹤山两邑会馆）的林某、阳和会馆（香山东莞两邑会馆）的周某等人之手，这些人“非惟无识，复善生事，埠中善举，多为所败坏”，他们以私害公，不肯交出款项。梁庆桂几经劝谕，舌敝唇焦还是没用，最后破除情面，呈请学部究办，才迫使他们就范。

<sup>①</sup> 《本社纪事》，载《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第1期。



三藩市 (San Francisco) 是华侨人数最多的地方，也是梁庆桂到美的第一站。经过 5 个月的努力，他终于在那里打开了局面，于是他又到沙加缅度 (Sacramento)、罗省技 (Los Angeles)、梳力 (Salt Lake)、了哥连 (New Orleans)、华盛顿 (Washington D. C.)、纽约 (New York)、芝加哥 (Chicago)、砵仑 (Portland)、舍路 (Seattle)、域多利 (Victoria)、云高华 (Vancouver) 11 地劝学。各地情况不同，有的地方商务无多，筹款困难；有的地方家族主义未除，不愿联合办学；有的地方侨民无多，难以独立成校，但联合办学地点又难以适中；有的地方人情涣散，众议分歧，徒事延宕。梁庆桂奔走于各地各姓之间，妥筹办法，终于得到热心人士的赞助，未及一年，各校得以相继建立。梁庆桂在上学部呈文中说：“庆桂遍历各埠，接见绅董，公宴私觐，广为演说，宣布朝廷德意，钧部懿举，本诸孔孟遗训，谕以忠孝大义，竭诚开导，以坚其内向之忱，侨民仰戴皇仁，眷怀祖国，远近传播，靡不感动。虽间有顽梗，遇事阻挠而谣诼多端，究不能摇惑人心，而各校卒以成立。此在美筹办之大略情形也。”<sup>①</sup> 其中艰辛，不难窥见。

梁庆桂创榛辟莽兴办美洲华侨学校，又根据当地特点，制定了侨校的办学宗旨和各项规章制度。他在美洲发表劝学简明办法，申述自己的办学思想时说：

“夫侨民子弟，生长外邦，束发受书，即入西国学校。比长，又习其专门，或游其大学，西学固所肄习，所阙者中学耳，则所欲兴办者中学为尤亟也。教育家有言：凡国于大地必有其国民教育，使其民具普通之知识，抱忠爱之热诚，以养成国民资格，而所授教育必以本国语言文字为主，盖语言文字为立国之要素，一国之人，无远无近，无老无幼，所藉以表情意通声气者，唯语言文字是赖。故灭人国者，必灭其国之语言文字，使失其所以表情意通声气之具，扼其吭而制其肘，然后任吾奴隶之，牛马之是命。俄悬波兰，禁其国语；英墟印度，易以英文。其已事也。吾堂堂中国人，忽其数千年沿习递嬗之语言文字，可乎？夫只习西学，是一外国国民耳；纵负绝学，亦一外国人才耳。吾国家用之，与用客卿无以异，即今所用之客卿，类皆深通中文，能理公牍，而我之西习学者，转不若彼，耻孰甚焉。

“且吾国专门实学闕焉未讲，所赖海外学子稗贩归国，播诸学界以为之倡。然译事甚难，今之译本，往往拘文牵义，言不雅驯，甚且不达其意，此不通中学之蔽也。

“庆桂不敏，忝膺劝学之责，亟欲立一学堂，使侨民子弟肄习祖国语言文字，一炉而冶，养成宏达之才，归备国家之用。人才日起，国势日强，将侨民经商海外

<sup>①</sup> 梁庆桂：《宣统二年上学部呈送美洲华侨学册文稿》，《式洪室诗文集》，民国 20 年（1931 年）铅印。

者，亦得藉国权而自立，此殆同乡诸君子所乐闻者欤？”<sup>①</sup>

三藩市中华会馆大力支持梁庆桂，他们选出乡望素孚才具精敏者组设学务公所，专责推进学务。1909年年初，中华会馆暨八大会馆绅商董事开会将大清书院改为大清侨民公立小学堂，搬进新建中华会馆中，并于1909年2月8日开学，请许领事为校长，学校经费暂在广东银行揭借2350元以供支应。学生报名入学者有140人，是为北美所建新校中最大之学堂。梁庆桂参加了开学典礼后，于2月17日起程归国。在梁庆桂归国时，《世界日报》发表了《送梁阁读归国序》，中说：“吾乡民之去国亦远矣，遐荒异域中，学舍巍峨，学子莘莘，人怀邹鲁之乡，士沐读书之泽，岂非亘古未有之奇局耶？……先生之功，百年树人，播种者之劳为不可没已。”对梁庆桂开创美洲华侨教育新局面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梁庆桂回国后，美洲华侨又联名禀报学部，要求表彰梁庆桂。原来，梁庆桂当日在美最重排场，而美国物价又贵，所至酬酢宴会，演说提倡，造成各埠华侨热心兴学风气，花费甚多，而学部拨给他的出差费用仅2000多元，他自耗家财过万元。华侨因他办学功绩有目共睹，耳闻其因此赔垫至巨，从不接受馈赠，特发起各处绅商签名，联禀学部，奏请表彰。<sup>②</sup>

梁庆桂在美1年，兴教劝学备尝艰辛。离开美国时，美国和加拿大成立了侨校8所，归国后侨民陆续呈报成立侨校4所，共12所。梁庆桂主持订立的学校章程、时间表各项，由于较为科学合理，成为侨校多年沿用的规章制度。其所核聘教职员人选，皆属上乘，成为侨校健康发展的推动力。此后，不但北美洲，海外其他有华侨居住的地方亦纷纷成立侨校，一时蔚成时尚。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由此得以增强，中国文化也在异国他乡流布延绵。梁庆桂被后人誉为“北美华侨教育的开山祖”。

## 丘逢甲：与时俱进的爱国思想

丘逢甲（1864~1912年）一生49年。他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他成年开始，到甲午战后内渡为止，即从1884~1895年，

<sup>①</sup> 《中西日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十八日，转引自刘伯骥《美国华侨逸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401页。

<sup>②</sup> 转引自刘伯骥《美国华侨逸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401页。

他的爱国思想集中体现为保乡守土的反侵略思想；第二阶段从1896~1904年，他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为兴新学、开民智的教育救国思想；第三阶段是从1905~1912年，他的爱国思想突破了政治改良的藩篱，赞同、支持反清民主革命。虽然他的爱国思想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但却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核心——祖国的富强和统一，并显示了他在爱国主义的推动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的总趋势。

第一阶段：以保乡守土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思想的产生及爱国热情的初次爆发。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丘逢甲刚满20岁。帝国主义的野蛮凶残和中华民族积弱不振，给这个青年人以深刻的刺激和强烈的震撼。他“闻变，忧心忡忡，于是知国事之多艰”，“乃益留心中外事故及西方文化，慨然有维新之志”。<sup>①</sup>

看起来似乎是外患突然掀动了丘逢甲的爱国之心，探究下去却发现丘逢甲的爱国思想是深深地植根于祖国的沃土里的。有一次，他和朋友打赌赛诗，在三天之内一口气便写下了100首台湾竹枝词，描述台湾的历史、政教、山川、风俗、民情，首首新艳，绝无雷同，当时便倾倒了不少人。但当人们为“东宁才子”的华美辞藻叫绝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青年人对乡土的激情。他熟悉和热爱台湾的程度，超乎一般人之上！正如他在竹枝词中所写的那样：“二百年来蕃衍后，寄生小草已深根。”<sup>②</sup>因此，当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伸进来时，他的痛恨是可以想见的。

当时，唐景崧任台湾兵备道，因爱逢甲之才，招他入幕佐治，逢甲则“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恒为大吏陈国家大计”。当时，他主要著有《中国学西法得失利弊论》、《何以安置余勇》、《穷经致用赋》等文章，初步显露了他具有一副关心国事、注重实际、眼光开阔、见识新颖的头脑。1889年，丘逢甲科举成名后，归乡以教书为业。他注重实学，“又常劝勉学生多阅报章以广见闻”<sup>③</sup>，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增长了西方民主政体知识及爱国主义思想。

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打响。清军节节败退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对时局素为关注的丘逢甲十分担忧台湾前途，他毅然投笔而起，以守土拒倭号召乡里，倾家资以为兵饷，着手组织义军。丘逢甲一家“子弟能干戈者，尽令从戎，兄弟子侄成年者，皆入营伍”。丘逢甲不但洞察了日本人对台湾的野心，而且对清

① 丘琮：《仓海先生丘逢甲年谱》，1913年本。

② 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③ 江山渊：《丘仓海传》，《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

政府的懦弱无能也有一定的认识。他强调只有依靠台湾本土人民奋起自救，才是出路。所以，他大力倡导群众“人自为战，家自为守”，并向来台帮办防务的中央官员表示：“如当国者真有弃台之意，窃愿举所有义旅共保危疆。”<sup>①</sup>为了团结人民一致对外，他致书台湾巡抚唐景崧，提出对义军的态度应“以宽御众，结以恩义”。他带领义军协助官军防守各关隘，一改平日名士作风，誓与士卒同甘苦。

1895年4月，中日签订割台之《马关条约》。丘逢甲闻讯悲愤异常，率领各界绅民向唐景崧呈文，并电奏朝廷，力争废约。呈文写道：“……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如日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然而，“刺血三上书，呼天不得直”，不论电争，还是电骂，卒不能挽。

清廷弃台，把台湾人民的抗日战争推向更为艰难的阶段，台湾各阶层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投降派十分害怕日本人，认为“一拂其情，势必全力并攻，徒损生灵，终归沦陷”。台抚唐景崧对于抗日护台也缺乏信心，觉得“坐困绝地，兵少难防”，“久支强敌，难操胜算”。一批贪生怕死的官僚纷纷收拾细软，准备逃跑。官一离任，民变立生，抢劫四起，各处大乱。面对这种情况，丘逢甲气愤地说：“余早知有今日矣！台湾者，吾台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受？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sup>②</sup>于是，他发表自主保台文告，庄严宣告：“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以图固守，以待转机。”对祖国的依恋，对朝廷的抱怨，对敌人的仇恨，对命运的抗争，各种复杂的感情都掺和在这字字血泪之中。

丘逢甲带领义军与日寇血战至7月下旬，终因弹尽饷绝，挥泪离开台湾。行前悲愤交集，感赋七绝六首。其中有一首云：“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sup>③</sup>表达了他对清廷割台行为的切齿痛恨和护台失败后万分悲痛的心情。

## 二

第二阶段：以兴新学开民智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如果说，前一段占据他头脑的主要是保卫乡土的意念，那么内渡后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倾注了更多的关切；如果说前一段他的爱国热情在反侵略战争中爆发

① 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江山渊：《丘仓海传》，载《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

③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出闪电一样的火花，那么内渡后他忧国忧民的感情在教育和创作中燃烧得更为炽热了。

丘逢甲离台内渡，定居于广东省蕉岭县淡定山村，在深深的悲痛和失望中度过了归粤的头两年。但对台湾的怀念和收复国土的强烈愿望，又使他很快振作起来。1896年，他送谢道隆归台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全输非定局，已溺有燃灰。弃地原非策，呼天觉见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sup>①</sup>

甲午战争引起了丘逢甲深深的思索。他开始认识到洋务运动所标榜的富国强兵的虚妄，在《海军衙门歌》一诗中，他记录了洋务派“经营惨淡之十年”的海防一举而败坏，致使“百万冤魂海中葬”的历史悲剧，对李鸿章吹嘘的海防优势作了辛辣的讽刺，对卖国外交作了愤怒的谴责。如何才能战胜外国侵略者？如何才能使国家摆脱深重的民族危机？丘逢甲痛定思痛，过去比较朦胧的维新变法思想迅速变得明朗起来。所以，当康有为、梁启超举起维新救国的旗帜时，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在具体行动中，他认为自己长于教育，“故内渡后锐意于兴学启民智”<sup>②</sup>。

丘逢甲抱着“能强祖国则可复土雪耻”的信念，在广东首倡新学，取得了不少成绩。丘逢甲很早就留心西方文化，在台湾执教时已“深感括帖之无用，在教授应试文艺之外，兼授中外史实及世局新知等”<sup>③</sup>。在韩山书院，更因摒弃八股试帖而与书院守旧势力不合。1899年，他联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汕头筹办新式学堂——岭东同文学堂。1904年，他又在家乡镇平县创办了初级师范传习所、镇平县立中学堂及东山、员山“创兆学堂”。他在员山创兆学堂自撰一联表达自己的志向是“创新学界，兆大人文”。他还派出宗人子弟往福建的武平、上杭及邻近的平远、嘉应州、兴宁等地，为同宗及异姓筹办族学，“先后共劝办学校以百数”，韩江上游小学教育因之发达。丘逢甲的办学目的十分明确。他在《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一文中，把教育与救亡紧密联系起来，反复申述中国“鄙夷西学不屑道，以驯致于贫弱而危亡”的沉痛教训，明确指出：“国以何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以何弱？其民之愚弱之也。”并大声疾呼“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号召青年“振刷精神，破釜沉舟”，勇敢地担负起救亡的责任。丘逢甲一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一方面抓好教育内容和形式的改革。岭东同文学堂采用新式教科书

①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丘琮：《岵怀录》，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1913年本。

和西欧新法教学，开设格致、生化、经史、算学等课程，并特地聘请日本学者为之教授，介绍日本维新学术。由于此校时时“灌输革命及维新之说鼓舞士气”，有志者趋之若鹜。办校十多年，“岭东民气蓬勃奋发”<sup>①</sup>，确实起了启民智、育人才的作用。

在办学过程中，丘逢甲与各方面爱国人士的联系加强，眼界开阔了，思想也开朗了。在立志维新救国的同时，渐有同情革命的倾向。1900年，他到南洋筹募办学经费，在香港会晤了正在倾尽全力组织武装勤王运动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与他们合照了持刀并立的照片。据丁文江先生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载，三月初十，梁启超致书乃兄君力，言各地运动情形，其中有“丘仙根进士倡率屋闾”之语，透露了当时丘逢甲的思想与立场。此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康有为提倡的维新改良同时并起，兴中会已策动过广州起义，正在酝酿惠州起义。丘逢甲对孙中山的活动也表示了赞许。有一天，他与唐才常纵谈时局，认为“孙某所倡排满革命，名义甚正”<sup>②</sup>。

1908年，中国知识界中兴起了革命思潮。上海爱国学社鼓吹种族革命，岭东同文学堂学生争相起应，革命文字见诸国文课卷。丘逢甲十分理解青年学生的救国抱负，对此不加干涉，还说，“此天赋人民思想言论之自由权”。当时丘逢甲有古诗一首赠谢逸桥，诗中对这个青年惊世骇俗的激烈言论拍手叫好，反映了丘逢甲思想的开放。诗云：“人言谢生颠，吾未敢从众。与言世界事，谈言动微中。即令能颠亦复奇，终胜老生了无用。神州大陆殊可哀，纷纷老朽无人才。眼中突兀少年在，令我郁郁心颜开。即今时事须放手，安得人尽颠如雷？谢生言论自由耳，已令世人骇俗死。丈夫何止用口舌，治世界事从今始。时哉时哉不可失，东南风吹大海水。”<sup>③</sup> 丘逢甲的门生子弟不少是坚决反清的志士，可以说与他的鼓励赞许不无关系，如众所周知的辛亥时期活跃人物邹鲁、姚雨平、陈炯明等均出其门下。

### 三

第三阶段：支持民主革命，爱国思想谱新篇。

丘逢甲因为办学成绩显著，开广东新学之先河，受到当政者的重视。两广总督岑春煊于1906年聘请丘逢甲担任两广学务公所参议。不久，又改任广州府中学堂监督和两广方言学堂监督，教育界同人又推他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丘在广东学务

① 丘琮：《咕怀录》，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逢甲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③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公所时，“凡有拟议，胥为岑春煊及公所总办张鸣岐所深信用，几于言听计从”<sup>①</sup>。随着丘逢甲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提高，他与粤省大吏的往来密切了。这给丘逢甲思想的转化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一方面，他同情革命，对康有为所持的保皇立场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在他的诗作中，与封建官僚的唱和之作增多了，褒扬节妇，提倡尊孔的诗作也出现了，甚至对革命党人发动民变兵变深表疑虑。总之，这一阶段的头几年，丘逢甲的思想呈现出徘徊不定、新旧交错的状态。

丘逢甲思想的根本转变是在1909年。这一年，广东省谘议局成立，丘逢甲被选为副议长。他热心为地方兴利除弊，又延揽革命党人古应芬为书记长，邹鲁、陈炯明为书记，倚仗他们兴学禁赌，颇有成效。但在谘议局争取立宪的运动中，他越来越看清了清廷顽固保守，失尽人心，终于产生了背弃清廷的念头。这年秋天，他写了《秋怀八首》，其中有一首云：“满目洪流治已迟，谁教天展九年期？元黄大化无今古，风雨神山有合离。四海毕消蛟蜃气，九天同拜虎龙姿。书生自作华胥梦，千载何妨此一时？”<sup>②</sup>在诗里他预言清廷气数已尽，正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一个新的政权将会出现，他希望抓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他收复台湾的梦想。这首诗可以说是他思想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标志。此后，他支持民主革命的政治态度日渐明确，行动上也愈为坚定。

1910年，三民主义腾播于全国，丘逢甲十分高兴地说：“是吾志也。吾欲行民主于台湾，不幸而不成，今倘能成于内地，余能及身见之，九死无所恨也。”<sup>③</sup>不过他仍担心革命将招致列强干涉，所以又说：“革命能和平成功，最佳。不得已而有破坏屠杀，亦不可过当。盖我国今日大患，不在满清，乃在东西列强。若因破坏屠杀而毁伤国脉元气，将益启列强侵略。”<sup>④</sup>这几年革命风雷激荡，革命党人不顾危险，多次举行起义、暗杀。丘逢甲每遇失陷者，如参加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的革命党人，辄以其社会、政治地位力为调护、保全。他因此而渐遭当局疑忌。清朝大员胡湘林、王秉恩等明访暗查，无所不至，甚至公然以革命党魁之名列诸公牍，登诸报章。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向朝廷密奏广东革命士绅，就以丘名为首，但丘逢甲我行我素，夷然不稍动。

武昌起义前，丘逢甲曾策动水师提督李准归向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广东谘议局召开各界大会，共同议决独立，迫张鸣岐反正。丘逢甲在其中起了积极作用，

① 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逢甲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逢甲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④ 丘琮：《帖怀录》，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推动了广东和平光复。广东光复后，丘逢甲被推为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部长，并作为本省代表派赴上海参加组织临时政府，后又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中央参议院议员。参加组织政府后，丘逢甲精神振奋，力任艰巨。他对于革命成功，十分欢欣，激动地说：“内渡十七年，无若今日快心者！”又伸手示人以护台战争留下的伤疤，说：“吾未尝一日忘此痛也。”在南京，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冒雪游孝陵，写下了“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的诗句，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不幸的是，此时丘逢甲突然发病，不得已告假回乡。他在南归途中仍忧念国事，经过厦门时，得知福建省独立后还未召开省议会，便应绅民之请，致电福建都督孙道仁，请速行召开省议会。电文大意为：革命目的在扫除满清秕政，若一切仍旧，安用铁血为？并说：“民国新造，断非一二人专制可以成功。”<sup>①</sup> 这表明丘逢甲的思想没有停留在排满的民族革命上面，而是继续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建立而努力。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退位，丘逢甲听到这个消息，脸上露出笑容。但当听到袁世凯代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又怅然若失，不安地说：“前途未可乐观也。”2月25日，丘逢甲在家乡逝世，临死时嘱咐亲人葬须南向，最后一次表达了他至死不渝收复台湾的心愿。

##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一向不大为人注意，因为梁启超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并大力鼓吹“20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大唱反调，不少论者认为，梁启超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有真正的认识。但是，笔者在考察了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后觉得，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比同时代的很多中国人都要正确和深刻，他对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实施，也有独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见解，表现了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人对国家前途的多种思考和选择。

### 一、对社会主义持肯定和赞成的态度

对于在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梁启超很早就有所注意和研究。

<sup>①</sup> 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逢甲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903年他漫游美国时，开始接触到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他在《新大陆游记》中记载：“余在美洲，社会党员来谒者凡四次。……其来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劝以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著手云云。……余以其太不达于中国之内情，不能与之深辩，但多询其党中条理及现势而已。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若近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其思想日趋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盖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以土地尽归于国家，其说虽万不可行，若夫各种大事业如铁路、矿务、各种制造之类，其大部分归于国有，若中国有人，则办此真较易于欧美。特惜今日言之，非其时耳。社会主义为今日全世界一最大问题，吾将别著论研究之。”<sup>①</sup> 这时他在学习和考察资本主义，但他对社会主义并没有拒绝接受，而是还在认识和思考之中。

1907年，他写了《社会主义论序》一文，为吴仲遥所著之《社会主义论》作序，并阐明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一些看法。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既关注中国，也关注世界，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大问题，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影响，值得加以重视和研究。他说：“世界之问题亦多矣，而最大者宜莫如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之内容多矣，而今日世界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是之故，而有所谓社会主义者兴。”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发生是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目前虽然还未有此问题发生的环境，但作为一个国民，世界的一分子，不应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sup>②</sup>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又持非常审慎的态度，认为应先弄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再看看其是否适合于中国。所以，他又说：“但其为物也，条理复杂，含义奥衍，非稍通经济原理者，莫能深知其意。又其理论基础，在于事实。而此事实为欧美各国之现象，我国不甚经见。国人索解愈难。……未知社会主义为何物，而欲论我国宜如何适用之，其以喻天下亦艰矣。”<sup>③</sup> 社会主义是在外国生长起来的東西，中国有没有社会主义生长的土壤？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究竟弄懂了没有？弄懂了多少？在没有弄懂以前，就忙于在中国实行，梁启超认为这样是无法把中国的事情搞好的。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已有了更多的认识，在探索中国要不要实行社

<sup>①</sup>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sup>②</sup> 梁启超：《社会主义论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sup>③</sup> 同上。

会主义的问题上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这种思想开头散见于一些归国演说辞中，后来则在1921年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首先，梁启超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吃人的不合理的剥削制度，资本家十之八九是“将本求利”之徒，资本主义的罪恶他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同情使他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深深痛恨，但他又感到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来振兴中国经济，所以在要不要用社会主义的方法限制、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上，他陷入了苦闷矛盾的思考之中。他说，为了生产的发展而“祝褻彼辈之成功，则是颂扬彼磨牙吮血之资本主义，与吾辈素心大相刺谬”；“我两年来，对此问题，始终在彷徨苦闷之中”；“对于此一问题利害冲突之两方面，积年交战于胸中而不能自决，有生之苦闷，莫过是也”。<sup>①</sup>

梁启超认为，在欧洲、美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是用以解决经济上不平等的问题，“故在欧美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也就是说，梁启超是赞同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认为是改善多数劳动者地位的运动，是必须进行的运动。

但在中国，梁启超认为目前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需要，但仍认为社会主义是将来的前途，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已。当中国的工人阶级（他称为劳动阶级）成长起来之后，便可实行。

可见，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是持肯定和赞同的态度的，认为在欧美是必须进行的运动，而在中国也是将来要进行的运动。

## 二、提出以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国情不同，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也与欧美国家不同。即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实行资本主义。理由如下。

第一，民国初年，中国生产落后，财政困难，人民大量失业，生存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只有发展资本主义大生产才能救贫救死。

梁启超说：“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十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欧美有业无产之人所处之境遇，在我国一般人视之，已若天堂。”<sup>②</sup>要解决群众最迫切的就业生存问题，便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即发展资本主义，让大

<sup>①</sup>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sup>②</sup> 同上。

量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的人被吸收到工业生产中，从而为社会创造财富，也为自己找到生活的出路。中国人现在连求当一工人还不可得，何来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当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起来，劳资矛盾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之时，社会主义的实行缺乏客观要求，脱离了现实和群众的需要。

第二，当欧美资本主义席卷全球之时，相对落后的东方被动地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潮流之中而陷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困境，中国要在世界经济竞争中不被吞没，必须要发展本国资本主义以与外来资本主义相抗衡，这是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梁启超认为，只有发展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梁启超说：“世界战争不一，有军事之战争，有学问之战争，有宗教之战争。而在今日尤为一国存亡之所关者，则莫如经济之战争。……中国今日之工商实已为外国经济势力所压倒，无论何种职业，皆失其自存之力，非大为革新，以谋抵御此潮流，则全国人民，舍为外国苦力以外无他事可图也。”<sup>①</sup> 他主张中国应大力提倡出大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相抵抗。

梁启超认为，中国没有大资本家，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很落后。要抗衡外国侵略势力，经济独立，没有强大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行的，摆脱民族沦亡的危机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所以，对于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家的主张，他是不赞同在中国实施的。他认为社会主义过早实施，不但不会使人民幸福，甚至连国家富强也一并不可得。这种见解是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的。

第三，梁启超还具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思想，认为社会运动是划分为阶段的，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阶段还没有到来。

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运动，而中国还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工人：“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而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工人阶级又从何而来？所以，他认为首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造成大量的工人，工人阶级的队伍和力量壮大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才有主体力量，新社会才可以出现。所以他说：“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之准备”；“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殆如此”。<sup>②</sup>

从这个思想出发，梁启超指出了那种认为中国可以避免欧美国家生产发展后出

<sup>①</sup> 梁启超：《初归国演读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页。

<sup>②</sup>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现的阶级分化、贫富分化现象的想法只是个梦想。他说：“吾辈畴昔所想念，总以为欧美产业社会末流之蔽至于此极，吾国既属产业之后进国，正可惩其前失，毋蹈其覆辙。彼其病源所在，今既经多人批却道窍，洞悉无余蕴，治病之药，亦粲然具陈于吾前，吾但审择而采用焉。即可以使我将来之产业界，不致为畸形的发达，而现在欧美纠纷艰险之现象，可以不复发生于吾国也。及至今日，而吾觉此种见解，十九殆成梦想。”<sup>①</sup>梁启超认为，中国今日不能不奖励生产事业以救贫救死，既要发展工商业，那么，劳资两阶级的对立和资本家掠夺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恶现象便不可逃避。此其一。第二，资本家虽然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发展社会生产、造成无产阶级产生壮大的另一面。所以，对于资本家应该用二分法，既要看到它是工人阶级之敌人，又要看到它也是工人阶级的同伴。没有资产阶级，也就没有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对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创造巨大生产力的作用，是有充分认识的，所以他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从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根本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即使劳动者付出较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良好愿望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运动也会因无所凭借而不能进行。

### 三、提出社会主义者对资本家应采取何种态度和政策

梁启超认为，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在现阶段既要利用资本家以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资本主义所随带的罪恶的膨胀，并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实行社会主义。为此，他提出了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家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政策。

第一，要顺应时势，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梁启超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是大势所趋，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能人为地加以抗拒，也没有抗拒的必要。对于外资，亦不必抗拒。因为，外资虽也掠夺我国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但毕竟比通商中的载糟粕而来刮脂膏而去要好一点。他说：“资本阶级将兴于中国，其机运殆已成熟，断非吾侪微力所能抗拒。吾国之资本家虽微不足道，然全世界之资本家，在其本国，各皆已陷于穷蹙之地位，势必以中国为逋逃藪。中国秩序稍恢复之后，各国之资本，必如狂澜倒卷以注于吾土，吾侪欲以微力遏之，必备极艰苦而无寸效。且吾亦何苦如此，彼投资我土，虽云掠夺吾劳力结果之一部，最少尚有余沥以及我，以视昔之隆隆海舶，载糟粕而来刮脂膏而去者，不犹愈乎？而况乎其结果必能为我产出劳动阶级以为将来自树立之基也。故吾以为资本阶级之发生，吾辈抗

<sup>①</sup>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阻其事为不可能，且亦诚无抗阻之必要。”<sup>①</sup> 所以梁启超主张，应该先发展资本主义，这是顺潮流而动、有利于中国进步的事情。

第二，把资本主义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对资本主义应采取纠正和疏泄态度，不让资本家掠夺太过，不让贫富差别太大，在劳资协调的状态下，徐图健实地发展。同时，逐渐举办公营事业和劳动者协作事业，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并逐步把生产的中枢转移到公众手中，避免资本家的垄断。

如何纠正和疏泄资本过度膨胀？梁启超认为：“所谓纠正态度者，将来勃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成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这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上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容许。惟当设法使彼辈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殊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纠正之手段，则若政府的立法，若社会的监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

“所谓疏泄态度者，现在为振兴此垂毙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却不能恃资本家为国中惟一之生产者，致生产与消费绝不相谋，酿成极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时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并进。一面政治上若稍有转机，则国家公营地方公营之事业，便当画出范围，在人民严密监督之下，渐图举办。一面各种协社，须极力提倡。以传教的精神策进之，但使能得数处办有成效，将来自可联合扩充。倘能令生产的中坚力渐渐由公司之手以移于协社之手，则健实之经济社会，亦可以成立矣。”<sup>②</sup>

第三，发展和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和组织，提高其知识和能力，为埋葬资本主义做好准备。

梁启超认为：“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可以我国劳资战争最后之胜负决之。”<sup>③</sup> 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也就是全世界资本主义消灭、进入世界大同的时刻。不久的将来，必有全世界资本家以中国为逋逃藪之一日，所以一举把全世界资本主义连根拔掉的任务，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无产阶级要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必须具有强大的实力和充分的准备，而中国无产阶级又非常幼稚和弱小。因此，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队伍

<sup>①</sup>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同上。

和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知识和能力便是刻不容缓之事。

梁启超说：“我国劳动阶级既负此绝大责任，则培植之者安得不预，而所以爱护之者安得不勤，又须知我国人组织能力，本甚薄弱，工会组织，又属难中之难，在今日而言工会，只能谓之在胎教时代，并呱呱堕地之声且未能闻也。如何而使之产生，如何而使之能育成不致殇夭，如何而使之能自动负荷责任，此真今日社会主义运动家所当寤寐思服者也。吾以为吾辈宜集中精力以成就此著，此著若就，以后无事不办。若以无组织之群众，作无气力之运动，是尤责胎儿以杀敌致果，其必不幸矣。”<sup>①</sup>

#### 四、梁启超社会主义观的认识价值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学说和运动是下了一番工夫考察和研究的。他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反复地说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探索，经过非常艰苦的一段心路历程，直至回书之时，也仍然是处在彷徨苦闷之中，而未能发现出一个心安理得的途径可以让自己着手从事。由于始终未敢自信已经找到了真理，所以只是提出一些想法来，供大家讨论研究。

其实，梁启超心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但因为这是一条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并不那么美妙的道路，与当时鼓吹直接通向美好的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比起来，自然是太过残酷和痛苦的，以致连他自己都难以启齿，当别人问到而不能不回答之时，回答起来口气也不是那么肯定了。梁启超的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充满痛苦和艰辛，但却有其深刻和正确的地方，以致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对他的认识水平和洞察力感到震惊。

首先，他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若不谈生产只谈分配，其运动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社会中，生产和分配是一对矛盾，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欧美国家因为生产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分配却发生了问题，所以提倡社会主义；而中国生产还没发展起来，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即使把国内的资产分配得非常均匀，又能怎么样呢？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

梁启超是这样说的：“彼辈（指外国资本家）所最愿望者，则吾国长在此种不死不活之纷扰中，生产力日益固竭，而人生必要之消费，终不能免，我既无力自给，彼乃凭借旧势，益恣侵略。……如是也，则我虽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铢黍罔失其平，而我社会向上之效终茫如捕风。……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

<sup>①</sup>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sup>①</sup>

其次，他清醒地看到，有组织、有觉悟的工人与散漫、破坏力大的游民虽然都是被压迫的人民，但却是两个不同类型的群体，社会主义运动所依靠的是工人阶级，而不是游民阶层。中国缺少工人而拥有大量游民，但游民决不可以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依靠力量。

梁启超谈到工人阶级与游民的区别，并指出工人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他说：“劳动阶级者，非游民阶级之谓，劳动阶级者，以多数有职业之人形成之，此项有职业之人，结合团体，拥护其因操业所得之正当利益，毋俾人掠夺，此在道德上为至当，在事势上为至顺。若夫无业游民，则与此异，彼本来并无所谓因操业所得之正当利益，则更何拥护之可言，故劳动阶级可以责人掠夺其剩余，可以向人索还其所掠夺，游民阶级则不能有此权利。其属于劳动者之一类，则可以为社会运动之主体者也，其属于游民之一类，则决不可以为社会运动之主体也。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吾以为当尽力设法，使之逐渐变为劳动阶级，然后与之共事”。<sup>②</sup>

再次，他辩证地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一对孪生兄弟，防止资产阶级的发生，也同时妨碍了无产阶级的发生，无产阶级不存在的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既要看到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也要看到他是无产阶级的朋友，关键是对资本主义应采用什么对策才能避害趋利。

梁启超说：“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藉。”<sup>③</sup>

他又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事业的发达，不但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依而生，而且可为中国游民创造就业机会，使之向无产阶级转化。他说：“然则如何能使中国多数人弃其游民资格而取得劳动者资格耶？曰：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虽然，于其间有不容忘记之一重要事实焉，曰：劳动阶级发生，资本阶级亦必同时发生，二者殆如狼狈之相依而不可离，吾侪既希望吾国有真正之劳动阶级，而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为孪生兄弟，若是乎，资本主义所随带之罪恶，自必相

<sup>①</sup>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同上。

缘而至。吾侪在今日，不可不先有彻底的觉悟，然后根据此觉悟以讲救治之计划。”<sup>①</sup>

综观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对于社会主义学理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并由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感知比较深切，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要求非常的强烈，而导致他的社会主义观较少空想，符合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应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可惜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和重视。另外，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和曲折，使梁启超关于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想法也成了泡影，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没能发展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最终在一个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走上了它独特的道路。

历史发展是曲折的，在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先人的思想遗产往往会给我们以巨大的启迪。

## 师复主义及其评价

师复主义是对中国无政府主义派的创始人、理论家和领袖刘思复的思想和学说的尊称，是他的门徒在他死后赋予的。对师复主义的评价向来是见仁见智。笔者试图把它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长河中加以定位，找出它的积极意义和局限，以说明中国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艰难历程。

### —

刘思复（1884~1915年），原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清，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又名师复，广东香山人。刘思复于1904年到日本留学，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和俄国“虚无党”的影响，开始醉心于无政府主义。1905年，刘思复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07年，在广东惠州、潮州起义期间，他被派到广州执行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任务，不幸事败，被清政府逮捕入狱。1909年被营救出狱后赴香港，继续进行暗杀活动。在两年的监禁中，刘思复细心研读了《新世纪》等无政府主义刊物，更加坚定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率领香山县的起义军（香军）与胡汉民等会师广州。1911年冬，他与战友丁湘田、郑彼岸北上谋刺当时

<sup>①</sup>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2页。

革命的主要敌人袁世凯和满清亲贵。到达上海时，因南北议和开始，被汪精卫劝止，在杭州住了1个多月。这1个多月中，他与同伴对革命道路反复思考与讨论，因对革命后各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感到不满、对政治斗争感到厌恶、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感到失望，遂立志在中国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以图走另一条道路来救国救民。1912年5月，他与莫纪彭、郑彼岸3人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8号创立“晦鸣学舍”，同年7月，又和郑彼岸、林直勉、莫纪彭等创立“心社”，开始在岭南传播无政府主义。

“晦鸣学舍”是在中国本土传播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个团体。1913年8月，“晦鸣学舍”的机关报《晦鸣录》周刊在广州出版，但因时值“二次革命”失败，广东军阀龙济光查禁了“晦鸣学舍”和“心社”，《晦鸣录》只出了两期即遭封禁。刘思复不甘屈服，同年9月把“晦鸣学舍”迁到澳门，改《晦鸣录》为《民声》，继续出版。“晦鸣学舍”也改为“民声社”。岂料《民声》仅出两期，又被袁世凯与葡萄牙领事勾结进行干涉，被迫停刊。“民声社”在澳门时，国际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克鲁泡特金、格拉佛、高德曼、大杉荣、柴门霍甫等与他们通信联系，交换出版物和各种信息，互相支持和鼓励。

1914年1月，刘思复离开广东，到了上海。他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民声》也在上海复刊，到1916年共出了29期；1921年又在广州复刊，出至38期。该刊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无政府主义，翻译无政府主义者的著述，介绍国内和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和世界工人罢工的情况等。刘思复为《民声》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他在该刊物上发表了50多篇文章，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该刊物不但在国内发行，而且在香港、南洋群岛流传。<sup>①</sup>在他逝世后，他的门徒收集他的文章辑为《师复文存》传世。

1914年8月，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党在英国伦敦召开大会，刘思复代表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向大会递交了《致万国大会书》，报告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情况。他的这些活动，使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与国际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刘思复在广州首创“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在服务行业中从事工人运动。据邓中夏记载：“无政府党首领刘思复，在中国南部宣传无政府主义，发行刊物多种。……他首创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无政府党对于工人的影响，的确延长十余年”；“无政府党在南方工会中

<sup>①</sup> 李光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其破产》，载《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

有很大的影响”。<sup>①</sup>

1915年，刘思复因患肺病去世，享年31岁。他生命虽然短暂，但死后极受推崇。不少无政府主义刊物发行《师复纪念号》专辑，他的主张被誉为“师复主义”。他所奠定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和组织，继续获得发展。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无政府主义社团分布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南京、江苏、长沙、山西、四川、湖北等地都有。在广州，则有“民权社”、“火焰社”、“民声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的报刊书籍也大量出版，报刊有70多种，书籍约有35种。<sup>②</sup>无政府主义思潮是新文化运动中比较活跃和较有影响的新思潮之一。它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中都拥有不少信徒。

## 二

刘思复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一个“完全服膺克氏学说者”<sup>③</sup>。

克鲁泡特金也和一切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认为自由有最大的价值，他所追求的目标是“万人的自由发展”。那么，是什么制度妨碍了万人的自由发展呢？克氏认为，障碍物就是“国家”和“私有财产”。于是他得出如下结论：以各种团体的自由联合代替国家，以共产代替私有财产，只有在这种时候，万人的自由发展，才有可能。这就是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就是否定权力；共产，就是否定私有财产。前者是关于政治生活的理论，后者是关于经济生活的理论。但这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融合为一体的。他否定权力的思想，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经济生活中贯彻，所以他主张不带权力的共产主义。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是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否定，进而对国家和私有财产制的否定，当然它也存有许多空想和谬误。那么，刘思复是如何接受和宣传它的？

在刘思复写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中，开宗名义地声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消灭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

要取得这种绝对的自由，则必须消灭强权。欲无强权，必自无政府始。刘思复认为：“政府果何自起乎？曰起于强权。野蛮之世，一二梟悍者自据部落，称为己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知识出版社1949年版，第5~6页。

② 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四），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27~330页。

③ 师复：《答迦身》，《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7年版，第167页。

有，奴役其被征服之人，复驱其人与他部落战。互为敌国，此国家之由来，政府之从出。自今思之，无价值已甚。彼时兽性未去，固无怪其有此，顾今则已由兽域而入于人境矣，以光天化日之人境，而留此兽域之产物，果何为者乎？”<sup>①</sup>

要取得这种绝对的自由，则必须消灭现存的资本制度。所以，刘思复在辛亥革命后，对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不感兴趣，反而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说：“资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仇敌，而社会罪恶之源泉也。土地资本器械均操之不劳动之地主资本家之手，吾平民为服奴隶之工役，所生产之大利，悉入少数不劳动者之囊橐。而劳动以致此生产者反疾苦穷愁，不聊其生。社会一切之罪恶，匪不由是而起。”他提出：“废除财产私有，凡一切生产机关，今日操之少数人之手者，悉数取回，归之社会公有。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制。”<sup>②</sup>

他们说：“吾党乃宣言于支那之平民曰：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光明美善之主义，出汝等于地狱，使入正当愉快之社会也。‘无政府’乃社会进化必至之境，近世纪科学之发明，与夫进化之趋势，皆宛与无政府之哲理相吻合。”<sup>③</sup>“改造今日之中国，宜采用社会主义也。然社会主义之派别甚多，蛛丝马迹，不可捉摸。……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唯一的无政府主义是也。”<sup>④</sup>“我们相信现社会谈论的主义，概是阿猫阿狗的主义！我们相信现社会倡行的革命，概是半面式的不彻底的革命！真正的自由，要无政府；真正的平等，要共产；这样的革命，才是人类的福音！”<sup>⑤</sup>

对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他们认为不是彻底的。他们说：“吾人之反对资本制度，乃主张废除资本之私有，非但反对大资本家而止。”<sup>⑥</sup>但这种激进的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一种幻想。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无政府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sup>⑦</sup>

① 师复：《无政府浅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页。

② 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③ 同上。

④ 《长沙安社翻印 民声 序言》，载《民声》（长沙安社选编本）1922年10月。

⑤ 《“克鲁泡特金研究号”发刊的原因》，载《民钟》1923年2月第4期。

⑥ 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⑦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9页。

但无政府主义者却认为他们的主张是可以实行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 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而达到，并不是无根据的臆想。

2. “无政府主义，乃世界的主义，无所谓适用于某国与不适用于某国。无政府党之提倡无政府，以为世界无论何国，皆当无政府，非专为一国说法者也。”所以，无政府社会即世界大同，世界革命是“无政府”社会实现的必由之路，而今天东西两文明日益接近，“行将导东亚大陆之平民与全世界之平民携手而图社会革命之神圣事业”，中国只要与全世界人民一道，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共同斗争，就一定能共同进入“无政府”的大同世界。

3.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性不是恶的，人性“恶”的一面是不良的社会造成的。“人类道德之不良，由于社会之恶劣；社会之恶劣，由于有政府。若万恶之政府既去，人类道德，必立时归于纯美”；“今人之好逸乐而恶劳苦则有由矣：私产制度阶之厉也。……富者逸而荣，贫者劳而辱，不知不觉之中，遂造成社会上一种好逸恶劳之心理”。向上为人类之公性，美好的社会是人人都向往的，只要先觉者“将此种无政府组织之良善，用种种方法，竭力传达于众，使家喻户晓之，自然无所谓阻力。……及乎知者渐众，群起而推翻政府，此时纵有少数不明真理者，无政府党人不难设法晓之”<sup>①</sup>。他们无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认为只要大家明白了道理，共同行动起来，无政府社会便可实现。

综上所述，刘思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大概包含了如下内容。

1. 以个人的绝对自由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即所谓的“无政府主义的妙理，就是自由两个字”<sup>②</sup>。自由是人类进步的最高境界。

2. 以建设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奋斗目标。

3. 以“革命”作为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惟一手段。这个“革命”，有其特定的涵义。首先，是指反对强权的一切手段，包括宣传无政府主义，使众人知晓无政府主义之光明，学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美善，并使知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良德，为实现无政府社会准备思想道德基础。革命也包括罢工、罢市、抗税抗兵、暗杀暴动等激烈行动。还包括五四前后的“新村试验”。但是，他们反对运动政治，即反对以参与政府议会的形式去争取人民的政治权利。认为主张无政府的人，不能提倡有政府的战斗。另外，这个革命，还指参与世界革命的共同行动。他们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实现，“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

<sup>①</sup> 师复：《无政府浅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页。

<sup>②</sup> 《告非难无政府主义者》，载《民声》第30号，1921年3月15日。

社会一切强权”<sup>①</sup>，“平民大革命，即世界大革命，故吾党万国联合，而不区区为一国说法……将来时机成熟，世界大革命当以欧洲为起点。其成功之迅速，必有不可思议者。若就今日中国言，则最要者莫如急起直追，致力于传播。庶免欧洲一旦有事，而东方传播尚未成熟，反足为世界进化之大梗也”<sup>②</sup>。

### 三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政权，反对一切私有财产，主张马上废除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在20世纪初年，这种学说在理论上是空想，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但在民国初年，师复主义在中国流传，有它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原因，也有它不可否定的历史进步作用。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君臣旧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崩溃，人们对于封建专制统治和高压政策的不满和反抗，对于自由与平等的向往，从而强烈希望寻求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第一，师复主义者率先在中国传播了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中国起了桥梁的作用。

清廷倒台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专制独裁统治，人民的自由和人权仍然遭到践踏，而“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在形形色色救国方案的新探求中，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派别之一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前途提出了新的去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一股新思潮，对国人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近代学者朱谦之回忆他在青年时代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时说道：“1917年，我进北大预科读书时，在北大图书馆里，陈列着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在那个时候，所谓新思想，就是指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揭发社会的黑暗，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的。”<sup>③</sup>无政府共产主义传入中国国内的时间比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要早，很多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是先从它那里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初步启蒙，后来再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如毛泽东就曾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过：“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途。在那个

<sup>①</sup> 师复：《 鸣鸣录 发刊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sup>②</sup> 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页。

<sup>③</sup> 师复：《朱谦之的回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7页。

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sup>①</sup> 恽代英、陈延年、吴玉章等都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

由于师复主义者初步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鼓舞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热情，它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开路的功劳。刘思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作了具体的介绍，对于当时流行的江亢虎和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刘思复也作了分析，指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产业国有”，不过是把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误认为是社会主义，而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更大背于社会主义原则，对于生产机关公有问题不敢置一辞，维护地主资本家的私有制，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他的分析对于当时对社会主义还不甚了了的广大人民来说，有启蒙作用。

师复主义者把欧洲的新思潮引入了中国，向国人介绍了欧洲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并预料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将很快在全世界实现，鼓舞了中国人民去学习和追赶世界的前进步伐。他们说：“试观欧洲无政府主义之出世，不过 60 余年，党人从事运动传播者，不过 40 余年耳。然今日欧洲各国已异常发达，近 10 年间，其进步更有一日千里之势。……万国革命之实行，且将不远。尤可喜者，欧洲社会，除资本家外，即是工人。今日之工党，脑中皆已深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义理，观近年工党之活动，即为无政府实行之朕兆。……呜呼，欧洲战云，弥漫天地，以亿兆人之生命，为彼富贵者之牺牲，政府之罪恶，至是而完全揭露矣！战事完结之日，即为宣布政府资本家死刑之日。无政府风潮，必将汹涌而起。愿吾东亚平民，急从好梦中醒觉，奋步疾追，幸勿瞠乎落后也。”<sup>②</sup> 虽然他们所描绘的前景过于乐观，后来也并没有出现，但对于世界潮流的认同，对于国人开拓眼界、跟上欧洲前进步伐，应有积极的作用。

在 20 世纪初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的爱国志士们纷纷向西洋、东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们走了不少弯路，碰了不少钉子，经历了不少艰辛，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无政府主义的出现，作为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认识，对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阐明，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宣传，都为中国人最终找到真理铺垫了基础，其积极探索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师复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前便率先提出和实行破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反对宗教迷信、反对封建婚姻、提高公民素质等思想革命的任务，开了破旧立新的先声。

<sup>①</sup>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28 页。

<sup>②</sup> 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6 页。

师复主义者在宣传他们的主义时，往往会遇到这样的质疑：今日人类之道德不齐，一旦无政府，必有种种纷扰，会出现逃避劳动和任意夺取需要品的现象，如何克服呢？也即是说，无政府制度下的人民，一定要有起码的适合这个社会的道德才行。刘思复认为：“无政府之道德，不外‘劳动’、‘互助’而已，二者皆人类之本能，非由外烁。但使社会改善，生活之状态日趋于适，此种天然之美德，必能自由发展。”<sup>①</sup> 不过，从当时社会的道德沦落的情况看，不改变自私、欺诈、奴性、漠视妇女和迷信宗教等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无政府社会实现的可能性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所以，师复主义者写了不少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文章，对旧道德之违背自由平等之公理、新道德之合于人性与科学多所阐明，并提出要进行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常革命以帮助人道进化的任务。

刘思复在1912~1914年写了一批这样的文章，如《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废婚姻主义》、《废家族主义》、《素食主义浅说》、《告妇人》等。另外，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写了《素食与道德》、《欧战后之女权》、《婚姻与恋爱》、《女子自由问题的研究》等篇章，这些文章对人类道德问题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意见。刘思复激烈地主张废绝婚姻制度，提倡恋爱自由，用废婚主义唤起一般女子自觉心，急谋养成独立生活之能力以恢复其本来之人格。刘思复认为：“支那之家庭，非家庭也，一最黑暗之监狱耳。此监狱由婚姻为墙基，族姓为砖石，而纲常名教则为之泥土，粘合而成一森严牢固之大狱。家长其牢头，多数可怜的青年男女其囚徒也。……欲破此大狱，其惟婚姻革命乎，族姓革命乎！而助此二者之实行，则纲常名教的革命也。”刘思复认为，去迷信与去强权，是革命的要点。迷信与宗教为一流，与彼相反者，则科学之真理。他大声呼唤平等和科学，成为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先路之导。

广州的师复主义者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对伪道德躬行良好的道德。1912年，刘思复与郑彼岸等在广州组织“心社”，1914年在《民声》发表《心社意趣书》时，便订有社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乘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做官吏；九不做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做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刘思复出于对信念的执着，极力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他自己是从不乘坐人力车和轿子的，平日坚持素食，烟酒概不沾唇。在他病危须要补充营养医生建议食肉时，他也不改初衷。为了不称族姓，他改名为“师复”。他的爱人叫丁湘田，在辛亥革命时即在一起秘密工作，历史很长，但二

<sup>①</sup> 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页。

人只同居而不正式结婚，这是他实行“心社”社约的表现。刘思复的道德人格深受他的信徒们的敬佩。当时“心社”在广州《平民日报》与《天民报》上开辟“心社析疑录”一栏，讨论社约和公开鼓吹无政府主义，在一些青年学生中获得了同情。课室和宿舍常有人热烈讨论“废除姓氏”和“取消婚姻”的问题，还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废姓风潮。虽然他们所躬行的良德，有矫枉过正和禁欲主义的倾向，还有脱离政治、放弃夺权斗争的偏差，但也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社会影响。对国民性的改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虽然师复主义者反对一切政府，在推翻政府的问题上，走向了极端，但在民国初期，它主要是揭露袁世凯政府对人民压迫的本质，指斥了袁世凯北洋政府独裁专制的罪恶，对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动员作用。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局势非常紧张。袁世凯横暴益甚，对异己者，动辄加以乱党名目，格杀勿论。《晦鸣录》在发刊词中，揭橥反抗袁氏强权之宗旨，指出：“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社会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他们声讨袁氏压制言论结社的自由。1912年12月，袁世凯下令解散“社会党”，1913年，又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其党员陈翼龙在北京被枪毙。刘思复作文痛斥袁氏罪恶，又在《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中说：“袁氏秉政，其专制乃甚于满清，不独吾党备受摧残，即温和如‘中国社会党’亦不能相容。言论集会之自由，剥夺净尽。”<sup>①</sup>他们揭露袁世凯政府利用法律作为镇压人民自由权利的手段，指出了不可迷信法律万能。这些具体的斗争，其攻击的矛头是指向袁世凯的封建独裁统治的。

第四，在中国率先提倡工人运动，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并促使中国革命分子在走向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师复主义者在工人中的活动，邓中夏的《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得最清楚。广东的机器总工会、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都是由他们首先搞起来的，其中机器总工会到五四时已有10余年的历史。1919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河南的大基头组织一个“互劳俱乐部”（即互助劳动俱乐部），在河南尾同庆四街，组成了“觉然俱乐部”，在长堤电灯厂、增埗自来水厂、石井兵工厂等处，都成立了俱乐部，主持人是梁一余，参加者有区声白、刘石心、梁冰弦等。他们在工人中策动组织工会，晚间传习世界语。

1920年，陈独秀和谭平山、陈公博、梁冰弦、区声白、黄尊生、刘石心等在

<sup>①</sup> 师复：《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

广州组织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办了不少宣传刊物，以推动劳工运动。广州出版的《劳动者周刊》，由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编辑。广东的工人运动发展较快，声势较大，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不久，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便分手了，无政府主义渐走向衰落。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很快衰落，而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呢？

首先，是它理论上存在重大的缺陷和谬误。无政府主义认为可以在推翻旧政府后，马上废除国家，而不考虑国家消灭所必须的各种客观条件，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只能使得它的理论陷入了空想。当时，不少革命分子就指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国家消亡等道理是不错，但非目前所能做到。”<sup>①</sup> 无政府主义认为人性是善的，把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实现寄托在“只要人类发扬互相扶助的本能即可”这样片面的认识上，而对于人类也有斗争征服的本能这一方面估计不足，也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这使它在理论上陷入了片面性。无政府主义认为一切国家、政治、法律和权力等都是蹂躏多数人自由生活的少数人造出来的，这是归纳了过去的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结论。但是，无政府主义认为将来的国家政治机构也是违反多数人意志而成为少数人的机关，这就未免太过于武断了。从资本主义制度，一飞脚跑到共产主义社会，从事物发展的规律看，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看，都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不管是多么美妙，由于缺乏实现的基础，成了空中楼阁，只能向往一下，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自然便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

其次，是它在实践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残酷的阶级斗争需要坚强的领导、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而无政府主义恰恰相反，想依靠自由散漫的、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去和全副武装的敌人斗争，其手段是十分软弱的。无政府主义否定革命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使得革命阶级在打击旧势力时，不能形成有力的拳头，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不少革命志士在实际斗争中感受到这一点，便迅速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羁绊，走上了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们说：“一个迷途的人，忽然面前现出一条大路而且是捷径的，还有‘舍而不由’的道理吗？”“要达到共产主义，非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不可”。<sup>②</sup> 对于欧洲革命来说，无政府主义已经是被抛弃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它更加不能指导。所以，无政府主义的衰落是必然的。

<sup>①</sup> 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印，第183页。

<sup>②</sup>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4页。

## 林森任治河督办时期的广东水利建设

### 一、林森出任广东治河督办的历史机缘

民国 11 年（1922 年）6 月，陈炯明发动兵变，围攻总统府和炮轰孙中山在广州的住所粤秀楼。8 月，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到达上海，积极联络各方势力，准备武装讨伐陈炯明，南下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孙中山说：“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再造民国，还要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须选定一个好屋基，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sup>①</sup> 民国 12 年（1923 年）1 月，孙中山胜利地发动了讨伐陈炯明的战争。2 月，孙中山重回广州，设立元帅府。3 月，正式建立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大本营建立后，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随之建立起来，由廖仲恺、孙科分任广东省省长和广州市市长。由于广州革命政权从建立开始便处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围攻之中，亟待从各方面加固和扩展，所以孙中山在民国 12~13 年（1923~1924 年）中，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打败了叛军陈炯明对广州的围攻，成功地从北京外交使团手中收回了粤海关“关余”，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镇压商团叛乱，筹建黄埔军校，等等。

其时，正任福建省长的林森因直系军阀孙传芳所部入闽，难于在福建立足，乃从福建来到广州，辅助孙中山。民国 12 年（1923 年）7 月 24 日，孙中山任命林森为大本营建设部长，8 月 20 日，就职视事。<sup>②</sup> 10 月 26 日，孙中山又任命他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民国 13 年（1924 年）1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主席之一。后当选为中央执委兼海外部长。6 月，兼理广东治河督办事宜。<sup>③</sup>

林森在担任治河督办时期（1924 年 6 月~1925 年 7 月），广东治河处在北江动工兴建钢铁活动水闸，在西江建石坝以防水患，又疏浚珠江以利交通，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林森出任治河督办是他政治活动中的一项兼职，他的任职时间甚短，主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74 页。

② 见《南方政府公报》（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3 年第 22、26 号。

③ 张磊主编：《孙中山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72 页。

要精力并不放在治河上。但在任职期内，治河处工作有进展，与他的工作精神、工作态度和领导作风亦有关系。由于水患对广州威胁很大，治理河道对经营广州这个民国革命的大本营来说，亦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所以，对此贡献亦应予以肯定和评说。

## 二、广东治河处的设立和运作

民国3年（1914年）夏，广东洪水为患，西江、北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一部分被洪水淹没，水面之高，为70年来所未有，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粤民怵于水患，公举代表联同旅京人士呈请北京政府派员疏治粤河。”<sup>①</sup>此请得到北京政府重视，很快便任命谭学衡为广东治河督办赴粤主持治河事宜。同年12月，谭学衡抵达广州，设立了广东治河处。广东省设署治河，滥觞于此。

广东治河处成立后，先后担任督办的，有谭学衡、曹汝英、孙科、汤廷光、姚雨平、林森……。其中谭学衡任职时间最长，其余任期均为半年到1年不等。林森为第6任督办。林森于民国14年（1925年）6月辞职后，治河处督办一职改为治河处长，隶属广东建设厅。民国16年（1927年）10月，复改为督办，隶属国民政府，继任者为戴恩赛。<sup>②</sup>治河处专管水利，掌理河海之疏浚、筑堤和预防水患以及发展水利及筹款施工事项。民国18年（1929年）改为治河委员会，兼管建港、筑埠事宜。

民国8年（1919年）以前，治河处主要工作是测量水情，民国9年（1920年）以后，陆续制订了治河计划和施工方案，开始了初步的整治。广东治河处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采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使用国际先进材料和设备进行治河。开始时，治河处特地从上海请来了具有丰富经验的上海浚浦局总工程师、英国人海德生来广东领导勘测工作。不久，海氏辞职。民国4年（1915年）8月，再聘请了瑞典籍工程师柯维廉为正工程师兼测量员，又选调了一些广东测量局人员，共同负责测量工作。正是这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长期坚持在治河第一线默默无闻地艰苦奋斗，查清了水情，次第制订出了整治西江、北江、珠江、东江的详细计划。<sup>③</sup>民国9年（1920年）后逐步筹措开工，从而使广东治河工程进入了科

① 广东治河委员会1936年编印：《20年来广东治河汇刊》。

② 同上。

③ 计划项目主要有：广州进口水道改良计划；珠江前航线改良计划；西江都城新滩改良计划；高要高明县属泰和、秀丽、白鹤等围防涝计划；北江改良计划；开辟海口帆船港及黄埔港计划。

学系统的整治阶段。<sup>①</sup>但由于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环境之中，经费少，且经费多不能按时支付，更兼战事频繁，致使许多计划不能动工或搁浅，到抗战前的1936年，已完成工程尚未及计划预算的1/5。此种境况，使治河处同仁一念及此，夙夜忧叹，引以为深憾。

### 三、林森任职时期的工作及效果

(1924年6月~1925年6月)

在林森任职的1924~1925年，广东省各地局面仍是动荡不安，但在西江和北江流域，却于此种政局下完成了一些实际的防护工程，成绩是令人满意的。

#### (一) 整治西江

西江发源于云南省之东北，其流向先趋于南，沿途受纳云南诸湖之水，挟之而下，约至热带圈处，改向东北，循此向流至滇黔桂三省交界地方，转为向东，沿黔桂两省之界而行，蜿蜒约370公里。出贵州境后称为西江。向东南行，横过广西全省，以达梧州逼临广东边境。梧州而下，东向入粤，至三水县城，折而向南，入南中国海。统计全长1790公里，在广东省内者317公里。

西江下游的洪水，为上流降雨量大时各支流暴涨所致。民国3年（1914年）时，西江上游各支流之水倾泻而下，极为急速，瞬间水位即行飞涨，24小时内，涨高6.7米，以致泛滥成灾。广东治河处根据测量数据，提出整治办法数种。一为缩小流域范围；二为凿新河以泄水入海；三为开阔河床；四为收束流量。因经费不足与社会动乱等原因，大型水利工程难于举办，为杜绝西江及海口三角洲涝患，惟有依靠围基。修建和加固沿河堤围，将全部流量，收束于干河两岸围基之间，以资宣泄。

林森任职期间，正是西江分段防涝计划的第一阶段——“宋隆防涝计划”的实施时期。宋隆流域属广东省高要县，流域面积为410平方公里。耕地约有135平方公里，占全部面积的33%。该处只有一小部分区域有围基保障，名曰大榄围或思霖围，但两围土基均高度不足，基身薄弱，一遇较大涝水，即不能抵御，所以在

<sup>①</sup> 广东治河经费，初无专款。民国3年（1914年）开办伊始，由北京税务处及广东省慈善团体所办之治河公局一次拨付数万元，以为开办费及测量西江之用。民国4年（1915年）又拨赈灾款数万元，继续测量珠江和北江。民国5年（1916年），编定预算，每年13.2996万元，呈准广东财政厅照拨。但因财政困难，只能每月拨给0.23万元。到了民国7年（1918年），由海关关余一次拨款100万两，建筑芦苞水闸。民国8年（1919年），广东军政府指拨关余6万元，建筑马嘶水闸及附近围基。民国13年（1924年），由粤海关每月拨给工程费1.4万两。

民国3年(1914年)、4年(1915年)、7年(1918年)、13年(1924年),洪水不是把围基冲成决口,就是漫过基面造成淹浸之患。宋隆流域之其他部分,则全无抵御涝患之设备。平常年景,每遇夏涝,禾田损失达61%。因此之故,民国3年(1914年)、民国4年(1915年)时,旅居广州及香港的宋隆人士,为建设家乡,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成立了“宋隆建筑基闸公所”。其股份之集合,均由旅居广州、香港,侨居澳洲的宋隆人士,以及宋隆各村人民共同肩任。其时恰值治河处成立,治河督办据“宋隆建筑基闸公所”之请求,派员规划一切。又于民国11年(1922年),咨请广东省长核准,于民国12年(1923年)动工。工程的主要部分,是建筑宋隆水口活闸、挖凿活闸出入口道、建筑新基以联络活闸与西江岸边旧有围基、改筑培固大榄围思霖围、在宋隆流域的西方和南方沿边建筑各峡横基等。

挖掘闸位地脚工程系在民国12年(1923年)10月开始,宋隆流域西边各横基系于民国13年(1924年)开始,其他各基则在民国14~16年(1925~1927年)分别建筑。林森任职时为民国13~14年(1924~1925年)。挖掘活闸地脚工程,颇为浩大,为初时预料所不及。挖掘闸位入口水道,工作倍感困难。建筑各围基和连络活闸新基时,由于与该项工程有直接利益者发生争执,后来又爆发了水口村武力阻止工程事件。改筑大榄围和思霖围的困难更多,因要拆毁一部分民房,补偿问题又无法善后,故遭反对更烈。加上时乱及匪盗,种种困难,无法尽述。开头有人提出,将各项工程分段招商承办,可分治河处之劳,处事亦可较为简单。但当时始终难以找到具有办理此项工程能力及经验之商人愿分承办理,所以治河处决然承担了全部工程任务。他们在宋隆水口设立办事处,各段另设分段办事处,处理了大量具体事务。全部工程由治河处派洋工程师一员直接管理,并派华人工程人员及事务人员协同办理,工程技术人员下到各村规划基线并直接与房屋所有人协商解决纠纷,加快了工程进度。挖掘闸位地脚工程本在民国12年(1923年)10月开始,其后因采石阻碍,于民国14年(1925年)2月始着手三合土凝结工程,活闸整座于民国16年(1927年)夏季完成开始使用,当年夏水被有效地抑制,该处一带洼地,是年收获田禾及价值,较往年多增毫银80余万。宋隆流域既得围基和活闸为保护,免除了涝患,还可以蓄水灌溉,使地势较高的田地也获丰收。由于较大船只可以在江上来往行驶,交通大为便利,市场日趋繁盛,人民生活及农工贸易也随之发展。<sup>①</sup>

## (二) 整治北江

北江防涝患之方法,与西江大致相同。将沿河各围基改良建筑,加高至适合的

<sup>①</sup> 广东治河委员会1936年编印:《20年来广东治河汇刊》。

高度，再增筑活坝及水闸于各支流之内，以防涝水之泛滥，捍护广州及广州西北境。整个北江防涝计划预计经费为1 100万元。因巨款不易筹集，故治河处计划于三水县的芦苞和西南两涌先建筑活闸，以限制北江流量减轻涝害。

芦苞活坝用土通离式闸门，是向英国伦敦兰森纳伯尔公司定做。该活坝具有16米宽之水窦，另有活坝6孔，每阔10米，皆具活动铁闸，均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工艺技术。民国9年（1920年）9月动工，至11年（1922年）6月，闸墩地脚工程告竣，到12年（1923年）4月涝水初涨时，活闸大致告成，介于北江和广州间一带田野受益颇大。民国13年（1924年）冬，林森任职时，因闸趺护口下游水深之处，骤然发生巨大激荡，致令芦苞活坝底的护石，微现变动之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此种变动虽小，但后果严重。所以，治河处马上组织人力用洋灰三合土重筑全部坝底护石。民国14年（1925年），又用束枝沉垫法修理坝底护石。由于修治及时，是年涝季中，护石已无显著变动。另外，因各围修筑工事，也大都于涝期再至前抢修完毕，所以民国14年（1925年）时，有效地减轻了水患。后来，在民国19年（1930年），再用钢筋三合土外罩法保护坝底护石，工程得以不断完善。

### （三）疏浚珠江

珠江之水，多由北江而来，也有西江水灌入。但每到旱季，珠江与西、北两江往往由于断流而不能通航。这时，珠江俨然一条卓然自立之河，是航运的重要水道。珠江正干之源发于广州从化县境内的柏塘山，流至广州沙面前的河南洲头嘴处，分为两大支流，也即珠江前航线及珠江后航线两条水道。两支流流到黄埔下数里处又复合而为一。

广州城在珠江前航线之左岸，此线较后航线为短，且水较浅，苟非潮水盛涨时大河轮船不能行驶，所以口岸轮船进入广州多走后航线。珠江河道浅，泥沙混杂，在泥沙之下，又是一层坚泥，后航线在低水位时亦只有2.7米深，前航线则更浅。所以，吃水在约4米的船只不能日日驶进广州口，只能在潮涨时驶入。而吃水在4.9米之船则根本不能驶进。海德生工程师在一份报告中说，改良的方法可用浚河机浚深河床，如使后航线浚深至4.6米以上，并筑堤以收束河身之阔度，那么吃水约4米的船便可日日驶入广州。如浚深至6.1米以上，广州可辟为内河深水港口。

治河处于民国7年（1918年）制定出疏浚珠江后航线测量预算报告，民国12年（1923年）制定出疏浚珠江前航线测量预算报告。此报告得到广州市政府重视并批准，拨给相当款项，开始了一些初步的工作。<sup>①</sup> 这些工作为广州日后建成为一良

<sup>①</sup> 广州市政府编：《市政公报》，民国12年（1923年）9月第94期。

好内港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认为，广东省的治河工程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因其对于民生关系重大，民国政府一直予以极大的关注，但一则省内军事未已，社会动乱，盗贼横行；一则财政困难，致使工程常常陷于停顿、窝工，拖延了完工的时间和减低了效果。在林森任治河督办的1年时间里，西江和北江流域均有建筑工程，东江流域也有养护工作。特别是芦苞工程，备受艰难，加速进行。而于民国13年（1924年）中断之宋隆工程亦克服困难重新动工。又民国14年（1925年）涝期再至之前，各围修筑工事也大都完成。因此，是年涝涨时期，除东江各处围基间有崩决外，其余各处均无重大灾情，广东人民皆额手相庆，视为“大幸”。林森任内之工作，值得肯定。

## 后 记

当我在该书稿的最后一页写上句号的时候，我很想对读者谈谈我的导师何若钧先生。何先生已于2004年深秋仙逝，离我而去近3年了，而我还没有机会写点文字纪念他，心中一直不安。我想，今天应该是我向导师的在天之灵奉献感恩之心的一个适当的时候吧。

由于我出身于岭南文化人的家庭，加上我的父亲刘逸生、兄长刘斯奋均为颇有名气的文人，很多人在得知我的家世后，自然而然地会说上一句：家学渊源。而我总是回应道：我的知识都是老师教的。这完全是事实。在我的家族中，承传文化不太像中国古代学术流派，讲究一脉相承。我父亲研究唐诗、宋词和中国古典文化，兄长研究诗词外，长于历史小说和绘画，弟弟刘斯翰研究诗词、汉赋、诸子，我则主攻中国近代历史。虽然都是作文史研究，但研究方向歧异。这除了我父亲从不要我们和他一样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时代使然。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一个很大不同，是家庭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不再被局限在家庭、家族之中，而是融入了社会、国家、民族的大海里。所谓家族主义，在近代已经逐步走向解体。我们接受的教育，主要不是来源于家庭，而是来源于国家和社会。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种文人的家庭出身还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更谈不上愿意接受家庭的影响。所谓家学，只是家有藏书，任你翻阅而已。但也可能是骨子里存在的先天基因，兜兜转转之后，最终还是走向了文化人的圈子里，以承传中国文化为职志。

1977年是大学恢复考试招生的第一年。在农村基层工作了11个年头的我有幸被华南师范大学录取，但种种原因未能就读，一直深以为憾。翌年，又再报考该校研究生。在选择专业时，看到中国近代史专业一栏上导师的名字：何若钧。好像是一种缘分的吸引，这个名字给了我莫名的期盼。

当年，华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录取学生两名：赵立人兄和我。加上世界史专业录取的两位师兄，该校历史系第一届研究生共4人。当我第一次面聆何老师

教诲时，先生端正清癯的面容、花白整齐的须发、修长白皙的手指、儒雅得体的谈吐，使我这双见惯了粗手大脚、面孔黧黑的村夫野老的眼睛睁大了：这正是高等学府大楼深院中的知识分子！是那样优雅、洁白、精致和超逸。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还有一种距离感。虽然我是在广州长大的城市青年，但下乡务农和工作 11 年之后，已经改变了很多，我只是一个粗陋的村姑而已。毛泽东说，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改造自己。我自认为做得颇好，不论是当农民、当民办教师，还是当县委干部，我都是“一脚牛屎”。

我是 1966 年的高中毕业生，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扎根农村不回城，早就死了读大学的念头。1979 年考入大学攻读研究生，对我来说真像是劫后重生，喜出望外。但我已经 33 岁！青春已逝，精力不济，加上营养不良，那 3 年的课程读得十分辛苦。不幸又患上重病，几近死亡边缘，萌生退学之想。多蒙恩师不弃，得以如期完成学业。

何先生出身于清代京师吏人之家，生于 1911 年，正是清王室寿终之年。曾于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他一口京话十分醇和嘹亮，字正腔圆。能言而不好辩，言语之运用，只在教导学生时加以发挥，为人十分厚道，体态祥和。每周两次，我上先生之宅受教。华师北区有几十座鹅黄色的双层独立小砖房散落在绿树丛中，当时称得上是别墅式的住宅，现在已经全部消失。当我怀着朝觐一般的心情沿着楼梯拾级而上走进先生之厅堂，先生早已坐着等候我。他的前面摆着几本厚厚的、发黄的历史典籍，这使我想起了“故纸堆”3 个字，荒疏学业 11 年的我是否钻得进去？

那时的专业课没有集体开课，采用一对一的辅导方式，何先生布置我阅读文献和史料，然后提问和答疑。在今天，这种待遇已难得享受了。我对历史十分无知，又经常提出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文字和思想上的问题来讨教，有时离专业颇远，有时离现实太近。先生毫不生气，热心查字典、找原著，语言亲切，令人如沐春风。但先生也严肃地指出我的弱点在史料研读之不足，论证空泛。他说：“历史学者就应以史实说话，以史为据，论从史出。”从此，拨正了我为学之态度和方法。待我稍为熟悉史料后，先生又建议与我合写论文，通过这种方法让我受到激励和锻炼。在学期间，与先生合写的论文《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研究》均发表。文章主要为先生所写，让我署名，全是提携之意。先生苦心，学生终生铭记。

毕业论文的选题，先生不容我有依赖思想，坚持要我自选。我选了一个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外的历史人物（张謇）作为研究对象，又北上游学，找寻和收集资料。临行时他叮咛再三，并写了数封介绍信让我揣在怀里，指引路径，尽力提供帮助。他把我当做女儿一样看待，以为我一个弱女子孤身而行，会害怕畏缩。其实，我在“文革”大串连时已走了半个中国，又经过“上山下乡”10 年锻炼，与他身边的

娇儿不同，走南闯北，视为平常。见我如此表现，他又大为诧异。

有一段时期，我身体极为衰弱，大部分时间在家养病，不能每日到校。何先生每周必来一信甚或两信，告知系里开会或党组织活动等消息，以免我因缺席被责。先生待我之细心关心，胜过父亲。其时，学校饭堂伙食极差，为了给我增加食欲，何先生经常留我在他家吃饭。师母特地给我煮可口的饭菜，她煮的卤水蛋非常好吃，直到今天都记得那种咸咸的、香香的味道。我与明理通达教养极好的师母和他们可爱的女儿小燕都成了可以推心置腹的忘年交。

1982年毕业时，何先生执意要我留校任教，而我则惧怕做学问之艰辛而迟疑不决。经他一再鼓励，我才突破心理障碍，决心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安身立命之所。我在历史研究方面毫无天赋可言，后天的努力也很不够，如今入行近30年，勉强弄出几本书来，自知难成大器，与先生之期望，相去甚远。

何先生立身清正，对人的品德极其看重。他常说，人品重于学问。对学生的评价，也多从品德着眼。他最憎恨追名逐利、见利忘义之徒。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左倾”思潮统治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老教授们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对人心之叵测深有感受。他们在一起评论某人时，第一句就问，这个人的品德如何？何先生因为学历高、留过洋、出身官僚家庭等原因也曾遭受一次次的批判，连半生心血写成的三大册《中国近代外交史》也被抄走不知去向。由于资料的散佚和年华老去，此书终未能重写而成为一生憾事。

何先生治学严谨，从不信口开河，也不人云亦云。每写一篇论文，必阅读大量历史文献，反复比较以弄清事实真相。下笔谨慎，言而有据，令人信服，常被推为“确当”之作而入选论文集。20世纪80~90年代前期的学术会议所集论文，与今天不同，不是有文必收，有文必刊，而是十里挑一，精编而成。特别是入选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集的，都是相当有水准的文章。何先生常代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广东省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担当学术评委，出任研究会理事，他的人品和学问赢得历史学界同行的尊重和认同。在“文革”后史学界拨乱反正的大业中，他们这些老前辈的历史学人为我们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功不可没。

何先生以75岁高龄退休，又以93岁高龄辞世，毕生服务社会，献身史学教育和研究，功业长存人间。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导师何若钧教授。

刘圣宜

2007年9月26日